

# 蔣介石王朝在京滬杭最後的掙扎

侯鏡如 覃異之 廖運澤

## 前 言

京滬杭之戰，是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下江南所進行的規模比較大的一次戰役，也是蔣介石王朝最後掙扎的一次大戰。這一戰結束了蔣介石王朝二十二年的血腥統治，因此在歷史上是有一定意義的。我們三人都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又都參加蔣介石這一最後掙扎的大戰，那時候鏡如任蔣軍十七兵團司令，覃異之任蔣軍南京衛戍副總司令，廖運澤先後任第七綏靖區及第九編練司令部副司令，又都先後投向人民。茲將我們在這一次戰役中所見所聞，及從各有關方面所得的資料，綜合寫成此篇史料。但我們接觸的範圍有限，所記遺漏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予以指正補充。又此稿曾蒙李以勛先生核正若干材料，附此致謝。

### 一 從淮瀋戰役中的滁縣指揮所說起

南京衛戍總部滁縣指揮所，是負責南京衛戍區長江以北地域指揮任務的單位，所轄地域包括津浦路明光以南、東自江蘇的儀征、西至安徽的定遠等十餘縣。指揮所除了一個衛兵連外，沒有固定的建制部隊。津浦路蚌埠至浦口段的護路任務，由交警總隊担

任，平时不归卫戍总部指挥。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紧张之际，覃异之担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滁县指挥所主任。在此期间，先后归指挥所指挥的部队有：袁英的暂编第七师，罗贤达的六十六军，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杨幹才的二十军等。当时滁县指挥所防区内没有人民解放军，只有江淮军区孙傅家的游击总队。淮海会战愈紧张，江淮军区的游击部队也愈活跃，津浦路蚌埠滁县段的铁路常被破坏，各县地方团队常遭袭击，蒋军东奔西跑，疲于奔命。12月1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召覃异之到国防部，当面指示说：“黄维兵团昨天垮了。刘总司令（刘峙）即由蚌埠移到滁县。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正由无锡开滁县，归你指挥。另外给你交警总队一个团，由你负责掩护刘总部的转移。你可乘飞机到蚌埠走一趟，和刘总司令及李延年兵团（第六兵团）联系后，迅速开始行动。”覃在蚌埠机场遇见黄维兵团的副司令胡璉，他于15日才由双堆集逃跑出来，等候飞机去南京。胡垂头丧气地对覃说：“这回老本都搞光了。黄维的下落还不明，我是乘坦克冲出来的。”

覃见了刘峙和他的参谋长，研究当时的情况，一致认为杜聿明的部队未被歼灭以前，解放军主力南下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有适当兵力作妥善部署，由蚌埠到滁县，行车的安全是无问题的。

在蚌埠，李延年请覃吃饭，李穿长袍，仍然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私下批评刘峙说：“我们这位刘老师（刘曾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既无办法，又无决心，和他在一起打仗，真把人气死。”晚间，九十六军政工处还举行跳舞会，舞伴多数是些妓女。临解放前的蚌埠，蒋军高级人员还是大吃大喝。有人开玩笑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确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大约12月下旬，刘峙的总部开始由蚌埠撤退，李延年兵团的主力也逐步南移，覃把掩护部队布置在铁道

两旁，一部分占领阵地，一部分游动“扫荡”。当时除在颍八岭附近发生一场比较激烈的战斗外，其他各地只有零星战斗。刘峙到滁县的第二天，覃还陪他及总部的幕僚人员游览了滁县附近的名胜。覃在丰乐亭上曾写了一首五绝：“当年丰乐土，今日遍狼烟，空有遗碑在，登临一黯然。”大有此游之后，不知何日能再来之感！刘峙还犒赏覃所指挥的官兵每人银洋二元。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领之部队被歼灭，徐州“剿总”撤销。李延年兵团于1月19日炸毁淮河大铁桥以后，由蚌埠南撤。滁县指挥所在这期间，不断接到各县县长告急求援的电话。这时只有杨幹才的第二十军在滁县掩护李延年兵团的撤退，根本无余力照顾各县。第六兵团南撤后，滁县指挥所即撤销，江北地区防务由第六兵团负责。

## 二 淮海战役后南京反动集团的种种矛盾

黄维兵团被歼灭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反动集团希望在徐州蚌埠地区打一个胜仗以稳定战局的幻想破灭了，大家都预料到杜聿明部也将很快地被歼灭。当时反动集团内部，真是人心惶惶，蒋军高级将领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的“求和”声明，寄以很大的希望。当时覃异之还在滁县指挥所，元旦前夕接到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电话说：“请你注意收听明天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将有重要的新闻发表。”刘峙总部秘书长刘子清也接到南京打来同样的电话，足见大家对这个声明多么关心。可是蒋介石的欺骗手法，是瞒不过广大人民的。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八条件，南京集团的反动头目大为不安。汤恩伯曾对覃异之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使大家都知道，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没有信心，他说：“从湖口到

上海共七百九十公里，只有十八个軍，光靠軍隊防守是不夠的，必須組織地方民兵配合才行。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可从組織民众方面做点工作。”湯的副总司令万建藩对覃說：“如果不打徐蚌会战（淮海会战），今天我們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見战略上决策的錯誤，影响太大了。”在軍事緊張的同时，反动派内部的矛盾也更尖锐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桂系与蒋介石圍繞着“利用和平談判作政治資本”所展开的勾心斗角。

由于軍事上不漸遭到慘敗，蒋介石在反动集团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蔣管区的物价飞漲，人民反蔣运动日益高涨。在外交上，美国自杜魯門連任总统后，对于蒋介石更为不滿，除了因为蒋介石这个傀儡的招牌已破产，需要培养新的奴才外，还因为杜魯門和杜威竞选总统时，蒋介石錯誤地估計杜魯門必然失敗，企图乘机拉攏杜威（蔣曾通过孔祥熙父子在美国花了許多錢帮助杜威），因而招致杜魯門的厌恶。在此种情况之下，李宗仁认为是取蔣而代之的最好机会。蔣政权的許多高級軍政人員，也认为李比蔣平易近人，希望李出来收拾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殘局。当时关麟征、覃异之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种看法。这是长期以来不滿意蒋介石过分重用浙江人（如陈誠、胡宗南、湯恩伯等）的积憤所促成的。就覃來說，对于蒋介石信仰的动摇，确是以后逐步投誠人民的开始。覃的日記上曾有这样牢騷的詩句：“公卿皆貴戚（当时社会上流傳：“蔣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財团浙江軍。”），国事日綢繆，有意归田野，无心恋帝乡。每因愁未盡，翻觉我难忘，黯武非长策，拔山笑霸王。”蔣帮將領这种普遍对蔣不滿的情緒，也增强了李宗仁取蔣而代之的信心。同时白崇禧在华中策动“五省联盟”（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并通过湖北省參議會1948年12月25日致蒋介石电，提出“和平解决”主張，



目的是逼蔣下台，提高桂系地位，給蔣很大壓力。當時蔣介石非常憤慨，拍桌子大罵，說：“共產黨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錢。”（桂永清、湯恩伯都對覃談過這段故事。）蔣介石於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被毛主席徹底揭穿其欺騙手法後，不得不於1月21日在謁中山陵之後，於下午4時10分乘專機黯然離開南京。

當時陪蔣謁中山陵的有南京政府一部分高級軍政人員，張樞明、覃異之、陳沛等還和蔣照了像。蔣曾對張等講了話，大意是：“今天我們在軍事上雖然失敗，但是只要我們知恥，發奮圖強，前途還是大有可為的。因為我們還有長江以南及西南廣大地區，比在黃埔革命時的基礎好得多。希望大家發揚黃埔革命精神，團結起來，一定可以轉敗為勝。”我們送蔣走了之後，大家心裡很難受，覃異之曾寫了一首詩：“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馬中原負霸圖（蔣介石客廳挂有于右任寫的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馬定中原。”），惆悵秦淮拼一醉，自來難得是糊塗。”可見當時反動集團的沒落心情。

蔣介石下台前三日（1月18日）把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並發表湯恩伯專任總司令（撤銷衢縣級靖公署），實際是要湯恩伯統一指揮蘇浙皖及贛東地區的軍事，積極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長江防務。同時蔣介石又派朱紹良為福州級靖公署主任，張羣為重慶級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級靖公署主任，陳誠兼台灣警備司令。在這樣的布置之下，蔣介石表面上雖然下野，實際仍能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從幕後操縱一切。

李宗仁上台後，於1月22日發表聲明，願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他們從各方面分頭找中共負責人接頭，除通過上海的民主人士找樞索外，還直接派人渡江找中共負責人接觸。覃異之曾兩次經手，秘密地把衛戍總部的通行証交給李宗仁

的亲信程思远。据程說：“德公(李宗仁)請李明揚过江去找陈毅，接洽直接談判和平問題。”在这期間，李宗仁曾約覃异之几次長談。談話內容，主要說明他的“民主”“和平”政綱，委婉地批評了蔣介石独裁帶來的危机。覃表示坚决拥护李的“和談”主張。李曾考虑在和談进行中他个人的安全問題，原打算由安徽抽調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担任警卫，后来只来了一小部分队伍(好像不到一个团)。覃曾告訴李，四十五軍三一二师有一个团(团长張荣儒)是自己的可靠部屬，李囑覃把这个团調来担任南京市的警备。(后来李由南京撤退，覃就由这个团中留下一个营負責維持过渡期間的秩序。)

覃从程思远处得知，在找中共进行和談的同时，李通过甘介侯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挂上了鈎。很显然，李当时是一手抓“和談”，一手抓美援。在軍事方面，李也做了一些拉攏黄埔学生的工作。他当面夸奖关麟征为中国少有的优秀将領，并打算以关代替顧祝同为參謀总长。关亦认为李恢宏大度，礼賢下士，可以共事。后来关到溪口見蔣介石，把李的意見向蔣介石报告。蔣对关說：“这是别人对我们挑撥离間，不要上当。你是带兵的人，我已通知国防部要你担任陸軍总司令。”关到南京見顧祝同，顧对关說：“行政院孙院长在广州，未經国防部的同意，竟直接发表張发奎为陸軍总司令，这是从来没有的作法。你暂任陸軍副总司令，一两个月后，把張調开，由你接任。”由此可见，蔣介石下野后，孙科也想乘机通过張发奎来抓軍隊。不久張被調为战略委员会委員，由关接任陸軍总司令。关从此即更靠攏李宗仁。后来在香港，关曾对覃大談其“反蔣不投共”的意見。

李宗仁为配合他的“和談”主張，也玩弄过一些假民主的花招。1月24日，他命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各地“剿匪”总部改

为軍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釋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間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館杂志；(六)撤銷特种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但1月26日的行政院會議上，除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外，表面上似乎都接受了李的指示。实际上，这批行政院的反动头目却从戒严法上玩弄阴谋，正如行政院的一个负责人說：“开釋政治犯与戒严系属二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項，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負責当局，为維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很显然，将政治性质事件引用所謂戒严法来处理，把所謂“政治犯”换上另一种“罪名”，也就可以不开釋了。事实也是这样，湯恩伯在2月11日发表談話，声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繼續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情事。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情事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軍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聞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民心。如有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張，破坏軍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沒有正式接到复刊許可时，不得复刊。”

当时南京上海有些人民团体，如中国人民和平促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等，都是創議局部和平的，一部分輿論也拥护局部和平。而蔣介石即以“全面和平”作幌子来破坏“和談”。湯恩伯的談話就是针对“局部和平”主張者而发的，同时也是暗示抵制李宗仁的一些所謂民主措施。

李宗仁抓住“釋放政治犯”這個招牌，是用來提高自己打擊蔣介石的威信，顯示他比蔣介石開明，企圖借此挽回國民黨在蔣管區的人心。在這個問題上，羣眾之是支持李宗仁的。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的態度是“不反對釋放政治犯，但是怕負責”。羣建議李宗仁給衛戍總部下命令釋放政治犯獲得同意後，由羣根據手令以迅速的法先釋放南京在押的政治犯約三百多名。湯恩伯對此大為不滿，派人到南京來查問。羣將李宗仁的手令拿出來，湯沒辦法，只得下令把南京的政治犯全部移往上海，歸湯總部直接處理。當時羣之釋放政治犯，也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國民黨的政權已無法挽救了，想做幾件有利於人民的事，為將來和平談判成功時，取得中共的諒解，以便得到較好的政治地位（當時還沒有立功贖罪的認識）。

南京在解放前夕，社會秩序很混亂，物價一日數漲，街頭巷尾銀元販充斥，傷兵到處鬧事，流氓地痞乘機殺人越貨，糧店被搶日有所聞。前方各部隊被歼後逃到南京的軍官甚多，衛戍總部的軍官收容所人數不斷增加。這些軍官生活甚苦，滿腹牢騷，常到外面滋事。此外，由於政府遷往廣州，各部留京職員感到今後出路及生活都成問題，困難重重，先後分別組織聯誼會，以便向政府要求發給應變費（被遣散的人員要求發給遣散費）。2月3日上午10時，各機關留京職員聯誼會，在財政部大禮堂聯合舉行成立大會，由各單位派代表一人參加商討工作問題。主持大會的是財政部專員周臣千，到會代表竟有一百多人。因人多雜亂，身份無法鑒別，許多特務乘機混入，會場秩序無法維持，繼之發生紛擾，一片喊打聲，秩序大亂。警察局派武裝警察到場彈壓，中午始告安定。周臣千等數人被扣押，社會部一職員受傷。事後衛戍總部發言人羅春波（政工處長）發表談話，認為這個聯誼會是非法組織，表示要嚴加取締。

在这期间，南京还曾发生过一次惊动京沪的“暴动案”。在2月上旬一次卫戍总部的会报会上(军、警、宪负责人参加)，警察厅长黄珍吾报告说：“最近在首都警察局中发现反动的秘密组织，宪兵第七团也有人参加。此案牵涉很广，最好由卫戍总部派负责人与宪警两单位共同处理。”当时决定派总部政工处长罗春波负责处理这一案件。事后了解这个案件的破获经过大致如下：

卫戍总部稽查处(军统南京工作机关)发现孟士衡(东北人)活动的面很广，并知道孟是民革秘密组织的负责人，常出入光华门内大光新村二号吴士文家。东北籍特务秦范五与吴士文住一个院子，并参加孟等的组织。2月7日据秦范五密报，2月6日下午8时，孟士衡、吴士文、萧儉魁(又名萧成玉或萧振青，宪兵七团逃兵，据说曾到江北与中共江淮军区取得联系)等在吴士文家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五千人的暴动，行动计划如下：(1)控制飞机场；(2)截断交通干线；(3)扣留李宗仁及其他重要军政人员；(4)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5)迎接解放军渡江。他们决定以两千人在市內暴动，以三千人迎接解放军渡江。2月9日孟士衡到上海，2月10日罗春波派政工处上校附员马志青(东北籍)追踪到上海。11日马把孟从曲友诚家雇出来将孟逮捕，并于11、12两日，先后逮捕萧儉魁、马骏名、吴士文、王鼎臣，15日逮捕夏璋瑛等。

在此案发现之前，警察厅长黄珍吾，因送家眷南逃，用公家汽车将家具细软运走，被警察巡官扣留，《南京晚报》用大字标题报道这一新闻。黄见报大发雷霆，勒令《南京晚报》停刊，经该报负责人找覃异之特圆，才许复刊。黄因此怀疑警察局内部有问题，一面扣押和他捣乱的警察巡官，一面深入调查警察局内部的情形。终于发现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马荣及北区警察局局长刘某，均与孟士衡

有联系，先后扣押局长以下十余人（其中有一局长自首）。同时宪兵方面也扣押了宪兵第七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二十余人。4月4日湯恩伯命令将孟士衡等押往上海，交其总部处理。民革京沪负责人王葆真亦因此案牵连，在上海被湯恩伯扣押。5月9日，孟士衡，吴士文、蕭儉魁等，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被湯恩伯、毛森所杀害。

反动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嫡系部队也动摇起来。大约在2、3月间（确切日期忘记了）的一个上午，張耀明对覃异之說：“据稽查处（軍統）方面的情报，四十五軍九十七师师长王彦清，有通敌嫌疑，請你约他来总部談一談。”覃說：“王是軍校学生，又在陆大毕业，必須謹慎处理，如果搞錯了，將影响高級軍官的情緒。”当天中午覃正在和王彦清談話，忽接湯恩伯的電話，要卫戍总部把王扣押待查。覃即告訴王，囑其赶快逃走，然后以電話报告湯恩伯說：“王彦清回师部去了，已电赵震軍长就近办理。”当天晚上王彦清即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把部队拉跑。因这个部队是由蔣介石的警卫旅編成，王不容易拉走，天亮后蔣軍派飞机投下傳单，各团就陸續回来了，王只带几个卫士逃到江北解放区。赵震因此被撤职查办，以卫戍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四十五軍軍长。此案发生后，国防部大为震动，蔣介石也从溪口打电话来查問。

4月1日，南京曾发生血案，学生死伤不少。自北平和平解放后，南京人心受到很大影响，各大学学生反征兵、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据張耀明說：“关于学生游行問題，李宗仁曾召集各大学校长及首都軍、警、宪和国防部有关单位，开了一个会。我是不同意学生游行的。我主張把学生围困在学校里，以免出問題。李宗仁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我在北平就让学生游行，并未发生什么事故。学生们有一股热忱，你越压迫，

他們反抗越大，給他們游行出出氣，有什麼關係。’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长)在会上說：‘学生游行，軍官总队也游行怎么办？’李說：‘讓他們分开游行好了。’各大学校长多半同意李的意見。”

在此之前若干日以來，軍官收容所政治队的軍官(政工干部編成，邓文仪、罗春波直接操縱)，曾不断和剧专学生的“活报剧宣傳队”发生冲突。这些政工特务們常到剧专学校去搗乱。邓文仪不止一次表示，要“以羣众运动对付羣众运动”。因此張耀明坚决主張使两者分別游行，以免冲突。張和邓文仪反复交涉，結果軍官总队提前游行。

4月1日，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和职工一万余人游行。在游行中并未发生什麼事故，不料参加游行的剧专同学乘校車返校至白下路大中桥时，竟受到駐在該地附近的軍官总队特务們的毒打。其他学校学生聞訊，赶来声援，并到总统府請愿，亦遭毒打。政大司机陈祝三當場被打死，屍体被特务劫去。單异之聞訊，即到卫戍总部，見特务們抓来剧专学院师生数名，其中有陈仲宜教师在內。特务气势汹汹地叫嚷：“抓到几名搗乱的共产党了。”單当即問明情况，知是特务們胡作非为，立即釋放被捕师生。这一天，总计被伤害的学生达二百余名。4月2日，中央大学物理系学生陈履繹，因伤不治身死(据说19日又有一名因伤不治身死)。張耀明星夜召开紧急會議，决定控制电讯，封鎖新聞，并决定以“互毆”来掩盖事实真相，推卸罪責。事后張耀明发牢騷說：“邓文仪給我們添麻煩，真混蛋。”

李宗仁取得代总统后，一手玩弄“和談”，一手勾結美国，目的是爭取時間，逐步巩固其已得的地位。桂系重要將領夏威(安徽省主席兼第八綏靖区司令)3月初在汉口发表談話，強調“划黄河而治”，正是代表桂系的主張。蔣介石將計就計让李出面周旋，爭取三

个月至六个月的時間，訓練出二百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当时蔣管区后方正加强征集及訓練新兵，如南京有王敬久的編练司令部，浙江有張雪中 的編练司令部，江西有胡璉及沈发藻的两个編练司令部，湖南有黃杰的編练司令部，四川有罗广文的編练司令部，台湾有孙立人的編练司令部等等。针对蔣李“緩兵計”的阴谋，毛主席于4月4日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告里宣布：“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話吓你們，无论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簽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这正击中蔣李阴谋的要害。

4月16日，黃紹竑携帶和平条款回南京請示。4月18日，据程思远向覃异之透露，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桂系重要人物黃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等开秘密會議，听取和討論黃紹竑关于进行和談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簽字。李宗仁沉默許久，最后表示向溪口請示才能决定。覃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去找白崇禧（覃与白是邻居），探問究竟。白說：“我們决不能在这个胁迫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簽字。”覃說：“这个江山簽字也完了，不簽也完了。”白很严肃地說：“我們不簽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負这个責任。”覃未再說，心里想将来的历史絕不是国民党写，而是共产党写。覃又去見李宗仁，李表示目前簽字有困难。看他当时的意思，似乎在蔣介石控制下有不能簽字的苦衷。李說：“我絕不会把战争带到广西去，我一定要对得起广西父老。”覃曾幻想广西有局部和平的可能，内心頗为快慰，因为他的家眷正在广西宜山家乡。李回到桂林后，最初表示消极，实际是和蔣介石討价还价，因此在蔣介石同意給以軍队指揮权、經濟支配权、用人行政权等之后，便和吳鉄城等由广州去“促駕”的人，一道乘专机飞广州，繼續反共去了。后来事实



証明，李宗仁仍然指揮不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當解放軍向粵北進軍時，李宗仁曾命駐海南島的二十三兵團劉安祺部增援粵北，而蔣介石却密令劉安祺開往潮汕，準備運往台灣。李對劉的“擅自”行動，雖嚴令申斥，並予以記大過的處分，但亦無可奈何。這是劉在廣州時當面對草談的。草對李宗仁的幻想又一次破滅，匆匆把家搬到香港，並和黃紹竑等四十三人在香港通電起義，從此走向光明。

### 三 長江防綫的崩潰

蔣介石於1月21日下野，25日就在漢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指示關於長江的布防問題，決定把長江防綫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指揮，其兵力有四十個師，約二十五萬人；湖口以東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其兵力有七十五個師，約四十五萬人。會後蔣派專人把作戰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執行，但將湖口以東的具體作戰計劃則保守秘密。

京滬杭戰區的作戰方針大致是：以長江防綫為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採取持久防禦方針，最後堅守淞滬，與台灣相呼應。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以優勢海空軍從台灣支援淞滬，然後待機反攻。這個作戰方針，李宗仁、白崇禧都不知道。李上台後，曾指示南京衛戍總部，作防守南京的計劃，並令國防部撥款構築防禦工事。他不知道湯恩伯正在秘密地將江寧要塞的大炮拆運上海。南京孝陵衛湯總部的指揮所，經常控制着一、二百輛卡車，準備隨時離開，根本沒有守南京的打算。國防部的某些負責人，也不知道這個方針的內容。在國防部開會研究長江作戰計劃時，湯恩伯根據蔣的指示，提出把主力放在鎮江以東地區的方案時，遭到第三廳廳長蔡文治的反對。蔡從全盤作戰方略來考慮，主張防守重點

应放在蕪湖地段，以确保南京的安全，当时即被湯斥为胡鬧。蔣介石的意图是拖延时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幻想在美国的保护下，重新统治中国。湯恩伯在談話中，也一再強調一年內必然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蔣經国曾对李以勛說：“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据他估計1950年一定发生世界大战。他說：“麦克阿瑟曾經表示，只要国民党能支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后来蔣介石亲到上海視察，对官兵讲话也一再強調上述的看法。

湯恩伯根据蔣介石的作战方針，策定长江防御指导要領，大致如下：

(1) 敌如由鎮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綏靖区部队，由鎮江沿公路及铁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2) 敌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綏靖区、第八兵团(原第四綏靖区)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贛綫。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錢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

(3) 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4) 淞沪地带，以獅子林、楊林、大場、真如、浦淞、梅壠、华涇为第一防綫；吳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涇、贛山公司为第二防綫；張华涇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綫。

(5) 有关补給事項(略)。

(6) 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圩、裕溪口、棕阳等地之阻塞。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及作战指导要领，京沪杭警备总部的兵力部署如下(见附图)：

(一) 淞沪警备司令部 (陈大庆)

防区为白茆口、崑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线，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贤、南汇，特别警戒上海市区。

(二) 第一绥靖区 (丁治磐)

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阵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浒浦、福山、鹿苑镇、楊舍、江阴、孟河、六港、鎮江、高资、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镇北之夹江洲岛、揚中、新碼頭、瓜州、礼州、义渡口特别警戒。該綏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崑山，西至鎮江与南京间之桥头堡。

(三) 首都卫戍司令部 (張耀明)

应以一部巩固大海、烏江鎮各桥头阵地。江南地段，迅速加强附郭工事，以一部守备桥头堡至銅井鎮間的江防，并确保龙潭、棲霞及大胜关。对新州車站附近江岸应特别警戒。

(四) 第六兵团 (李延年)

应确保浦鎮、浦口之安全，使南京不受敌炮火威胁。

(五) 第七綏靖区 (張世希)

以一部守备銅井鎮至銅陵鎮間的江防，确保采石、当涂、蕪湖。对获港附近之江面特别警戒。控制有力部队于蕪湖繁昌机动。对各桥头堡阵地、江心洲，须派必要部队占领。防区东至銅井，西至銅陵。

(六) 第八兵团(原第四綏靖区) (刘汝明)

担任銅陵至湖口之江防，各桥头堡阵地派有力部队确保之。

(七) 第十七兵团 (侯鏡如) (駐徽州)

八十七軍(段濟)開杭州整補(後改調寧波)。

一〇六軍(王修身)在寧國(歸第七綏靖區,為機動部隊),又該兵团之三一八師(彭懷霖)除派一個團隨兵团部行動外,余留杭州擔任警備(歸警備司令周鼎指揮)。

七十三軍(李天霞)撥歸第九編練司令部指揮,駐歙縣整補。

(八) 海軍第二艦隊 (林遵)

于沿江西段配置艦只,協同陸軍作戰。

(九) 機動部隊

第五十四軍(關漢騫)主力于丹陽集結,準備策應淞滬及第一綏靖區之作戰。第九十九軍(胡長青)于龙潭、下蜀集結,準備策應第一綏靖區、首都衛戍司令部、第七綏靖區之作戰。

各部隊的作戰地境如下:

淞滬警備司令部:崇明、白茆口、青浦之綫(綫上屬右)。

第一綏靖區:儀征、橋頭、高淳、太湖、平望之綫(綫上屬左)。

首都衛戍司令部:烏江、銅井之綫(綫上屬右)。

第七綏靖區:銅陵、黟縣之綫(綫上屬左)。

第八兵团(第四綏靖區):皖鄂省界、湖口、都昌、余干、金溪、資溪、光澤之綫(綫上屬華中軍政長官部)。

後來考慮到戰區太大,為了指揮靈活,又作如下的調整:

(一)調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為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金華指揮所主任,準備指揮浙贛綫之作戰。原屬該兵团之二十八軍(劉秉哲)改歸南京衛戍總司令部指揮,仍擔任浦口、浦鎮方面之防禦。九十九軍調為總部機動兵团。

(二)調張世希為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仍兼第七綏靖區司令,

駐宣城，統一指揮第八兵团及第七綏靖区的作战。派副总司令万建藩兼徽州指揮所主任。

(三)成立上海防守司令部：由石覺任司令，專任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揮。

沿江兵力配备如下(見附圖)：

(1)上海防守司令部 (石覺)

三十七軍(羅澤闓)轄二〇二、二〇四、二〇九等師(由青年軍編成)，駐浦东(二〇四師駐崇明島)。

五十二軍(劉玉章)轄第二、二十五、二九六等師由東北撤來，駐南翔。

七十五軍(吳仲直)轄第六、十六、二〇八等師駐沪西。

另有九十五師(朱致一)及馬志超部女警总队相当四个团为預备队。

(2)第一綏靖区 (丁治磐)

一二三軍(顧錫九)轄一八二、三〇八、三三四等師，駐白茆至鹿苑地段。

二十一軍(王克俊)轄一四五、一四六、二三〇等師，是四川部队，駐中港地段。

五十一軍(王秉鈺)轄四十一、一一三、一一四等師(东北軍底子)駐揚中地段。

第四軍(王作華)轄五十九、九十、二八六等師，主力駐鎮江，一師駐瓜州。

暫一軍(董繼陶)由江苏保安团編成，駐崇明島整編。

(3)首都卫戍司令部 (張耀明)

四十五軍(陈沛)轄九十七、一〇二、三一二等師，駐桥头鎮至

銅井鎮地段。

二十八軍(劉秉哲)轄五十二、八十、一九五等師，駐浦口地段。

(4)第七綏靖區 (張世希)

六十六軍(羅賢達)轄十三、一八五等師，駐銅井以西。

二十軍(楊幹才)轄一三三、一三四、二六三等師(二六三師在四川)，駐蕪湖地段。

八十八軍(楊寶毅)轄四十九、一四九、三一三等師，駐銅陵、旧縣地段。

(5)第八兵團(第四綏靖區) (劉汝明)

五十五軍(曹福林)轄二十九、七十四、一八一等師，駐貴池。

九十六軍(于兆龍)轄一四一、二一二、暫五師等，駐安慶南岸。

六十八軍(劉汝珍)轄八十一、一一九、一四三等師，駐湖口以東地段。

(6)機動兵團 (湯恩伯直接指揮)

五十四軍(關漢騫)轄第八、一九八、暫五十七等師，駐丹陽。

九十九軍(胡長青)轄九十二、九十九、二六八等師，駐龍潭。

為了加強鎮江南京段的江防，蔣介石派東南軍政長官部(實際是保密局)的技術總隊(專任破壞任務)杜長城部負責在這段江面敷設水雷，其中有水底雷、飄浮雷以及埋在沙灘上的地雷等。

戰役經過及蔣軍潰退情況：

4月20日以前，蔣軍在長江北岸的橋頭陣地，絕大部分已為解放軍陸續拔除，僅余八圩港、瓜州、浦口、浦鎮、裕溪口、安慶等地。江中的江心洲亦多處被解放軍占領，蔣軍長江南岸的陣地，已處於暴露狀態。

4月20晚，解放軍二十四軍、二十五軍、二十七軍由荻港對岸

两翼之太阳洲、黑沙洲、白馬洲等地向南岸猛烈炮击。21日晨，解放军约万人已分由该三洲渡至南岸。第七绥靖区司令張世希不断向湯恩伯告急，湯除責令張以駐蕪湖之二十軍楊幹才部堵击突破口外，匆匆派出机动部队九十九軍（欠九十九师）前往增援。21日上午湯曾到蕪湖視察，并当面鼓励楊幹才，口头許可升楊为兵团司令，令其指揮二十軍、九十九軍挽回战局。湯沒有料到，九十九軍甫抵宣城，江防部队在解放军强烈攻击之下，已放弃了陣地。九十九軍即經石臼湖以西，沿蕪杭公路企图逃往杭州。同时第八兵团之五十五、九十六、六十八各軍則分別向歙县、祁門、浮梁夺路南逃。孤立固守安庆之第八绥靖区（夏威）所屬之四十六軍一七四师，則逃过长江随六十八軍之后撤向浮梁，企图绕过鄱阳湖逃向九江方面該軍守地。

21日下午6时，江阴要塞一部分官兵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逮捕要塞司令戴戎光，占领了要塞，使南京以东之江防堡垒变成了解放軍渡江的桥头陣地。这个意外的变化，使湯恩伯及其將領，大为震惊。首先向湯恩伯报告这个情况的是二十一軍軍长王克俊。这是由于江阴要塞的炮忽然向該軍陣地射击，伤亡很大。他最初怀疑五十四軍第八师的陣地被突破，后来才发现江阴要塞出了問題。湯恩伯一面責令机动部队五十四軍星夜反击，同时令棲霞山之九十九师速开上海（該师兵車刚通过，沪宁铁路即被切断）。五十四軍的出击部队三个团，在路上即被解放军包围，激战至22日中午，一个师长陣亡，一个副师长負伤。五十四軍軍长關汉弼不敢繼續反击，改取守势掩护撤退。

22日，解放军由各个渡河点渡过长江的部队已达三十万人。湯恩伯惊惶失措，因他平日強調长江天險，共軍沒有海空軍配合，不

容易大举渡江。在这种意外情况的打击下，湯于22日下午匆匆决定全线撤退，撤退部署大致如下：

江阴要塞以东的二十一军、一二三军，沿铁路及公路逕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的五十一军、五十四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大湖向上海撤退。驻镇江之第四军及首都卫戍司令部所属之四十五军，统归張耀明指挥，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首都卫戍司令部改为第七兵团。第二十八军掩护南京部队撤退后，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

#### 李宗仁及其所部逃离南京的狼狈情况：

4月19日李宗仁何应钦在南京召集十一人小组委员会，听取并讨论黄绍竑报告赴北平和平谈判情况，次日李何联名电复北平，拒绝签订和平协定。这一消息传出后，南京人心甚为波动，向外搬家的人越来越多，京沪火车及京杭汽车拥挤不堪。22日上午，京沪火车中断，搬家的人都涌向京杭汽车方面，就更增加了军队撤退的困难。这天上午，浦口方面战况渐趋激烈，南京听到隆隆炮声。卫戍总部下午接到湯恩伯全线撤退的命令，立即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撤退部署。在会上，有人建议要二十八军工兵营在撤退时破坏下关火车站及码头。覃异之坚决反对，会上反复争论，最后張耀明同意覃的意见。張耀明和覃异之又研究撤退后维持南京秩序的办法，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组织。之后，張又秘密对覃说：“有人劝我不要走。”覃说：“你决定怎么办？”張说：“我不反对中共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但要我背叛老汉（指蒋介石），我实在做不到。”当天晚上張到外面接洽后，决定請馬青藜（是張的朋友及同乡）出来维持过渡期间的秩序。深夜馬到卫戍总部来研究维持秩序的办法。張和覃决定留一个营（欠机枪连）給馬組成糾察队，保护水电厂（当时覃异之接到首都



电厂陆法留厂长的电话說，保护电厂的宪兵已撤走了。）及維持街上秩序。覃把留下来的郑营长介紹給馬，并对全营官兵讲话，安定他們的心。

4月22日上午，蔣介石曾派吳忠信乘专机来接李宗仁何应欽等到杭州开会。在飞机場上，何告诉李：“江阴要塞今早失守，五十四軍正在反攻。”李当时很惊讶。当天下午李何等即乘原机回南京。何应欽願祝同23日早就乘专机离开南京。

南京机关部队的撤退，原規定23日上午2时集合完毕即开始行动。由于各单位爭先恐后，道路拥挤不堪，至上午4时还走不动，6时左右才陸續离开南京。李宗仁的专机于上午9时起飞，覃异之于上午11时左右搭空軍司令部的运输机离开南京，逕飞上海。蔣介石王朝盘踞二十二年的南京，终于4月23日深夜12时解放了。

所謂长江防綫，除上海附近地段外，已全綫崩潰。夺路南逃的各路蔣軍，在解放軍跟踪、平行、超越追击的不断打击下，狼奔豕突，潰不成軍，完全丧失了抵抗力。除五十四軍大部及五十一軍一部僥倖繞太湖逃往上海，第八兵团所属之五十五、九十六、六十八三个軍分散逃往浙贛路沿綫各地外，其他由南京东西地段逃向杭州的各部队，絕大部分被歼灭。在逃跑途中，二十八軍与首都警察总队因搶夺卡车发生冲突，解放軍追到吋，都放下武器一起作了俘虏。二十軍、八十八軍、九十九軍(欠九十九师)大部于24日在蕪湖以南的湾址、屯溪間被歼灭。二十軍軍长楊幹才被击斃，九十九軍軍长胡长青負重伤。第四軍、二十八軍、四十五軍、六十六軍之大部及五十四軍之一部，于4月26日至29日，先后在溧阳、郎溪、广德、长兴間被歼灭。六十六軍軍长罗賢达、二十八軍軍长刘秉哲被俘。

湯恩伯曾命令退到浙贛沿綫各兵团統归李延年指揮，准备在

浙贛綫以北山地建立第二道防綫。无奈南逃部队，有的只剩司令部，有的七零八落，連同原来在浙贛沿綫重建、新建尚未成立之各軍，均聞风向浙东及福建沿海逃竄。比較完整的刘汝明部，未經激烈战斗便放弃陣地，拼命往福建龙岩方向逃跑，沿途避免与李延年、朱紹良等联系。故該部曾一度失踪，直到閩西地区才恢复联络。因此第二道防綫无法建立起来，蔣軍欲求喘息机会而不可得。

在徽州的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鏡如，于4月23日临时奉命指揮一〇六軍、九十六軍、九十二軍之三一八師及安徽省保安团編成之第二纵队（陈瑞河）等部，掩护撤退。其中九十六軍随刘汝明部南逃，始終未联络上。三一八師在杭州被周碧拉住不肯放手，只有該師一个团随兵团部行动。侯鏡如令一〇六軍、第二纵队在徽州外围占领陣地担任掩护。首先退到徽州的是刘汝明的司令部，刘停留的时间很短，以后就不知去向了。張世希带少数幕僚人員逃到徽州时，情形非常狼狽，因带的銀洋太多，路上行动不安全，分出一部分給十七兵团。可見这时命比錢更为重要。又如第九編練司令張雪中，只身乘吉普車逃命，把特务营留給十七兵团。各部队遺留在徽州的彈药甚多，有的卡車裝得满满的，司机却逃跑了。徽州指揮所主任万建霖临逃走时，囑咐十七兵团在撤退时把所有彈药車全部炸燬。侯鏡如认为国民党的火勢已去，炸燬几卡車彈药有什么意义，不如留給解放军，以表示个人的心意，所以这些彈药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

反動政权在灭亡前夕，对于自己的高級將領也缺乏信心。如廖运泽和湯恩伯关系很深，原任第一纵队（安徽省保安队編成）司令，因其堂兄廖运周在双堆集起义，湯便把他調离了部队。湯將廖首先調为第七級靖区副司令，因为这是第一綫，怕他不可靠，又調为第

九編練司令部的副司令。廖的部隊被改編為一一〇師，但是這個部隊最後仍在廖的堂兄廖運升的領導下，在浙江又烏起義（廖運澤此時已離開部隊）。又如一一〇六軍在撤退中，也有一個師向解放軍投降。張世希曾對侯鏡如說：“這玩意兒真危險！在自己的部隊里，一會兒這裡豎起紅旗，一會兒那裡豎起紅旗。他媽的，這日子真不好受！”他不知道，這時侯鏡如也正在醞釀起義呢！

侯鏡如由徽州撤退時，徽州外圍已聞槍聲，臨時奉命留陳瑞河部（第二縱隊）在太湖地區打游擊（後來這個部隊全部被歼）。李延年派張定國師（一八三師）在大埠（距徽州三十里）掩護十七兵團通過。侯鏡如到淳安，與安徽省府秘書長朱子帆見面，曾談到起義問題，因一一〇六軍不是自己嫡系部隊，王修身家眷財產均在上海，虽動搖，但無決心。同時因與廖運升師及三一八師失却聯絡，預訂之起義計劃一時不能實現，且時間也來不及，決定以後再說。

蔣軍在撤退路上，常常發生互相吞併部隊的情形，彼此防範，有時如臨大敵。如在金華附近掩護十七兵團撤退的劉鼎漢部（十一師），在路上占領障地，名為掩護，實際專事吞併友軍的小部隊。該師因是陳誠的嫡系部隊，既不聽李延年指揮，更不聽侯鏡如指揮，自由行動地向前先逃。到福建的福安時，劉把交通封鎖起來，不許別的部隊接近碼頭，幾乎與一一〇六軍打起來。後來陳誠派船把這個部隊運送台灣。又如不肯隨廖運升起義的朱振野團，對蔣軍說來，應該算是有功了，後來花了一百五十包米的運動費，編成第六兵團的獨立團，結果還是被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繳械吃掉。也有互相拉隊伍的情形，如十七兵團的嫡系部隊九十二軍之三一八師，在杭州擔任警備時，被周壽拉去，後來在福建以該師之一個團及兵團部獨立團為基礎重新成立三一八師，以後這個部隊就在福州起義。蔣軍

將領都知道，有部隊在手中，到處受人尊敬，一旦部隊光了，到處遭人白眼。把部隊當做起家的資本，這正是蔣軍的本質。

由南京逃到杭州的蔣軍，也是混亂不堪的。第七兵團（南京衛戍司令部改稱）所收容的部隊不到兩千人。第四軍軍長王作華和第四十五軍軍長陳沛，他們乘吉普車只身逃到杭州，向當地軍需局騙取全軍經費後化裝逃亡。5月2日張耀明帶領殘余部隊和杭州警備司令周魯一道，經寧波逃往定海。杭州5月3日解放。

#### 上海之防禦和撤退：

覃昇之子4月23日到上海，即與石覺（防守司令）見面，當晚湯恩伯約覃吃飯，要覃和石覺共同研究上海的防禦問題。24日覃與石視察浦東陣地時，石覺吹噓水泥活動堡的作用，說：“這是擊敗共軍進攻的重要武器。”25日湯決定發表覃為上海防守副司令兼滬東區指揮官，覃托石覺向湯婉辭。26日張耀明到上海，約覃到杭州幫助他收容部隊及成立兵團司令部，并向湯保薦覃為第七兵團司令，他自己想乘機脫身到台灣去。覃同意到杭州幫幾天忙，但不願擔負任何名義。覃29日由杭州回上海，聽說南京市長滕傑攻擊衛戍總部撤退時有三大錯誤：（1）未破壞車站及碼頭；（2）成立維持會，形同和平移交；（3）指揮無方，部隊混亂。覃已決心不干，故未作任何解釋。當晚覃在凱歌歸飯館吃飯，遇見袁守謙，袁對覃說：“校長已到上海，要我約一部分同學于5月1日上午去談談，請你參加，當天上午8時在湯總部集合。”後來知道，就在這大會上決定成立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的非常委員會。覃為避免見蔣介石，于5月1日上午乘飛機經廣州回廣西去了。關於上海防禦的情形，一部分是覃在石覺處知道的，一部分是五十二軍軍官後來在香港和覃見面時談的，加上廖運澤從有關方面取得的一些資料，合併起來，綜述

如下：

1948年12月初，湯恩伯（衢州綏靖公署主任）兼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即决定在上海作坚守的准备，并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其防御准备概要如下：

（一）对解放军进攻淞沪时，主攻方向之判断：（1）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2）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尔后西渡黄浦江，攻占吴淞，切断上海退路，再攻取市区；（3）沿长江边直攻吴淞，控制要塞，尔后由北向南，攻取市区。

（二）守备淞沪之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达到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使用。

（三）守备要隘：沿月浦、楊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之线，向后三千米纵深为主阵地。

（四）阵地编成：

1. 外围阵地：以南翔镇、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并于上述四点各构筑团的据点阵地。以川沙城至北蔡镇之线为浦东之外围阵地，并于上述两点各构筑团的据点阵地。另在崇明岛及吴淞口外七个小岛上，共设置二百个水泥活动堡。

2. 主阵地：浦西方面，由吴淞以西之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楊行、浏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直至黄浦江边之线，其中以宝山城、楊行、浏行、庙行、大场、真如、楊家桥、虹桥为重点，每个重点各构筑一个团的阵地。浦东方面，由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每点各构筑一个团的阵地。

在主阵地中，以大场、真如最为坚固，以南市及浦东最为薄弱。另在主阵地纵深之东站及机场，均筑有独立据点之工事。

3. 核心陣地：利用市区内高大建筑物（如四行倉庫、國際飯店、中央銀行、市政府、警察局、法國兵營等），作为堅固之抵抗据点。在市区内各街道要冲，以水泥活动堡及沙袋构成抵抗工事。

（五）兵力及防御部署：防守上海之兵力，除原在上海之三十七軍、五十二軍、七十五軍、九十五師及馬志超部的四个交警总队（相当四个团）外，并增加由浙东调来的第十二軍（舒荣）、由鎮江以东逃来的二十一軍、五十四軍、一二三軍、九十九師（后改称九十九軍，仍以九十九師为主）、暫八師以及重新拼凑而成的五十一軍。其防御部署概要如下：

1. 外圍陣地：一二三軍（附暫編第八師）守备浦西方面各外圍据点。五十一軍守备浦东方面各外圍据点。此外则于太仓、崑山、浏河、嘉定、青浦、松江、嘉善、平湖、台浦、金山卫、南汇等地，派出小部队。

2. 主陣地：五十二軍担任沪西北地区（獅子林、月浦、楊行、浏行）之守备；五十四軍担任沪西部（大場、真如、北新泾）之守备；七十五軍（附九十五師）担任沪南及西南部（虹桥、梅家弄、龙华）之守备；三十七軍（欠二〇四師）担任浦东南部（楊思、塘桥、洋泾）之守备；十二軍担任浦东北部（高行、高桥）之守备。

3. 核心陣地：由二十一軍、九十九師、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二十一軍及九十九師在江湾地区。

（六）防御战斗及撤退：5月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軍之第二十軍、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三十一軍等已集結于上海外圍，形成半圓形之态势。12日起，在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圍攻之下，浏河、太仓、崑山、嘉定、平湖等外圍据点，均发生激战。14日，解放军一部向五十二軍防守之獅子林、月浦、楊行、浏行之线全面进攻，战况很激

烈，解放军受相当损失。湯恩伯大事宣傳所謂大捷，強迫上海工商界慰勞蔣軍，發青天白日勳章給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并在国际飯店举行庆功大会，招待各軍战斗“英雄”。其中五十二軍的“英雄”最多，約二百二十余名，目的在鼓舞士气、安定人心。至16日，守外圍陣地之五十一軍、一二三軍，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损失，尤以一二三軍损失最为惨重，先后放弃了外圍陣地。

5月17日战况最为激烈，湯恩伯調整主陣地的部署如下：浦东地区，增加五十四軍之一九八师，与原在浦东之十二軍、三十七軍、五十一軍殘部組成浦东兵团，由五十四軍軍長關汉英指揮。其兵力配备如下：三十七軍担任洋涇鎮及其以南地域之守备；十二軍及五十一軍殘部担任高行、高桥地域之守备；一九八师为机动部队。浦西地区，由石覺直接指揮各軍防守。其兵力配备如下：七十五軍（附九十五师及暫八师）担任苏州河以南地域之守备；五十四軍（欠一九八师）担任真如、大場之守备；二十一軍主力及九十九师統归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指揮，担任浏行、月浦地域之守备；五十二軍担任吳淞要塞地域之守备；一二三軍殘部及二十一軍之一部在江湾地域。

5月17日以后，浦东方面的战斗愈形激烈。蔣軍拼死掙扎，每一陣地之得失，常反复冲杀爭夺，直至无力反击而后已。5月20日前后，防守高桥之十二軍，大部被歼。21日，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蔣軍出海通路亦遭受威胁。湯恩伯为了保障退路安全，于5月22日以交警总队接替七十五軍苏州河之陣地，抽出七十五軍增强高桥方面之防御。23日，湯恩伯以五个团的兵力，在金家桥一带与解放军展开主力战，作最后之掙扎，反复冲杀，伤亡枕籍。同日，解放军乘交警总队接防不久之弱点，一举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湯恩

伯、石覺等甚為震驚，把指揮所搬到吳淞要塞，作逃跑準備。24日，防守浦東洋涇鎮之三十七軍，在解放軍沉重打擊下，放棄陣地，逃過浦江以西。25日，守備高橋之十二軍及七十五軍一部被歼，高橋為解放軍攻克。26日，蘇州河以北市區，大場、江灣、吳淞各地，相繼為解放軍攻克。蔣軍二十一軍大部、三十七軍、五十二軍一部、一二三軍主力被歼。湯恩伯倉皇率五十四軍及十二軍、五十二軍、七十五軍之主力、第二十一軍、一二三軍兩個軍部，向舟山羣島逃走（原駐崇明島之二〇四師已先開台灣）。湯在臨撤退前，派淞滬警備副司令劉昌義指揮二十一軍及一二三軍殘部擔任掩護。實際是把雜牌部隊及非嫡系將領作為替死鬼。後來劉昌義率領這些部隊投降了解放軍。湯恩伯的撤退是很忙亂的，有許多部隊都未接到通知。聽說三十七軍軍長羅晉閣為此在台灣曾和湯恩伯打了一場官司，這是後話。至此，蔣介石堅守淞滬與台灣相呼应的陰謀，和他在大陸上其他陰謀一樣，又以慘敗而告終。

## 結 束 語

（一）反動派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蔣介石在軍事上遭到一連串失敗之余，曾玩弄“假和談”、“假下野”的陰謀，以便爭取時間，重整旗鼓，卷土重來。當這些陰謀被毛主席揭穿之後，又企圖把上海作為他在大陸上的據點，借以苟延殘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爆發來挽救他的命運。因此在上海戰役開始之前，他曾乘專機到上海指示機宜。上海戰役進行中，他又乘兵艦到吳淞口外督戰，最後還儘可能地把嫡系部隊運往台灣，依靠美帝，繼續與人民為敵。湯恩伯在上海戰役中，屠殺大批愛國進步人士，企圖以恐怖手段來阻止人們歸向共產黨。但是，無論反動派如何狡猾、殘暴，終于



逃不了惨败、灭亡的命运。过去如此，今后也将如此！

(二) 我們与湯恩伯都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多年的同事，湯在作战指挥上的拙劣，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前細心，枪响忙乱。他的感情易于冲动，每每为局部战况所眩惑，一再改变决心，打乱整个作战计划。这次京、沪、杭战役，又一次証明他指挥之拙劣。4月20日夜間，蕪湖方面告急，他不就近使用一〇六軍增援，却从沪宁綫上把九十九軍調去，削弱重点防区的机动力量。結果援軍未到，前綫已垮，使增援部队与垮下来的部队混在一起同被歼灭。21日晚，江阴要塞发生异常情况时，机动部队只有五十四軍之两个师（一个师临时被湯指派去接替五十一軍六十华里长的江防），大大削弱了反击的力量。說明他在战役行动上違反了原訂的战略方針，因而处于忙乱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出解放軍指挥的英明，先在蕪湖地段猛打，吸引蔣軍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方面，21日晚以奇襲手段夺取江阴要塞，迫使蔣軍全綫撤退，从而在追击中歼灭之。这又一次証明解放軍的战略思想，不仅善于指挥自己的部队，而且善于調动敌人的部队。在上海战役中，一面猛打浦东，又善于利用交警总队新接防的弱点，一举突破蔣軍苏州河障地，充分发挥解放軍勇猛、机智的优点，善于抓住有利时机，选择有利地点，給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造成全局性的胜利。且不談政治上的因素，仅就指挥优劣相对比这一点說，蔣軍必败无疑。何况解放軍士气旺盛，到处得到人民拥护，更非日趋沒落的蔣軍所能比拟。

(覃异之执笔)

## 江陰要塞解放的片斷

葛 含 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取得偉大勝利後，國民黨部隊的精銳部分都已被歼滅，但蔣介石並不甘心失敗，妄想保持長江以南的反動統治。為了謀取時間達到重建反動部隊的目的，蔣介石又演出“下野”與“和平談判”的陰謀把戲；同時積極部署江防，企圖凭借長江天險，構成長江防禦，阻止解放軍南進。

在渡江戰役中，我當時在國民黨軍隊里，擔任江陰要塞司令部參謀長，現將江陰要塞解放情形，就個人所見所聞凭記憶所及，記述如下。

### 一 江陰附近地區國民黨軍隊情況

(一)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設在上海，總司令湯恩伯，指揮京滬杭一帶江防部隊。

(二)第一綏靖區司令部，設在常州，司令官丁治磐，受湯恩伯指揮。

(三)第五十四軍司令部，設在常州，軍長關漢騫，是湖南人，黃埔四期畢業，軍下轄三個師，其中有第八師，師長施有仁，他是軍校八期一總隊畢業，是我同期間學。

(四)第五十二軍司令部，設在無錫，軍長劉玉章，是陝西人，黃

埔四期毕业，軍下辖三个师，这个軍是由东北败退下来的。

(五)第二十一軍司令部，設在江阴，軍长王克俊，他是四川人，中央軍校高教班三期毕业，軍下辖三个师，第一四五师在江北八圩港，作为軍的桥头堡陣地，其余两师在江阴要塞側翼担任江防。

(六)第一二三軍司令部，設在常熟，軍长顧錫九，江苏涟水人，他是顧祝同的堂兄弟，該軍是由苏北败退下来的。

(七)炮兵五十一团团部，設在江阴，团长李道恭，他是安徽人，黃埔六期毕业。

## 二 江阴要塞部队情况

(一)江阴要塞司令部，設在江阴城内，司令戴戎光，他是江苏阜宁人，黃埔軍校六期及日本士官炮科毕业，1948年6月由陸軍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調任本职。

(二)工兵营：营长唐秉煜，他是江苏盐城人，軍校十五期毕业，是唐秉琳的胞弟，1949年初由国防部第三厅上尉參謀，調到江阴要塞任少校工兵营营长。他趁調动期間，秘密到江北与解放軍取得联系。要塞起义时，他在地下党领导下起很大的积极作用。他同守备总队长吳广文是表亲，同我在国防部三厅同事，感情是不错的。

(三)要塞炮兵总台：总台长唐秉琳，江苏盐城人，軍校第十期二总队炮科毕业，是唐秉煜的胞兄。在戴戎光到江阴要塞前，他已經在前任司令孔庆桂下面任守备总队长。1948年6月我到江阴，就接任他的职务，他被調为要塞炮兵总台的总台长。江阴要塞的起义，他在地下党领导下，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炮兵总台下辖三个大台，共有炮七十門左右。

(四)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蓉，安徽人，軍校第八期一总队及

陆大十五期毕业。1948年6月由陆军总部兵工处副处长调任江阴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底由参谋长调任本职。他是参加江阴要塞起义小组之一员。游动炮兵团下辖三个营，有炮三十六门。

(五)守备总队：总队长吴广文，江苏盐城人，军校八期一总队毕业，1948年6月由陆军总部兵工处科长调到江阴要塞任参谋主任，1948年底接我的守备总队长的职务。他同我和王德馨都是军校八期同班同学，同唐秉琳、唐秉煜是表亲。所以在江阴要塞起义前准备时期，他在地下党领导下是起了桥梁和核心作用。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历世经验也比较丰富，做工作比我们老练，听说他在大革命时期，即1927年，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失去联系，到抗战时期，在1937年于汉口与周总理见过面，接上了头。因此，他到江阴要塞就早有所用意和打算。在1948年底又正式入了党。守备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兵力约三千人左右。

(六)江阴要塞参谋长梅含章，浙江人，军校八期一总队及陆大十七期毕业，1948年6月由陆军总部兵工处科长调到江阴要塞任守备总队长，1948年底调任参谋长。

此外，江阴要塞的部队还有：通讯连，勤务连，照测队。

### 三 戴戎光是怎样当上江阴要塞司令的

1948年5月，戴戎光在南京任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陆军总部总司令顾祝同与戴是苏北同乡关系，所以总司令部办公室苏北老乡也比较多。刚刚那时我任兵工处科长，吴广文也是科长，王德馨是兵工处副处长，大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江苏仪征人，保定军校毕业），私囊已饱，想作寓公，以享清福，故辞去要塞司令职务。他

向蔣介石保薦江陰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團團長李道恭或參謀長孫琦（江西人，黃埔六期炮科畢業）繼任要塞司令職務。

江陰要塞司令是一個肥缺，因為：1. 要塞在江陰黃田港設立檢查站，該處是長江南北交通的要道，貪污走私，有利可圖；2. 江陰沿江一帶蘆葦的收入；3. 要塞附近礦山開採權，有利可圖；4. 要塞有數百畝田出租；5. 在江陰坐地分紅，如在棉紗工廠搭干股等；6. 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機買賣；7. 吃士兵空缺。因此這個肥缺一出，引起很多人的垂涎，到處鑽營奔走，都想當上江陰要塞司令。胡宗南曾飛電保薦鄭瑞充任要塞司令（鄭瑞是浙江溫州人，黃埔六期炮科畢業，後來到德國學軍事，是胡宗南的部屬）。

那時重要軍事人員之任用，都直接向蔣介石保薦，必須通過國民政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經俞簽呈才有獲得批准的可能。俞濟時下面有個上校機要參謀朱永莖，是上海人，同濟大學學生，軍校十期一總隊及陸大十九期畢業。朱在軍校入伍時，我任他的班長，在軍校德文班同班上學，陸大又先後期同學，所以他與我感情很好。朱永莖透露消息，說江陰要塞司令出缺，由各方保薦來的人已有六個，俞濟時的簽呈中李道恭列第一名，這份公文正要送給蔣介石親自批示，文件都在朱的手中。戴戎光知道我同朱永莖的關係，所以他一清早就來到我家里，要我給他想辦法。于是我即時就到西白菜園朱的宿舍，和朱商量如何給戴戎光的名字列上，並且要列在李道恭名字之前，就是說把戴戎光的名字列在第一名。當時事關緊急，首先要由陸軍總部辦公室弄到一紙保薦書，才有所根據。于是當天戴戎光就到陸軍總部弄來一紙保薦書，填好之後由我直接交與朱永莖。朱永莖當夜把戴戎光名字列在第一名，並在戴的考語欄內給他寫得特別好，第二天送給蔣介石。蔣介石是按照常規辦事，把俞

济时簽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就此圈上。

不几天，蔣介石要戴戎光去談話，主要的是要看戴戎光如何的人。戴戎光听到已經圈上了他，欢喜万分，又听到蔣介石要召見，赶忙做了一番細致的准备工作。第一件，把头发完全剃去，刮成光光的和尚头；第二件，把嘴里上面門牙上鑲的那一顆金牙齒挖掉。他如服装整理等等，自然不在話下，戴戎光是摸清了蔣介石的脾胃的。蔣介石平素对部下，是只重視外表，尤其不喜欢軍人戴金戒子和鑲金牙齒等，所以戴戎光就是这样钻营取巧地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

要塞司令公文发表后，戴把陸軍总部兵工处的全班人馬几乎都搬到江阴要塞去。兵工处副处长王德蓉調任江阴要塞參謀长，科长吳广文調任江阴要塞參謀主任，我在戴戎光当上要塞司令过程中帮了他的忙，所以調任我为江阴要塞守各总队长，以此报謝。这一幕人事活动的醜剧，也可以略見国民党軍队内部人事腐朽情况之一斑。

#### 四 江阴要塞的解放

1948年年底，由于戴戎光为人狡猾，贪污中飽，对下刻薄，又加上他較一般人反动思想要頑固，如蔣介石下野时，他也脫去軍装，換上便服，表示与蔣介石同进退等。因此，部下对他是阳奉阴違，背后都对他很不滿。后来尤其我，因为他把我由总队长調为參謀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对付我，令人可恨。这个时候党已派来地下工作人員，如黨員唐秉鈞同志，他是唐秉琳的哥哥，由江北过来，住在我总队部附近，以养病为掩护。另外还有解放軍政工部派来担任交通的吳明同志，以及后来派到要塞作內綫工作的营教导員徐以遜同

志等。所以当时吴广文、唐秉琳等已经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渡江准备工作。由于我和吴广文是同班同学关系，他约我参加过数次起义小组秘密会议。记得有一次在我的总队部开的会，又有一次在我家里开的会。会议参加者，有吴广文、唐秉琳、王德馨和我等。在我家里开会那一次，除我们四人外，还有唐秉煜也参加的。我参加起义小组，当时思想深处真实情况，是看到国共两党斗争非常尖锐，将来究竟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我和蒋介石是浙江同乡，是黄埔八期学生，又是陆大十七期毕业，手中有“贵、陆、浙”三张王牌，在蒋帮部队里是够混了。但是共产党一旦胜利后，我怎么办呢？我一张牌也没有，我就不能混了。因此，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能够在共产党胜利后情况下，也能够混起见，所以就想着有机会找好通过一个关系，对共产党也有所表现，作为我日后能够混的一个出路。恰好吴广文约我参加起义小组，一方面在吴广文的友谊支配下，另一方面又恰恰正好合我的心意。后来唐秉煜秘密到江北解放军总部汇报军情，取得一切联系，以及如何协同解放军行动等问题，这些渡江前准备工作，都是仅仅瞒过了戴戎光。所以江阴要塞的解放，可名之为江阴要塞军官起义。

大军渡江前夕，大约在1949年4月间，吴广文因放船事，引起戴戎光的怀疑，因此，借放船贪污嫌疑，戴戎光将吴广文逮捕。后来吴广文逃脱，秘密地去到无锡。

在解放军渡江头一天，即1949年4月20日早晨，戴戎光派我到常州参加丁治磐所召集的军事会议。其主要内容是已获悉解放军炮兵阵地的地点，令要塞炮兵今晚向江北解放军在八圩港以西二公里附近地带的炮兵群进行歼灭性射击等。会毕，当晚返江阴，先到黄山要塞指挥所见戴戎光。只见他头上冒气，慌慌张张地在那里

打电话，我也没有把会议内容告诉他，仅仅说了一声我开会回来了。他也没有问会议的内容，就叫我回江阴城内司令部坐鎮，专与友邻部队及上级联络。当晚我在司令部，步上阳台，了望四野，一片死气沉沉。当夜23时左右，风向急剧地转了一百八十度，由东南风变为西北风，这正是有利于大军渡江，此乃天时作美。

由于要塞地下党的领导，作了許多渡江前的准备工作。4月20日半夜，看到江北岸上燃起三堆火光，这是表示渡江战役的开始。要塞上的炮，事先已经把炮弹的信管卸掉，变更了射击口令和射击的距离，作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二天，即4月21日1时左右，解放军趁着有利的风势，万炮齐放，以排山倒海之势，二十分钟就到达南岸。仅在黄山要塞东边长山附近，与二十一军一个营的防守部队有过小小的接触。

在要塞附近渡江，都是顺利地飞上南岸，当先头渡江部队上岸后，唐秉煜和地下党徐以逊同志以及刚渡江过来的丞民营长等带领少数人，换上了国民党的军帽，首先进入黄山要塞总台的指挥所，巧妙地活捉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于是江阴要塞在地下党组织领导，得到解放，光荣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江阴要塞既经解放，迅速地把炮口转过来向二十一军阵地射击。当时，二十一军的一四五师适由江北八圩港向南岸败逃，渡江时，遭到要塞炮兵阻击，伤亡甚大。在21、22日，解放军以江阴要塞既得阵地为据点，在江阴东西两侧地区陆续登岸，并迅速地占领和扩大了各处滩头阵地，使国民党苦心经营三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汤恩伯所属各部队在解放大军全线突击的巨大威力震撼下，被迫放弃沿江要点，分别向上海、杭州、浙赣线实行总退却、总崩溃直到总消灭。

以上所述，是凭我个人的所见所闻，作了一个概括的回忆，有些可能记忆得不够准确，希望与此有关系的同志，予以指正。



# 蔣軍長江敗退和淞滬潰逃的狼狽情形

施有仁

1949年南京、上海解放時期，我任國民黨第五十四軍第八師師長，曾守備揚中、江陰間的江防，直到撤離上海，退往台灣。茲將這一階段經歷的情況，記述如下。

## 一 五十四軍部隊的一般狀況

五十四軍系陳誠的嫡系部隊，軍長闕漢勳，黃埔軍校四期出身。該軍轄有步兵三個師，即第八師、一九八師、暫編五十七師。除暫編五十七師系該軍駐防陝西時，由地方部隊編成外，其餘均系1945年春在貴州安龍、興義一帶接受美械裝備的部隊。記得1948年年底，解放軍在北京宣布對蔣部部隊作戰戰果中，列五十四軍尚系蔣軍中唯一沒有被完全解決的美械裝備部隊。該軍于1948年11月由豫北撤至句容、南京間地區，進行短期整理補充後，于1949年2、3月間移駐丹陽、常州、無錫一帶地區，除擔任地方綏靖外，並負有機動支援揚中、江陰間長江守備的任務。當時該軍的概略部署是第八師主力駐常州，另分派一團駐無錫，其餘軍直屬部隊和兩個師均駐在丹陽附近。

## 二 據守長江和撤退

1949年4月10日，軍部命令第八師接替揚中、江陰間長江守備

任务，原担任该段江防守备的部队，系属东北军系统的王秉钺的五十一军。当时李宗仁同北京的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之势已急，蒋蒋以五十一军兵力单薄，军心不固，乃派由我师接防。扬中至江阴直线距离约计六十华里，其间岛屿湾岔很多，地形复杂，障地纵深较大。我向军部提出：原属一个军的正面，今由一个师接替，兵力未免单薄。军长当时答复我：以一九八师和暂五十七师两个整师的兵力分别控制于我师障地的直后，有事马上支援，比增加兵力担任防守更灵活有力。我师于19日午夜开始接防，20日午夜始接防完毕。我仅视察了左翼障地，右翼障地还没来得及视察，21日黄昏战斗即行开始。

在我防守的地区内，新四军的地下武装力量很大，战斗甫一开始，我师指挥部通向各团的电话大部遭到破坏，派出修线的人也遭到地下工作人员的袭击，以致我师的指挥系统一开始就陷于半瘫痪状态。解放军随即由江阴城渡江成功，并向我江防障地进行纵深突破。我的右邻守军（川军系统）王克俊的二十一军打电话给我军长说，解放军由我师的防守地区突破。我当时为了推卸责任，矢口不予承认。事实上解放军究竟由哪里突破的，因电话不通，我尚没接到防守这段地区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江阴要塞部队早已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举行起义，将解放军接运过江。江阴城正好是我师和二十一军的分界线。障地既被突破，我即电报军部请求增援。军长当即命令暂五十七师全师出击。但以正在黑夜，驻在距江岸四十华里龙虎车站附近的暂五十七师，部队未经出动，三个团即遭解放军分别包围。混战结果，师长阵亡，副师长负伤。待至天明，情况比较明了，知道长江全线突破，大势已去，军部将三个师作梯次配备，交叉掩护，向南撤退。此时，京沪铁路已被解放军截断，我们军的部

队，乃经由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太湖撤向上海。

### 三 守备上海的经过

我们部队撤到上海后，即归上海防守司令石觉指挥，担任沪西南翔、真如同地区的防守。我师的正面包含京沪铁路和苏沪公路两条交通要线，可以说是整个上海防守阵地的比较重要部分。我的左邻部队为七十五军，右邻部队为同军的一九八师，再右为五十二军。记得当时担任上海周边防守的部队，计有王秉钺的五十一军、王克俊的二十一军、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罗泽闳的三十七军、马志超的交通警察四个总队；另外还有九十九军和十二军两个番号的一部分队伍。我们撤到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由奉化赶到上海，随即召集守备上海部队的团长以上的官长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内训话。他首先说到国际形势，指出不出三个月的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那时美国就会对我们恢复援助。其次说到上海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最后说到守备上海兵力的如何雄厚，军需是如何充分，阵地是如何坚固，又加海空军的有利条件，固守三个月是无问题的。并说他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结尾一再强调他已往是怎样高明，论断是如何正确，说到做到，要求大家无条件地相信他，坚定固守上海的意志。在他留在上海的几天时间内，几乎每天都要召集官长训话，内容不外以上说话的重复。

防守上海的阵地，在1948年就构筑有钢筋水泥的堡垒群，但是没有完成阵地的编组工作，阵地内部交通和副防御设备等完全未作。部队接到防守任务，对阵地进行侦察占领时，才发现构筑的堡垒群有很大一部分是位置在建筑物中间或者建筑物后面的，简直

无法射击。当时，大家一致痛骂国防部派出指导构筑工事的人无能。事实上上海郊区建筑物相当密集，有些是无法避开的；另一方面负责选择阵地和指导构筑工事的人，因向建筑物的业主索贿不遂，有意将工事建筑在建筑物附近以泄愤。当时蒋介石接到守备部队关于这种情况的报告后，即着汤恩伯下令守备部队为了清扫射界，规定凡位置在既设阵地周围一公里以内的所有公私建筑物一律拆掉、犁平，有延缓执行的严惩，对拦阻的群众格杀勿论。同时恐怕这些失去房屋产业的人对蒋政权不满，留在上海恐怕捣乱内变，因而下令将其一律驱逐疏散。据上海防守司令部计划，第一期疏散人口为八十万，这也就是因为清扫射界必须要拆除房子的人。被拆除的房屋产业丝毫不给赔偿代价，被驱逐疏散的人既无妥善安排，又无分文资助。当时受害的人既感房产丧失、生计断绝，又遭驱逐疏散，瞻望前途渺茫，又加上反动部队鞭打绳拴的逼迫，一时上海周边哭声载道，怨气冲天。反动部队内有些良心未尽泯灭的人，对此惨象，目不忍睹，下不了毒手，但是终归抗拒不了汤恩伯和蒋介石的严令督逼。

尽管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训话时说的那样斩钉截铁，但是等到解放军对上海发动攻击的炮声甫发，蒋即乘飞机逃往台湾去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把他的司令部搬上兵舰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把他们的指挥所迁到吴淞要塞炮台上去了。战事初起，解放军的攻击重点似乎是指向我的右翼五十二军的正面，该军曾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不久解放军的主攻方面转向浦东，驻在川沙的五十一军不战而溃，跟着罗泽闾的三十七军望风披靡，解放军前锋很快就威胁到蒋军主要退路黄浦江水道，以致蒋军防守上海的最高指挥部受到极大的震惊。为了挽回颓势，

乃不得不改变部署，以交通警察的四个总队换下七十五军；以七十五军为基干，配合我军的一九八师（防务由暂五十七师接替）再加上原在浦东的十二军一个师，组成浦东兵团，由我们军长闕汉骞担任指挥官，对浦东部署反攻。记得浦东局势最危急的时候，是5月17日，我的家眷就是那天晚上在代理军长周文韬的催逼下和他的家眷一道搭乘轮船逃往台湾的。蒋军对于浦东的反攻，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同时情势日趋危急，全线一夕数惊，到处呈现出面临总崩溃的象征。

#### 四 上海的撤退

蒋介石在防守上海之初，对于他的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力量，的确是信心不足，曾在上海附近准备了大量的船只，打算随时撤退。嗣以解放军渡江后未即对上海发动进攻，同时蒋军守青岛的刘安祺部连电告急，蒋乃将控制于上海附近的船只的很大一部分开往青岛接运刘安祺的部队。待上海告急，守既无力，退又无船，乃造成丢弃部队狼狈逃窜的惨象。在石觉决定撤退前，将我的一个整师布防于江湾的第二线作为掩护阵地，留下原防守的阵地则交由顾锡九的一二三军接防。石觉命令我，凡第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有经他许可，一律不准通过；尤其交通警察部队已呈现不稳，更要防止其进入防线。当时防守司令部得到的情报，说交通警察部队已经投降敌人，给上海的防守部队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

25日上午，交通警察部队由共第二十总队长率领，很整齐地撤退到我阵地的前方。这些部队在山东与我并肩反人民的时间很长，同时马志超同我的私谊很深，在他不久前离开上海赴福建时，由于他的交警部队阵地和我接边，曾向囑我对共部队予以大力协助，因

而我对交警部队的总队长差不多都很熟識。我問負指揮責任的第二十总队总队长前綫的情况。他說他們好几天失去了同防守司令部的聯絡，派人与邻接部聯絡也找不見，在他們的正面，也沒發現共产党的部队。我就把他說的用電話报告給石覺，石还叫我不听他們的鬼話。待我把同交警部队关系給他說了，石就說既然沒有什麼，就归我指揮，隨便在陣地前指几个地方叫他們暫時住下了。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总撤退的命令，命令的要旨說：上海时机緊迫，船只缺乏，部队中重武器、馬匹、車輛加以彻底破坏，或者投入黃浦江中。所有各級运输部队和各級司令部的勤杂人員一律留置現地，尽量撤退战斗指揮人員。規定我师和七十五軍第六师共乘一个輪船，在虬江碼头上船。石覺并在電話中嘱咐我不要將撤退消息告訴交警部队。尽管命令上是那样規定，但是我沒想到情况就那样坏，同时认为部队是自己的本錢，也舍不得丢弃，就按一般情况部署，全师撤退。

下完命令，我就乘吉普車开往虬江碼頭，开行不久，就被路上的車輛阻塞，无法通行。我尚以为少数汽車拋锚，乃下車徒步到前面观看情况，看到馬路上停滿了各式車輛，一直走到碼头上，也都是这样的，才知道由于解放軍的砲彈已經打在碼頭附近，開車的司机和压車人員都把車輛丢了，趕着上船逃命去了。我到船边一看，我們的部队还没上多少，而船到被乱七八糟的人挤滿了，棧桥上都无法挤上去，我还是由人从舷旁边扶上去的。分配我們乘坐的船是个排水三千噸的貨船，事前就裝了二千多噸的面粉。結果我的部队仅上了一千多人，而第六师仅只上了一百四十多人。情况特別緊急，在我們船的左边已經落了不少砲彈。船上人員一再要求开船，

同时船上也载的像人山人海无法再挤了。我同第六师师长商量结果，无可奈何地只得下令起锚开船。

这个船是货船，只有一百多个人的伙食设备，船上的淡水储备也不足。由上海到台湾有两天航程。虽然船上装有面粉，但是无法炊爨。同时船上人多人杂，秩序也特别紊乱，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就把面粉用海水掺合，贴在烟筒上烤成半生不熟的面饼果腹。到达基隆港上岸，清查当时撤退到台湾的番号有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六十九军的一个师，每军实际撤退到台湾的一般多在五千人上下，并且以勤杂人员占多数。此外有一部分如七十五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均由上海直接撤往浙江、舟山群岛。还有一大部分如交警部队、三十七军、五十一军等在撤退中就没得到命令而丢在上海了。

## 五 撤退到台湾后的不同待遇和争吵

我由上海撤退到台湾是从基隆港上岸的。由于我所在的五十四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陈诚听说我们撤到基隆，就发动台北市的绅商到码头上进行慰问欢迎，一时敲锣打鼓，各色标语飞扬，场面很够热闹。但是，对照我们这些丢盔抛甲、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更显得寒伧难看。自己当时看到这种情景，诚如芒刺在背，确有啼笑皆非之感。

我们的部队进入台北市后，即被安置在才修葺一新的、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总督府内。这栋房子原准备给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东南长官部用的，临时把我们安置到里边，这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荣誉和奖赏”。由上海所有撤退到台湾的部队也只有我们五十四军才受到这种优越待遇。其中唯一主要的原因，就由于我们是当权者陈诚的嫡系部队。我们在台北市休整期间，几乎每天都

有功劳品額发到部。軍长關汉卿即被发表为台湾守卫副总司令兼台中地区司令。陈誠搜罗台湾所有兵員，尽先补充五十四軍。

和我們同时由上海撤退到台湾的五十二軍刘玉章部，陈誠对之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五十二軍撤到台湾，刘玉章見了陈誠，陈第一句就說五十二軍在上海撤退时損失很大，有名无实，应即进行縮編。刘玉章当答以他的部队系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建制，請陈对该軍有何意見，可找湯恩伯总司令处理。陈以刘玉章出言頂撞，編併五十二軍未遂，不待該軍休整，即下令共开到澎湖列島的馬公島駐扎，餉秣时有不继，部队多以馬鈴薯果腹。陈誠又将在上海作战前編入五十二軍的刘梓皋部，改調归当时守备金門的第五軍建制。在我离开台湾后不久，刘玉章的五十二軍，也由台湾开到舟山羣島担任守备去了。事实上五十四軍此次由上海撤退时的損失，比較五十二軍更大；同时五十二軍在上海守备期間，还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而五十四軍可以說是不战而潰。陈誠此次之所以对五十二軍这样苛刻，完全是国民党部队內抱有历史成見的派系傾軋罢了。因为五十二軍首任軍长关麟征过去第一次在十一師、第二次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远征軍，先后揭过陈誠的底，他們互相打击报复。听說大陆解放以后，关麟征曾长期在香港、澳門两地作寓公，不敢到台湾去，也就是怕陈誠对他进行报复。

在上海撤退中，未接到命令而被丢掉的三十七軍軍长罗祥閣，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化装搭乘外国輪船，輾轉由香港逃到台湾。罗曾任过国防部厅长和胡宗南的參謀长，活动力甚强。他憤恨湯恩伯不通知他的部队撤退，不但把他的做官本錢全部丢掉，并險些儿作了解放軍的俘虏。他一到台湾，就极力对湯恩伯进行控告和攻击。而湯恩伯的嚙噬、在上海守备作战負有責任的石覺、陈大庆等不甘



示弱，对罗反唇相譏。双方相持不下，因而蔣介石不得不召开上海作战檢討会以求解决。

当时参加會議的成員，主要是曾参加上海守备作战撤退到台湾的部队的师长以上指挥官。蔣介石原定出席亲自主持會議，后以上海的慌乱撤退，自己也有一份，同时觉得两造相齟，实也难辨曲直，因而临时改由陈誠主持。会前，石觉和陈大庆曾分头向参加会议的人疏通，說此次上海作战和撤退，不論其损失大小，只要能撤到台湾，都是有功的；至于过失方面，湯总司令一个人替大家全部承担了，希望大家在檢討会中，对湯总司令要言下留情。开会时首先发言的就是罗泽闓，他說：“湯恩伯身为統帥，在上海撤退时，带头逃跑，将部队遗弃不顧。照这样的行为，将何以对部下，更何以对党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这番話把湯恩伯气得齐頸項根都紅了，罗泽闓的語言甫落，他就开腔了。他說：“你罗泽闓能說会道，在会场上說話如同猛虎一样。但是同共产党作战，連綿羊都不如。你的部队，在浦东不战而潰，使共产党部队直薄黄浦江岸，危及上海守軍后路，使得整个局势逆轉，以致指揮部无轉圜的余裕。你还說我該自杀，你就早該自杀！”会上两人形成对吵，使别人无插言余地。陈誠坐在主席位上，搖頭叹息，始終未发一言。爭吵的結果，双方都提出要求开軍事法庭解决。末了，陈誠看見这样吵下去难分难解，也就順水推舟地說：“好，就由国防部組織軍事法庭进行解决罢。”會議就这样混吵一通，无結果而散。事实上会后并无下文，仍以不了了之。这次會議，我沒有参加。会中的情况，是由亲身参加会议的五十四軍副軍长周文韬和五十二軍师长刘梓泉在会后的当天晚上告訴我的。

在我未到台湾以前，认为蔣介石一贯鼓吹台湾为复兴基地，这

里的新兴力量一定相当雄厚，一切军政措施也一定有一番改弦更张的新气象。事实上亲临其境后则大失所望。原来驻在台湾的部队，陆军方面，在台湾南部凤山附近，有属于孙立人系统的唐守治的八十军；在台北附近有属于陈诚系统的戴朴的第六军。这两个军的编制都只有两个师，并且空额很多，每师实有人数约五、六千。这两个军都是在1948年，先后于辽西和淮海地区被解放军击溃后，调到台湾重新成立的。尤其是第六军，在我到台湾时，还没装备武器，正在进行着所谓徒手体格训练。驻在马公岛的还有四十军李振清部四千多人，是1948年从豫北安阳用空运撤到台湾的。此外就是由上海撤回的一些残兵败将。海军方面具体的情形我不够明了。据我当时在海军总部和第一署署长萧西清私人谈话中得知，海军由于重庆号军舰和长江舰队的先后起义，海军总部对于撤到台湾较大较新的舰艇，都不敢派遣出海，担任勤务。另外还有1948年年底在京沪地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杨厚樑，第二师师长周雨寰，都是桂永清在教导总队时代的工兵营的干部，并且都是留德学生。这些部队，因为时间关系，组织和装备都没有健全完备，撤到台湾后不久，即进行改编，将原来的两个师六个团，缩编成一个司令部四个团，由杨厚樑、周雨寰分任正副司令。我到台湾后不久，他们就先后开到福建、广东和海南岛的各港口担任勤务去了。还有直隶于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有三个警备总队，每总队的兵力，相当于步兵的一个团。

当时在台湾担任新军训练的孙立人，是美帝一手豢养的忠实走狗。由于美帝的全力支持，他在台湾目空一切，气焰万丈，和陈诚、桂永清摩擦很大。他掌握了全部美械装备，就予取予求，作威作福。如当时驻在台北附近的第六军，已编成很久，陈诚请孙立人发

給美械武器，孫則要求將第六軍交他整頓為條件。結果陳未答應交其整頓，孫則勒住武器不發。截至我離開台灣時，第六軍部隊還是徒手。另一方面，桂永清也曾請求孫立人給他的陸戰隊發給武器，孫仍以將部隊交其整頓為條件，結果，很長時間也沒達成協議。至於五十四軍因系陳誠的嫡系部隊，陳誠全力補充該軍兵員。我離開台灣不久，先後接獲該軍團長、副師長來信，說部隊兵員已補充就緒。但是該軍的武器雖經陳誠要求孫立人發給，而孫仍以將部隊交其整頓為條件，以致雙方很久僵持不下。那些人在信中說，真的為了部隊素質和戰鬥力着眼，將部隊交孫整頓未嘗不可，事實上孫是借整頓之名，樹立自己的人事系統，以期達到樹黨營私兼併爭權的目的。言下似對這種只圖爭權，罔顧大局，歎息不置。事實上，蔣帶的派系分歧，各立門戶，互相排擠傾軋，是他們自上至下一脈相承的傳統。等到地盤越小，飯碗越少，局勢越惡劣，他們內部鬥爭就越激烈。所有以往的反動統治階級的發展與死亡，都証明了這一規律，不過台灣的反動集團表現的更突出深刻罷了。

# 蔣軍五十一軍上海被殲記

金 鏡

蔣軍在上海地區最後掙扎情況，筆者根據蔣軍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鈞提供的材料，綜合概述于下：

## 一 上海戰役前的一般情況

早在1948年年初，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即在共司令部成立一個上海城防工事委員會，糾合滬市流氓、黨棍、豪紳如方治等，以保衛大上海為名，強征民財、民物、民力來加強其所謂上海城防工事。他們在滬甯鐵路正面如南翔等地破壞許多民房，以構築障地，並修建了大批水泥鋼筋的機槍掩體。在南市、吳淞和江灣附近等地區，也構築同樣的工事。在浦東方面，如滬市之邊緣上也修建了很多鋼筋水泥的輕重機槍巢及炮兵掩體。在高橋附近也修了很多工事。

與其加強工事的同時，湯恩伯在上海附近集中了不少軍隊，計有駐吳淞方面之五十二軍劉玉章部，駐滬西之七十五軍吳仲直部，駐市內的幾個交警總隊，駐浦東方面的三十七軍羅澤閻部，駐高橋方面的十二軍舒榮部，還有炮兵指揮官邵百昌所指揮的重炮兵配置于各沖要地點，徐庭瑤所指揮的裝甲兵部隊控制于北四川路以北地區。此外，尚有供應這些軍隊的後勤機關——上海補給區司令部，共司令為黃壯懷，駐于上海市內。

1949年4月，解放軍粉碎蔣軍江防勝利渡江後，湯恩伯感到上海危在旦夕，蔣介石也曾一度親臨上海。他們為了妄圖在上海作垂死掙扎，於是將其長江戰役中的殘兵敗將聚集上海，計有：五十四軍關漢鵬部，二十一軍王克俊部，一二三軍顧錫九部，五十一軍王秉鈺部。就中戰鬥力較充實的為五十四軍。一二三軍系蘇北游擊部隊整編未久。五十一軍原為兩個師編成的軍，在長江戰役江北橋頭堡作戰時為解放軍歼滅約兩個團，敗退中又損耗一個多團，殘部於五月初旬到達上海的不過六千餘人，步槍二千枝，輕機槍二百五十枝，重機槍四十餘挺，迫擊炮二十餘門，山炮十二門。五十一軍殘部由軍長王秉鈺率領，敗逃上海後，駐紮交通大學，收容整理。其所屬之一一三師，原任師長李濟由於在長江戰役中擅自脫離戰場指揮位置已被撤職，遺缺由湯恩伯派暫四師師長丁作彬調充。其所屬之四十一師師長劉衛國亦因同樣原因撤職，改由其副師長鄒煜南升充。

以上各軍在5月底前後大部分軍抵上海附近，歸上海防守司令石覺指揮，入於滬市蔣軍之戰鬥序列。

五十一軍原系東北軍，其官兵多系北方人，逃抵上海後，風聞仍有南撤消息，因而軍心不穩。因為他們深知蔣介石歧視雜牌部隊，如果再跟着南逃，一旦裁併，即將流落異鄉無家可歸。因此該部官兵時有逃亡，比如軍部參謀處第三科張科長及司書、譯電員即不辭而別。該軍自1946年整編後，人事複雜異常，內部矛盾重重。

5月初，湯恩伯鑒於滬戰迫在眉睫，於11日召開軍事會議。當時出席會議的有：三十七軍軍長羅澤闡，五十二軍軍長劉玉章，七十五軍軍長吳仲直，十二軍軍長舒榮，二十一軍軍長王克俊，一二三軍軍長顧錫九，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鈺，炮兵司令邵百昌，裝甲兵部

队司令徐庭瑤，交警总队长(不知姓名)，补给区司令黄壮怀，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京沪杭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总部各处处长，还有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等共约七十多人。

湯恩伯于上午11时始来到总部，显得很匆忙的样子，似連早飯都未吃，他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在桌上吃飯，說：“大家都准备好了吧？总裁叫我轉达各位，我們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只要我們坚持半年下来，那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他紧接着又說：“你們有沒有困难呀？可是誰也不能随便撤退嘛！撤退一定要杀头的。”但是他既未說明当前戰場情况，也未指示在上海作战的明确方針和要領，更沒有下达一个全盘的命令。这次會議就是这样的談話，約一小时左右即結束。但会外傳說，蒋介石要坚守上海，为的是取得較长的時間，以便把搜刮来的黄金、白銀籌款运往台湾。

上海市郊附近蔣軍之布防，悉由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秉承湯恩伯之意旨办理。在5月11日北四川路总部會議后，因为并没有一个全盘的命令，难以窺其全豹，仅知大致情形如下：

守备吳淞要塞及其附近的为五十二軍(軍长刘玉章)，守备浏河方面的为二十一軍王克俊部，守备沪宁铁路正面和南翔附近的为五十四軍關汉騫部，在南市附近的为七十五軍吳仲直部，在浦东市郊边缘的系罗泽闓之三十七軍，守备高桥镇的为舒荣之十二軍，在川沙以东三九港附近为五十一軍王秉鈞部，在松江方面为顾錫九的一二三軍，南汇和川沙县城概由地方团队駐守。上海市內由交警总队守备。装甲兵部队控制在北四川路以北附近。其总部直属重炮兵多分配于沪西方面各冲要地点。由当时蔣軍在上海的布防情形来看，系沿市郊边缘占领障地，既未区分攻势地区，也未控制有力的第二綫部队，这一事实表明蔣軍在上海是专事防御。

## 二 上海战役中蒋军就歼序幕

5月11日北四川路总部军事会议后，湯恩伯面告五十一軍軍长王秉鈺說：“你們部队准备即开赴浦东川沙方面，接替三十七軍的一部分防务，詳細情形可与石司令直接接头。”当时王秉鈺說：“我們部队到达上海最晚，喘息未定，没有什么力量。”湯恩伯說：“你还很好很好”。据王秉鈺提供的材料說，他听了湯这话以后，心中暗想：“反正你是拿杂牌部队擋头炮，先将我們送礼。”王随即往見石觉，石指示說：“总司令叫你們开到浦东接替三十七軍川沙至三九港間之防务。那地区很好，东边靠海，有我海軍掩护，正面有洋灰鋼筋工事很坚固。松江方面有顧錫九的一二三軍，浦东方面有三十七軍。回去候命令，可以先准备准备。”

5月12日晨，王秉鈺接到湯恩伯的电令，要旨如下：“着五十一軍軍长王秉鈺即日率所部限13日前开抵川沙附近，接替三十七軍川沙至三九港之綫的防务，加强工事，坚固守备之。”

王秉鈺接到湯恩伯上述电令后，遂率領所部于5月13日晚以前先后到达川沙县城附近。該地地方团队充斥，秩序极为混乱，居民大部逃徙。既没有什么正式部队，也没有什么洋灰鋼筋工事。据王秉鈺提供的材料說，他认为沪西极为重要，如果攻破沪西，浦东即可不攻自陷，因此解放軍主力当用在沪西，而浦东可能只以一部分兵力进击。因此浦东方面的战斗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可能沪西方面一結局，浦东方面随之了事。

基于上述判断，王秉鈺于13日夜拟定布防要領如下：以白龙港为中心，掌握部队实力，以图自固，即将本軍陣地右翼依托于东海岸之三九港为轴綫至南汇公路，构成扇形守势鈎形陣地，待結局之

推移，再相机行事。其战斗指导要领为：如解放军以有力之一部向我攻击，当与之周旋；不得已时，以三九港为轴枢，实行逐次后退防御。如解放军全力进攻沪西，我则固守阵地观战，俟该方战斗结局，再作决定。

14日晨，王秉钺下达如下之命令(要旨)：

1. 军令接替三十七军在三九港瓦川沙间之防务，并加强工事而坚固守备之。

2. 第一一三师(欠三三八团)即日由三九港瓦南望棚至川沙东小火车站与南汇公路交叉点村落之间占领阵地，并构筑工事坚固守备之。但须以三九港为轴枢，立即与四十一师衔接，作第二、三线预备阵地。

3. 第四十一师即日以左翼衔接一一三师瓦川沙东之小火车站与南汇公路交叉点至川沙小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并构筑工事坚固守备之。但须将阵地之左翼在南汇方面形成守势钩形，同时以右翼衔接一一三师构筑第二、三线预备阵地。

4. 两师阵地之前缘为上述之村落南缘端，两师警戒部队之线为南望棚和川沙东小火车站与南汇公路交叉点南方千米之线。

5. 军砲兵营配备工兵一连，以主力向白龙港西南地区占领阵地，协力两师之战斗，尽以主要火力支援四十一师之小火车站与南汇公路交叉点正面之阵地，再以有力之一部指向一一三师南望棚之正面阵地。在战斗初期，须以两个连砲兵在南望棚西北附近占领游动砲兵阵地，支援两师之初期战斗。

6. 三三八团团长沙振夷指挥军直属部队。砲兵为总预备队，位置于白龙港西侧附近。

7. 军部位置于白港。



五十一軍所屬各部隊受到命令后，于当日（14日）上午即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开始构筑障地。这些军队在挖筑障地中，曾破坏居民许多房屋及公共交通设备。浦东方面多系水田，他们借口为了构筑所谓射击设备和扫清射界，肆意破坏。如四十一师在川沙小火车站和南汇公路交叉点之南边，曾拆毁居民草房三十余间，挖坏南汇公路一、二里，移去火车轨道约一里许。他们还在民房墙上穿枪眼、凿砲洞，损坏民宅数百处，居民不堪其苦，相率逃避一空。

5月14日夜11时，五十一军军部获得谍报，说由14日以来，松江方面蒋军已纷纷向南汇方面撤退，据说松江方面已到解放军大部，正沿沪杭铁路向东北急进中，松江方面似无多大战斗，蒋军都北退了。

14日午夜，一一三师和四十一师也先后向军部报告，南汇以南约二三十里的公路上，到了解放军先头大部，并向南汇迅速前进中，现在南汇方面驻军纷纷北退，情况甚为混乱。

王秉钺综合上述情报，认为浦东的战斗已迫于眉睫，乃于15日晨1时许以电话传知两师师长及军直属部队等，限15日拂晓前完成战斗准备，以便随时应付战斗。

15日晨7时许，四十一师师长鄒煜南报称，在该师之南汇公路与川沙小火车站交叉点正面，已到解放军大部，并立即开始攻击。待到中午战况愈形激烈，障地上草房多半起火，团长閔祥麟阵亡。到同日晚間，王秉钺循鄒煜南之请求，放弃该方面障地，后撤至第一预备障地，战况尔后即较为缓和。

15日午，一一三师之海塘公路方面也发现有解放军向之近迫，下响池发生战斗。至午夜12时许，师长丁作彬报告，解放军有部队在南望棚一带实行猛烈夜袭。至16日上午3时，南望棚障地已被

突破。王秉鈺鑒于陣地軸樞陷于危殆，于是由總預備隊抽派一個加強營向該方面增援，實行強烈逆襲，待至16日將明遂將該陣地又復占領。爾後該方面的戰鬥也漸趨沉寂。16日晨2時，據軍部諜報報告，川沙方面到有蔣軍暫八師殘余，迅即向滬市方面退去。其後邊有解放軍大部隊，現正沿南匯公路和川沙城西邊向北急進中。

同日晨4時，四十一師師長鄒煜南報告，有解放軍大部隊沿川沙以西向顧家宅（川沙東北）方向急進中，該師正面戰況較緩和。

同日夜11時，一一三師師長丁作彬報告，該師正面之解放軍自攻受挫後，戰鬥較沉寂。

同日又據總預備隊長馬振夷報告，在白龍港正西方顧家宅附近、西邊、及其以北南匯公路西方，發現有解放軍大部隊，正向北運動中，並不時派其一部向白龍港西邊該軍之預各陣地試行偵察攻擊。

王秉鈺得悉各方面情報後，遂作出如下的情況判斷：

判決：當面之解放軍正以一部扣留我軍于現陣地，同時以主力實行大規模繞翼運動，企圖將我軍包圍于三九港、白龍港及南匯公路以東的海濱狹小地區，然後一舉壓迫于東海面上而殲滅之。

理由：當面解放軍之後續大部隊，自16日來似已停止其更進一步之攻擊，僅發生局部戰鬥。但其後續大部隊自16日夜以來，即自川沙西邊沿南匯公路西側向顧家宅東北方面前進，繞過我軍陣地左翼向北方急馳中。又如在白龍港、南匯方面，發現解放軍並不時以小部隊對我預備陣地實行偵察攻擊。由此可見解放軍對本軍並非無力攻擊，而是避開正面攻擊以有力部隊扣留我軍于現陣地。現在解放軍正以大部隊實行包圍運動，待到達預定包圍圈後，企圖將本軍一舉殲滅于白龍港方面海濱地區。

王秉鈺认为如果解放军采取这样的打法，他的五十一军即难持久，势必在上海市方面的本战之前而陷于全灭，对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因而准备先向高桥镇靠一靠，掌握力量，再伺机行动。但他顾虑撤退的责任问题，于是召集四十一师及一一三师两师长来军部共同研究。

16日下午2时，四十一师师长郝煜南与一一三师师长丁作彬来到军部开会。王秉鈺除询问当面情况外，着重征询两师长对今后作战的意见。丁作彬说：“我部当面前线虽然比较平静，但闻解放军后续大部队均已越过我军阵地右翼向北急进，似乎要把我们包围在海滨，然后实行攻击，那时咱就苦了。现在我部弹药已不多，粮食只能吃到十七号，后方补给线已断，就是战斗，恐难持久。不如保存点实力，先设法躲一躲吧。”郝煜南也说：“我与当面之敌虽然暂时对峙着，但是我们阵地都在水田中，并不坚固。如果敌人再增大部队施行压力，那恐怕更难确保了，还是早想办法好。”

王秉鈺同意丁、郝的看法，接着说：“最怕敌人将我们包围于白龙港附近海滨狭小地区，一举而歼灭之。若是这样，我们虽苦战也无补实际。因此不如先向高桥镇后退，掌握实力，以待后图。”说到这里，丁、郝也同意。于是王秉鈺拿出预先拟好的方案，命令丁、郝两部撤退。命令要点如下：

1. 本军拟于16日薄暮后，利用黑夜向高桥镇附近撤退；
2. 一一三师于16日晚8时开始撤退，沿海塘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高桥镇附近东边背进；
3. 四十一师于16日晚9时30分开始撤退，沿高桥镇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高桥镇西侧背进；
4. 两师在撤退中各自作必要之掩护处置；

5.三三八团以一个营在白龙港东西之线占领阵地，掩护军之撤退；

6.三三八团(欠一个营)并指挥军直属部队，于16日薄暮开始撤退，在一一三师先头，向高桥镇东端背进。

丁、鄒两人接受王秉钺的命令后，各自转回师部作必要的撤退准备。但是当天傍晚7时许忽然下雨，各部撤退受到影响。四十一师师长鄒煜南回师部后，即属所属各部退却，但他并未作撤退的具体布置。他自己连晚饭都未吃，即换上便衣向上海市逃去。因而鄒部顿时陷于混乱，官兵争先恐后纷纷逃命。半夜11时许，该部散兵溃窜至顾家宅东北约十余里的高桥公路附近，即闻枪声大作，人声嘈杂，火光烛天，当系为解放军堵击，全部即于当晚溃散消灭。

由海塘公路方面撤退之军直属部队和一一三师，固然遵命令按时撤退，但是夜间大雨，道路泥泞，行进困难。当该部退至白龙港以北十五、六里的地方，为解放军堵击，失去退路，在狼奔豕突中纷纷歼。自16日晚至17日晨，五十一军就是这样在解放军重重包围中消灭于白龙港以北海滨地区，一一三师师长丁作彬逃走，军长王秉钺被俘。

5月16日解放军歼灭五十一军后，即集中全力对占据沪市边缘之三十七军和在高桥镇之十二军进攻。经过两三昼夜的激战，三十七军阵地于20日左右即被击破，该军大部被歼，军长罗泽闾逃走。占据高桥镇的十二军，其阵地两翼依托于东海及黄浦江间之狭小地区，负隅顽抗，但在解放军砲火大力轰击下，又被步兵猛烈进攻，战至22、23日即被击溃。该军大部被消灭，一小部退窜沪西方面，于是浦东方面战局于24、25日即行结束。

# 国民党統帥部关于京沪杭作战的 决策和爭吵

唐 文

1949年2月，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精銳尽失，假借和平来緩和解放軍的攻势以期爭取时间妄图重整旗鼓的阴谋又告失败，只好調动殘缺不全的各部队，沿长江天塹进行防御。陸軍总司令部參謀长湯尧本已隨陸軍总部迁移到广东曲江，因为代总统李宗仁說和談有成功之望，中央各机构暫不南迁，其已迁者，可派高級人員代表来中央办公，以便联系，所以湯尧又率少数職員回南京参加国防部办公。作者从湯尧处获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上海的两次作战會議的情况，分述如下。

## 一 南京的一次作战會議

1949年4月里的一天，參謀总长顧祝同召开作战會議。那时国民党和談代表团團員黃紹竑所携八項二十四款已由白崇禧表示拒絕，黃已飞赴香港，国民党反动派已由伪装和平的幌子下暴露出原来的猙獰面目，积极备战。湯尧即以代表陸軍总司令的資格参加了这一作战會議。

在会上，装甲兵司令徐庭瑤說：“从我家乡（安徽无为县）来人說，‘共匪’收集很多夜壺，說是预备摆在船上，放入灯油灯草点灯照明，以备渡江之用。”当时听者哄堂大笑。

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說：“不可輕視，敵人詭計多端，必須加以防范。我們海軍倒不怕它有燈，怕的是它偷渡。”

國防部次長秦德純說：“長江自古天險，曹操、符堅都渡不過來，何況共產黨，除非它是天兵天將。”

聯勤副總司令張秉鈞說：“我們先研究一下，沿江守備的兵力究竟怎樣？依我所知，每師人數平均不到五千人，以三分之一作直接配備（即在江邊散開，直接用火力阻止解放軍在江上活動），不過一千五百人，再除去連背預備隊外，則真正警且江邊的每師還不夠一千人。這樣怎能守得住？”

傷兵管理處長魏益三說：“還是採取全部直接配備（即不留預備隊，全部散開在江邊），加強工事設施的好。”

湯亮代表陸軍總司令建議：“重點方面採取間接配備，控置強大預備隊，乘敵軍半渡而歼滅其主力；非重點方面採取直接配備。現在必須把敵人主攻方向弄清楚。”

接着，顧祝同說：“先判斷一下敵人主攻方向是否在瓜州、揚中方面。”

第二廳廳長侯甬說：“依據種種情報，敵人主渡方向是在瓜州、揚中方面。”

第三廳廳長蔡文治說：“根據學理和敵人行動征候，敵人主渡方面應在荻港，換句話說在南京上流而不在南京下流。因為荻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後可以從繁昌、宣城直下長興、嘉興，將我軍的主力席卷到常、嘉、滬三角地區。這樣，于敵人有利，對我們是最痛苦的。而且我主力被困于常、嘉、滬後，所有江西、浙江的大門敞開了，可以任敵縱橫。我決不同意這樣指導。不如控置主力于蕪湖、宣城、郎溪，爾後隨戰況退守浙贛鐵路沿綫，才能逐次抵抗，使敵不能一

举深入，还能配合华中部队作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可是据汤总司令的战报正与此相反，他控置主力于京沪铁路沿线，分明是自投敌网，第三厅不能同意。”

接着顾祝同说：“这话很对，汤总司令可以参考。”

但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作为这一战役主角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言不发，也未作任何表示。最后由会议主持人军事最高首长顾祝同总结说：“三厅可以把意见抄一分送交汤总司令参考改正。”

## 二 上海的一次作战会议上的争吵丑剧

人民解放大军解放南京后，顾祝同又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会议一开始，顾祝同的开会报告未完，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即抢先起立说：“我不知道这仗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敌人一定由荻港渡江。如果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掩护。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判断敌人行动无一不确实，可是指挥作战的毫不采纳。这样，幕僚还有什么当头！我滥竽这个作战厅长真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他气呼呼地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扯着军服衣襟的下边，猛向左右两边一撕，把军服上五颗扣子拉断了线，扣子飞满会场，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惊愕，顾祝同安慰他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马上愤怒地站起来指着蔡说：“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按汤曾当过军校大队长，蔡系共学生，有师生之谊。）

蔡怒斥湯說：“你還有臉擺出你的老師臭架子來嗎？軍校學生再沒有一個人認你這個飯桶老師，沒有哪一個人再承認你是個軍人了！”

湯追著問：“軍人應該怎麼樣？不是要服從命令嗎？”

蔡說：“是呀！我一個小厅长算不得什麼，可是我以總長名義命令你的，你為什麼不服從？”

湯說：“我集結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總裁（指蔣介石）命令的，總長也要服從這個命令。你們來看，這就是總裁的手令。”他接著宣讀蔣介石的命令，內容大要是說：上海存有約值三億多銀元的黃金、白銀（按：1948年8月19日蔣介石採用王云五發行金元券辦法，強迫收兌黃金白銀，連婦女首飾也不能私藏，一律兌給中央銀行，違則沒收，這就是這批鉅額黃金白銀的來源），命令吳國楨請假，改由陳良以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代理市長，負責利用大批輪船將全部金銀槍運台灣。在未運完之前，湯恩伯應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銀運完後，准湯率部向舟山羣島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擊。如該項金銀不能安全運到台灣，則惟湯恩伯、陳良是問。

大家听了蔣介石親筆手令後，都面面相覷，默然無言。湯恩伯又說：“因為金銀數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陳初如（陳良別號）怕我守不住，每船裝重了一點，以致‘太平’號輪船在舟山洋面觸礁復沉，因而我和陳初如部不知怎樣才能逃脫總裁的責罵和懲辦。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難嗎？依你的計劃，主力分散到浙贛沿綫，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時間，試問這責任由誰負？”湯恩伯又接著說：“奉命保守秘密，不敢隨便洩漏。今天不是這小子發狂（指蔡文治），我還不給你們看的。算了吧！總裁無意久守上海犧牲實力，只要金銀運完就了事。這責任由我來負。你們這些長官、同事們



先請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我的手脚，必要时我还要保护你们。”当时这平日以含蓄修养见称的顾祝同也为之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 大劫掠和大屠杀

郭 旭

## 一 在上海的劫掠

1949年4月間，南京解放后不久，繼承軍統特务头子戴笠衣钵的毛人凤由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南阳路145号国防部保密局办事处，召集该局在上海的各处处长开局务会议。我当时任该局第五处（经理处）处长，是参加者之一。毛人凤在会上指示说：“南京现在已经被共军占领了，上海非常危险。估计共军在南京略事休整，就会来攻打上海。以长江那样的天险，还被共军打过来了，上海是不易守住的。我这次到溪口见了总裁（指蒋介石）。总裁指示说，已令汤恩伯保卫上海至少要守住一个月，叫汤会同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和行政院物资局局长江杓，将上海所存的黄金、白银和物资运往台湾，以免资敌（指人民解放军）。并给了我以下的任务：

1. 协助汤、陈等办理抢运物资工作；
2. 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
3. 集中沪杭甬一带的交警部队，以六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两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的工作；

4. 監視上海的資本家，勿讓他們將物資偷運往香港等地；
5. 發給應變費金元券一億元。

關於集中交警部隊，控制輪船、帆船和大小木船及護運物資等工作，我已經命令交警總局副局長郭履洲（當時交警總局局長馬志超率該局大部分職員隨交通部遷往廣州，上海方面由該局副局長郭履洲負責；福州方面由該局副局長尙望負責。）負責分別辦理。關於調查上海資本家的物資和監視工作，我已經命令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黃加持負責辦理。關於應變費一億元，已經由俞局長（指原任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通知顧總長（指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老郭（指我）迅速前往國防部洽領。”

我聽到毛人鳳的指示後，即於當日前往國防部預算局和聯勤總司令部財務署駐上海辦事處，將這項應變費領回來了。

過了幾天，毛人鳳告訴我說：“湯恩伯召集陳良、江杓及有關機關負責人，到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開會，討論搶運物資事宜。我（毛自稱）沒有去參加，叫郭履洲、黃加持去了。聽到郭履洲報告會決議定事項大致如下：

1. 將中央銀行所存黃金、白銀和銀元，打包運往台灣；
2. 機器設備、車輛、紙張及暖氣設備等物資，都運往台灣；
3. 棉紗、布疋，大部分運往台灣，一部分運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
4. 所有招商局及民生公司等輪船，除留一部分軍用外，其餘都交由物資局調用；
5. 帆船及大小木船三千多艘，其中約有一千五百艘不能駛往台灣，暫留作軍用外，能駛往台灣的，都交由物資局調用；
6. 所有護運工作，都由交警總局負責，由該局派兩個總隊專司

护运；

7. 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杓处理公务；

8. 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毛人凤叫我前往物资局找江局长，托江将保密局的汽车和印刷机器等运往台湾。我即于次日到物资局找江杓，江告诉我说：“现在每天都有轮船驶往台湾，贵局托运的物资，请即送到本局运输处，以便带往台湾。”我返保密局办事处报告毛人凤，毛交代总务处办理，都交给物资局运往台湾。

同年6、7月间，我在香港听到为汤恩伯修筑防御工事的陆根记营造厂总经理陆根泉说：“我在无锡、江阴一带，为汤恩伯修筑工事的价款共银元四十八万元，汤还未给我。我找汤要时，汤说需向台湾陈诚那里领下来后才发给我。因为由上海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都交给陈诚了。”我向陆说：“你和汤的私交极好，汤由上海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究竟有多少，你有没有听到汤说过？”陆说：“我曾听到汤说，上海撤退前夕，由中央银行运出的黄金、白银，除因有一艘轮船遇风沉没损失一部分外，计运到台湾的有黄金一万一千多大条（每条十两），白银三亿多两，银元几百万元，都交给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了。所以汤要等陈诚将款发下后，才归还我垫的工费。”

与此同时，我在香港听到保密局广州办事处香港组组长盛吕富说，陈良泯陶一珊到香港处理由上海运到香港的棉纱、布疋等物资，据陶面告他说，这项物资共约值港币四百多万元。

同年10月间，我由香港飞往台湾时，与江杓同机。在九龙启德

机场候飞机时，我問江关于上海撤退时搶运物資的情况。江說，黃金白銀都运往台湾，不过有一艘船遇风沉沒損失了一部分。他說的数目，和陆根泉听到湯恩伯所說的相同。江并說，棉紗布疋大部分运往台湾，有一部分运到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陶一珊来港处理。机器紙張等都运往台湾。因为船只不够，还有些物資未及运出；如果上海能多守半个月到一个月，則能多运出很多物資了。

广州解放前，我經香港逃到台湾，住在黃加持家中。黃告訴我說：“湯恩伯、陈良和江鈞等，在上海撤退前夕，搶运台湾的物資不少。总裁（指蔣介石）對他們很滿意，特別是陈誠對他們滿意。陈誠过去和湯恩伯因为在总裁面前爭寵，不大对头。这次陈因湯将在上海搶运的物資都交給他，对湯不同了，向总裁保湯为东南軍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作他的副手。陈誠过去先后任軍政部长和參謀总长时，陈良先后任軍需署长及联勤副总司令兼經理署长。当时陈誠排斥陈良，几次想撤換陈良，改以他的亲信赵志尧继任，因为总裁沒有批准沒有換掉，因此对陈良的印象极不好。这次陈良将上海搶运的东西都交給他，因此对陈良的印象也不同了。陈良以一个文人搞軍需多年，現在得任为參謀次长，主管后勤业务，就是陈誠保举的。听说陈誠还向总裁保荐江鈞为經济部次长哩！只有我倒霉，我是今年3月間，才由南京稽查处处长調任上海稽查处处长的。而上海的資本家多早在去年12月間及今年1、2月間逃到香港去了。他們的物資，早已运的运往香港，藏的藏起来了。如杜月笙，王曉籟等，去年12月間就跑到香港去了，荣德生也走了，叫我怎样去監視他們和找到他們的物資呢？上海撤退时，我最后撤退，飞机輪船都沒有了，我乘了一个小漁船，划了两天多才到定海，风浪又大，几乎命都送掉了。到台湾后，毛先生（指毛人凤）罵我不中用，沒有达成任务。真

是‘隨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我当时带开玩笑地对黄说：“你和毛先生都是‘太太至上’的（笑他们都是怕老婆的）。黄大嫂和毛太（指毛人凤的老婆向心影）的感情很好，何不走走内线，要大嫂托毛太和毛先生说明一下呢？”

黄说：“我已经当面托毛太代为说明了，并请潘先生、指保密局办公室主任潘其武）代我说明了。”

从以上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解放时劫掠的梗概了。

## 二 在上海的屠杀

1949年5月初，蒋介石乘军舰到了上海，驻在复兴岛，亲自指挥汤恩伯抗拒解放，劫掠上海的物资运往台湾。蒋抵上海后，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逮捕和监视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当时，毛人凤住在上海蒲石路118号。大概是5月3日晚边，毛人凤打电话找到我家，指示我到广州成立办事处的事情。我抵毛家时，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和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等都在那里，毛人凤叫我参加他们的谈话。毛人凤说：“总裁（指蒋介石）指示，凡属有嫌疑的人即予以逮捕，对张澜、罗隆基等予以监视。这件事情，本应由上海稽查处和上海警察局会办，因上海稽查处另有任务，希望善森兄（是毛森的别号）多负点责任，由加持兄协助办理。”

毛森回答说：“好，我即叫刑警处和各分局执行。”

毛人凤说：“好，随时将情况告诉我。”

毛森说：“是，随时向你报告。”

他们的谈话结束后，毛森和黄加持辞出。毛人凤指示我速赴广州成立办事处，就近向国防部洽领经费和粮服，并分别转发给所属

各单位。

我接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即于翌晨离开上海飞往广州，对毛森等在上海逮捕和屠杀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到同年10月21日，就是于广州解放时經香港逃到台湾的翌日，毛人凤邀我到他家吃晚饭，为我洗尘。当入席时，适毛森由金門（毛森于上海解放时，随湯恩伯逃往廈門，任廈門警备司令，廈門解放时逃往金門）乘第一次由金門到台湾通航的飞机到达台湾，前去看毛人凤，毛人凤邀共同席吃饭。席間，毛森向毛人凤汇报在上海撤退的情况。毛森說：“上海撤退前夕，共逮捕了有嫌疑的人犯三千多人。临走前，除释放了一千多人之外，杀了一千三百多人。”

毛森說时，洋洋得意。当时，毛人凤和在座的馬志超（原任交通部交警总局局长）、潘其武（原任国防部保密局办公室主任）、叶翔之（原任国防部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及我，都举杯慰劳毛森。

杀人不眨眼的毛森，还埋怨毛人凤說：“5月25日那天，你的电话迟打来一刻钟，我就把張瀾、罗隆基两人干掉了。”

毛人凤說：“总裁（指蔣介石）原来是指示要把張瀾和罗隆基搞掉的。我因为看到民主同盟沒有多大的力量，不过跟着共产党呐喊而已，杀了他們也沒有什么用处。再则杀了他們之后，反給人以口实。人家将說总裁杀害民主人士，影响其他的民主党派。不杀掉他們比杀掉他們的作用还大，所以我向总裁建議不杀掉他們。总裁同意了，因此我馬上打电话給你不要杀他們了。这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

毛森說：“可惜！可惜！真是便宜了張瀾和罗隆基。他們两人真是幸运啊。”

以上是我亲自听到毛森向毛人凤汇报说的。但到解放后，听到原任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说，他在杭州改造时，听到原任上海警察局南市看守所所长黄某（忘其名）说，上海解放时，在该所秘密屠杀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为一百三十多人。

毛森在上海解放时，杀害的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究竟是一千三百多人，还是一百三十多人，抑或除在南市看守所秘密杀害一百三十多人之外，各警察局于解放时也屠杀了，合计起来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这两个数字，我不能肯定那个是对的。但是，不管是毛森说的对也好，黄某说的对也好，都可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解放时，实行屠杀了。就是如黄某所说的是屠杀了一百三十多人，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了！



## 1949年国共和談的有关史料

張 丰 肖

我曾于1949年2月和4月，先后参加了顏惠庆、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四人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及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刘斐六人組成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现将参与这两次和談所知的和还能回忆的写出来，作为文史資料，或尚可供参考。如有遺漏和錯誤，請同志們指正。

###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成立与飞平經過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談，于1946年1月簽訂停战协定，又在政治协商會議上作出了決議。但是1946年7月蔣介石在英帝帮助下，違背人民意志，撕毀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會議的決議，发动全国規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及精锐师团多被歼灭，已至众叛亲离、不能維持的境地。蔣介石还想保持殘余力量，取得喘息時間，以便卷土重来，于1949年1月1日提出愿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談判的建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也做出了想与中共和談的姿志，电邀邵力子由上海到南京商談。1月4日邵力子、張治中在南京介寿堂招待文化新聞界談和平政策的进行。監察院也通过宣言，呼吁国共立即停战謀和。

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广播电台正式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国民党所提的建议是虚伪的和平，而明确地提出，中共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大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大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主席这个声明发表后，全国振奋，南京和谈气氛高涨，反动政府也做出了伪装和平的姿态。1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及总统住所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是国共双方无条件先停战；第二是各指派代表协商。

1月20日，总统府的秘书长吴忠信往访邵力子，谈蒋介石已决定引退。早在1948年末，在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不利的形势，有电向蒋提出和平主张，迫蒋下野。当时蒋以淮海大战正在进行，不敢与白破裂，就在中央党部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上，表示了要下野，到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

李宗仁于22日代理总统职，并发文告，即以停战谋和为号召，还说“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个人服务方针，亦夙以人民意志为依归”。李宗仁还下令要做几件事：1.释放张学良、杨虎城；2.释放全国政治犯；3.废止特刑庭；4.恢复各党派合法地位；5.取消戒严令；6.停止特务活动；7.启封停刊报纸。结果所有这些纸上空头命令，一件也执行不了。

这时，立法院的部分主和派，主张让蒋介石下台，支持李宗仁

上台，并也表示同意国共停战和谈。

孙科也唱了一套要实现和平的调子，并在22日的行政院会议上决议：政府为促成和平之实现，特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埭、彭昭賢（后因中共反对而未参加）、钟天心五人为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俟中共方面代表于双方同意之适当地点决定后，进行和平商谈。

邵力子曾对专访他的记者表示：“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之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需要的。为保持国家之元气和减少人民的痛苦，大家都迫切要求和平，国共双方也都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又相信我们的使命能够达到，而能促进和平的成功。我们代表同人，愿意尽力使和谈能圆满进行，同时使实际的战争能够停止。我们诚恳希望中共早点答复，并提出商谈的地点，使双方的谈判早日进行。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做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力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悬辞。”

李宗仁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八条以为基础进行和谈。延安和南京间，为了先要解决逮捕战犯和准备和谈的日期、地点等问题，用无线电广播，反复交换了意见。

31日，李宗仁借邵力子来到上海，上午召开了内阁会议，下午召开了各党派联席会议，决定推派颜惠庆、章士钊、陈光甫、冷御秋、江庸五人去北平。经李宗仁敦促，这五人同意接受。颜惠庆表示：“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脏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孙科也同意将行政院由广州迁回南京，以利和谈的进行。又悉，当时蒋介石曾由奉化有信托张羣借给李宗

仁，鼓勵“各戰求和”。

由李宗仁主持、甘介侯奔走聯繫組織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人選，一再變更。陳光甫、冷御秋因事不克前去，先介紹了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志讓，後又增滬江大學校長凌憲揚、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永利化學公司經理侯德榜等，說任務為“敲門”。甘介侯還說已獲得北平區軍管會主席葉劍英規定的歡迎前去的三條注意：1. 雙方談話要守秘密，非經許可，不得向報界發表；2. 不准新聞記者隨行；3. 以人民代表資格來平，不得代表政府。

至2月9日李宗仁又借甘介侯飛上海，再度聯繫，最後決定代表團的人選為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邵力子則以私人資格前往。

這個和談代表團，從開始醞釀到組成，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南京反動政府方面在這個談判中的推動力量是桂系軍閥，國民黨主和派和上海資產階級”。僅就“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組成的過程來看，就得到了証實。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人選，最後決定為顏惠慶（年73歲）、章士釗（69歲）、江庸（72歲）等三人，而邵力子（68歲）是以私人資格前往與中共當局交換意見者。此外隨同前往的有：李宗仁的飛平聯絡工作者黃啟漢，四老的秘書龔安慶、傅樹蒼、潘伯鷹、張豐曹，隨行者金山，中航公司也派電信課長顧樂村與技師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2月13日在上海各界熱烈歡送聲中，“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於上午11時半，乘中央航空公司XT537號專機，由上海龍華機場起飛北上。各代表在機場曾向記者談此行任務。顏惠慶說：“此行倘能使共方決定和談確實日期，則已可大功告成。”章士釗說：“此去除呼吁和平外，願將中共所提出建議，隨時告訴南京。”江庸說：“已受郵

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至以私人资格前往的邵力子，则笑而避免正面答复，仅谓：“此次乃去跑龙套，尙未到以政府代表说话的时机。”当天下午2时一刻抵青岛，原定加油续飞，奈以等候需换已破裂的左前轮，乃留住青岛迎宾馆。14日乘原机离青岛于4时半抵北平。承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委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徐冰副市长和刘仲华诸位同志至机场欢迎，并承招待全体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到北平的第二天(2月15日)上午，北平市叶剑英市长来访，并邀请所有代表及秘书至三楼介绍见面，继即与甄、江、章、邵四位作初次谈话。近午承送来书报不少，并分赠《毛泽东选集》各一厚册，均感兴奋。午后四代表交换意见，如何提出希望中共即推派正式代表并定期和谈。当晚应北平市叶剑英和徐冰正副市长的欢宴。参加者除和平代表团外，有董必武、林彪、萧荣臻诸位首长，傅作义、邓宝珊也参加，北平各界领导同志到者很多。当时感到欢叙颇畅，和平气氛甚好。

关于通航问题，已得到叶剑英参谋长批准，由金山去天津协商国共间招商局通航问题，上海航业代表魏文翰、周启新、姜克尼、俞惠方等四人也由沪乘“大上海”轮到天津。

在17日中共欢迎晚会上，先听到徐冰副市长诚意言和的讲话，继由林彪司令员讲话，主要内容有三点：1.诚意言和；2.军力解决无问题；3.可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叶剑英参谋长更分别和四老个别长谈，表达了和意至诚，只要南京政府方面确具诚意。18日再应董必武、罗荣桓、林彪、萧光臻、薄一波五位的首席宴会并作深谈，大家感到快慰，当晚就交由黄启汉、刘仲华电南京李宗仁报告进行顺利情况。

不过同时也感觉到当时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论调比中共为高，所以要晤第三方面民主人士一谈，或当有更好的收获。当时得南京消息，京沪各地对我代表团到平后的任务，寄以极大希望，就是立法院，也将决定在南京复会。

20日午后，在北京饭店由林彪、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萧荣臻、叶剑英等六位举行了一个招待民主人士的大宴会。宾客包括各党派、学术、文化、专门技术及民主人士约四百多人。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四老被邀请参加。林彪首先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邵力子被请发言，他说：“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这是庆祝平津解放，争取全国解放的庆功宴。

21日晚10时，军管会交际处王拓处长来告，已决定明晨请四老飞石家庄应毛主席的邀请。（当时由北平去石家庄，铁路还未修复，公路也难行，汽车要走两三天，怕四老受不了，幸商得飞机驾驶员同意由共驾机飞往。）

22日上午10时专机离北平径飞石家庄，除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四老外，还有傅作义、邓宝珊两位同行。在停留石家庄期间，承毛主席接见，并与周恩来将军一同会谈两次。会谈在和諧的气氛中进行，并对通邮、通航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关于中共和

該代表人選及和談地點，允予考慮，3月15日左右可望決定。四老于24日下午飛返北平，臨行並帶有毛主席給李宗仁的信一封。

代表團自13日由上海飛北平，至22日四老飛石家莊一段時間中，主要的是不斷和葉劍英將軍商談，試圖商定國共正式和談的時間和地點，並提議恢復國共區的各种交通，為停戰開辟一條途徑。經過四老去石家莊見了毛主席回來，遂得到了具體的結果。

26日，顏、江、章、邵四老在六國飯店設宴公請北平黨政軍各界首長林彪、董必武、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薄一波、徐冰、戎子和、陶鑄、譚政和傅作義、鄧寶珊諸位，借表臨別時的答謝，並攝影留念。

27日分別告辭。邵力子還去北京飯店分晤由沈陽來平的李濟深、李德全、沈鈞儒、章伯鈞諸位作臨別訪談。10時乘六國飯店去西苑機場，承中共領導同志葉劍英將軍等熱烈歡送。專機于11時一刻起飛離北平，至下午2時20分即安抵南京明故宮機場。歡迎者有當時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的代表李宇清及于右任、童冠賢、居正、吳鐵城、白崇禧、何應欽、翁文灝、吳忠信、張治中、徐永昌、桂永清、張鎮、張耀明、邱昌渭、范予遂和各界代表，新聞記者尤多。四位老人在記者包圍詢問中說：“此行頗為愉快，歸途一帆風順，大家均極康健，我們已準備有書面談話告訴你們。”當由我宣讀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四老發表的書面談話，全文如下：

“同人等此次以私人資格訪問北平，歷時兩周，迭與中共領袖葉劍英、林彪、聶榮臻、董必武、羅榮桓、薄一波諸先生共同或個別洽談。中間並應邀赴石家莊一行，承中共主席毛澤東先生及周恩來將軍延見，就和平談判問題廣泛交換意見。同人等深覺和談前途雖困難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務已告終了，因此南旋，擬向李代

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并承中共诸领袖恳挚款待，尤应附志感谢之意。顏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三十八年(1949年)二月二十七日。”

代表团全体同人回到南京后，均被招待于首都饭店。李宗仁5时来訪談，当面交给带回的毛主席信件。7时宴于李宗仁住所，于右任、張治中、何应欽、白崇禧等作陪。李宗仁和邵力子先后讲话，对和談前途困难虽多，希望甚大，感到安慰，并表示愿为和談的实现而努力。

28日，行政院长孙科由广州飞返南京，監察院长于右任和立法院院长童冠賢联合欢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表示欢迎并賀和平使者完成了使命。顏、邵两老致詞答謝。

当时情况，表示得很认真和热烈。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留京三天，完成了汇报任务后，顏、江、章三老和秘书、随員等，均于3月2日离南京返上海。顏惠庆在上海机场說：“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政府和共产党双方也都希望和平，现在和平之門已开，虽然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和平代表团此行任务已了，今后和談进行，当由政府与共产党双方开会商討。”

邵老在离北平回南京时，原拟同顏、江、章三老一同去上海，向上海各界汇报，但在下飞机时，即听新聞記者談起陈仪已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陈到上海后即遭湯恩伯扣留。邵老和陈仪对于和平，言行比較一致，蒋介石叫湯恩伯这样对陈，如邵到上海，也很难說有否同样遭遇，所以决定还不如留南京，对和談进行有所贡献。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北平南返后，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免打击了反动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尤对广大人民的希望停战



謀和，起了一定的影响。

### 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的組成及和談破裂的經過

孫科內閣于3月8日垮台，以“停戰謀和”主張作號召的何應欽內閣于3月23日宣告成立。3月24日，何應欽內閣第一次政務會議，首先議決組織“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李蒸。

从广播中获悉，共和談代表团已推定周恩来、林彪、叶劍英、林伯渠、李維汉、聶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齐燕銘为秘书长，并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談。

“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邵力子坚辞首席代表，改推了張治中，并发表卢郁文为秘书长。我被指派为秘书，兼負总务和联系之責。

張治中將軍臨行前，曾飛奉化見蔣介石一次。

28日上午，何應欽曾单独找我去行政院，对前次“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的情况，提出几个問題：

何問：“北平一般情况如何？”（提到秩序、市容、軍容、工商业、货币、居民等。）

我答：“秩序已安定，市容很整齐，解放軍和藹，紀律好，装备精；工厂繼續开工，商店也已開門營業，货币行使人民币（美鈔和銀元也还可兌換），居民也安居乐业，清查戶口較彻底。”

何問：“你們在北平行动是否自由？有人監視否？”

我答：“我們住北平六國飯店，承中共十分优待照顧，可自由訪亲友，行动方便，从未有人監視。”

何問：“傅作义和邓宝珊究竟怎样？”

我答：“他們自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后，很受中共优待重視，很自由愉快，我們不時晤叙。”

何問：“你們在北平看到叶劍英、林彪、聶榮臻等态度怎样？”

我答：“感到客气、誠懇，大家愿意和談。”

何問：“到石家莊見毛主席和周恩來，你所看到的情况，对和平气氛如何？对和談可能性如何？”

我答：“我沒有去石家莊，四老回來說，毛主席和周恩來有了誠懇明確的答复。总的情况，和平气氛是好的，和談有可能。”

何問：“在北平的其他党派人士态度怎样？”

我答：“我們接触了不少人，他們也都同意和談，但調子高些。”

何最后要我做好工作，希望早日归来。看他和我当时談話的态度，是頗有疑慮，对我所說，也有怀疑的。

对如何进行和談，曾由何应欽召开了四次會議加以研究討論，并还預拟了与中共商談的腹案。

和平虽为全国絕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但是頑固派还是一再从中阻撓，給我們很大的压力。有的人說：“和談为匡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有的人說：“其在政府尤須不忘自身之立場，及为国民大会去年依据宪法而产生者。試問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产党談判？”还有的說：“这次和談，政府必须坚持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国有五大原则，应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内，力求平等的和平。”所有这些反动論調，充分說明当时情况的复杂，給了我們十分沉重的压力。

“代表团”临行前，李宗仁曾亲自表示予以絕對信任，付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行，他就能签字。但事实証明，这全是謊話。

29日，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华和卢郁文秘书长来郎老家，与我商

談赴平的准备工作：1、即将代表团全部名单电北平中共；2、31日由卢秘书长带领秘书处同人先走一批，我也先行，代表們迟走一两天；3、拟定同人必須注意事項。秘书处同人在張首席代表家开了会。30日决定两批行期，向中国和中央两个航空公司分包了飞机，又向中央銀行領到銀元一万元。后又接到黃启汉自北平无线电话告知与中共接洽圓滿經過。

3月31日上午10时，“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秘书处人員，由秘书长卢郁文率領計九人，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先行由南京飞平。另有通郵代表团团长梅貽璠等五人，通航代表雷仲仁等二人，并将存留南京和上海的华北郵包九十五袋带去，无非想表示一下和談将开始，先做一点通郵的貢獻，是有好影响的。当天下午1时半到达北平，住六国飯店，承軍管区秘书长薛子正、交际处长王拓欢迎及中共和談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銘盛宴招待。

在进入六国飯店时，就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標語。当时在思想上有些波动，为什么对我们此来有这样的猜疑，现在看来，中共早有英明的預見。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刘斐及顧問、秘书、隨員等一行十九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南京，于下午3时到达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警备司令程子华、中共和談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銘、东北野战軍參謀长刘亚樓等均到机场欢迎。代表們住六国飯店，晚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談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

“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团”全体名单：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顧問朋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秘书余湛邦、張丰胃、潘伯隱、严北溟、蕭金平、

陳樹華、謝超、張月起、周光宇，副官張立鈞、洪世瑞，隨員楊公庶、雷錫璋等，共計二十九人。

代表團在萬南京飛北平前發表談話：“我們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進行和平商談，深感責任重大，實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我們也知道在和談進程中，當不免遭遇若干困難，但是我們相信雙方商談，似無不可克服的難題。我們當謹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誠意和中共方面進行商談。希望能夠獲得協議，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實現，以慰全國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愛好和平的各界人士們，隨時給我們指導、督促和支持。”

在代表團飛平以後，南京又成立了由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童冠賢、孫科、張羣、朱家驊、白崇禧等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接受和談代表團的諮詢并賦有批准代表團可能擬出的任何方案的權力。從名單上看，要這批人來負起指導和決定的權力，對和談前途，實難樂觀。表面上是指導和談，骨子裡還不是只有起阻礙的作用。

我們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後，跟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譚平山、傅作義、鄧寶珊諸位，及中共林彪、林伯渠、聶榮臻、葉劍英、李維漢諸位首長，個別聯繫訪談，十分頻繁。由於戰犯問題（要求從寬）、渡江問題（希望不過江或緩談渡江），需要多方交換意見，原擬5日正式開始和談，因此決定延緩幾天。

和談進行中，還商談了通航問題。我們會向中國和中央兩個航空公司聯繫，在和談期間每周有一二次班機來往北平、南京、上海間。當時的想法，也是以通航顯示代表團的作用。

7日晚11時李宗仁還偽裝謀和之誠意，特電毛澤東主席重申謀和之決心。原文是：“張長官文白兄轉潤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定謀和，徘徊之忱，諒貴黨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

亮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蒞平，協談問題，亦已采納貴方所提八條為基礎。宗仁憐于戰禍之慘酷，蒼生之憔悴，更鑒于人類歷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乘己飢己溺之懷，更作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謂歷史錯誤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攜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況復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布聞，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陽印。”

毛主席8日復電：“南京李德第先生勛鑒：卯陽電悉。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主張，具見本年1月14日聲明。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總以是否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為標準。在此標準下，我們準備採取寬大的政策。本日與張文白先生晤談時，即曾以此意告之。為著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獨立，為著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貴我雙方兩宜早日成立和平協定。中國共產黨甚願與國內一切愛國分子攜手合作，為此項偉大目標而奮鬥。毛澤東。1949年4月8日。”

國共雙方的廣播電台和報紙都傳播了李宗仁和毛主席來往電文對和談的意見，當時對和談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毛主席從4月8日起，每天分別邀見張治中（一天），鄒方子、章士釗（一天），黃紹竑、劉斐（一天），李蒸、盧郁文（一天）等會談。

会谈内容，我未据代表们宣示，但他们一致表示，敬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并为毛主席的谦虚、诚恳感到鼓舞。

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又欢宴于颐和园。后悉中共先拟招待代表团食宿于此，以交通及设备不甚方便，乃改在六国饭店，足见盛情周到。

13日，中共将双方在会谈中同意的要点印就书面送来。代表们于上下午两次集会研讨，提出拟加修正意见。当晚，双方代表于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研究。双方交换意见，连续两天。15日又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讨论“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会谈，在未开会前，双方代表分别谈话，反复商榷，细致周到。正式开会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见以书面写出，总计四十余处，被采纳者半数以上。其最显著的如八条二十四款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就经协议分成两款。第一款第一项，中共采纳南京代表们的意见，将条文改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作了这样的修改和补充后，平情而论，中共坚持其应该坚持的，忍让其所可忍让的，既严正掌握原则，又抱虚心忍让态度，使人佩服。

15日，中共代表团于双方会议上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4月20日以前表示态度，4月20日为签字日期。

代表团于当晚推定黄绍竑代表偕屈武顾问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专机飞南京请示。黄、屈于16日上午10时专机飞往南京。

至18日，南京广播說：1.对和談八条二十四款，可予忍让，但对渡江問題尚在考虑；2.黃紹竑因血压高，不及于20日前返北平，云云。

19日晚，南京广播說：“对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似未便同意，尤以渡江要求，实非即可同意。”还作欺騙宣傳，說：“既誠意和談，非中共表示停止和談前，决当繼續努力。”真是欺人自欺！

20日晚，得南京李宗仁、何应欽复电，主要意思是不同意签字，囑对和平协定草案，再作商討并反对即行渡江。

后来知道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曾举行临时會議，并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員参加，由孙科主席，听取吳欽城关于和談經過及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与政府复文的报告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国内和平协定”决不能接受之声明，并即电达李宗仁和何应欽。同时国民党宣傳部部长程天放告記者說：“和平的希望黯淡，如果共产党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們的努力。”他还說：“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在这里决定了的。这种立場到4月18日才公开宣布，因为在这以前发表可能会危害和談。”吳欽城还曾对記者說：“广州集团与南京集团的意見，现在实际上是一样的。”

代表团接到李宗仁、何应欽复电后，当晚就开会研究，并曾电李宗仁建議：如在南京蔣軍包围压力下签字困难，可放胆飞北平来签字，代表团可担保安全。根据后来黃紹竑在香港发表給李宗仁的一封信上所說，他4月16日晚上，就是由北平飞南京帶去“和平协定”那天，向李宗仁报告和談經過后，并提出代表团同人的意見，請政府作接受与否的参考，滿以为一定会詳細討論。但出于意料之外，17、18两天，竟毫無动静，原来是为等候溪口来人，而19、20

两天的會議，就完全以溪口的意旨來決定這個歷史性的重大問題。李宗仁16日晚還囑咐不必再提對於協定可以考慮接受的意見。所以很明顯，這次和談，南京僅是象徵的主持者；實際上，一切都由溪口來決定，蔣介石還是在幕後操縱。

21日，中共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正式下總攻擊令，全面渡江。（下午報紙發號外）

這天，上午、下午，“南京和談代表團”均有會議，商討如何處理。當晚12時南京來電詢問代表團歸期，擬派飛機來接。同時周恩來總理來電話，告知人民解放軍今晚已勝利渡過長江的消息。22日晨，李宗仁來長途電話給張治中，告以中共軍隊確已渡江，詢問代表在北平情況。當答中共有留意並表達代表團意見，請李暫不離南京，更不可去廣東。想不到當晚就知李宗仁、白崇禧均曾往杭州去見蔣介石。當晚十時南京又來電話，說明天派飛機來接代表團。23日南京又有電話，說李宗仁、何應欽及政府均已分乘飛機、汽車離京，憲兵警察全撤，城內秩序大亂，具體揭露了反動派垮台的狼狽相。

當晚我們代表團集會，商討決定回南京、還是留北平的問題。經大家反復討論，認為這樣回去，倘作犧牲，毫無意義；要認清形勢，辨明是非，應中共的挽留，待新局勢來臨，再為和平努力。最後取得了一致意見，通過了全團留平不返的決定。因此24日由上海飛平來接代表團的中航專機，由上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的設法，反在上海秘密送來了張首席代表的夫人等全家一行九人。待第二天飛返上海時，只載送了通郵代表李雄等二人 and 郵件等，我代表團全體同人則無一人回去。24日，獲悉李宗仁確已飛逃桂林，何應欽飛逃上海。我代表團又曾去電建議李宗仁，勸他既到桂林，就留在桂林，



千万再勿去广州。那知李宗仁最后还是到了广州。

华北邮政总局与上海邮政总局通邮协议，于27日晚6时在北平东交民巷邮汇局举行签字。华北邮政总局由局长苏韵农、副局长成安玉代表签字，上海邮政总局由梅貽璠、翁英灏、沈鑫、李雄代表签字。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张文昂致词，祝贺这次通邮协议的成功，希望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克服困难，实现通邮协议。但是广州行政院却通过决议案：“对中共区邮电汇兑一律停止。”既悍然撕毁协议，更毫不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充分暴露了反动政府的本质。

4月27日，行政院在广州宣布撤销“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同时以代表团未乘来接的专机南返，就制造了代表团全体人员被扣于北平的谣言。

“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自4月1日由南京到达北平，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李宗仁拒绝签字，具体暴露了反动到底的本质，也就说明了反动阶级垂死还要挣扎，决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后来在局部地区，如湖南、新疆等省的和平解放，都是仿照办理，也还算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5月10日宣告结束。兹摘录几个比较重要的函电，以供参考：

#### (一)5月18日邵力子、章士钊给李宗仁信的全文

窃自和议破裂，举国愤慨，某等失机辱命，撫心慚慙，非言可宣；即律以公刻意谋和之初衷，当亦为慨歎不置。讀最近在穗声明，犹以和平之一贯信念为言，大局虽改，而息壤仍在，某等无似，請得

剴切言之。查和議之起，在去冬徐蚌戰后。其時南京主和，表面固屬相同，就中誠諛避就之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蓋師徒撓敗，再接維難，良不得不借和議以資喘息，徐圖背城借一之舉。於是陽主和而陰實主戰者有之。即欲和已，而以內而封建魚爛之習難改，外而英美連鷄之利可貪，又嚴憚中共之一洪爐，毛髮輕投，一燎且盡，於是主大江為界南北分治者有之。而公舉非其倫也。憶公曾對眾言：吾寧向本國人屈膝，決不向外國人低頭。又云：吾決不為破壞國家統一之罪人。是公了然于和議之真實性，及其可能獲得之最大限度，乃聞人之所深信，而亦為中共領袖之所不欲置疑。以故某等與顏（惠慶）江（庸）返自石家莊時，所陳約定不外此物此志。蓋和者也和，既言和已，勢須限于以真言和者為對手。如上舉兩派人，一則本身原不願和，一則條件為全國人民所吐棄。設誠意謀和，而遽以此兩派人或其意見參雜其間，是在邏輯為自亂其例，在事迹為求前反却。更為譬之，是无地累土，而妄冀九層之台，和亦安有成理。于斯，有須促公回憶者，國民政府對和議之聲明，曾有兩次：一為本年元月蔣公引退之所為；一即同月十四日中共毛主席宣布八項條件后由公承諾作為基礎談判。此中關目，必先洞觀明白，始不致誤入歧途。須知毛主席之八項條件，除第八條為獨立主張外，其餘七條大抵針對蔣之元旦五項而發。理居絕對，事適相反。在法，正負不得同時俱真；在勢，受其一必且拒其二。由是公之談判諾言，不啻打銷蔣之五項意見，使無主張余地，灼灼甚明。某等折沖以還，自信兢兢業業，矢慎矢忠，竭其最大力能，以期獲得限度內之最前地步。未開會之前，兩方代表分別談話，往復商榷，洪細俱到。中共峻求因而弛緩者，數與益均不為少，如戰犯其最著也。自正式開會，我方對協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見，以書面寫出，總計四十餘處，被採納者半數以

上。平情論之，中共堅持其所應持，慨讓其所可讓，虛懷雅度，彌足欽慕。惟吾人有不宜忘者：此次和會，乃敗者之所要求；又國民黨執政二十年，智盡能索，甘于退讓，向后吾國之政治領導權屬於中共。只須了此二義及和會構成之前後事實，則問題中之國內和平協定，在明眼人非惟無深閉固拒可能，反而以善善從長甚或得此已足之意念迎之，似為事勢之所必然。不謂公宜言于和議破裂之頃，竟斤斤以蔣之元旦五項為訓，一若致責于使者之忘所盡力，致恨于中共之無意曲從。至公本身昭示中外之堂堂諾言，所謂以中共八項條件為基礎者，全然置之度外，若無其事，此誠闕命徬徨，百思不得其解者已。昔齊王好竽，有操瑟立齊門者，為讖者所譏。蔣之五項意見，中共視之猶齊瑟也，而公操之以求見容于齊，幾何不成曲柄之勢乎。孟子又載有求為齊言者，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終于無成。公處南京會議中，為主戰派所劫持，無從申張己見，純以齊傅之面對楚咻之眾，因不得不瞻顧蔣所揭槩，以為虛與委蛇之資。嘻！和戰大事，豈尋常虛與委蛇小策所得容頭而過身者！以公之明，豈不熟知。近來公屢以一貫謀和為言，以某等之愚，不識一貫云者，橫貫底于何地，縱貫起自何時。如公所謀和，自始囊括蔣之強硬主張在內，竊疑不智；蹉蹉執持中共八項條件認作基石，事後乃歸咎于蔣之反面策略未獲重視，竊疑不忠。夫和議倡自國民黨，而中共和之，使者數反，文電百出，界綫分明，基石確立，徒以公失于智與忠之運用合度，功敗垂成，坐使黨國諸公羣圖以破壞和平之罪名嫁于鼻己，竊疑不信。不寧惟是，猶記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領袖對於公之是否力能謀和，頗難釋然。經某等再三誓說，以為和平本身有無窮民意為之后盾，即屬一種不可侮之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幟之下相與提攜，雙流會合，并于一噴，應足以克服可能發生之困難而有

余。中共同意此說，和平之門以啟。要而言之，中共此次主和，完全以公為對象。至主戰分子，僥倖也可，招致也可，頗得假公之力充類至盡而為之。倘此者絕無可能，抑成效至微細，亦愿公篤守本位，划清界限，以純粹言和之身，與中共提携到底。此中微妙，諒公洞鑒無遺。苟非如此，和局自始不立，遑待今日。今事實之所表現，公非惟不能堅持原議，砥柱中流，并設法孤立硬派使之就已，而且放棄自己立場，投身于叫囂驟突之激渦，使頂踵盡隨主戰之洪流以沒，旋以主戰者之聲口，抨击和議之不終。此不僅顯示公之信念不篤，進退失據，抑又使持節往復始終其事如某等者嗜焉喪其信守，無以對中共降心傷力諸君子，某等誠私心痛之。說者謂公本心固非尔尔，重圍難脫，遂不得不隨波逐流。某等以為此乃謬悠之談，殊不足為公辯解。蓋和戰大事，凡國家安危，生靈禍福，大抵定于俄頃，決于一言，豈容隨人浮沉，漫以輕心掉之。況主戰派之跋扈驕張由来已久，非倉猝之所形成，又其時散處台榭，并未嘗逼處肘腋，而公名器在手，操縱有途，至何以必開南京會議，東呼西召，造成一被包圍之大圈，使已沉浸其中而不得出，某等誠百思不得其解。姑退一步言，謂此出于事急之無可如何，惟協定之限期屆滿，過江之“敵”軍欲至，所謂硬派，不啻驚鳥駭鹿，覓路分奔，獨公坐鎮中樞，左右顧盼，擅為所欲為之勢，握千載一時之機，某等在平，焦灼萬狀，急電陳詞，懇公無論如何，莫離南京一步。万一別有危機，艱于株守，亦求公飛蒞燕京與某等共圖轉圜突變之方。虽公不以某等為不肯，巽詞見復，而當機立斷之雄心，終不致其苛責中共之幻想，有意回環，終于模稜。此着一失，某等敢謂盡六洲之鉄不容鑄此大錯。然亦徒見公缺乏劍及履及之決心，豈得悉諉為主戰者之形格勢禁哉！迨南京之遜途告終，桂林之勸駕以始，某等亦曾飛電奉告，此公懸崖勒馬

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乃公终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蒞穗，同流合污，阳冠僚案，明儕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某等之愚，以为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固由于本身依倚民众，组织坚强，而亦因于国民党反乎民之好恶，殷败无能。三年之间，党府从全胜以至惨败，迄犹秋风卷席，不至扫地以尽不止。此在中外历史，尚无前例。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掏诚作最后计校，苟能为国多存一分元气，为民多救一人性命，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或曰和平名耳，其实降也。欲以此提振困兽犹斗之精神，拼作铤而走险之末计。嘻！斯何时也，颠倒行逆施乃尔。夫同族之争，败固非辱。政权过久，交迭有时。语云：绳之绝也，必有绝处。绝处在此，降亦何妨。朝三暮四，名何须执。议者以和平协定过酷为言。某等亦颇谓中共可能并无妨再加让步。例如前言删去，或止于轻描淡写，可以减少若干激刺性，而毫无碍于实际条件。又如第四条之军队处理，可候至联合政府成立，以命令行之，无须亟亟整编。忆会议时，某等曾就上述相类意旨，不断陈说，并谓成功者资予对方之幅度愈形宽大，收效所至将与此为比例。然中共坚执历史之教训不可违，基本之策略不可变，彼自有其惩前毖后之理，某等殊难为竭忠尽欢之谈。且天下事之以协定而成者多矣，酷不酷，何常之有。即以国共史迹而论，重庆政协，中共不曾愿受五分之一之军队限制，三分之一之重大事件否决权乎？公试回思，此对中共可得名为酷否？然当时蔣犹靳此区区而不之畀，坐是决裂，人民涂炭至今。今既主客之形不同，强弱之势易位，中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论情无所谓不平，在法亦惟

有順受。天演家言，适者生存，鼎革成事，不取反咎。今日国民党之不适，与中共之应取，岂不如十日并照之明。于此犹必以国家为孤注，人民为刍狗，不忍于政权一日之得失，甘犯穷兵黷武之罪名，对人怨道全失，对己后祸莫测，岂非大愚不灵之甚者乎。今日之事，和固和，不和亦和。和者天下之公言，民生之唯一出路，非国民党所能截断，亦非中共所得把持。中共虽于公失其信心，顾仍未至断然绝望。公虽不脱束縛馳驟之境，顾发憤仍未始不足有为。某等留滞北平，俛息待命。聞公与何院长敬之兄屢以中共扣留代表昌言于众，发布代表团公函又复故加删节，以致要語漏略，本意不明。試思某等纵至不肖，而以立身响有本末，見事非无是非，何至受人拘牽，惟所进退。中共大党，持政待人，各有渠度，亦何至强抑使节，自堕令名。須知吾儕不应以不肖之心待人，尤不应以莫須有之事論政。况某等在此，言和之人不加多；某等在南，言战之人不加少。形骸土木，了无重輕。徒以年事路高，人緣非淺，平章国事，略有扶持，因緣应合，責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为，坐視公等之溺于禧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抑有进者，近聞閩錫山閩关两粵，以危詞怵公，公之赴穗，未免中共愚計。傳有云：敗軍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可与計事。夫閩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遜去，而責若輩死綏，以致城破之日，屍与沟平，屠无完瓦，晉人莫不恨之。今彼欲以亡太原者亡广州，公竟悍然不顧，受其羈勒，斯誠咄咄怪事。又美帝国主义为中共所决意排除，公宁不知。前在宁时，公提出外交意見，期某等向中共折冲。某等当以此点万无冀幸，非惟不应向中共說及，而且公之言論行动，切宜謹慎将事。倘非斬釘截鉄，打倒美援意念，絕无与中共合作可能。如此等語，想公犹能記憶。今据报端所說，公再三为美援辯护，且斤斤执持中共对苏之表示，为閩执人口

之計，嘻·過已。蓋中共揭櫫新民主主義，非至聯合政府成立，經各黨派共同討論之後，不能有旗幟鮮明之外交政策。遽先以捕風捉影之談，蔽罪于人，為己身已成事實文過飾非之地，既不足取信天下，亦何足以昭情理之平。且不務反省，漫以壓迫、恐怖、陰謀、暴力、欺騙、極權、鉄幕種種丑惡名詞，罵倒政敵，罵誠屬已，倒乃未必。人既不倒，己且先崩。凡此皆與某等所能了解于公者異趣，設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義布之，則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其后果何堪設想。某等顛蒙，夙承見愛，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特乘劉為章兄返港之便，取此番經過之實在情形，及某等之深切自信，為公慷慨陳之。知我罪我，所不計也。邵力子、章士釗敬上。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注：此信由劉斐帶香港轉廣州面交李宗仁。）

## （二）5月20日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李蒸、劉斐五人致李宗仁電

廣州李代總統、何院長賜鑒：和談破裂，為時一月。回憶黃代表季寬返京請示，曾托其轉請政府相忍為國，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不幸未蒙採納，重啟戰爭。頃奉召南返，後以中共堅決挽留，並表示將俟新形勢之發展，尚可繼續為和平努力。一月以來，同人身在北國，心念南中，求為和平留一線希望，絕不願輕動意氣。故雖迭聞廣播指為扣留，公布函件，漏刪重要詞句，均容忍而未置辯。區區之愚，固知戰爭不可久持，和平終必實現。今共軍南渡，甫及一月，而東南形勢日非，上海孤懸，豈可久守，武漢三鎮既失，浙贛閩軍事亦成卷簾之勢。大勢已去，人心所向，難期苦撐待變，終恐子事無補，徒苦人民，且禍國家。此豈公等首倡和平之本意，更何以對天下後世之歷史責任。同人等默察年來國共成敗得失之易勢，其主因在

政治而非全在軍事。蓋中共積其二十余年之豐富經驗，深得為民服務之道，而其嚴格之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又保證其上下一致，貫徹其主張與政策，因而獲得人民之合作與擁護。同人等與各方接觸，目擊耳聞，知中共對於維護國家獨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貫徹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業，確為有目共睹之事實，且亦符合國父革命之理想，決非吾黨過去政策及作風所可企及。同人盱衡大局，以為今日只有以誠意承認錯誤，以勇氣承認失敗，坦然交替政權，則總理之革命事業成功，固不必在我，而中外觀感，必能因此和平轉移政權之革命風範，予吾黨將來以新的評價。抑又進者，自和平協定公布，黨內多詆為條件太苛，類似迫降，致有寧可戰亡，不可敗降之憤語。然平情而論，則八條固早為德公所承諾之商談基礎，二十四款只系實施八條之詳細規定。未開會前，我方代表迭經坦切商談，已容納同人若干意見，復經提出書面意見四十餘款，被採納者半數以上。如第一條戰犯名單，完全不提，即為最重大讓步之一例，并經口頭約定，正式簽署協定時，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此意亦經由黃代表轉達。倘吾人能正視戰敗之嚴酷現實，又能了然于政權更迭之常理，同人之愚，以為革命大業，天下為公，已既不能，當讓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與大勢，仍繼續作決無前途之戰爭，則惟有導僅存之殘局于毀滅，增益其對民族歷史所負之罪愆。倘能平心靜氣，發揮高度理智，不因少數人意氣權位之私，置大多數人民之生死禍福于不顧，則一轉念之間，祥和立現。例如近日上海之戰，外圍據點盡失，倘期凭四圍之地，死守到底，則將毀滅此六百萬人民之城市，此豈仁者所應為，亦豈大勢所可許。同人等回溯往事，既痛心不幸而言中，瞻望來日，更覺須當機而立斷；亦知兩公及黨內諸公，經此巨變，必能痛定思痛，力求所以勒馬悬崖之計。



故不惜剖陳利害，率直進言，倘承鑒其愚忱，俯賜採擇，即與中央諸公，共商恢復和平之道，並先行停止上海方面之無效抵抗與破壞，以示誠意。同人等仍願本一貫為和平奮鬥之信念，盡最後與最大之努力，以期減少人民痛苦，保留國家元氣。海天南望，不盡所言，惟詳察賜復是禱。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李蒸、劉斐同叩。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北京飯店。

### （三）張治中於6月23日對廣州、香港的一再進行攻擊和駁辯 曾發表聲明

張治中在聲明中說：“胡言班語，沒有駁斥的必要。不過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傾向，象徵着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奮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並且具有嚴格的批評制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這些優點，反映到政治設施的，是有效率的、沒有貪污的政府；反映到黨員行動的，是儉樸、肯幹、實事求是的軍政幹部。綜合說一句，這都不是過去我們國民黨所表現於政治設施和黨員行動所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能力把國家危機挽轉過來，還可希望把國家搞好，還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證明。”

他在聲明中指出：“這次和談破裂，在我們國民黨內，有些人認為條件太苛，類似投降。其實平情而論，這八條原則早為當時南京政府李代總統所承認的和談基礎，二十四款就是實行這八條原則的具體辦法。在談判期間，我們代表團已經和中共代表懇切磋商，並提出書面修正意見四十餘處，被中共接受過半數；並且口頭約定，如果當時南京政府同意簽字，還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們認

識戰敗求和的必然情勢，就該以誠意承認錯誤，以勇氣承認失敗，坦然放棄政權。甚望我國民黨中央和各地負責同志能夠善用理智，正視現實，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馬的打算，悲天憫人，忍辱負責，為軍民減少犧牲，為國家多保元氣。”

張治中在聲明中最後說：“目前，大局已演變到此，我覺得各地同志們，應該懲前毖後，當機立斷，毅然決然表示與中共推誠合作，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亦即為中共新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共同努力。至於我們國民黨，早就應徹底改造，促進新生，才能適應時代，創造時代，達成我們革命黨人應負的歷史使命。在目前，我們如果把眼光放遠些，心胸放大些，一切為國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為子孫萬代幸福着想，我們不但沒有悲觀的必要，而且還有樂觀的理由。國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為什麼我們國民黨和個人，獨甘落後，不能新生呢？！”

張治中的這個聲明，表達了他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看法，也可看作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共同意見，確實想忠告當時國民黨內稍有愛國心、是非心的人們，應與美帝和蔣介石、李宗仁一伙決裂，轉到人民民主陣營方面來，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也才有新生。

但是李宗仁、何應欽集團，卻還在幻想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仍然服從反革命到底的蔣介石的命令，決心與國家民族和全國人民為敵，最後還是拒絕和平，不特使所派赴北平的代表團前功盡棄，還指揮殘余的陸海空軍和特務匪徒繼續從事瘋狂的、絕望的破壞和頑抗。但這種抗拒，當然決不能阻礙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全國人民的解放，總逃不了徹底的失敗和要受到人民的制裁。

## 1949年北平和談的片斷

刘 斐

《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載有張文白先生所寫關於1949年北平和談的回忆一文。因為這幕和平騙局是蔣介石、李宗仁二人互相穿插，而由李出面串演的，所以就我当时所知道的李宗仁方面的情况，写成这篇文章，作为补充，借供参考。

### 一

我从1945年秋开始辞职，直到1948年秋才得到辞准，离开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正准备回湖南去的时候（家眷已经逃走），李宗仁突然到我家来看我。他说：“你这次辞职获准了，很好；但你不要忙于走开，现在情况可能有变化。据吴礼卿（吴忠信的号）来说：‘现在蒋已很难对付下去了，我想劝蒋暂时退后一步，让你来代理总统，应付眼前的局面，你赞成吗？’我对他说：‘在这严重的危急关头，我不孚众望，只有蒋总统才能作中流砥柱。’吴说：‘我看现在只有你来，才能对时局起缓冲作用。你如果同意，我准备同蒋先生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绝不要向外人谈。’”

接着，李问我：“你看吴礼卿的话是甚么意思？是蒋的示意呢，还是吴礼卿的主张呢？”

我当时说：“蒋没有办法搞下去了，这是事实。但他是不是真有

認識，真心準備下台讓你來搞呢？還是象吳禮卿所說的，他搞不下去了，讓你來臨時應付一下呢？或因為你幾年來同他在政治上不合拍，他不放心你，怕你乘他危急的時候搗亂，故意叫吳禮卿來試探你的態度呢？你對這個問題應該小心，這三方面都應該考慮到，但以後兩個方面的可能性最大。”

李說：“是的，我當着吳禮卿的面還是很恭維蔣的。”

過了兩天，李宗仁又來找我，說：“上次吳禮卿的話是真的，他又來找我了。他說蔣已接受了他的意見，真願意下野，要我代理總統，全權去應付這個局面，並要他（吳）來同我商量，我已經答應願意考慮。”李隨即問我：“你看這應該怎麼搞法？要搞嘛，這也是一個機會。”

我當時說：“蔣發動的內戰是失敗了，軍事形勢不利，人心厭戰，經濟、財政已山窮水盡，金元券破了產，民怨沸騰，岌岌不可終日。如果他真的把政權交出來，你當然責無旁貸，副總統在憲法上是應該代理大總統行事的；如果他是假的，只要你来應付一下，就不是好玩的事情。現在仗是不能打了，只有和；你要和，蔣能不扯后腿嗎？他是不会真的放弃政权的。除非他真的下台出国，而你又能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真正彻底的和；否则，你是不好搞的。”

李說：“這個問題應該好好研究，你暫時莫走行不行？”

我說：“我的家眷已回湖南去了，沒人照料。我從抗戰勝利那天起辭了八次職才辭准，急想要脫離這個環境，暫時回湖南去休息一下，以後看情況再說。”

在這次同李談話之後，我就離開南京到上海住了兩三個星期，以後又到杭州住了一個星期。那時陳儀任浙江省主席，白天陳派交通厅长杜偉陪我遊覽，晚上陳和我一同吃飯。飯後談天，陳表示對

蔣不滿。他說蔣要他征兵、筑工事，他一概不理，他认为再不应该打了。他的話很爽直，但因为他同蔣的关系太深，所以我不敢多說真心話。

我离开杭州后，由浙贛路回到了长沙。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件重大事情，这就是：白崇禧逼蔣下野；蔣先声明求和，继又声明下野；毛主席发表了和平談判的八項基础；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接受和平談判的八項基础进行和談。

我在长沙每天都同湖南省主席程潛見面。程对蔣历来是不滿的。他原任武汉綏靖主任，因为蔣要把白崇禧調离国防部，好让何应欽当国防部长，就把武汉綏署改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調白崇禧为总司令，以免白在中央掣蔣的肘，于是不能不把程潛調开。恰在这时湖南省主席一职竟逐的人很多，程也愿意作湖南省主席。蔣就利用程的老資格来抵制那些竟逐湖南主席职位的人（如賀耀組、陈明仁、黄杰、宋希濂、李默庵等），以程为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綏靖公署主任。蔣对程潛也是不信任的，就把他的心腹李默庵作为綏署副主任、刘嘉树作为綏署參謀长、以及特务楊继荣等安置在程的下面，以便从实际上控制湖南，但他們都只有空头軍銜并无实力。至于程潛，表面上是省主席兼綏署主任，实际上是光杆。在以前蔣的势力还强大时，程固莫可如何，現時局面变了，程明知再跟着蔣走是没有前途的，但反蔣又没有本錢，言論行动还多少要被蔣系人員所控制；加之过去程同桂系有嫌隙，又不敢同李、白靠攏，所以程处境困难，感到很苦悶。他对我表示，現在只有不干，設法离开算了。我当时鼓他的勇气說：現在和平空气很濃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內战，主張和平，李宗仁既主張和，蔣已下野，你这时也应该同李、白一道来主和，爭取息灭內战才好。只要同李白的关系搞好了，湖南

內部就有办法穩定。對於李、白的關係，我答應可以替他疏通，以便彼此合作。程表示同意。

我到長沙後，程還召集了湖南的舊宿士紳曹典球、仇鰲等，開一次會，徵求他們對付時局和省政方針等有關的意見。大家議論紛紜，總的趨勢是主張和平，希望不要再打了。因此，反對內戰的空氣一時頗為濃厚。

這時，蔣系在湖南的分子，天天在李獻庵家裏開會，搞些甚麼。我不知道。同時他們又天天到程潛處開會，口頭上說：擁護頤公（程潛），湖南人要團結起來，並且想盡方法擴編隊伍。他們還常常來摸我的態度。我說我是辭了職的人，百事我都不管。

## 二

白崇禧在武漢，聽說我到了長沙，就接二連三地打電話來要我去武漢。我在長沙休息了幾天才到武漢去。白同我談及他目前的狀況。談到李宗仁時，他說：“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訴他說老蔣是要你的，干不得。他說：‘我有辦法，他要我，我也要他嘛！你們只幫我的忙好了。’”白接着說：“眼面前這個情況，只有找李任公出來領導才好。我們要季寬（賈紹斌）去請他，又沒有找到，他到北方去了。李任公來了個密信……”說着，他把一塊白綢子上面寫的密信給我看，大意是勸白崇禧要革命，反蔣；說共產黨是革命的，叫他們不要怕共產黨。我記得其中有“革命者不怕革命”的一句話，至今印象還很清楚。白接着又說：“我已通過劉仲容去同中共接頭，還不知結果如何？現在我們已同老蔣鬧翻了，要是李任公來，就可以實行聯共反蔣，各方面的關係才好通氣。”（本來就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他們三個人之間的三角關係

來說，白向來是尊崇李濟深的，對李宗仁則常懷着鄙視的態度。李宗仁則由於個人的地位關係，怕失掉他在桂系中的領袖地位，常忌諱李濟深。這是兩李之間的微妙關係。）我從白崇禧的情況看，他這時是感到非常苦悶的。國民黨的一點賭本，被蔣介石一起輸光了。他為了自保，不能不同蔣介石分家，並已經同蔣介石鬧翻了臉。而蔣介石又拖住李宗仁來作替死鬼，白不願意李宗仁干，怕他上蔣介石的當，想找李濟深來聯共反蔣，又沒有找上；通過劉仲容去直接同中共接頭，他感到沒有把握，還有顧慮。他處在這進退兩難的情況下，舉棋不定，只好讓李宗仁去搞搞和平，等待時局的演變。白還覺得桂軍主力孤懸在湖北太不利。他素來是一個重視實力的人，為了觀望風色，首先想鞏固自己的實力地位，希望通過湖南同廣西老巢聯成一氣，才可以進戰退守，立于不敗之地，故對湖南很重視。他主動地問我，湖南的情況怎樣，程頌公能不能一道來搞和平反蔣運動，並要我到湖南去當主席。

我說：“我在抗戰末期對蔣介石、陳誠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惡痛絕，所以抗戰一勝利，我就連續辭職，你是知道的。我身體差，需要休息。湖南的事，還是利用程潛為好。”

白問：“程頌公有甚麼表示嗎？你在長沙曾同他談過沒有？”

我說：“程是不滿意蔣的，但他處境困難，現在不能公開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極情緒，我鼓過他的勇氣，要他同你們一道來搞和平反蔣運動，他同意了。我認為利用程來解決湖南問題有許多好處。他資格老，他在湖南處於家長的地位，比別人好搞得更多。但他本身是個光杆，要給他一點本錢才行。”

白說：“那——我調一個師到湖南去歸他指揮如何？”

我說：“調個師去固然好，能調一個湖南部隊去更好。我看把陳

明仁調到湖南去如何？他同程潛有關係，又是湖南人，這次是你保他再起用的。（陳在四平街作戰時被陳誠打擊，受了撤職處分，後來向蔣要求作湖南主席又沒有達到目的，有牢騷。白出任華中“剿總”司令去武漢時，我建議白利用陳明仁的關係，好便於指揮武漢地區的黃埔學生部隊，所以白保陳為武漢警備司令，陳是很滿意的。）他對蔣、陳不滿，現在可以要他去支持程潛搞和平反蔣運動，并由他去對付李默庵等蔣系分子也較為方便些。”

白表示同意，說：“就這麼辦，你再去同程頌公、陳明仁商量一下，看他們意見如何？”

我把這個意見告訴陳明仁，陳表示願意。接着，我到長沙，把這些具體作法告訴程潛，程也感到滿意。隨後，我又到武漢，把程潛的態度告訴白，白也很高興，並立即命令陳明仁部調往湖南。在作法上是先把陳部調到湖南境內的岳陽，以便支持程潛來搞反蔣主和運動。

經過我在武漢、長沙之間的幾次往返，溝通了白崇禧和程潛之間的关系，他們在政治上的合作關係搞好了。尤其是程潛有了一些骨幹部隊作為支柱，他就敢於公開搞些反蔣主和的措施了，如扣留中央銀行想從湖南運走的準備基金、下令停止征兵等，即其例証。

### 三

李宗仁代理總統後，就有電話到長沙來要我去南京，言詞是懇切的。他說：“你來嘛！暫時搞一個呂超那樣的名義（意味着搞總統府的參軍長），也好一起商量嘛！”我沒有答應他。

北平和平解放後，國共雙方商定以北平為和談地點。那時，孫科任行政院長，提出了一個代表蔣、孫、李三部分的和談代表名單，



其中有一部分代表被中共拒絕，李宗仁提出的甘介侯也被拒絕了。于是李又提出我为代表并已征得中共的同意，才又打电话来长沙要我去南京准备北上和談。李因事先沒得我的同意，怕我不肯接受，同时还要白崇禧打电话来劝駕。白要我先到汉口会一面再飞南京。我对白說，我就心李宗仁担負不起搞真和平的責任，对代表一职不想答应。白崇禧說：“现在木已成舟，中共既同意你作代表，你不去也不妥，并且现在只有和的路可走，还是去的好。”白并說：“你快来汉口，我們商量一下罢！”于是我只好把家眷送往香港，自己則准备离开长沙赴武汉。

临走时，程頌公顾虑我到北平去后，湖南的事不好同白崇禧通气。我告诉他：“我去北平后，这里同白的联系，可由唐天閑(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白崇禧的。有甚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閑去說就是。现在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这时要你同他反蔣、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轉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威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向湘西方面躲开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动身赴武汉。

这时，一方面和平空气高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股逆流。蔣介石还在把他的残部集中南京、上海一带，积极备战。政治上的頑固分子、立法委員中的一部分人，議論紛紛，反对以八項和平談判基础来和談，用以破坏和平运动。我到汉口，白崇禧当面劝我到南京去担任和談代表时，我說：“要和，就要真心实意的和，不能搞假和。要真和，蔣是会破坏的，必須彻底反蔣才能真和。若是这样，我是愿意去的。如果只是搞一套假和平的花招，最好不要我去。”

白說：“事在人为嘛！现在只有一条路，总的方針是反蔣、主和，你放心去做罢！”

我于3月初由汉口飞南京。李宗仁那时住在錢大鈞的房子里。我去那里看他时，他首先說明他同蔣的关系和他自己的搞法，并說他主和有三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全国人民要和，立法院多数委員主張和；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方面会支持我来和，美国人的态度对局势会有很重大的影响；蔣也表示不妨碍我搞和談。他又补充一句說：“尤其美国人不支持蔣，而支持我来讲和这一点，苏联和共产党都是不能不重視的！”言下頗为眉飞色舞。

我知道甘介侯、邱昌渭这般人，早在抗战胜利后，李任北平行轅主任时，就通过司徒雷登、傅涇波替李宗仁拉美国人的关系，并联系一般名流学者作为他个人政治活动的資本。后来在副总统选举时，司徒雷登也支持李宗仁跟蔣属意要当选的孙科竞选。这时，李又想利用美国人的支持来搞和談。我就說：“你靠美国人支持你来同共产党打交道，共产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它还会买美国人的賬嗎？共产党拒絕甘介侯当和談代表，不正是对你勾結美帝的当头一棒嗎？你这种搞法，只能增加你和共产党讲和的困难。”

李說：“唔！那我也可以找苏联大使罗申呀！我是認識罗申的，你也和他很熟識。关于和談的事，我們同他商量商量，看他有甚么意見，行嗎？”

我說：“你同罗申往时在政治上沒有甚么联系，現在来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即使你去請他，他也未必来（时罗申已照国民党政府的通告把苏联大使馆迁往广州）；即使他来了，他也不能命令中国共产党非同你和不可呀！这些都不过是你的幻想而已。至于蔣介石說他不妨碍你，是靠不住的。他不过是利用你来作緩兵之計。你要和，他的軍隊能听你的話嗎？他的全班人馬一个沒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能应付得了嗎？”

李說：“只要和談能够成功，共产党不和我作对，我用全国人要和的力量去压着他們，他們是不能破坏的！”

我說：“主要是仗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甚么样子呢？”

李說：“現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滿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办法了。”

我說：“若还不行怎么办呢？”

李說：“那以后再說嘛！”并問我：“你的看法呢？”

我說：“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計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沒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須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終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蔣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說：“我有决心！”

我說：“将来即使条件談得好，要签字履行，蔣也是会破坏的；若談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蔣的势力籠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嗎？”

李說：“和談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們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談判罢！我自有的办法。只要把蔣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組織民主联合政府的。”

我得到李宗仁縱然在和談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签字的諾言后，便答应代他到北平走一趟。我并建議李宗仁及时請程潛、張发奎、余汉謀等到南京来，共同商討和平的問題，借以增强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四省军政界的团结，李照办了。程、張、余等到南京会谈后，都一致表示支持李宗仁的和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和平反蒋力量。

为了形成一个拥护和谈的阵势，当时还改组了行政院。因孙科同李宗仁是不协调的，孙一方面反对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的谈判，同时在财政上孙又一筹莫展，事实上也非下台不可。但桂系又拿不出一个适于作行政院长的人来，只好利用与蒋有关系的人来搞，于是考虑请同桂系有一定联系的何应钦来组阁。但蒋不同意何搞（表面上说和谈内閣不应以军人来搞，骨子里是掣李宗仁的肘），何心里是想搞的，却看蒋介石的颜色行事，故作姿态表示坚决不干。后来经过许多周折，蒋同意了，我也到上海去促何的驾，何才答应组阁。就这样，勉强凑成了一个和谈的阵势，并在何应钦主持下，召开了由和谈代表参加的四次会议，商定了和谈腹案九条（原文见张文白先生回忆录），作为和谈依据。

和谈代表团在新内阁的任命下，于1949年4月1日出发，当天飞抵北平，开始了为时约半个月的高谈。在高谈过程中，我根据李宗仁的企图，并不注重条款细则上的争论，主要只考虑能否达到李所要求的：划江而治，确保东南半壁等梦想。所以，在我同毛主席见面时，就提出这样的意见：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蒋介石已经下台了，只要和谈能够成功，蒋是不能再起来的；人民苦于兵祸已久，若是利用李宗仁来和平解决长江以南的问题，就可以免于用兵，借以保全国家元气。

事实证明，这是李宗仁的缓兵之计，后来把国内和平协定送南京签字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拒绝。

当双方代表在八项和谈原则基础上结束了谈判，确定了一个

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正准备由黄绍竑代表送南京签字时，章行老（章士钊）问我：“你看，这个和平协定李宗仁会签字吗？”我说：“他可能不签。”章说：“他原来不是說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签字的吗？现在这个条件好，为甚么不签呢？”我说：“李宗仁是充满了个人名位思想的，决没有真正为国、为民，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的。”章说：“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签字，那是太没有心肝了！”

結果，真不出我所料而没有签字，章行老说：“你对李宗仁真是看透了。”后来在我去香港接家眷时，章行老和邵力老（邵力子）还对李很气愤，写了一封长信托我带去，责备他背信弃义不履行签字的诺言。

#### 四

和谈一幕，既然由于顽固分子的破坏和李宗仁主和态度的不坚决，终于拒绝签字而破裂了。和平代表团的成员就都留在北平（国民党政府对这批人明令通緝）。那时，我因眷属还在香港，须我去设法接来，就决定去香港一转。5月间我从北平经天津乘船赴港，带了章行老和邵力老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

我到香港以后，李宗仁即由广州派邱昌渭来港要我去广州，我看李的想法和我不一致，我就没有去。李还几次打电话到我家来催我去，我以需要休息为词推辞了。这时，程潜也先后派程星龄、刘嶽厚带着他的信乘飞机来港要我去湖南。程在信中大略说到白已胁迫他一同备战，他应付不了，希望我回湖南去接他的主席职务，他好脱身，情词非常恳切。我当时复他的信，叫他不要辞职，事情仍

照我們以前所談的相機辦理：一面和白崇禧與委蛇；同時移避湘西，以便相機起義。

當時白崇禧率桂軍主力部隊到了衡陽，也來電要我去湖南，我也推却了，並復他的電說：如果他能到廣州來，我願同他和李三個人在一起談談。白就定期約我到廣州見面。6月初（具體日期記不清），他從衡陽飛廣州，我也從香港飛廣州。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了一整天，又談到深夜。我首先向他們介紹了在北平的所見所聞，告訴他們：現在是勝敗的大勢已定，無可改移的了。然後問李宗仁為甚么到桂林去的，去了為甚么又不按以前的諾言簽字？

李說：“你們談下來的條款，簡直等於投降，這叫我怎麼能簽字呢？簽了字怎麼能執行呢？一切都被蔣控制死了，我發號施令沒人理，要兵沒有兵，要錢沒有錢，甚么事都辦不通。處此既不能和、又不能戰的情況下，叫我怎麼辦呢？我只好生氣不干了，才以飛廣州的名義折回桂林去的。”

我說：“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羅網到廣州來呢？”

李若有所思地震動了一下，還沒有開口，白崇禧就說：“老蔣派居正、吳禮卿等幾位元老到桂林，請他去廣州執行代總統職務，並帶來老蔣一封親筆信。蔣在信中責他以大義，還假惺惺地說他兩人應如何‘黨存與存，你存我存’，這樣他又軟了心腸了。”說到这里，李宗仁拿出老蔣那封信給我看。信的大意是：首先責備李說：“現在黨國處在危急存亡的最后關頭，你身為代理總統，對黨國、對人民負有不可旁貸的責任，豈能兒戲視之一走了事。”接着說：“我是國民黨的總裁，就我的處境和地位說，又應黨存與存、你存我存。只有黨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別無任何出路，決沒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末了說，只要李

到广州来負責，一切軍、政、財權都可歸李掌握，他一定要作到使李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要軍隊有軍隊，決不致有任何掣肘之處云云。

我看完信後對李說：“你象那個童話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樹上，有個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沒有辦法捉到手。後來他想了個主意，從杯中取出一只蘋果來，向猴子再三誘惑，示意要把蘋果給它，那猴子看見了蘋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樹上徘徊瞻顧，跳來跳去，終於經不起誘惑，下樹來取那只蘋果，剛想把蘋果抓上，卻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鎖鏈了。蔣在信中說一定要給你以軍、政、財權，就等于是那只蘋果嘛。現在薛岳控制了廣州，就是蔣手上的鎖鏈，你有甚麼辦法呢？”

李說：“我只好負責犧牲到底了。”

我說：“你這樣替蔣介石負責，就是替罪魁禍首的蔣介石墊棺材底，于黨、于國、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應該的。”

一直談到深夜，白崇禧說：“我們還是九九歸一，一起到廣西打游擊去罷！”

我說：“不行的，打游擊誰還能強過共產黨？為今之計，只有李德公下野，因為他已失去代表講和的資格，由你（指白）率領湘、桂兩省軍政人員和部隊局部起義，還可救全多年來追隨你們的部下。這樣，你們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個安頓。否則，你們失敗了往國外一跑，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

談到這里，我只好說：“好罷！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

這時，李宗仁在桌上一擡，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白崇禧

默不作声。我們的談話也就在这样沉默中結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飞回了香港。



## 和談前夕蔣介石的幕后操纵 和李宗仁的备战部署

宋希濂

—

1949年3月22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24日上午8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跟飞机送你们去。”（究竟当时是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见，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这个学校这时已经大部分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书报等。我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偉克。这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我们在1937年秋天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人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

緒，誰也不相信會有打回來的一天的。”他叫炊事兵弄了一些蛋炒飯給我們吃。約在下午3時，我們換乘一架小型的運輸機，不到一小時，就飛抵奉化機場。俞濟時來迎接我們，同乘一輛小汽車行駛約半小時就到了溪口，把我們安頓在武嶺小學樓上的一間房子里。5時許蔣經國來邀我們出去散步，我們沿着小溪緩步而行，談話很少。由於心情的沉重，也無心觀賞風景。當晚在蔣經國家裏吃飯，拉拉雜雜地談了一些問題，多半是三年來失敗的原因，而對前途怎樣辦，得不出任何的結論。

第二天早晨7時，俞濟時來說蔣約我們上山去吃早點並談話。於是我們同乘一輛小汽車沿公路上駛約一公里多後下來，在松林中循着一條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約一千多步便到了蔣介石的住宅，是修建在叢樹中的一棟小平屋。我們在會客室坐下不到五分鐘，蔣介石進來了，和我們點頭寒暄後，便帶我們到屋後去走走。出門後不到兩百步，便是蔣介石母親的墳墓，我和關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禮，蔣介石回禮並說“謝謝你們”。我們在後山一帶散步眺望了一番，隨即回來吃早飯。飯後，我們分別向蔣匯報了屬於自己工作範圍內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況。關麟征並談到李宗仁徵求他擔任參謀總長職務的問題，向蔣請示。隨後蔣介石向我們兩人講了一段話，茲記述其要點如下：

(一)我們自黃埔建軍以來二十多年的過程中，遭受過許多的挫折，但從未失敗到象今天這樣的嚴重。抗戰勝利後，我們的軍事力量，較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強大得多，為什麼在短短三年的時間里，會弄到今天這個地步呢？軍事上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軍隊的戰鬥意志太薄弱了！一個師甚至一個軍，一被共軍包圍，只有幾個小時或頂多一天功夫，就被

共軍完全消滅了。共軍行動飄忽，我軍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進行決戰。一個部隊被圍，如果指揮官勇敢沉着，選擇要點，固守待援，本是我軍捕捉和殲滅共軍的最好時機。但每當增援部隊快要到達的時候，被圍部隊就已被共軍吃光了，結果總是撲了一個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隊也拖得筋疲力竭，給共軍以更多可乘之隙。就這樣，使得共產黨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而我們則日益削弱。抗戰期間，日軍一個小部隊，據守一個據點，我軍以數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圍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為日本軍隊有武士道的精神，他們的官兵視死如歸。我們過去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能以少擊眾，以一當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貪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戰期間，許多部隊大體尚能保持這種傳統的精神而英勇奮鬥。但抗戰勝利後，很多部隊完全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离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你們現在帶學生（那時美麟征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帶部下，首先最要緊的就是要恢復國民革命軍的傳統精神，才能擔負起救亡圖存的重大責任。

（二）共產黨人和追隨他們的一些黨派及社會上的一些人士，對於我個人及國民政府，攻擊譏諷，無所不用其極。他們說政府是如何地橫征暴斂，說我是如何地有錢，說老百姓對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們黨內也竟然有些人隨聲附和。共產黨的目的就是要消滅本黨，本黨同志不知一致團結起來對付它，反而這樣离心离德，實在令人痛心之至！你們是我的學生，也是和我共過多年患難的同志，你們萬不可輕信旁人對我的毀

謗誣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两段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地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而他还认为失败只是因为部队官兵不肯为他拼命，想起来真是荒谬。

蒋介石接着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帝国主义给他的援助还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1948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sup>①</sup>，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①我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护登台的是CC派的潘公展、董滢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CC派流氓们气势汹汹的吓阻。戴季陶以元老身份登台发言，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推张莘、吴铁城等五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袍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只是一种姿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恼羞成怒，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副戴季陶于是年2月在广州服毒自杀，与此事有关，确否尚待查证。

蔣介石講完他原來準備要對我們說的一大篇話以後，稍為休息了一下，喝了几口白開水，接着對關麟征說：“我離南京前，曾和敬之（何應欽）、墨三（顧祝同）談過，叫你擔任陸軍總司令，何以尚未發表？李宗仁要你當參謀總長，這是他們企圖分化我們的一種間諜，你不宜擔任。你以任陸軍總司令為適宜。”蔣介石隨即對我說：“如果和談不成，共軍必然渡江，今後西南地區極關重要。現在湖南境內的几个軍，于必要時，應叫他們退到湘西去。如共軍向宜昌、沙市進攻，你所指揮的部隊，可轉移到鄂西一帶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設在恩施為宜，因為那裏有飛機場。陳明仁兵團將來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帶。這些部隊，應歸你統一指揮，以鞏固川東門戶。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顧總長、林次長研究一下，並把我的意思告訴陳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軍長。”

蔣介石說完后站起來打開會客室的門，叫站在門口的一個警衛去找俞濟時來。沒有几分鐘俞濟時就進來了，蔣介石囑咐他帶几本專用密本交我帶去交給在湖南的几位軍長。我和關麟征隨即向蔣告辭，偕俞濟時一道下山，約等了半個鐘頭，俞濟時把三本密碼本交我帶給第十四軍軍長張際鵬、第七十一軍軍長熊新民、第一百軍軍長蔣當翊，並要我對他們說今後可常和總裁直接聯系。

上述這些情形，都是蔣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後操縱一切的实际例証。

我們乘一架專機于正午在奉化機場起飛，下午1點多鐘到了上海。商得飛行員的同意，決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門酒店。晚間上海市政府秘書長陳良來看我們。他原在軍政部任軍需署署長，和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飲酒，會講笑話，任何一次聚會，有他在場，是不會寂寞的。但這次一見面就唉聲嘆氣地說：“完了完了，

我們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經完全喪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終了！”

26日上午11时我們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見顧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見蔣經過。談到关于关麟征任陸軍總司令問題时，顧祝同說：“这件事，因行政院于2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請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決議，发表了張发奎任陸軍總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馬上变更，只有暫緩一个时候再說。”因此，关麟征之任陸軍總司令，延到1949年8月才实现。在当时，陸軍總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尙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見反动派內部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 二

1949年3月31日晚7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設宴欢送以張治中为首的和談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軍事會議。参加者有何应欽、白崇禧、顧祝同、張治中、林蔚、蕭毅肃（林、蕭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參謀次长）、湯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總司令）、王叔銘（空軍副總司令）、刘士毅（总统府軍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十二人。會議討論了下列三个重要問題：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蕭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會議責成京沪杭警备總司令部及华中軍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軍南渡，并就海軍沿江巡邏、空軍分区偵察以及交通補給等問題，作了必要的決定。

第二、將駐新疆部队东調。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綫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駐兵将近十萬，在目前情勢下，似无必要，建議將駐新

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詢張治中意見（張那时是西北軍政长官）。張巧妙地答复說：“將駐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遙远，無論步行或車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張的意見，囑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張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駐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拔費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9月間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十个美械师的分配。1948年蔣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編組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军队，在各地設立了许多新兵編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剛揭开时，蔣介石急得如同热鍋上的螞蟻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的掙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十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12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訴我的）。这些装备，于2、3月間陸續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給他四个师的装备，說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訓練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訓練处，兵員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訓練。顧祝同則謂現時全国設立的新兵訓練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領发武器，此事必須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統籌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騷，說：“过去許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結果都送給了共产党。現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縱把持嗎？”（白这番話是对顧祝同說的，实际是指蔣介石、何应钦等。）顧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駁。一个坚持要四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間頂起嘴来，声音越說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臉紅脖子

子粗，大有互相辱罵甚至動武之勢。何應欽看見情形不對，連忙勸他們兩人不要爭吵，說此事待他仔細研究一下，再請示李代總統決定。一場激烈的爭吵，算是平息了。以後聽說分給了桂系兩個師的美械裝備。

最後，李宗仁說了幾句勉勵的話，就散會了。從這個為時僅兩小時的會議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動派內部狗咬狗的丑態。

### 三

我子和談代表團飛北平後的第二天離開南京。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呆在蔣家王朝的都城的最後一次。在這十一天中，凡所接觸過的人，除張治中對和談還抱有幾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餘都是一片悲慘的絕望哀鳴。例如二十多年來為蔣介石所最親信的參謀次長林蔚，向來是一個說話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辦公室和他談到前途的展望時，他搖頭嘆息地說：“國民黨幾百萬軍隊，都是二十多年積蓄起來的精華，現在幾乎被共產黨完全歼滅了，局勢敗壞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共產黨提出的和談條件，實際上就是叫我們投降，有什麼和談可言？我自當幕僚以來，很少攜帶手槍，現在我把手槍隨時佩帶在身，準備萬一被共軍抓住，我就自己了結自己。”又如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時期，我就和他在一起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這大一見面就說：“老弟，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那樣好的一個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功夫，就會失敗到這個地步，真是象做夢一樣。”他站在空軍總部的台階上指着小營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說：“這些都是空軍幾年來修蓋起來的，有的尚未完工，現在得讓共產黨來住了！”言下



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門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計的小洋樓是各式各样的，真是爭奇斗妍，美輪美奐，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館的外，絕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們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樓、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鬧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許多大旅館上等餐館酒樓茶樓，过去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盛极一时，現在則是顧客稀少，門庭冷落，一到傍晚，許多商店即已歇業，街上行人，屈指可數。我看了这一付淒涼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唸起元代詩人薩都拉“六代豪華，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詞來。我想，現在該是七代了！有位唐人先生写了一部“金陵春夢”的小說，我們不談這部小說的內容，用“金陵春夢”四字来形容蔣家王朝的产生、发展到沒落，真是再恰当沒有的了。

## 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沈 蔚

1948年11月間，我在昆明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时，突然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给我一份急电，叫我把云南省站的职务交给副站长皮绍晋代理，立刻赴南京另有任用。我从昆明飞到上海后即轉乘火車往南京，他特派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到車站接我，并送我去玄武門到傅厚崗那条馬路上保密局外宾招待所“誠庐”休息。这个地方当时是保密局专门用来作为与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招待过美帝特务头子。平日一般外勤省站负责人去南京，多半招待住安乐酒店或保密局开设的珠江飯店，这次却例外地让我住入誠庐。我对这种招待感到奇怪，便問成希超叫我到南京有什么事？他也弄不清，只听说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等我去做。

当天下午我正准备去見毛人凤时，他却先到誠庐找我，只简单說明这次是由蒋介石指定叫我到南京主持暗杀李宗仁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毛人凤是叫保密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主持，并进行了一些布置，后来蒋介石知道叶翔之是个女人出身，一向主持內勤工作，連手枪都不会用，便决定調我这个专干这类杀人有經驗的劍子手去担任这一項任务。毛人凤說了这几句話之后便邀我一同上車去見蒋介石。

我們从下午3点等到5点多钟，蒋介石才抽出時間接見了我們。他这次談話态度非常和藹，很親切地問了我云南站的工作情况和我的家庭情况，最后才問到我知不知道这次調我到南京的新任务。我說毛局长已告訴了我。他便說明决定叫我主持这项工作关系到整个大局的問題。他当时还夸口說共产党是迟早可以打败的，而內部的搗乱是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决定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內部統一團結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說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败仗，我們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說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絕對不能泄漏，要我从速布置好以后，只等他一决定行动时，便要絕對能完成使命。末了他还举出荆軻刺秦王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鼓励我，并对我过去愿意冒險到解放区去寻找戴笠失事的飞机，还提出来贊揚我。听口气，好象叫我为了完成他这一任务，連我的性命也要在所不惜。我在辞出时也堅决表示，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任何牺牲都能办到。他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說：“这是我們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个人进行商址，連副局长徐志道都沒有参加。当时决定担任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別行动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是担任暗杀，一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其他的几个桂系头子也采取同样办法来对付。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亲自协商办理，会后由毛人凤分別通知經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別行动組要錢要人应尽量滿足需要。

一星期以后，这个組便作了以下的具体布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我的助手。

秦一向在軍統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干杀人越货勾当，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軍統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侦察他的行动，便在马路通向他住宅的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子，一面可掩护侦察，一面可以在决定行动时利用这里多站几个人不易被发觉。这个地方是由軍統临潼特训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担任。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为掩护，如发现李到机场乘飞机走的时候，立刻报告毛人凤，通知空军，准备用战斗机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毁。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在安徽，为了防止李等乘火车走，便在江南铁路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子，派人摆设香烟摊，监视行动。此外，在汤山附近通杭州的公路上，我们也派了两个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另外还在白崇禧的住宅对门我们也开了一家小酒馆，白的卫士成天在这家酒馆里来饮酒聊天，对监视白的行动很方便。当时只有监视甘介侯比较困难，他住的街道名称我现在记不清楚，只记得附近不易找掩护，而由特务摆上一个流动香烟摊。毛人凤发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高的小车，准备李宗仁坐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时，可以追到半路上去进行狙击。

这个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1949年1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退休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后自己继续干下去，因为淮海战役蒋介石的精锐全部被歼灭后，李宗仁还拥有一部分桂系武力，正在趁机进行逼宫的把戏。在那一段时间中，毛人凤天天叮嘱我作好一切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就动手。当时我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每人两支手枪，弹头内都注入最猛

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一支手提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的用途。毛人凤怕李宗仁在那几天不出来，又叫我在李的住宅附近进行勘察，以便蒋介石命令下来立即执行。我也作了一番布置。

直到1月20日，毛人凤才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担任监视的人交给人事处另外安置，只叫我把秦景川、王汉文、吴德厚三个人带回昆明去，准备必要时再为蒋介石去刺杀他所想要杀掉的人。到了1949年9月，毛人凤在昆明见到我的时候，还一再提起这件事。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而留下这一祸根来捣乱。

## 蔣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軍事會議前后

李以勳

### 一 蔣介石“下野”后蔣軍崩潰的情況

蔣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迄是年6月下旬召开福州軍事會議时止，这一阶段历时近半年，他的主要阴谋和詭計：一是假与共产党和談，一是防范李宗仁的夺位，一是企图保东南半壁，一是确定台湾作为挣扎基地。

蔣介石下野，政权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是内外夹攻所迫成的：一面由于淮海战役主力丧失殆尽，为了获得喘息时间作最后挣扎，假装与共产党和談；一面由于一败再败引起美国朝野不满，为此乃以“退休”为名，让李宗仁上台来应付过关。蔣介石的所謂下野实际上是假的，他不是甘心失败或下台的，只是退居在幕后指挥，和1927年下野到日本、1931年12月下野到溪口的阴谋，基本上是一样的。淮海战役惨败，蔣介石得悉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杀”后，在1949年1月12日即命其长子蔣經国带同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軍施觉民、警卫总队队长任世桂、通信总队队长(人名忘記)等先后至溪口，布置通信网及警卫安全网。迨1月22日蔣退出南京总统府回到溪口后，溪口与各方面电讯畅通无阻，策划指挥儼如司令台，内外圍剿喧森严，和南京黄浦路的官邸基本上

毫无二致；每天頻繁召見党政官員及高級將領，絲毫看不出是退休的狀態。蔣介石口口声声下野不再執政，甚至說要移老雲霧寺（溪口的住所），骨子裡却是一分鐘也不肯放棄權力。這是他一生“好話講盡、坏事做盡”的一套狡詐權術。

李宗仁上台代理總統，蔣介石本想把他作為傀儡，但李宗仁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慫恿下，野心勃勃想取蔣而代之。起初是明順暗爭，後來却明爭明鬥，但歸根到底，桂系實力有限，是鬥不過蔣介石的。當李宗仁甫行上台，想和李濟深聯繫，發表七項措施，主張釋放政治犯，特別是要釋放張學良、楊虎城。據我的小同鄉當時任總統府參軍長的李漢魂3月間來福州對我說：“蔣總統很不同意德公（李宗仁）這種做法，所以要放也放不了。”因此，所謂七項措施也只是徒托空言。3月間，李宗仁和行政院長孫科不能相容<sup>①</sup>。孫科向蔣介石請求辭職，蔣鑒於李孫不和，加以當時立法、監察委員們反對孫科的人很多，均認為“阿斗無能”（一般人以孫科比“阿斗”），蔣征得李宗仁同意後，也不再支持孫科，准其辭職。於是李趁機推薦與自己關係較深的蔣系首要份子國防部長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認為這對自己控制政權方面，可能有些便利。但在蔣操縱之下，何任院長三個月，對李毫無裨益。蔣李矛盾在政府遷至廣州後日趨尖銳。6月間，蔣授意何應欽辭職，並提出以閻錫山繼任。蔣特由馬公島飛至台北轉廣州（住在梅花村一號陳濟棠公館）和李一再商量，始取得同意。惟李宗仁要求蔣將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調任國防部長，企圖直接掌握實權，蔣却堅持由閻錫山兼任，未予同意。

7月上旬，國防部派第一廳副廳長何志浩為代表（公開名義為

<sup>①</sup>1931年廣州組織西南政府以來，李、孫兩人私交一向就壞，李宗仁上台給孫壓力，孫科對其侄兒孫乾說，有李宗仁這個牽閘在，根本就不愿再干。

中央各軍事学校毕业生护党救国非常委员会的代表)来福州传达：(一)宣諭李宗仁迫蒋介石出国的三封信件长达三千余言；(二)揭露李宗仁要調白崇禧回任国防部长的阴谋，是想以全国仅存的一百八十万军队和共产党作和談及投降的本錢，劝各級带兵官勿受其愚弄。据何志浩告诉我说：“蒋介石对李迫共出国甚为不满，蒋李是无法并存的。”听取这项传达的有中央軍校及各兵科专门学校与陸軍大学出身的將級军官六十余人。

蒋介石退居幕后指揮，在軍事上特別重視东南地区。因为三江(江苏、浙江、江西)与閩粵是他夺取政权以来的基地，至于西北、西南、两湖与广西地区，僑員虽大而力量薄弱，苟存不易。蒋自2月初即以薛岳继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以朱紹良继李良荣任福建省主席，以陈誠继任台湾省主席，以陈誠的心腹方天(国防部參謀次长)继胡家凤任江西省主席。此外，蒋又設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湯恩伯为总司令統一指揮江苏、浙江及皖南軍政；并为便利湯的指揮，以“忠实可靠、反共坚决”的丁治磐充任江苏省主席兼第一級靖区司令官直归湯恩伯統轄。又以周彝(陈誠的心腹)继陈仪任浙江省主席兼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归湯恩伯指揮。至于陈仪的去职，是3月上旬蒋在溪口下手令将其免职，22日又下令将其扣留在上海，同时并密令湯恩伯执行(按陈已被蒋杀害于台湾)。其原因有二：主因是陈仪看到大势已去，不想頑抗到底，曾密函湯恩伯，劝其不再抵抗。湯将原件密报蒋介石，蒋认为陈通敌叛国，故予扣押。次因是湯恩伯在北洋軍閥时代經陈仪(当时任浙軍第一师师长)一手提拔，这时陈任主席，湯任京沪杭总司令，不便指揮陈仪，因此非調开陈仪不可。所以在蒋未扣陈仪之前，湯就一再力保共同乡同事又是部属的周彝继任陈原来的职位。



3月間，張治中至漢口和蔣介石商談和平談判問題，後來又在南京由新任行政長官何應欽主持幾度召開會議，就中共所提八項條件作基礎加以研究。當由李宗仁、何應欽和國民黨中央公推三位委員組織指導委員會，並訂出九點與中共商談的草案。國防部並作出了國共停戰協定的低限要求七點。3月下旬，國民黨南京政府決定派往北平進行和平談判的代表人選是：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

4月中旬，國共雙方代表擬訂了和平協定草案八條二十四款，由黃紹竑帶回南京。蔣介石在漢口接到顧祝同的報告非常憤怒，徹夜徘徊，頻頻拍案，說：“文白（張治中字）無能，喪權辱國。”4月21日，福州綏靖主任朱紹良對我們講話說：“蔣總統由漢口來電話，共產黨所擬的八條二十四款，條款苛刻，難於容忍。如今局面，和是必亡，戰可能不亡，望傳告將士備戰。”從此國共的和談宣告破裂。

和談破裂後，人民解放軍即開始渡江。在鎮江、南通之間，南京、蕪湖之間，安慶、九江之間，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部、第三野戰軍陳毅部共約百萬大軍，均在二十四小時內強渡長江南下。23日，南京卫戍總司令張耀明率部棄城逃竄，作為封建買辦官僚的統治中心的南京，從此解放。同日，擔任江防的部隊在蕪湖附近的第七綏靖區張世希部，在銅陵、貴池附近的第八兵團劉汝明部，在安慶、九江間的第八綏靖區夏威部，均行潰退。在皖南及浙江的第二綏兵團如第十七兵團侯覺如部、第六兵團李延年部、第九編練部（預備兵團）張雪中，在江西地區的第二紅練部（後改為第十二兵團）、第三編練部（後改為第二十三兵團）胡璉及沈安蒸等部均在4月底向南逃竄粵閩地區，沿途被解放軍追截，潰不成軍。

長江被突破後，湯恩伯被迫收容殘部及原擔任防守上海的各

軍，作固守上海的準備。4月底，蔣介石由漢口潛至上海，在龍華機場向湯恩伯、陳大慶（上海警備司令）、石覺（上海防守司令）、毛瀛初（上海區空軍司令）指示機宜之後，即飛台北轉馬公島（澎湖列島的主島）。湯恩伯所率的上海守備部隊二十二萬二千餘人（包括地方團隊），計有三十七軍羅澤闓部（羅在上海戰敗逃台後和湯恩伯打官司，為蔣介石所扣押）、五十二軍劉玉章部、七十五軍吳仲直部、十二軍舒榮部、五十四軍闕漢騫部、一二三軍顧錫九部、二十一軍王克俊部、五十一軍王秉鈞部（以上共為八個軍）及朱致一的獨立九十五師、鄒鵬奇的獨立九十九師、藍嘯聲的青年軍二〇四師、暫編第八師等和交警支隊曹鈇身部、江蘇保安旅孫宗玖部，企圖固守上海，希望上海變為國際共管，持續半年的守備來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戰。（蔣經國告訴我，美國已保證第三次世界大戰最遲在1950年春開始。）

湯恩伯將上海市構成外圍、主陣、核心三種陣地進行抵抗。但備戰四個月，作戰只半個月（由5月12日至27日）即行崩潰。蔣介石率領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在上海作戰開始後五日，即由馬公島乘兵艦來至吳淞口督戰。5月23日蔣介石看到外圍工事盡毀，陣地俱失，知道如再繼續作戰就會全部被歼，於是手令湯恩伯逐次掩護從海上撤退，將一些基本部隊撤出（如七十五、五十二、五十四等三個軍及九十五、九十九、二〇四師等三個獨立師）。其餘非基本部隊除投降外均被歼。這是蔣介石下野後親自指揮戰鬥的實況。

當上海外圍蔣軍各部潰敗時，參謀總長顧祝同曾電令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第七綏靖區司令官張世希、第八兵團司令官劉汝明、第九綏靖部司令官張雪中、第七兵團（南京衛戍總部改編）司

令官張繼明，統歸京滬杭副總司令兼金華指揮所主任（另兼第六兵團司令官）李延年指揮，但這些司令官們相應不理，一味率殘部分竄逃入福建。當時，劉汝明、張雪中等部在第二野戰軍的一部（後來查明不足一個軍）追趕下，退入閩北之南平，劉部竟又擅自退至閩西南之龍岩，由長江一潰就達一千五百華里。而李延年、張世希、侯鏡如等部在第三野戰軍的一部（後來查明也不足一個軍）追趕下，退入閩東之福安、長樂及福州附近。其中只有第十一師劉鼎漢部，因是陳誠的基本部隊，在閩東三都澳為陳誠派船將該部接往台灣。

退集福建的蔣軍殘部，除劉汝明兵團尚勉強成為部隊外，其餘各部隊均已破爛不堪。5月間，參謀總長顧祝同攜帶整編福建部隊方案，乘專機至台灣和陳誠磋商之後，又飛往馬公島請示蔣介石，決定作如下的整編：

（一）第六兵團司令部、第十七兵團司令部、第七綏靖區司令部、第九編練司令部等四個戰略單位，決定保留第六兵團司令部番号，其餘一律裁撤。

（二）以上單位各司令官李延年、張雪中、張世希、侯鏡如等一律改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兼任第六兵團司令官。

（三）第八兵團劉汝明部暫不整編，容點驗後決定。

（四）第七十三軍、第八十八軍及第七綏靖區直屬官兵合併為一個軍，保留七十三軍番号，撤銷八十八軍番号，以李天霞任軍長，原屬各軍均編成一個師，保留十五師及一一六師番号。

（五）第七十四軍、第八十五軍及第九編練部直屬部隊，合併為一個軍，保留七十四軍番号，撤銷八十五軍番号，以勞冠英任軍長。原七十四軍縮編為一個師，保留五十一師番号。原八十五軍直屬部隊及二一六師合併為一個師，仍保留二一六師番号。另保留二十三

師番号。

(六)第一〇六軍王修身部保留番号，第十七兵团直屬部隊編入該軍補充。

(七)第一二五軍吉星文部縮編為獨立第三十七師，吉星文改任該師師長。

(八)第二十軍軍長楊幹才陣亡後，該軍隨第七綏靖區司令部退抵福州之部隊編成一個獨立團，准予開回四川，重新組織第二十軍。

(九)成立福州綏靖公署軍官團，以侯鏡如兼任團長，方先覺任副團長。凡屬各兵团、綏區、各軍師編余軍官一律冊報該團受訓，薪糧照發，出缺優先任用。

6月間，蔣介石仍在馬公，一面要陳誠加緊訓練由上海退回台灣的部隊，一面到浙江定海觀察舟山羣島兵要地理與守軍情況。接着就到廣州和余漢謀、薛岳研究守備廣東的問題，同時和李宗仁商討任用閩錫山為行政院長。6月中旬，蔣也知朱紹良，說要到福州視察福建防務。21日他乘飛機到了福州，並召開軍事會議。

## 二 蔣介石召開福州軍事會議的原因

蔣介石一向重視福建地區，認為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台灣五省在政略上、戰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資豐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憑借和便利，有國際盟邦的直接支援。他在下野前二十多天，在南京黃埔路官邸召見我時曾說：“福建非常重要，沒有福建就沒有台灣。你到福建協助李良榮主席注意閩浙邊區、閩粵邊區和閩台之間的聯繫。你所帶的獨立第五十師是戰略預備師，是美械裝備，應好好訓練，作為防衛福建的有生力量。”（按：我已發表陸軍第

一訓練處副處長，後來改任第一編遣司令部副司令官，蔣要我不動聲色，趕快到福建兼長該師。因福建很重要，沒有部隊布防。)

福建在解放前，裝備優良、兵員充足的部隊只有這一個獨立第五十師(全部美械)。5月上旬，長江江防各軍潰集福建的殘部，和在淮海戰役被消滅後在福建重建的各軍師均未征集起來，所以，蔣對福建的防務是很放心不下的。蔣下野時，李宗仁進入總統府將文官處和參軍處所屬各局加以改組，大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樣子。他以李漢魂任參軍長接替薛岳，以劉士毅任該處第三局局長接替俞濟時。因此，蔣下野後將侍從系的人事預為安置，重點擺在閩、台地區。除留蔣經國、俞濟時分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正副主任隨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員一部安置在陳誠的台灣警備總部，一部安置在朱紹良的福州綏靖公署工作(按朱、陳兩人均曾任過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其親信侍從如參軍施覺民，發表為福州市警察局長，原警衛室主任石祖德，發表為廈門警備司令。

石祖德告訴我：蔣的原來計劃第一步住溪口故鄉，第二步遷至福州之鼓嶺，第三步遷至廈門之鼓浪嶼，最後才遷至台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馬公。後來因上海戰事失敗很快，才匆匆由吳淞乘兵艦逃至馬公，不再遷往福建。迨6月間，蔣介石看到福建已成前線，該地區軍事與政治，中央與地方，嫡系與雜牌，矛盾重重。蔣介石為了策劃固守福建，解決有關問題，所以才飛到福州來面授機宜。據朱紹良、俞濟時、湯恩伯、李延年、石祖德、施覺民等人談及當時蔣飛閩的原因，及蔣在6月21日下午在福建飛機場召見我時所談的問題，綜合起來約有如下幾點：

(一)為了鼓勵士氣、收攬人心。自4月下旬長江江防被解放軍突破，5月下旬上海被解放軍占領後，退抵福建的殘破部隊雖一度

加以整編，但軍心渙散、軍紀廢弛。在4月下旬至5月中旬二十多天中，一退兩千里以上，沿途軍行所至，雞犬不寧。因為形成流竄，后動系統已亂了套。在蘇皖邊、浙閩邊，居民生計一掃而光，借故征草，儼如浩劫，民怨沸騰。自第二野戰軍一部長驅進入閩北、第三野戰軍一部長驅進入閩東后，退守閩中閩江以北各部隊俱無作戰信心，老是想渡過閩江逃往閩南來苟全性命。蔣介石為了穩定人心，所以要親來撫慰以示關懷，表明他還是三軍統帥，並不是羣龍無首的亂局。

(二)為了表達要堅守福州的企圖。自人民解放軍進入閩境之后，蔣介石曾在上海及馬公電告福州綏署主任朱紹良，要將福州附近構築一個半永久性的防禦工事，作堅強的防衛作戰準備。但朱紹良陽奉陰違，一面受“福建上將”(海軍上將薩鎮冰及陳紹寬)的影響，他們希望朱紹良不要在福州決戰，以免地方糜爛；一面听信綏署副主任吳石的進言，認為斯大林格勒堡壘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個月，福州南有烏龍江，東臨大海，形成背水之陣，如何能固守？何況山地作戰又是共軍起家的本領。(按吳石因有通共嫌疑，為福建特務頭子王調勤告發，於1950年在台北為蔣介石所殺害。)同時福州市長何震也陳述福州貧困，征工征料多有困難。因此朱對死守福州毫無信心。蔣介石雖然三申五令，但朱仍未計劃建築半永久性的工事，只是要陳士章在福州西北，要李以勳在福州大小北嶺，王修身在福州東北，構築一綫野戰工事，應付一下。據李良榮6月15日來福州告訴我，他在馬公見蔣時，蔣對朱在福州备战不力，表示忧虑，準備要親來福州視察。

(三)為了再度整編部隊與調整裝備。由於各部退抵福建后，歷經5月間裁編一次，取消了一些兵團、綏區及幾個軍師番號，但6月

蔣查明留下未撤在福建地区的部隊人數仍不充實，冒名頂替的現象普遍存在。在福州補給區及財務處領糧餉人數近二十三萬人，實有人數相差甚遠。由於改發銀元券，台灣中央銀行動用儲備黃金過鉅，蔣介石認為非再度核實兵員、裁減番号，不但國庫空虛，而且造成無可戰的部隊。但一再裁撤，又怕官兵們心理變化，故親來作精神動員一次，然後下手整編。同時看到退集福建各部隊裝備（武器、被服、裝具）不良，在退却時不僅重武器棄盡，連輕武器也損失不少，甚至連行軍鍋灶都丟光了。當時美國國防部鑒於國民黨軍隊作戰不力，也無意積極再行補充。為了切實調整新旧武器加以使用，蔣特來福州，要求各軍今後要愛槍如命，借以糾正依賴美械源源補充的“大少爷不在乎”的心理。

（四）為了調和中央與福建地方人士的關係。自蔣介石下野後，福建地方紳士看到戰局不利，排外心理日趨嚴重，中央與地方間的隔閡也較前加劇。福建參議會公然反對征兵，主張閩人治閩。福建海軍眷宿薩鎮冰曾說：“民國以來，福建受外省人統治已三十餘年，蔣上台以來二十餘年中更加厲害。”曾任海軍總司令的陳紹寬被陳誠壓迫解甲歸來，也是牢騷滿腹。他的部屬一位參謀長楊仲強及曾任海軍次長的李世甲說過類似的話，說什麼福建人在共產黨方面還出了一個鄧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國民黨則空空如也，連本省主席也要外省人來當。（這些情況我在5月間曾函告蔣經國轉報蔣介石。）1949年1月前任福建省主席李良榮報准國防部在福建成立一個一二一軍，該軍軍長沈向奎曾受到閩南人陸軍上將張貞的指示，各級軍官一定要起用閩南人。在4月間，閩北師管區司令譚道平調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服務，這續經顧祝同報准蔣介石以總統府高參于天寵調充，但福建參議會議長丁超五反對，電請國防部阻

其到任，而主張以該師管區副司令閩人吳某充任，于是國防部不得不答應，否則就征不了兵。蔣介石迫于形勢不敢施行压制手段，只好收買利用，所以到福州來進行調和一下。據蔣的親隨告訴我，蔣原來是想在福建省府召集黨政軍重要人員開會和談話的，後來聽說福州情況複雜，不敢入城，故臨時改在飛機場開會。

(五)為了調解朱紹良、李延年和刘汝明的關係。在福建地區不僅有中央與地方、軍隊與政府、黨務與政治的矛盾，就是軍隊指揮官之間也是矛盾突出，其中以朱紹良、李延年和刘汝明之間（嫡系與雜牌）為甚。

李延年与刘汝明远在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間即有矛盾。那时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蚌埠指揮所主任，曾指揮过刘汝明，当时刘驕橫自恃不听指揮。同年4月下旬，防守長江的部隊撤退時，李延年任京沪杭警備副总司令兼浙江指揮所主任駐金華時，國防部命令凡屬南撤入閩各兵團、綏區及編練司令部（二線預備兵團）統歸李延年指揮，而刘因存在蚌埠前嫌，又不听其指揮。因此兩人之間矛盾頗大，兩人入閩互不見面。

朱紹良与刘汝明因一向不在一个戰場或地區相處，原無宿怨。1949年5月上旬，刘率第八兵團南竄抵閩北之建甌，照理進入福建自應受福建最高指揮部——福州綏靖公署的指揮，惟刘部進入閩境數百里，竟不向朱報告情況。後來由朱派少將高步瀉位東到建甌和刘聯絡，刘也不買賬。朱為此特向蔣介石控告刘企圖不明。後來刘兵團的五十五軍七十四師李益智部，在南竄途中迷失方向，与該兵團失去聯絡，擅自竄抵福州附近，朱便立即派人收容并想加以改編。這使刘大為不滿，向蔣告狀。因此刘入閩近兩月未与朱會面，連電報往返也甚少。刘原是西北系宋哲元舊部，為人跋扈，平日除对



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外，對其餘的人均不大奏眼。因此蔣介石企圖來閩調和他們之間的矛盾。

(六)蔣的親隨秘書曹聖芬在機場對我說及兩件事：(1)李宗仁和朱紹良電信往來頻繁。蔣介石得報，李宗仁想在6月底或7月上旬來榕一行，故趕在李之前先來福州布置。因蔣李之間爭權，6月中旬在廣州已經爭得面紅耳赤了。(2)蔣介石急于在東南成立軍政統一指揮機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關於長官的人選，陳誠與朱紹良互相讓讓，蔣介石需要來福州與朱磋商，以便決定。

### 三 會議經過與蔣介石講話要點

1949年6月1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2時30分，蔣介石在福州市南郊飛機場辦公大樓召開臨時軍事會議。參加的人員有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紹良，東南前進指揮所主任（前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福州綏署副主任吳石，參謀長范蘭堯（兼代福建保安司令），第六兵團司令官李延年，副司令官梁棟新，參謀長任同棠，第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遲到），第七十四軍軍長勞冠英，第九十六軍軍長于兆龍，第一〇六軍軍長王修身，獨立第三十七師師長吉星文，兼獨立第五十師師長李以勛，各軍的師長，各師的團長，聯勤總部第一補給分區司令繆啟賢及其直轄通信兵團、監護團的團長，福州綏署各處處長，第六兵團司令部各處處長與綏署、兵團部直轄的憲兵、警衛、特務、水警等獨立團團長，各軍各師的副軍長、副師長等八十餘人。缺席未趕到的人員：有第八兵團司令官劉汝明，副司令官兼五十五軍軍長曹福林，第六十八軍軍長劉汝珍及所屬各師師長，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副司令官唐云山、方先覺，第九軍軍長徐志勛，第五軍軍長

高吉人，第一二一軍軍長沈向奎及各軍所屬師長。這些人因駐防閩西、閩南地區，而蔣介石又提前來福州開會，故未能趕到。蔣臨時指示湯恩伯將會議要點帶到廈門傳達，另改時叫蔣本人再至廈門召訓。此外，國民黨總裁辦公室主任俞濟時、參軍兼福州警察局長施覺民、總裁警衛室主任兼廈門警備司令石祖德、總裁機要秘書曹聖芬等均行列席。

蔣介石於21日上午8時帶領親隨人員俞濟時等由台北松山機場起飛，9時到達，原想先往福州市巡視一番，當時福州市民已奉命懸旗相迎，後因安全保障問題中止。蔣到達後休息片刻，9時30分開會，由曹聖芬及綏署秘書曾某擔任記錄。其經過概況如下。

#### (一)各單位主官報告軍情概況

開會後，首先由福州綏署參謀長兼代福建全省保安司令范誦堯，報告福建省內的戰況，說6月中旬共軍陳毅部一個軍已進入閩東，劉伯承部一個軍已進入閩北，以及福建原有的“土共”(游擊隊)在閩東、閩西、閩北的活動情況(其中報告閩西陳永生部頗為詳細)。然後他又說明福建全省國民黨軍隊的布防情況，具體陳述在閩江以北第六兵團、閩西南第八兵團、閩南第二十二兵團的情況。再次報告福建地方保安團隊使用情況，及當前各行政專署與各縣的治安情況。(蔣當時對着地圖，記下位置。)

其次由福建後勤補給司令繆啟賢報告福建地區軍糧、被服、械彈與裝具車輛情況，特別強調福建軍糧不足，已向地方借糧五百萬斤以上，希望台灣軍糧按期接上，以維軍民信用便利作戰。(蔣當時怒形於色，匆匆記下。)

再次由各軍軍長、各獨立師長相繼報告部隊防務情況。除獨立第五十師原在福建擔任治安是美械裝備、兵員充足、無所要求外，

其余各軍軍長多要求补充兵員、武器和服装。二十五軍軍長陈士章提出，該軍服装难以蔽体。七十四軍軍長劳冠英报告，該軍兵多枪少，曾經再三請求补发，但迟迟未能領到。他說，将来应战不力，責任归誰担負。九十六軍軍長于兆龙、一〇六軍軍長王修身，虽均毕业陆大为蔣所識，但自知出身杂牌并非嫡系，和陈士章、劳冠英不能相比，恐要求过分，激起蒋介石怒惱，认为該軍兵員不足、装备不良会将部队裁掉，所以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关于人馬武器服装的問題十分慎重。蔣當場詢問，回答亦不奢望，只求保住番号的苟存。独立三十七師師長吉星文部是淮海战役后，馮治安的第三綏靖区残余部队組成的，吉星文自知該師兵員械彈不足，却不敢請求补充，只要求蒋介石准將該師調至河南打游击。（蔣記下，一笑置之，不答。）

各部队报告毕，守平潭島的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因船誤点迟到，由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代为报告該軍人員武器待补状况，并提出平潭島“土共(游击队)猖獗”，該島兵单有所顧虑的問題。最后由福州綏署主任朱紹良將閩东、閩北地区守土不力、弃职潛逃的行政人員加以惩办的情况作了报告。东南前进所主任湯恩伯將閩浙边、閩粵边情况及閩海边三都澳、平潭島、馬祖島、金門島、东山島的視察情况作了补充报告。蒋介石与朱、湯、李四人就地图談了一些有关攻守計劃后，隨即对全体与会人員讲话，并就名册点名。

## (二) 蒋介石在会场讲话的要点

首先，他說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来和大家見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他說：“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論理不应再問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匪’作斗争。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付托，勉以‘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遺言，現正是

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要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他说这段话时，故意表示振奋的样子，发出微笑。）

其次他讲到“生平待士不薄”，何以今天弄到士兵衣不蔽体的问题。他说：“本人自民国十三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为统帅已达二十五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日士兵衣不蔽体，使我心中难过。我在溪口时，后来在上海及马公岛，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多陷入‘匪区’，我预知原料困难，曾多次要联勤郭总司令作最大努力的筹划。据郭说在6月以前搞好二百五十万至二百八十万套夏服不成问题。我在马公岛了解福建地区已拨足十六万套服装，按实际人数基本上每兵一套是够分配的。今天据陈军长报告该军士兵衣不蔽体，使我愧对部属。福州补给区廖司令（当时廖站起来，蒋怒加斥责），你是干什么的？十六万套服装如何分配的？立刻列表来报，彻底查明下落，否则就应法办。廖司令你听清楚了没有？（廖答：听清了，马上遵命办理。）希望各军长师长回去，好好安慰部下，保证服装有着落。我回台湾即令补运。总之这些事是使我痛心的。”（当时廖本人吓得发抖，会后他对我说陈士章这个家伙在会上向蒋老头告状，几乎要我脑袋搬家呀！）

再次蒋讲到由于“我们一败再败，盟邦失去信心，如今美援困难，应作最艰苦奋斗”的问题。他说：“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刚才听到各军、师长报告，除独立第五十师李以勳部兵员武器充实外，其余全省各军兵员、武器均差得颇多。这个问题当前靠征兵、靠美援，俱难济于事，特别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美械愈来愈难，国械各兵工厂俱

在大后方，每月产量有限，全国分配不足之数相差甚鉅。大家应当知道：我們的盟邦美国，自抗日后期由于我国政略胜利（按：蔣所指是国民党投靠美国的好处），得到美援、美械的装备（完整的与不完整的參半），六、七年以来已装备我軍将近一百个师，并有其他重武器、化学武器。大战结束后，美国目下存在菲律宾及日本冲绳基地的武器有限。盟邦看到我們屢打敗仗，将它援助的东西轉而送給了敌人，并壮大了敌人，朝野俱有不满，认为援蔣等于援共，真使我慚愧之至。現在武器来源不容易，大家再不知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如闊少爷一样，就只有束手待擒。依当前情况，将来美械补充困难，就是国械土造也难如数补充。敌人把我們的武器搶去，部队战斗力强大起来，把我們的兵俘去，反过枪头来杀我們，的确是我們奇恥。如果大家不下决心，以一死报国，将为百代的罪人。”蔣介石說到这里，好象很难过，指着七十四軍軍长劳冠英說：“劳軍长，你听清楚沒有？你所带的部队，就是有人沒有枪，何等可恥！各軍师长、团长回到部队去，要传达我的指示，人人做到爱枪如命。”

最后他讲到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問題。他說：“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潰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閩。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細，所以沒有长驅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們狼狽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們任兵团、綏区司令的，只顧逃命，弃盔丢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除裁撤大单位外，把大家保留下来，編余的悉有安置。現在各部队士气不振，軍紀廢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經批准竟擅自去台湾。对福建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歎！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

斷，福建就是手足，沒有福建即無以確保台灣。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閩江以北，閩南也難以確保。今後大家要樹立雄心壯志，和共‘匪’頑強鬥下去。最遲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聯軍就會和我們一道驅逐赤俄勢力，消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轉達所屬，知道我的希望與決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頓，作保衛福建的準備，用自己熱血來鞏固台灣，國土就一定能夠恢復。”（蔣介石這番話，當時由於我的部隊及另指揮的三個保安團分防閩浙邊境的壽寧、福安及閩粵邊境的廈門、金門、海澄、雲霄及福州地區軍隊尚未集中，曾編印出來發至連長一級。）

#### 四 福州軍事會議決定的問題

蔣介石講話完畢，隨即與朱紹良、湯恩伯、李延年、俞濟時交談了幾分鐘，並作出決定。主要內容，記錄如下：

##### （一）關於防務方面：

1. 進入福建之解放軍，在6月16日以前，除第二野劉伯承部一個軍進入福建北部，占古田之解放軍不足一個師。第三野陳毅部占上海後，現在浙江休息，進入閩東邊境的僅一小部。現在守備閩江以北地區之七十四軍、一〇六軍、九十六軍、二十五軍及獨立五十師、獨立三十七師仍固守羅源、連江迄福州西北大湖、雪峰、古田附近之綫。

2. 九十六軍及獨立五十師（福建保安第五團、第六團與突擊團均由該師指揮）作收復古田的準備；收復後應加以固守，以鞏固福州外圍據點。

3. 七十三軍仍固守平潭島，加強據點，實行清鄉，並封鎖福清海口與平潭間交通，嚴格檢查。

4. 駐漳龍地區之第八兵團、泉廈地區之二十二兵團不北調。閩江以北兵力不足，將由台灣抽調增防，並加強重火力的配置。

5. 原決定獨立五十師調金門歸還二十二兵團建制暫緩實施，容收復古田後再定。

6. 守福州之二十五軍、一〇六軍及七十四軍之二十三師迅速加強工事，近郊要點應構成半永久性工事以資固守，征工征料由福州綏署統一計劃之。

以上統由福州綏署朱主任速作調整布置。

### (二) 關於調整機構與整編方面：

1. 國防部已遷廣州，東南沿海防務重要。為確保東南（以台灣為中心）諸省，決定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統一指揮浙江（當時只有舟山羣島）、福建、廣東、台灣四省軍政事宜，長官人選決定後另行電達。

2. 政府發行銀元券後，動用黃金白銀，經費困難，嚴禁吃空，決定核實各部隊兵員，認真估計戰力。即行成立東南區點驗整編委員會，以蔣鼎文、俞飛鵬充正副主委，速行計劃點編。

3. 為充實部隊戰力，今後決定進行裁減大單位，充實師以下單位，以健全戰略師為主，軍與兵團一級盡量減少。在福建區應如何調整，追點驗後決定。

以上由國防部命令施行。

### (三) 關於後勤補給方面：

1. 在閩各軍有兵員而武器不足者，福州補給區速將現存台灣高雄約兩個師的國械裝備運閩，先發給守各連江、平潭之七十三、七十四兩個軍，其餘平均酌量補充，以資應急。不足之數另行由後方設法調用一部。

2.凡屬在閩部隊是美械裝備部隊，如獨立第五十師之彈藥，尽速由台灣補給區補足三個基数。馬尾彈庫所存之國械彈藥，速行發足閩江以北各軍，以資備戰。

3.軍糧缺乏系由于船隻困難所延誤，應由福州綏署朱主任與聯勤副總司令兼台灣港口司令何世孔協商運送，不得再誤。所欠地方民糧，扫數清還。

4.在福建地區各軍就地所借軍糧一律清還，并辦妥手續以免影響軍心。福州綏署及福建省府迅速命令清查，不許延誤。

5.服裝不足，限在本月底清查確實數量，由福州補給區向台灣補給區補足，每人一套夏服。這件事繆司令火速辦妥，延誤即究辦。

6.关于馬尾要塞重建工程及福州防禦工程費，另案預算，能在就地征用者速行構築，不得延誤。

## 五 蔣介石在会后召集將領個別談話紀要

蔣介石于6月21日下午1時20分，在飛機場大樓與全體与会官員聚餐。蔣與同席的人員談天，問各軍師長的年齡、籍貫、家庭情況。午餐后，蔣通知俞濟時傳見獨立師長以上將領，由曹聖芬做記錄。被傳見個別談話的計有朱紹良、湯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陳士章、勞冠英、于兆龍、吉星文、李以勳等九人。下面所記的談話內容，除蔣介石親自對我講的之外，對其他各人所談的，一部份是听曹聖芬告訴我的，一部份是其本人告訴我的，一部份是本人的親信告訴我的。茲記要點如下：

對朱紹良談話內容 據曹聖芬及朱的女婿鄧墨林（福州綏署第一處處長）說有五點內容：（1）蔣征詢朱关于東南軍政長官人



逃意見，蔣表示他及陳辭修(誠)的意見，以朱充任最适宜，從而可以讓出福州綏署主任交湯恩伯接任。而朱表示，一定要陳辭修擔任，因陳在台情況熟悉，而且過去歷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多年，對東南各省軍政人事、指揮調度較為便利。蔣當時點首，並說回台與辭修商量決定後再電告。(2)蔣要朱調整部署之後，在解放軍未進攻以前，如情況許可，應到閩南視察，並親到漳州和劉汝明見面，消除前嫌，以示同舟共濟之意。(3)蔣要朱飭令各專員、縣長加強地方團隊，利用黨團骨幹征集志願兵，配合正規軍作戰。(4)蔣要朱對地方參議會加以誘導，不要上共產黨的當；在危難關頭應軍政一心、軍民一心，不應輕率提出反政府的意見。蔣對朱說，不可過於溫情，對在地方有煽動行為者應嚴懲不貸，使其畏懼。(5)對朱說明福建在戰略上的重要，希望朱在戰前多加計劃、部署，並行督戰，以穩定局勢。

**對湯恩伯談話內容** 據曹聖芬告訴我，蔣要湯對福建作全面的計劃，區分大陸要點守備與沿海島嶼守備兩案。在共軍未繼續南進前，着重乘兵艦沿島布防，加強督練，並整飭官兵頹唐現象。

**對李延年談話內容** 李會後對我說，蔣談話要點如下：(1)蔣要李一定攻下古田，使福州有一個耳目。李認為古田隔福州過遠，即使攻下也難守得住。當前共軍人少，如陳毅主力南下，情況就立刻變化。(2)蔣要李死守福州，以鞏固台灣外圍。李說：“死不足惜，不過在今天，我李延年進也危險退也危險，陳誠再作我的頂頭上司，他能饒我么？”

**對王修身、陳士章、勞冠英、于兆龍等談話內容** 蔣和他們談話的時間頗短。據他們在會後說，主要是詢問部隊人馬、裝備、訓練、防務有無困難等情況，對這次會議決定事項有何感想，有無其

他意見等。据我当时观察，于兆龙、陈士章出来有些喜形于色，而王修身、劳冠英則有不快之感。

对吉星文谈话内容 吉星文对我說：（1）总统对我要求調至河南打游击一事表示同意，不过他說我們部队里眷属太多，打游击要輕装，应事前做好准备，可将全部眷属迁台。（2）总统說我的部队原是馮治安的一点底子，应好好保存下来，因張自忠总司令在世时对国家有过功劳。总统准备調我部至閩南，归刘汝明指揮，这一点使我很不安。我对总统說：“恐怕刘司令官会吃掉我的部队。”总统說：“我会关照你，有困难可立即电告我。”这使我很感动，因我的部队一再减編，官兵是不安心的呀！

对手以勛谈话内容 李是最后被召見的一个，談話時間較长。

蔣召見我时，甫坐下，蔣先要我将离开总统府半年来，在福建地区所見到的重要事情扼要报告。我将一些混乱現象报告完毕，蔣提出一些問題問我，我一一答复，由曹圣芬记录下来，特別的問題，蔣也亲自記下。当时對話如下：

蔣問：“据报朱一民（紹良）主任每日醉酒吟詩，对备战很松懈，是否属实？”

李答：“他飲白兰地酒是經常的，但不很醉。得空时，要和福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曾小魯互相吟詩。他对福建备战，不很积极。一般看来很平靜，死守福州的信心不大。两月前李汉魂（总统府參軍长）來榕，朱要我作陪。席間李汉魂对朱說，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注意調整部署。朱当时曾表示：‘国家成敗兴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前月薩鎮冰、陈紹寬、丁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三百人，目的是在国軍

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这件事事前是朱主任默許的。如今校长你要我們死守福州，上述这些事情，請校长估計一下。”（蔣亲自記下。）

蔣問：“加强福州工事問題，我一再向顧总长（祝同）說过，要国防部赶快进行，也一再函告一民加紧构成半永久性筑城，作持久战打算。但是据报福州工事做得太差，没有一点計劃。是否征工征料难，还是福州綏署不奉行我的指示，倒底是什么原因？”

李答：“在福州外圍，野战工事有了一点，但很薄弱。除了一〇六軍在福州东郊、独立五十师在福州大小北岭、二十五軍在福州西北郊由鼎湖山麓迄洪山桥构成若干掩体外，有計劃的守备問題，福州綏署并未明确区分任务。至于半永久性筑城却没有一点。福州市长何震說，在福州做工事，征工征料不容易，除非政府拿出錢来。在上海有外圍、主陣、核心三綫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蔣听后，只是摇头感叹，并問我何震哪里人，什么出身。）

蔣問：“福州綏署副主任吳石，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調回福建以来，据报有厌战論調，并曾多次向人說，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話么？他在陸軍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課么？你可以談談他的情况？”

李答：“我1940年考入陆大时，吳已調至柳州任第四战区參謀长，没有听过他的課。1942年我毕业陆大，回第九战区工作，路經广西参加柳州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他認識。1947年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曾見過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談戡乱問題，他认为长期打下去会把我們拖敗，在戰場上要想三年五載將共軍消灭实不可能。因战綫长、戰場寬，在江西圍剿三年尙不成，何况今天共产党羽毛已丰乎？今年5月底他来福州，不久邀我到温泉路家中吃飯时，說：（1）

福州易攻难守，最大的地障是背靠烏龙江；(2)福建是山岳地区，便于打游击，但打游击乃是共产党起家本事，我們的游击本事比共产党差远了；(3)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之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也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綏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飯桶；(4)当今之計，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的諸方面来看，一饒之望可以持久者是守島嶼，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蔣隨即記下。)

蔣問：“福建省參議會在我引退时，据报曾策划反对征兵，連招募志愿兵也反对，是否属实？也曾主張过要以‘閩人治閩’和‘联省自治’等問題是否属实？福建人对中央还有什么不滿的？”

李答：“福建省參議會丁議長超五及大部分省县參議員，排外心理很重，惟閩南、閩北兩派地域观念的隔閡，在意見上也不完全一致。总的說来，以閩北人尤以福州的士紳、官僚、政客、退役將校为甚。例如去年年底校長派我来福州兼任独立五十师时，当时在南京、在福州就有許多參政員、參議員罵过李良榮主席，认为李丢尽福建人的臉，在福建成立一个独立师还要保荐一个广东人来当师长。今年春总统府參軍施覺民調兼福州警察局长，第三局高參于天寵調任閩北師管区司令，參議會就大肆反对，认为‘福建人只配当兵不配当官’。他們說，福建成为浙江和其他外省人的殖民地了。又說，真奇怪，共产党对福建人不輕視，国民党对福建人却薄待至此，这种兵还能应征么？这种仗还能打么？丁議長和在香港的李济琛有来往，平时自恃是国民党元老，朱主任、李主席对他都奈何不得。請校長注意这些事情的影响，这对守福建、守福州的困难是分不开的。至于联省自治或福建自治問題，在校長下野后，他們认为大势已去，朝廷无主，只有各自为政。这种論調在3月間 还有所聞，近月来却没有听到了。”(蔣当即吩咐曹秘書要好好記下来研

究，他自己也記下要点。)

蔣問：“李司令官吉甫(延年)对战局信心怎样？吃大烟的瘾戒断了么？是否还常常打麻将，他有什么困难之处？”

李答：“近月来李司令官的思想是消极悲观的，他前月告诉我：自总统引退后，人心大变，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国运问题。目下福建尽是败亡之将、惊弓之鸟，只知上骗总统下压官兵，对上浮报对下敲诈，打起仗来只知保全性命。至于李吉甫本人，生活腐化总统是明白的。他到福州以来，爱在福州宫巷二十号林则徐重孙林长孺家中吸大烟、打麻将事实。不过他打仗有办法，算断敌情比较精确，气量较宏，统驭上也较服众。李本人对总统是忠实的，但对陈总长(诚)则非常不满，在思想上亲何(应钦)、轻陈的倾向是一贯的。”(蔣频频点首，没有记下。)

当我谈完李延年情况后，蔣說：“时间到了我不再进城了，原来是想乘车进城巡视，看看福州父老的，容下次再来吧！”最后他问我还有意见么？还有困难么？

李答：“校长要我和九十六军一道负责收复古田，这个任务比较困难。九十六军是杂牌底子，素质复杂，兵员装备都不充足，即使攻下古田，固守也不容易。当前福州外围兵力单薄，加上军粮不足补给线太长，攻守都有困难。校长不是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目前解放军正在休整，这是共产党作战惯例，一个大战役之后一定有一个时间是休整。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八万之众，如果我们陈毅主力未入闽进攻福州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逐步抵抗撤至闽南，这对持久作战很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更有实际效果。我向校长直言，并非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

蔣仰首叹气后說出如下的話：“你當我的學生，難道不知‘先制之利’、‘先發制人’、‘先聲奪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么？沒有軍隊還有國家么？保全軍力是重要的，但福州過早落在共‘匪’手里其政治影響甚大。台灣人半數以上原籍福建，對故鄉十分關懷。南洋一帶的僑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數。如果他們知道福州失了，就認為福建失了，就更誤解為我們國民黨徹底失敗了。這種心理上的變化，就會使我們失去海外僑胞的同情與支持。所以為了大局，福州是必須死守的。希望你體會我的心事放膽去做，只要將領有必勝信心，處絕地也可以生。同時你應知道我們政略是成功的（指靠美國而言），有我領導你們，有台灣在，即使大陸盡失，也可復興。”

下午3時左右，蔣介石由朱紹良陪同赴機場，他乘坐的“美齡號”飛機已升火待發。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蔣介石的。當我跑步趕至機場跑道邊時，湯恩伯早已率領與會將校列隊相送。在蔣未到達前，聽說與會的軍師長們，特別是團長和軍師參謀長們，趁機溜進美齡號飛機，分別坐一坐，會心地相對微笑。蔣介石到達機場時，湯恩伯急忙叫集合，這些軍官們才蜂擁出來站隊。湯指示他們對蔣介石要“目迎目送。”這蔣起飛後，朱紹良宣布：“各回原防，听候具體指示後行動。”散場時，我看表已是下午3時30分。

## 六 會議後執行蔣介石命令的情況

由6月21日開會完畢迄7月底止，在這三十多天中，朱紹良在糧秣、彈械的補充方面，對蔣介石的命令是奉命唯謹認真執行的，其他方面的情況分條綜述于下：

（一）國防部東南區點編委員會的成立及其點編經過

（1）福建地區點編經過：蔣介石回台灣不久，為了徹底核實東

南各省兵員与装备、策划东南半壁的确保方案，急急地于7月1日成立一个国防部东南区点编委员会，并授该会主委有决定师以上战略番号撤销与保留的特权。该会主任委员由陆军上将、战略委员蒋鼎文调充，副主任委员由陆军上将、战略委员俞飞鵬调充。下辖：浙江点编组，福建第一、第二点编组，广东第一、第二点编组，台湾第一、第二点编组，海南岛点编组，蒋鼎文亲率福建第一、第二点编组到福建来。福建第一点编组负责闽北地区，由台湾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郑冰如充组长；福建第二点编组负责闽南地区，由国防部监察局中将局长彭位仁充组长。该会规定在点验人员、武器时，前綫守备部队，除哨兵外一律到点，非守备前綫的后防部队，除卫兵外一律到点，否则以逃点论处。福建地区在7月4日至15日点验完毕，蒋鼎文飞回草山向蒋介石汇报。据朱绍良说，在点验中，中央系统的第六兵团各军师、第二十二兵团各军师尚顺利，惟在漳州地区点验第八兵团各军师则甚感棘手。因该兵团是地方系统，兵员缺额过多，在点验过程发现有计划地集体冒名顶替：点甲军时，乙军抽兵顶替；点乙军时，甲军抽兵顶替。点验人员无奈之何。7月15日蒋鼎文在福建省立一中第六兵团李延年司令部召集师长以上开座谈会时说：“福建地区原领军粮军餉人数二十二万人以上，这次点验结果，不足十八万人。其中刘汝明兵团的人数仍未核定，容请示总裁之后再定。这种现象非迅速整编就无法和共军作战。福建乃台湾生命綫，充实战力乃刻不容缓的大事。希望各军师长体念国家危难、粮餉不足之苦，为了挽救大局，一定要执行整编命令。”这次点验雷厉风行，点验委员们是严肃进行的。例如蒋介石命令九十六军及独立五十师要迅即进攻古田，所以先行点验。独立五十师守在福州西北一百华里之大湖前綫，点验人员亲到排哨点进行点验。九十六军

在开拔至雪峰前两天，即在福州飞机场点验，他们想抽调部队或借兵冒名顶替，十分困难。但在这次点验过程中，各级官兵俱是怨声载道的。

(2)福建地区整编经过：1949年7月中旬，点验核实人馬、械彈与部队质址后，蔣鼎文飞回台北，提出整编方案签請蔣介石批准，即以国防部兼部长閻錫山名义发布福建地区陆军部队整编命令，其要点如下：

甲、第六兵团李延年部所辖各军师的整编：1.该兵团之七十三军李天霞部番号保留；该军所辖之十五师及一一六师番号保留；该军原辖之七十七师毛定松部未归建，番号撤销；该军兵力不足，将交警第二旅楊遇春部撥入该军补充（该旅是特务部队后来抗命南甯）。2.该兵团之七十四军劳冠英部，番号保留；该军所辖之五十一师、二一六师番号保留；该军之二十三师兵力不足，撤销番号，官兵遣并补充。3.该兵团之九十六军于兆龙部、一〇六军王修身部合并为一个军，保留九十六军番号，以于兆龙任军长，一〇六军番号撤销。原九十六军所辖两个师，合并成一个师，原一〇六军所辖两个师合并成一个师，以章毓金、吳劍秋分任师长。

乙、第二十二兵团李良荣部所辖各军师的整编：1.该兵团之第五军高吉人部、第一二一军沈向奎部、独立第五十师李以勋部、空军警备第一旅勞錫洸部合并为一个军，编成三个师，保留第五军番号，以沈向奎任军长。原第五军的三个师合并为一个师，保留二〇〇师番号，以叶敬任师长。原一二一军番号撤销，所辖三二五师呂省吾部、三五〇师黃建墉部，番号撤销，该军官兵一部编入五十师，一部编入四十五师补充。独立第五十师不再独立，改为第五军军内师，番号保留，仍以李以勋兼任师长（后来因该师駐防在福州西北



前綫，朱紹良向蔣介石請准保持獨立不改編，仍歸福州綏署直轄）。空軍警備第一旅改編為第五軍之四十五師，以勞錫洸任師長。2. 該兵團之第九軍徐志勳部、第二十五軍陳士章部，合併為一個軍，保留第二十五軍番號，以陳士章任軍長，第九軍番號撤銷。原第二十五軍之兩個師編成一個師，保留四十師番號，以曾正我任師長。原第九軍所轄之兩個師編成一個師，保留一六六師番號，以葉會西任師長。

丙、第八兵團劉汝明部所轄各軍的整編：該兵團所轄之五十五軍曹福林部、六十八軍劉汝珍部，保留番號，軍內各師暫不調整，另以福州綏署直轄之獨立三十七師吉星文部撥入該兵團補充，該獨立三十七師番號撤銷。

各部編余的軍官，一律送閩南軍官團歸方先覺收訓，保持原級原薪，出缺優先遴選補實。這次點驗整編結果，軍師單位兵力是核實了一些，但在緊張形勢下，改編缺乏訓練時間，軍心是極其動搖渙散的。

## （二）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成立經過

蔣介石對東南沿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台灣五省非常重視（按：6月下旬，江蘇全境已解放，浙江只留下以定海為中心的舟山羣島地區未解放，為周岩、石覺、郭濶等部所盤踞，江蘇流亡主席丁治磐也逃匿于此），這是由於：1. 在兵要地理上，這些地區海口較多，容易接受美國的支援，進可攻，退可守；即使全國大陸盡失，沿海地區也有島嶼可以凭借。2. 在經濟條件上，東南是富庶之地，蔣在該地區歷史淵源較為深長。再則當地的買辦、地主、縉紳、仕商對蔣比較馴服，不僅是蔣起家之地，而且浙江乃蔣家鄉所在之地，故蔣在淮海戰役後將命根寄托在東南的掙扎，比其他各省為甚。

自蔣介石在6月下旬开会回台之后，因福建的朱紹良、湯恩伯，广东的余汉謀、薛岳，浙江的周鼎、丁治芬，均先后表示拥护陈誠任东南軍政长官兼統籌兼顧以完備保东南，于是在6月25日蔣介石即发表陈誠任东南軍政长官，以王东原、罗卓英副之。6月27日至6月底，东南軍政會議于台北召开，規定苏、浙、閩、粵、台五省主席，閩粵綏靖主任，各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各級署參謀长，駐台各軍师长出席参加。蔣介石在会上重申确保台湾，作为“复兴”中华民族基地，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巩固东南各省防务，借以巩固台湾外围屏障的决心。陈誠在会上指示，除軍令、軍政有关业务外，并談了編制、装备、訓練、运用与补給等問題。7月1日东南軍政长官公署开始行使职权，于是蔣介石在福州召开的軍事會議对东南防务取得一致意見的阴谋得以实现。第六兵团副司令梁栋新出席会议归来，曾带回文件七件，我7月上旬到該兵团部看过一次。

### (三) 进攻古田的经过

古田位置于福州西北約一百公里，四面皆山，城廂位置俱低，乃福州通向閩北至浙江必經之道。蔣介石认为古田是福州外围唯一战略要点，非据有古田即难以确保福州。7月中旬刚刚点驗部队完毕，軍队如何整編尚未决定前，李延年轉达国防部參謀总长顧祝同电給于兆龙、李以勋，大意是：“奉總裁手諭，該两部决定保留并加以充实，照福州會議定案，在敌軍未增援前，九十六軍火速开雪峰与原守备大湖之独立五十师协力收复古田（該师暫归該軍指揮），以巩固福州外围。”朱紹良并給予該两部一些“战临費”作为鼓励，并令补給区儲各軍粮半月配合作战。

7月25日該两部即以一部兵力向古田搜索前进。九十六軍一部进至古田东南之山村曹洋厅附近，独立第五十师一部进至古田

东南之天津、下坑地区搜索。九十六军及独立第五十师先头部队，均被驻守古田之解放军所阻击，伤亡了一部份。于兆龙、李以勳据报，古田原有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师，现在已调入江西归建，新接防的部队是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朱绍清部先头部队，第十兵团叶飞司令员带主力已抵建甌。在7月下旬，我陆续据报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所谓“收复”古田任务，我认为不可能完成，于是据实电报请示机宜。随得朱绍良复电，要我撤回大湖转为守备；九十六军也调整部署，7月底全閩江以北部队均一面守备一面整编。蒋介石期望占领古田的幻想，因此便冰消云散不再重提了。

#### (四)由台湾调兵来福州增援的经过

守福州及閩江以北部队，自7月间点验整编之后，撤销一个军和五个师的番号，兵力甚为不足，朱绍良、李延年均甚隐忧。当他们洞悉第三野战军陈毅所部著名的第十兵团叶飞部已入閩后，基于福州会议定案，因閩南的第八、第二十二兵团不能北调，应由台湾调兵增援，朱绍良电请陈诚从台湾抽兵增防，以资固守福州，却迟迟未得复。迨7月下旬，陈诚始由台湾高雄抽出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之二十五师一个加强团三千人附山炮兵一连，由该师副师长關某(四川人，名字忘)率领来榕，弄得朱绍良啼笑皆非。

当时台湾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也曾来视察一次，并向朱说明台湾兵力情况。他说，台湾在本年5月以前，只有八十军唐守治部及第六军戴朴部，都是在东北失败后收容官兵重建的，没有作战经验。自上海战役后，撤回台湾的五十四军闕汉骞部、七十五军吴仲直部、五十二军刘玉章部、九十九军郝鹏奇部和青年军二〇四师蓝啸声部，俱是残破不全，尚未补充完毕，须迨8月间始能外调。所以当前只能抽调五十二军的一部，8月上旬该军始能开拔前来，等语。

在这情况下，福州防守兵力捉襟见肘。蒋介石要朱紹良固守，全是主观梦想，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是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而已。

福州于8月17日解放，朱紹良、李延年只身乘飞机逃跑。全战役在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主力打击下，守军七万余人几乎全部被歼。关于福州战役经过，本人另文纪实。

\* \* \* \*

综观以上所记的事实，证明蒋介石所谓“下野”、“引退”、“和谈”都是假的。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他时时刻刻都在整军备战，不甘死亡，企图卷土重来。毛主席说过：“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sup>①</sup>。”这是一针见血之论。蒋介石下野后，虽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妄图挣扎，但终于被人民所唾弃，滚出大陆。诚如毛主席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sup>②</sup> 这的确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个人对反动派曾尽以“忠诚”，后来大势已去，被迫率部投向了人民。惟反省过去的顽固、愚昧、危害人民的勾当，殊不足以自贖。今天享受人民优遇，内心有无限愧怍之感。

---

① 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88頁。

② 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90頁。

## 蔣介石做總統的一個片斷

胡次威

### 從選舉第一屆國大代表說起

1935年，我在浙江省做蘭谿區行政督察專員，當時國民黨政府正要選舉第一屆國大代表，由中央選舉事務總處派我兼蘭谿區選舉監督，寄來一張簡派狀和一块長方形的關防，要我立即成立區選舉事務所。

不久，接到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黨部的會銜密電，附有代表候選人名單，要我支持他們一律當選。自然，所有候選人都是清一色的國民黨黨員。我隨即召集所屬十一縣的縣長到蘭谿開會，在會議席上宣布了密電和名單，請大家發表意見。有的縣長認為這張名單無法執行，因為有一些候選人是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有一些候選人在本地聲名狼籍，劣迹昭著，誰都不會選他們。可是多數的縣長認為所謂選舉也者只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最關重要的還是選舉方法問題。

浙江省政府和省黨部的密令，明擺著是不能不執行的，我當然同意後一種意見，和縣長們在選舉方法上商決了三個問題：1. 選舉人名冊問題。各縣都未作過選舉權人的調查，根本無法編制選舉人名冊。大家認為這樣更好，選舉人識字的不多，原可由代書人代為

簽名領取選舉票，那就正好發動各該縣政府全體職員翻開“百家姓”和“千字文”，用大代放里的排列法任意編造。2. 秘密名單以外的候選人參加競選問題。為了在面子上做得好看一些，准許他們自由參加競選，即使他們帶人前來投票，至多也不過投幾十張或者幾百張票，這樣一點票數，誰也不能當選。3. 保障秘密名單所提的候選人當選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必須在投票結束後，立即估計他們所得的票數，臨時發動各該縣政府全體職員漏夜寫投票，缺多少補多少，以補到他們足夠當選的票數為止。

我還排定日程親往各縣監選，能敷衍的就敷衍，能彌縫的就彌縫，務使其不致出事。最後又想出一條“掩耳盜鈴”的辦法，要各縣縣長把選舉票櫃送到當選，在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集中開票。我曾發現有不少的選舉票在票櫃里擺得十分整齊，顯然是打開櫃子成摞地放進去的，而不是一張一張投進去的。好在唱票、計票、監票的先生們都是“自家人”，大家都心照不宣。至於那些秘密名單以外的候選人，已明知其不能當選，誰也不願既花路費又費時間來欣賞這最後的一場把戲。

江蘇省的第一屆國大代表選舉票，辦得晚一些，我在1936年調往該省做江寧區行政督察專員兼江寧區選舉監督，又適逢其會。我在浙江既已有了一套違法舞弊的經驗，到了江蘇只是召集所屬各縣的縣長到江寧東山秘密開會，面授機宜，他們據以如法炮製，那就不在話下了。

“處處老鴉一般黑”，全國其他各省各區選舉第一屆國大代表的手法，和我差不了多少，可能有些地區比我還要搞得更糟。可以肯定地說，如不違法舞弊的話，那一千多名的第一屆國大代表誰也當不了選。

可是国民党政府的宪法，便是这些代表老爷們隔了十多年之后在南京开会制定的。誰能說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文呢！

### 国民党内部对宪法草案的一场爭吵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做总统，因而不顾一切，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在抗战前，立法院起草过一个宪法草案，叫做“五五宪法草案”。“五五宪法草案”对总统的职权有所限制，蒋介石原本是不满意这个草案的。正在此时，张君勱和曾琦通过行政院长张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说要重新来一个各党各派都能同意的宪法草案，提交国民代表大会讨论，否则民社党和青年党就不参加国民政府。在蒋介石同意之下，张君勱草拟了若干宪法原则，其中最突出的有四条：1. 总统的任期定为四年，只得连选连任一次；2. 实行“责任内阁制”，由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3. 实行自治；4. 设置大法官九名，解释宪法和法律。蒋介石自有他的打算，对这些意见一律接受。

蒋介石随即指定王寵惠、吳鉄城和王世杰等三人负责起草，由王世杰执笔，只一个星期草成了一部宪法草案。先在国民党内部进行讨论，开会地点在中央党部，我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到会的约七八十人，由王世杰主席。

在王世杰报告起草经过以后，大家就吵开了。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个草案远不及“五五宪法草案”，根本要不得。还有人大罵张君勱冒充宪法专家，招搖撞騙，不能让他踏出主意破坏国民党的党治。王世杰一再说明只能就案言案，不能涉及根本问题。于是书归正传，转而讨论草案的具体内容。

不料这样一来，吵得更兇。爭执得最厉害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1. 要不要在憲法草案第一條規定“遵奉三民主義”的問題；2. 領土範圍應該怎樣規定的問題；3. 國民代表大會閉會以後要不要設置常務委員會的問題；4. 總統在國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應不應有緊急處分權的問題；5. 總統應不應有否決法律權的問題；6. 總統的連任次數要不要加以限制的問題；7. 各省應該是行政區劃還是自治區域的問題；8. 要不要設置大法官的問題。發言的先生們各有各的企圖。例如，希望蔣介石作總統的人，即極力主張總統應該有緊急處分權和法律否決權，也不要限制總統連任次數。不願意蔣介石做總統的人，則與前一種人的意見完全相反。彼此爭吵，互不相讓，從下午吵到深夜。王世傑同蔣介石通了一次電話，最後宣布說：“這個草案是蔣先生同意的。各位的意見都很好。夜深了，散會吧。”一場爭吵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幾天，中央黨部又召開會議討論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的組織原則，被邀約的是各院部會的代表，只有十幾個人，我代表內政部出席了這次會議，由王寵惠主席。

王寵惠首先提出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名額問題，他認為至多不能超過一千二百人，其中區域代表占百分之七十，團體代表占百分之三十。社會部長谷正綱表示反對，他說：“不管是多少代表，社會團體的代表至少要六百人才夠分配。”王寵惠回答：“你不能占去全部名額的二分之一。”谷說：“我是主張在一千二百人之外再加六百。”王寵惠再答：“沒有這樣大的會場。”谷又說：“就應該建築一個大會場。”王說：“這名額是蔣先生決定了的。”谷說：“你應該去報告蔣先生，不能隨便駁回我的意見。”他們二人唱了一出“二人抬”，其他的人只是愕然插上幾句。吵了兩個多鐘頭宣布散會，以後這個會議也沒有再開。應該說這是國民黨內部在憲法草案爭吵中的一段



插曲吧。

### “我不作總統，誰做總統”

蔣介石想做總統貼了心了，可是想不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向他傳達美國主子的命令，要他把總統讓給另一美國奴才自稱“過河卒子”的胡適。

其實，在南京國民黨官場里，大家早已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司徒雷登的前任是赫爾利，在他辭職回國的時候，蔣介石特意為他開了一個歡送會。赫爾利說在歡送會上大罵國民黨政府貪污無能，气得蔣介石臉紅脖子粗。在座的國民黨官員們，面面相覷，不知所措，連素有“大炮”之名的谷正綱也一言不發。當然，奴才失去了主子的歡心，應該是多麼的難過啊！

在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開會的前幾天，中央黨部召開了一次臨時全體會議，討論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由蔣介石親自主席，我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列席了這次會議。

蔣介石先談了一套總統人選是怎樣的重要，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的主要議程是選舉總統，應由國民黨提出總統候選人。最後才說到據他的看法，總統候選人必須具備這樣四個條件：1. 文人；2. 學者專家；3. 國際知名之士；4. 不一定是國民黨黨員。大家心中有数，具備這樣四個條件的顯然是胡適而不是蔣介石。我的旁座是吳國楨，他對我說：“司徒雷登真行，大概這次蔣先生真要退讓賢路吧。”在蔣介石講話之後，即宣布暫時休會，下午再開。

這天下午開會，蔣介石未到，由何應欽主席，大家便開開了。有人在議論了四個條件之餘，直截了當地提胡適做總統候選人。有人不同意，認為胡適不配作總統，紛紛提出吳稚暉、于右任、居正做總

統候選人。這些人在發言中，都先把蔣介石恭維了一番，說他如何如何“勞苦功高”，為了愛護“領袖”，應該讓他“暫時”休息一下。也有人提出蔣介石可以不做總統，但是他不能不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或者是行政院長。發言的多是一些比較年輕、對蔣介石素來不大滿意的人，特別是黃宇人一再上台發言鬧得最起勁。吳稚暉、于右任、居正、戴季陶、孔祥熙、張羣、張治中、陳布雷、陳誠等，坐在前排一聲不響。只有吳稚暉發過一次言，說他自己衰庸老朽不配做總統，應該提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大家哪里肯聽，足足鬧了一個下午，主席宣布散會，明天上午繼續再開。

第二天上午的會議由蔣介石主席，會場空氣甚為緊張。我當時這樣想：“快要作結論了，大概是提吳稚暉，決不會提胡適。”蔣介石怒氣沖沖地先把提胡適做總統候選人的大罵了一頓，接着唱了一出“丑表功”，說他自己如何追隨總理（指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如何誓師北伐定都南京，如何削平內亂，又如何打敗日本。最後他咬牙切齒地說：“我是國民黨黨員，以身許國，不計生死。我要完成總理遺志，對國民革命負責到底。我不做總統，誰做總統！”他說完之後，向全場掃視一周。於是先由前排發起，引起了疏疏落落的掌聲。隨即宣告閉會，一哄而散。

我在事後問張羣：“蔣先生既然願意做總統，為什麼又要提出四個條件影射胡適呢？”他回答說：“難道你還不知道這是‘民意測驗’嗎？”啊，原來如此！

蔣介石也終於當選了總統。事後有人說，還算好，沒有象李宗仁、孫科競選副總統那樣請客拉票、賄賂公行。可是據我所知，屬于CC系統的國大代表，就經常“叨擾”陳果夫和陳立夫，最後還每人送了三十萬元路費。曹錕當選總統只對每一名“豬仔議員”賞洋五

千元，比之蔣介石那就未免过于“寒儉”了！

### 其他有关的二三事

在宪法草案未提交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讨论以前，还要先送交立法院经过所谓“立法程序”正式通过。

有一天，最高法院院长夏勤（他是我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书时的教务长，解放后死在香港），匆匆忙忙地来找我，说：“糟了！刚才立法院通过宪法草案把最高法院取消了。怎么办？”我说：“真糟，连疏通都来不及了！”后来商定由我写一篇文章，主张恢复最高法院。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中央日报总编辑陶希圣，他把它作为代论登在中央日报的社论栏。立法委员先生们着慌了，赶快提出复议，恢复了最高法院。据我想，陶希圣不会不请示蔣介石，我这篇文章也正合蔣介石的胃口。

第一届国大代表们纷纷主张，要在国民代表大会闭会以后，设置一个常务委员会，连具有国民党党籍的代表也是这样主张。内政部长张厉生同我谈起了这件事（我当时是内政部长），他说：“蒋先生坚决反对在国民代表大会闭会以后设置常务委员会，有了常务委员会不但遇事掣肘，把这一班穷鬼极恶的人摆在南京，随时向各院部会荐人惹事，也就够瞧的了。”他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个问题，特别是要在“总理遗教”中找根据，才能说服具有国民党党籍的国大代表。我写好之后送给陶希圣，登在中央日报的专载栏。

我不是国大代表，可是我在这期间搞的是国大代表和宪法方面的工作，替蔣介石卖力，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兇。

蔣介石当选了总统，于1948年5月1日在总统府举行“宣誓典礼”，我被邀参加了这次“典礼”。这一次的扮演，先出台的是穿长袍

馬褂的監選人吳稚暉，隨着一文一武，文的是國民代表大會秘書長洪蘭友，穿一套硬領燕尾服，左手捧着一頂黑呢大禮帽；武的好像是黃鎮球，穿的陸軍便服。副總統李宗仁比蔣介石先上台，穿的陸軍便服，掛了一排大大小小的勳章。最後才出現了總統蔣介石，穿的長袍馬褂，佩帶一枚青天白日勳章。內政部長彭昭賢坐在我的旁邊，他說：“老胡，你看！洪蘭友象不象一個耍魔術的？”我說：“本來就是耍魔術嘛！”我們兩人都心中有數，即便這種玩笑，誰也不會“齣”誰的“壁腳”。其實，在當時的那種場面下，有此同樣感覺的不止我和彭昭賢。

剛一散會，我還沒有走出總統府的大禮堂就遇着陳布雷。他說：“不要走，到后花園照象去。”我同他一起到了后花園。不過我很奇怪，為什麼參加這次照象的人並不多？

#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瑣記

王 棧 三

## 一 我助李竞选的由来

1944年春，我离开陕西教育厅，任北洋大学工学院西安分院教授。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来西安视察，在友人宴会上，彼此相识。次日，李约我长谈过一次。抗战一胜利，我摆脱了在西安我极不愿担任的几种头衔，前往重庆，有意去北平教书。旅舍徬徨月余，正自无聊。一日，白崇禧见访，约午餐，并出示李宗仁请我任北平行轅中蒋政务处长电报，旋为我订好飞机票，这是1945年年终的事情。我和“桂系”发生关系，原来如此偶然。

到北平任职后谈及，方知李宗仁很注意我和他谈话时不满意蒋（介石）胡（宗南）军政措施的意见，故一經其秘书长萧一山提说，便诚心约我。相处三、四年，李对我无长官习气，而极有礼貌。尤其我接办私立华北大学（后改华北文法学院），精力多用在学院方面，他反而支持我；我厌恶参加作为政务处长所应参加的特种会报，他允许我不参加。我甚至也可以不上纪念周。1947年国民党总登记时，我不登记，向他辞职，他认为我有不登记作党员的自由，但非党员也可以做处长。当处理1947年北平学潮时，他肯采纳我的建议。他常嘱我约些进步教授便餐，客人谈话骂蒋介石，他只微笑笑。

1947年，他給蔣介石上万言书，囑我起草，他仅口授几条意見，内容一半以上，由我用激烈語句發揮我的改良主义。由于以上原因，我对李宗仁由陌生而逐渐亲近了，幻想他終可以走中間路綫。就这样，我便作了原来我并不认为怎么光采的“桂系”的一名走卒。

1948年春节后，李宗仁准备竞选，我虽入伙不久，时被引与計事。然而，毕竟关系太淺，全盘布置和个中秘密，自然我不能尽知。本文只就管轄所及，沃纒必书，务求紀实，助成信史。

## 二 策划拉攏，費尽心机

1948年2、3月，北平北池子×号李公館人來人去，倍形熱鬧，竞选策划开始了。住在李公館的甘介侯是李的腹心之交，也是策士之首。最初談及竞选，甘贊成，我反对。我說：“依宪法，副总统有职无权，在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方得代理。蔣介石撕毁政协決議，去年制宪，今年选举，自絕于人民，你何必奉陪？蔣当了总统以后，不能执行职务之‘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发生：死亡与失敗。他何时死，难說；必待同共产党打仗失敗，他才会辞职。到那时候，試問代理的副总统又能打胜人民軍么？我看，与其竞选，不如准备联合实力者，飞返西南，以武力反对‘戡乱’調停国共，于国于己，方为有益。”甘說：“不然。夺蔣政权，武干冒險，不如文干待时。至于对付共产党，蔣介石还不是靠美国嗎？”李表示，他且緩議，先得竞选。我遂无言。次日，甘介侯对我秘密地說：“你不知道，美国要弃蔣扶李呢！”

虛伪欺騙是资产階級民主的实质。在蔣介石国民党政权中，还談什么民主选举呢！誰想竞选，無論党内提名或自由竞选，首先必須得蔣同意。有一天，李宗仁憤然作色地說：“他媽的，不同意也要

干。”这是因为已几次电蒋，均不得复的原故。又有一天，李大发脾气说：“白健生怕蒋介石，我不怕。”这是因为白崇禧曾派人（程思远？）来平劝勿竞选的原故。但李既一不做二不休，为达目的，终须先下功夫，求蒋同意。3月初，他派我飞南京见吴忠信和戴傅贤，说吴会帮他，只须对吴表明他的竞选决心，请吴向蒋为力。因我曾在考试院做过专门委员，熟悉戴傅贤及其左右人士，李以一尊金佛送给戴。据说这金佛是日本人由东京本愿寺移来北平，预备在北长街建寺供养，非常名贵，李不知怎样弄到手作为运动戴傅贤的礼物。果然戴傅贤一见，连忙合十膜拜道：“我无德消受，当转赠广东刘（？）大师供养。”经我说明来意，戴看在佛面上，满口答应，说：“德邻先生配合蒋公，真党国之福也。”如是念念有词地说了多遍，并亲笔作复，大有包在他身上之意。看来不辱使命，我曾天真地喜欢一阵。我第二次见到白崇禧，他派车给我，并请吃饭；但谈次对于李的竞选，确乎是不大热心的样子。

李公馆喧腾的气氛，随着国大开幕日的逼近日益浓厚起来。东北、华北各省市的“国大代”过平，李针对对象必派适宜的人招待一番。我的夹带中也配有一束对象。行轅高干中，广西人并不多，北方各省市人都有，分头拉拢，都很顺利。我并荐李瘦枝課长飞回西安活动一次。平津代表包括CC、复兴特务在内，都乐得做口头人情，同声拥戴。李尤着眼在文化教育方面，曾函问胡适意见，胡复函赞同，李得意地透登报端，以扩大影响。3月中旬末，忽传蒋梦麟为选举事秘密到平，李即时要我往见胡适，一规究竟。不料胡确得蒋内定孙科为副总统的密旨，明对我说，据他看，副总统人选以孙科为宜。我质问：“先生赞成李主任竞选，不是已喧腾报章，怎么好反汗呢？”胡说：“岂但李德邻可竞选，任何人都可以竞选呵。中国事由武人包

办，东一个general（將軍），西一个general，太不象样。这次副总统最好来个文人。”我第一次才明白胡适确乎是蒋介石的御用学者，漂亮话只不过解嘲欺世罢了。李宗仁自我陶醉的发热头脑，这一下泼来一瓢冷水，李公馆助选集会，一时静穆起来。胡适一票打什么紧，倘使当面奉承主任的“国大代”都象胡适，前景真有些不妙，尤其内定孙科的消息，惹人头痛。

逐省计票，轮到山西。如今山西票号，閻錫山是号主，号主如果同意，可以稳拿整票。李说：“须向百公客气一番。”行人又派到我。其实我认识閻錫山，还是前年随李视察绥远路过太原时的事。太原閻王殿空气真热，火炉加电炉，弄得说客舌敝唇焦，所幸结果圆满，閻王目无代表人格，径答“一致选举德公”。他还有示信的特别作法，写就“与王代表谈话纪录”交我复命，李极满意。

象这样行人四出，分头拉票的活动，一定很频繁，我不悉知，也无须多叙。如同做生意要登广告一样，制造竞选口号，最后成为助选策士们的重要工作，值得一记。什么行宪、戡乱、革新政治、中立外交等等，一些人提出一套建议。我则本着我的极浓厚的改良主义思想，拟出实行民生主义、清算豪门资本、认真土改、剔除贪污等等第二套话说。李以为前者最低、后者最高，还是前一套通妥点。我虽心不谓然，也随它去罢。

### 三 自吹自擂，明争暗斗

3月23日，李宗仁飞往南京。策士、走卒、拉拉队随往，与京桂助选者合组助选委员会，一时大方巷二十一号白公馆热闹异常。我本是先年“制宪”时不终会而离会的“国大代”，此次毫无名堂，专来看戏。所谓“国民大会”从3月29日黄花岗纪念日开幕，至5月1日闭



幕，滑稽戏連演一月有零。“国大代”总额三千零四十五名，报到二千八百一十四名，最后投票的二千六百四十八名。国民党装璜民主，拉来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和以張君勱为首的民社党，但给与这两党的代表席位，不到总数的九分之一。至于三党代表成分，则一模一样。买办、軍閥、貪官、污吏、地主、豪紳、CC和复兴特务，再加上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大杂烩。在各地选举代表时，羣犬爭骨，久已鬧得烏烟瘴气。开幕后，还插演不愿退让者顏泽滋等十人絕食的折子戏，煞是好看。

选举嘛，总统应该是竞选中心。但签署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代表，竟有二千四百八十九名（规定只須百人以上），还选什么。拉来居正陪衬，但报上刚看見居正的竞选主張，次日便急忙声明取消，有“吹笙引凤，讖者窃笑”之語，真够滑稽了。19日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大总统，也奇怪，得票却比签署少了数十張。法西斯统治集团是在东北、华北、郑洛、涇渭各战场連吃败仗的时候，抱着“晉阳已陷休回顾，更請君王猎一围”的心情，故作鎮靜，硬着头皮演这齣戏的。其实把蒋介石叫作“主席”或“总统”，阿猫阿狗，并没两样，也救不了败北。在选举总统之前，4月5日忽盛傳蒋介石不作总统，胡适将为总统候选人之說。据胡适左右說，确有此事，胡曾象煞有介事地查閱“宪法”內总统职权，說：“照这样当总统不算太忙，我还有写文章的时间。”构成一齣令人发噱的插曲。

选举副总统倒成为剧情发展的高峰，竞选者有六人之多：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还缺此先例。六位竞选人讲演、請客一直鬧了一个月，南京各飯店如百齡餐厅、重庆安乐厅、安乐酒家、龍門酒家、介寿堂、华侨招待所等处，天天花天酒地，鬧嚷嚷的。

前面提过，蒋介石内定孙科为副总统。大概因为独裁形势不妙吧，不敢由党提名。4月6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党不决定候选人，但暗示于、李、程，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竞选。

李宗仁等不理睬蒋介石的暗示，竞选更积极了。蒋介石便企图用特务组织控制选票。在北平热心拥李的人如CC的吴麟人、军统的刘斌之等，都抱歉地向李声明他们已没有选举自由，吴麟人却用他个人关系为李介绍几票，由我代李请他们吃过饭。特务组织又企图威吓或利诱助选者。韩练成（原国民政府参军，整编四十六师师长）得悉这一消息，秘密地告诉刘仲华和我，说CC和复兴组织先拟以高官相诱，又估计我们不肯，很可能要使我们失踪。不知又怎的终没下此毒手，但韩君的话必不假。为什么？我由大方巷移居旅館，又由旅館移居金城银行友人王君的经理室。三日后，王君称，秘密查核急且厉，且戒声张，逼问通过王某由平贷款多少。这足证特务在行动了。他们那知李宗仁的选举费用一文也没经手嘛。“蒋记”天下的民主内容，如是如是！

象盘点存货一样，要核实一下交易数字。李宗仁偕我同车访戴傅贤。不料戴傅贤发疯无赖起来，说：“时局已弄到如此地步，我一切听命蒋公，他说上天就上天，他说入地便入地。”不帮忙事小，弄得下不了台。适何应钦至，李才愤然而去。金佛算白丢了。后又同往山西办事处，其领队代表梁化之出闾电相示，谓餉械悉仰给政府，选举事项须听命主席云云，又令人失望！其实，既以反统制姿态竞选，戴傅贤作用已失；山西扬言遵旨也难怪。结果走私举李者纷纷，鬻的包办又何尝是绝对的。惟探访东北、华北、西北若干代表，请言犹昔，差强人意。但人心隔肚皮，又谁能保险呢？

国民党既宣布自由竞选，而“总裁”又伸出黑手支持孙科打击

元老將軍們，因此，統制與反統制激化了，輿論多同情反統制方面。競選人用演說、談話、廣播、廣告多種方式，自吹自擂，發表政見。一片“戡亂”、行憲、民主之聲，人們聽得真膩口了。惟于右任所說“劣是他競選的本錢”，有點別致。李宗仁的調子隨着掌聲，越唱越高，從準備的第一套到第二套了，喊出實行民生主義、清算豪門資本、征用外國存款、實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戰士授田和保障人民四大自由（有免于貧困及匱乏之自由）。這些口號引起各大學教授的共鳴，也引起統制方面的震怒，南京忽盛傳李宗仁通共了。李在安樂廳宴千餘代表，慷慨陳詞，說他“不怕戴紅帽子”，不料這話反而在這樣的代表面前，竟博得掌聲震天。我方暗暗詭奇，而李的話意又轉到他的反共成績方面，空氣頓時冷卻下來，經我忙寄紙條，這才轉過話頭，但掌聲已稀薄得可憐了。試一查李宗仁的歷史，他1927年導演過“特別委員會”，反動極了，要他發“違心之論”的進步言辭，倒反而難于理解，我們枉費心機了。不過，在反動大雜燴的“國大代”面前，為什麼卻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是中間分子頗多呢？還是即便特務有時也良心發現呢？我至今不得其解，提供研究政治心理者作參考。的確，偽裝進步也是李宗仁當選原因之一。

23日的選舉結果，李宗仁得票七百五十四張，考上第一名，其次為孫科、程潛、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24日依法就前三名重選，結果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仍居第一，次為孫科、程潛。眼看孫科當選無望，統制者惱火了。黑手怎樣統制，我不悉其詳。25日程潛稱“奉命放棄競選”（旋即否認奉命），李宗仁登報放棄，并訂27日飛返北平，孫科最後也兩主席團亦選。丑劇不能完場了。試場舞弊，舉子罷考，國民黨監委醞釀彈劾（隨李見黃季寬，曾聞此息），一時輿論譁然。胡適畢竟是個書生，他竟說穿了黑手的秘密。他說：“一

个总统如果高兴的话，表示一下愿意什么人做他的助手，也是正当的。”“正当”尽管“正当”，然而“总统”着急了，连忙又声明另作决定，派人劝李、程、孙继续竞选。民青两党也凑热闹，呼吁和谐。八百三十二名代表提案请保障投票自由。这是对于“高兴”的“总统”一拳沉重的打击。最堪注意的是蒋介石请出白崇禧代表他宣称“选举绝对自由”。狐借狐狸，出尔反尔，法西斯头子貌似兇恶，其实胆怯，不但在人民面前战慄了，也低头在将军麾下。桂系李白的双簧，至是显出一点妙用。滑稽得很，“竞选”人变为“应选”人。28日三选结果，李宗仁依然第一，得一千一百五十六票，但距法定半数一千三百二十五票尚远。于是29日依法就前两名四选，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比孙科多得一百四十三张，依法当选了。午后，大方巷二十一号贺客盈门，第一个贺客便是指挥统制的陈立夫，满有意思！

看完这出戏，在当时对我有很大影响，我看出南京政权崩溃在即，不想再攀附作官了。我对华北文法学院一千三百多名青年负有责任，遂结束自己经手的事务（愿意受帮助的代表，送飞机票或路费），5月2日，我便赴沪转平。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 孫科、李宗仁竞选副總統的形形色色

周一志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期，有一兩次已經秣馬厲兵，準備進攻延安，但在全國人民不允許發生內戰的壓力下，又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只得臨時被迫停止預定的陰謀。到了對日戰爭結束，蔣介石日夜所想的，就是消滅共產黨及解放軍。美帝國主義者對於蔣介石打共產黨這一點，當然是贊同的，但不是沒有條件的。條件就是蔣政權必須實行英美資產階級式的“民主”，以符合美帝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口味。因此，馬歇爾在調處當時國共兩黨的軍事失敗後，就催促蔣介石實行所謂憲政。美帝的目的是十分明顯的。

蔣政權要打內戰，非靠美帝在軍事上、財政上的支持不可。為了迎合美帝，蔣政權乃玩弄“制憲”和“行憲”的把戲。1946年底，蔣政權召開所謂制憲的國民大會。1948年春，號稱行憲，選舉總統、副總統，想以此欺騙中外，硬說中國已非獨裁政治，把政權由國民黨頑固派控制下開放給全民了。

1947年的一年中，選舉偽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由於蔣政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CC系與三青團及復興社的矛盾，蔣介石的嫡系與國民黨其他派系的矛盾，真是鬧得烏煙瘴氣，笑話及丑態之多，

罄竹難書。一些競選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的分子，事先都想插入國民黨的統制名單之內，這些人都設法祈求“蔣總裁”圈定他們的名字，因為誰得到一圈，誰就奠定了當選的基礎。這些分子後來當成了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之後，也有人批評蔣介石如何如何獨裁而不民主。聽說蔣曾經罵這些人說：“當初你們惟恐我不獨裁，不圈定你們的名字。現在你們自以為是民意代表了，說我獨裁了，不民主了。老實告訴你們，你們不配對我談民主。”當時我說笑話，我反對蔣介石一切的講話，但對他這一段話，認為是說對了。

關於1948年春，國大開會選舉總統、副總統之前的背景，我想只談這一點。

## 二

1947年冬，我已辭去立法委員職務，在上海做律師了。某一天，接到李宗仁叫甘介侯寫給我的信。內容大意說：李聽說孫科無意於競選副總統，要我問一問孫，這個傳說是不是事實；如果是事實，那麼，李就決定競選副總統，並且希望孫幫忙云云。我拿甘信去見孫，孫答復我他仍打算做立法院長，認為李出來競選很好，並表示願意從旁支持李的競選。（聽說另外還有一兩個人也代表李問孫這樣的話。）我得到孫那樣肯定的回話，乃以負責的口吻寫信給甘介侯，叫他把孫的態度轉告李。這是說明最初如果孫決意競選，李大有可能不作競選之想的。

李宗仁這個人，有一點長處就是沒有什麼架子，對人態度頗為“誠懇”。（我們一批朋友，從認識李起，背後稱他為李連長。）國民黨的一些所謂雜牌軍隊以及南北地方人士，對李都保有好感。日本投降以後，李宗仁做北平行轅主任，在處理當時的反美愛國運動，對

待青年學生的方法，同國民黨頑固派的手段有若干距離，也博得中外人士的較好評語。美帝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討厭蔣介石，認為蔣是法西斯獨裁者；對於李宗仁的態度，發生了好感。因此李就僥倖時會，形成好像是國民黨開明派的重要人物了。也正因为如此，就引起了蔣介石和頑固派對李宗仁的嫉視。

李宗仁宣布競選副總統之後，蔣管區輿論對李有利，蔣介石發生警惕，聯想到李如果當選，將來對於他的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因此，他暗下決心，必須設法不使李競選成功。蔣也同其他人一樣，看出於右任、程潛兩個人不見得是李的對手，經過考慮，於是提出孫科來同李對抗。

在1947年春，蔣突然在國民政府主席下設一副主席職位，并叫孫科擔任此席。當時吳鐵城每次對我談到此事，言談之間，頗為得意。他有一次說笑話道：“蔣一向自認是繼承中山先生的，現在確定孫哲老繼承蔣，將來又盼望孫哲老栽植蔣經國為後繼人。為此，則由孫蔣而蔣孫，又回復孫蔣，繼續三朝，豈不是好事嗎？”我從旁了解，蔣的決定拉出孫做副主席，是出於張羣、吳鐵城的獻策，用意在進一步使孫對蔣軟化。同時蔣叫國防部出材料替孫在中山陵園區造一所大的花園洋房（地皮由孫隨意指定），價值在十萬美金以上。據說蔣又借一種名義送了孫科一筆可觀的外匯。這樣一來，孫由於對蔣感激，政治上變成一個掘蔣者了。

1947年中，蔣軍在內戰中逐步失利，尤其是東北的軍事情況，使蔣焦急之至。有一天，蔣把孫找去，對孫說了一些知心話。蔣的話的大意是現在東北軍事頗堪憂慮，如果美國已答應的幾億美援再遲遲不兌現，則軍事情況將更不利了。蔣的結語是盼望孫公开发表談話，向美國呼援及早兌現。蔣說東北軍事失利，是由于有苏

联援助中共的关系，如果孙以一向亲苏（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人出来说话，是容易打动美国人的。孙受蒋之托，即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内容一方面以东北问题为题目指摘苏联（等于孙自己卸下了亲苏的招牌），一方面向美国要求从速帮助国民政府；结论时又说，如果美国再不卖眼，则中国只有进一步联苏云云。美国的舆论，对于孙的谈话，反应极坏，大都说孙科这种谈话，颇类于无赖汉敲竹杠手段，美国不能接受这种敲诈式的说法而改变政策。这次谈话是孙科在情绪冲动下向美国通讯社记者信口开河似地说的，可以说他一生中最坏的一次政治上大失态，也是他被蒋灌了迷魂汤而说出来的最缺乏理智的一段话。在蒋介石方面，对孙这次谈话，当然引为满意，因为表示孙已百分之百地入其彀中了。

如前所说，蒋介石看到了只有拉出孙科来竞选才可以抵制李宗仁，于是在1948年春伪国大开会前不久，由宋美龄用英文同孙密谈，促孙出马竞选。据说，宋美龄对孙说费用可以不必操心，蒋夫妇一定支援；如获选副总统以后，还可考虑仿照美国的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的例子，仍由孙兼任立法院长云云。这样，在孙旁边的一些人，甚为兴奋，认为“蒋介石这一票”既然选了孙，孙必能高枕无忧地当选。因此，孙便发表谈话，宣布竞选副总统，并且还说仿照美国之例，副总统可以兼充立法院长。我在上海看到此谈话，了解蒋拉孙出来竞选的意思，特写了一封信给南京的朋友们，提醒他们孙突然出来竞选副总统也还罢了，可是由孙自己或孙系的人鼓吹副总统可以兼任立法院长，是十分不妥的；一方面中国宪法同美国不同，另一方面国情也同美国不同，此事最后必定办不到，徒然给人们以不良的印象。我的朋友们，那时头脑甚热，对于我的信，置之不复。



### 三

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最初的打算，想由國民黨中央常會先來一個決議，指定孫科為副總統候選人。這樣一來，就是排除李宗仁競選資格的最直接了當的一個辦法。可是政治上事情總不簡單，不但李宗仁及桂系全體不允許蔣如此做，連程潛、于右任以及捧程、捧于的人們也反對這樣做。一時反對的空氣，以及廣西省國大代表聲稱將全體退出國大會議，不惜鬧翻的態度，壓迫蔣及頑固派只得放棄預定的打算<sup>①</sup>。

孫科及當時圍繞在孫旁邊的人，心理上過分相信國民黨統制的力量，以為程潛、于右任兩人固然不見得是李宗仁的對手，但孫科對李宗仁是不会有問題的。如此，捧孫的人們，首先就存着一個輕敵之心，堅持所謂“一條票當選”之說。直到最後，事實證明所謂“一條票”的效力並不靈驗，他們才沒有話說了。其次，在爭取選票同各方面周旋、拉攏的風度上，孫科不如李宗仁遠甚。孫科夫婦完全以一種貴族的姿態同人們接觸，而李宗仁夫婦以平易近人、毫無架子

---

<sup>①</sup>李宗仁從北平到南京競選，特別先到上海，目的在拉攏一些捧他的人。上海捧李的人們，在“維也納”跳舞廳開了一個助李的競選茶會。我在此會將結束時，鑒于講話的人沒有提到必須反對由國民黨先指定副總統候選人的一點，特起來說話。我的話大意是說，打開窗子說亮話，對於總統一職，是談不上競選的。可是副總統一職，的確應該用民主的精神讓大家真正競選，以樹立風氣。孫科、李宗仁、程潛、于右任四位，在國民黨內歷史、地位、才幹各有千秋，應該讓他們自由競爭，由國大代表們來決定誰當選副總統，不應預先統制。我個人認為李宗仁的風度很好，也拿出一些政治上的意見，因此我個人願意支持李，並希望李競選成功。（我事先也同孫科談過，因為我入手就答應過李宗仁幫他一點小忙，不能食言。孫對我說他並不因幫李而怪我云云。）

的风度同人接触，这一点对于李胜孙败的关系也不小。那时我到南京两次，看到孙方和李方的情形，一些圍繞着孙的人们随时流露着满不在乎的意态，而李宗仁夫妇以及桂系人们大多表现得诚悬谦虚，见了明明不是帮他们的人，也说“这次承你帮忙，非常感谢。”双方对比之下，使我发生我的“老上司”这回恐怕要我跟头的预感。

#### 四

在那次伪国大开会时，引起人们注意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王寵惠、胡适、莫德惠等一羣无恥文人，受到蒋介石的暗示，由会议通过在宪法以外，加上一个所謂“临时条款”，使蔣能更名正言順地实行其独裁权。另一件就是表面上是孙科、李宗仁两个人在竞选副总统上十分激烈的“明争”，底子里是蒋介石小集团同桂系之间的尖锐化的“暗斗”<sup>①</sup>。蔣看到李宗仁当时的政治行情越来越高，对之越

<sup>①</sup> 李宗仁决定竞选以后，先以其妻郭德洁回广西布置。故意叫她经过香港见了一次李济深。我在1948年12月初在香港见到李济深。李告诉我这件事。当时李对郭德洁说：“德邻不必竞什么选，还是到香港来一同革命吧。”郭笑着回答说：“也许会有这样一天的。”李宗仁夫妇这一手是故意叫蔣知道的一种姿态。（我那时同朋友说笑话：“乡下姑娘”这一手不简单啊。）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在李宗仁甩出“杀手锏”的时候，当时住在李家的陈江（此人是律师，江苏崇明人，号东阜）秘密告诉我，他对李私下出了一个主意，必要时由陈拿一件蓝布大褂给李化装，扮成普通商人模样，夜间由陈同李从后门秘密溜出去，到下关搭四等慢车到沪宁路陈的乡下亲戚家住些时，此事连郭德洁都不让知道，弄成一个人为的“李宗仁突然失踪案”，好象蒋介石把李暗下毒手的情形，以此拆一个“大烂污”。据说李对陈的建议赞成，必要时真就那样办。我听了陈的话，本着天下惟恐不乱的想法，大感兴趣，认为应该开那样的大玩笑。据说后来李会把陈建议的内容告诉了白崇禧，白一面笑着，一面说不应开那样大的玩笑。从此，也可見国民党內派系斗争的内幕，成为事实的五花八门者固然不少，未成事实的奇奇怪怪的花样更多呢。

不放心，不惜用一切手段打击李，不让李竞选成功。在孙、李投票决战的三、四天内，据说蒋本人往往通宵不睡，把能够影响投票的文武官员一个一个预定好时间（多半是一小时见两个人），对之面授机宜，亲自替孙科拉票。有人告诉我，蒋对黄埔一期学生贺衷寒说：“你们要知道，自从李宗仁决定竞选之后，这件事对校长（蒋自称）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你们一定要明白校长的苦心啊。”这几句话，可算和盘托出蒋的心意了。

在孙、李竞选濒于最后阶段时，我又去南京。李宗仁恳切地对我谈，可否由我到孙处一谈，是否孙能够看在大家多年友情的面子上，请孙放弃竞选。我回答李说，我愿意去一谈，不过效果是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无望的。我见孙说：“今天恐怕只有我这个老部下来说院长一点外间的真情况了。据我看，院长的形势很不如李德邻。”孙对我此话，颇为注意，立即说：“你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我说：“李德邻及桂系人们在外面放的空气是，这次他们是同CC系顽固派斗争，即令竞选失败，也是光荣的。换言之，院长如果成功，也是因为顽固派捧出的，即令选成，也不见得是光荣啊。”孙听了我的话，一、二分钟默然。我接着说道：“李德邻有一点意思叫我转达一下，是否院长能看在多年彼此的友情面子上，放弃竞选让他。”孙想了一想，慢慢地对我表示事情已成骑虎，不容退却了。

当时站在广东人立场帮孙，反对广西的李宗仁，态度最激昂的是薛岳。他的地方观念很重，又是对于桂系政治上有恩怨的人。因为南京《救国日报》的龔德柏（号称龔大炮）把1931年何应钦指摘孙科在铁道部有贪污行为的通电重行刊登出来，薛岳乃约同张发奎等广东军人，由薛上将亲自指挥，声称要去救国日报质问。薛岳用大声的广东话：“谁不去就是衰仔。”成羸军人开到救国日报，

不由分說也不質問，就把報館的排字房及一部分機器，打得落花流水。這一“草包”的行為，使救國日報增加了身價，更振振有詞地大罵孫科。薛岳不啻對孫幫了一個大大的倒忙。國大代表都不以孫方面的行為為然，增加了李方面的選票。

孫、李競選到了最後階段，南京政界忽然產生一種謠言，內容是說李宗仁如果做了副總統以後，就會勾結一些內外的力量，對蔣實行“逼宮”奪取政權。這個謠言，多半是CC系這類人放出的。黃紹竑替李出主意，應該來一個“殺手鐮”，宣布退出競選，也就是“以退為進”的策略。李、白兩人先前對黃的說法有些懷疑，後來想通了，即刻照辦。國大會議因此停開了幾天。這一手弄得蔣介石十分狼狽。孫科的形勢，經過此一風波，更陷於不利了。

最後的結果，李宗仁以一百幾十票的比較多數，當選了副總統。事後我分析李勝的原因，除了一點政治上李有較孫有利的因素以外，在爭取選票的技術上，桂系把握了兩個要點，對於最後勝利很有關係：一是爭取到擁程潛的票數中的大多數票；二是通過各種關係爭取到民、青兩小黨的選票一致投李。這兩點事先也不是沒有人對擁孫的人點醒的，但孫派主觀上甚為樂觀，不甚理會這兩點。因此雖有蔣介石那樣賣力幫孫打李，結果孫仍是失敗。

## 五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孫科也仿照資產階級民主的那一套，向李祝賀，說了幾句官話。李夫婦立即到孫宅拜訪，表示答謝之意。孫太太隨後對我說了许多負氣的話，並且竟相信不相干的謠言，硬說在競選的白熱化時，桂系還有暗害孫的陰謀云云。李宗仁再度盼望我替他在孫處和緩情緒，希望大家的友誼，仍同以前一樣才好。我

为此又特向孙试探进言，但发觉孙表面上态度比孙太太好些，可是看得出底子里对李毕竟有很深的敌意了。

轉瞬之間，所謂民選的立法院開會，將選舉立法院長了，我又去南京。孫見我就問：“你看我這次竟選立法院長的情況如何呢？”我回答說：“這一次一定順利成功，但有一點，院長千萬不要在心理上以國民黨統制派的票做為基本票，那麼，我確知道各方面的想法，對於選你是一致同意的。如果你露出要靠CC系捧場的意思，則又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反而不好。我以為這一次你以行所無事的态度出來竟選，一定圓滿成功。”孫聽了我的話又說：“你真的以為是那樣嗎？”我說：“我追隨你有二十年以上了，也有一點政治經驗了，我敢說我的話會符合事實的。我同于振瀛以及許多朋友談過，他們這一次一定支持你，就是希望你不要同陳立夫他們拉得太緊。”孫聽了我此語，微笑着點點頭。我又乘機說道：“我回憶在1944年在重慶的時候，各民主黨派及各方民主人士，對院長都抱有很大好感及希望，不料這一次你竟選副總統，竟使民、青兩黨的票都投李德鄰了，我頗有感慨。”孫聽我這話，立即把話頭轉移，問我在上海的律師業務如何，不願多說下去了。立法院選舉院長的結果，孫十分順利地一次投票就當選了。

經過竟選副總統的政治上一頁，蔣介石同孫科之間關係，又進了一步。同時圍繞着孫的一部分朋友，同國民黨頑固派人們，也改變了以前的情形，由於上面兩個老板的趨向於親近因而至少也不對立了。1948年冬季，翁文灝的行政院長搞不下去了，蔣乃請孫做行政院長，孫將脫離立法院，吳鐵城決定竟選立法院長。可是孫竭力拉吳為行政院副院長，又答應吳兼外交部長。同時蔣也囑咐吳應協助孫，吳乃打消做立法院長的想法。孫一定要拉吳的用意是很

明显的，因吴等于是政学系分子，对蒋说话比孙自己方便得多。当时立法院空气，大多数人反对陈立夫当院长，于是董冠贤以北方人资格，董线时会被选为立法院长。到了淮海战役以后，蒋氏王朝大势已去，孙科在行政院长任上，也赞成对中共进行和谈<sup>①</sup>。这件事在蒋看来，在这种生死关头，孙不回他穿一条裤子顽固到底，认为太不够朋友，可谓忘恩负义，于是又大大地恨孙了。对于这一点，后来孙不是不明白的。这就是孙总不去台湾的理由，而台湾方面，也只有一些不相干的华侨立法委员们有时说应该邀孙到台的话。事实上蒋孙两人一时的互相利用的条件早就消失，谈不到什么感情了。

---

<sup>①</sup> 1949年初，孙科叫水利部长钟天心到香港同中共方面“搭线”，乃公开事实。那对孙的用意是使大家知道他系有黄绍竑同中共接触，他也叫钟天心同中共接上头了。钟由香港回广州后，对记者承认此事。蒋对孙此举当然引为痛心，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 “中原王”湯恩伯\*

文 彊

### 湯恩伯是怎样起家的

湯恩伯系浙江省武义县岭下村人，出身大地主家庭，全国解放时約五十四岁。他在未投靠蔣介石之前，曾在北洋軍閥孙傳芳部浙軍第一師(陈仪任師長)任过上尉參謀，后来由陈仪送往日本士官学校习炮兵。毕业归国后，历任該師少校、中校參謀及团附等职，后又升任上校參謀处长。

1926年大革命时期，北洋軍閥孙傳芳倒了台，陈仪投奔国民党，湯恩伯亦随之而来。在蔣介石統治时期，湯初任中央軍校第六期大隊長及軍官教育連連附，后升陸海空軍總部少將高級參謀。1929年冬，改任教導第二師第一旅少將旅長，后升为副師長兼旅長。1931年冬升充第二師師長，其間因作战不力撤职，不久又調充八十九師師長。1933年冬又迁調第四師師長兼第十縱隊指揮官(指

\*編者按 本篇系作者由下列四人所供材料編写而成：1、馬勁武(抗战时期中原战役时任湯恩伯部二十九軍中將軍長)；2、王秉鈺(1943年至1944年任一一二師少將師長，后調升五十一軍軍長，均受湯恩伯指揮过)；3、岳煥运(1941年至1943年任第一战区調查統計室主任，兼河南省政府調查統計室主任，并兼中統河南站站长，与湯恩伯及其部屬接触甚多)；4、文彊(1942年至1944年任軍統华北办事处主任，后兼第一战区調查統計室主任，时常与湯恩伯来往)。

揮八十九及第四兩師)。1935年冬升任十三軍軍長。這之後歷充軍團長、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豫魯蘇皖邊區總司令兼四省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等要職。1945年之後又調充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南京衛戍總司令、第一綏靖區司令官、衢州綏靖公署主任。到大陸解放前夕，又調充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上海解放前逃往台灣。1959年病死于日本。

湯恩伯與蔣介石都是在日本士官學炮科的，有先後同學關係，而且又是浙江同鄉，湯和蔣介石接進的機會較多，深得蔣之寵信，並且繼陳誠、胡宗南之後，成為蔣介石的三塊紅牌之一，其主要關鍵，在於他一貫頑固地充當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打手。1929年冬，蔣介石為了進行軍閥混戰和鎮壓人民而擴充軍隊，成立了三個教導師，拔升湯恩伯為第二師的少將旅長。蔣介石駐閩馮之後，調徐庭瑤接任該師長並改為第四師，湯恩伯被提升為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

自1930年冬季起，湯恩伯即奉命單獨率領第十旅參加了江西的“清剿”，與贛東北蘇區領導者方志敏、邵式平將軍為敵。經過一年共分三個階段的“清剿”活動，特別是1931年春對上饒縣及臨江湖地區的“清剿”，殘酷地破壞了蘇區，恢復了反動的黑暗統治。此後湯率所部又對附近的霞坊、葛源蘇區實行所謂“搜剿”，無數勞動人民慘遭殺害。最後，湯即分兵圍于鉛山屬之開江鎮和上饒縣，實行所謂“防剿”、“清鄉善後”等反動措施。湯恩伯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使這一地區的革命事業受到了極大的損失，竟以“剿匪有功”擢升為第二師師長。

1932年春，湯率第二師在河南潢川一帶與紅軍作戰失利，雖被撤職，但賦閒不到幾個月，即於當年秋又被調充為八十九師師長，



于湖北黄陂一带进行“清剿”的罪恶活动。这一时期汤对豫鄂皖苏区危害最大，他曾对当时充其团长的陈大庆常常谈及在那一带用机枪扫射青年群众及共产党员达两三千人之事，认为得意之作。于是汤又以“剿匪有功”，于1932年冬改调为第四师师长之后，又奉命升为第十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四及第八十九两个师），参加了1934年春及以后的所谓“五次围剿”，在福建泰宁、建宁区域内构筑封锁线（即木碉堡寨）。同年他又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驿前、白水等地区以及石城的洛寨山地，与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经过九次激烈的阵地战。由于红军北上抗日而转移了阵地，汤即迅速地进占瑞金，修建了“犁庭”公园，无耻地夸大战功。1935年春夏之交，汤率部由江西进入湖北通城县白沙桥地区，与红军徐彦刚部主力遭遇，激战半天，双方伤亡很大，彼此各自于当夜及次晨转移了方向。这之后即率部在湖北大冶、阳新和湖南岳阳等处整训补充，竟以屠杀人民“有功”一跃而被擢升为十三军军长。

就汤恩伯的个性、特点、作风来说，约可作如下的概括：

一、充满了封建色彩的枭雄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的作风：

汤恩伯每与其朋辈如胡宗南、戴笠之流，好纵谈我国古代英雄人物，他所列举的离不了“五霸七雄”，特别崇拜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人。他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也特别崇拜。照他的说法，日本武士道精神是由我国“荆轲刺秦王”、“田横五百义士”等固有精神传到日本去的，由于我国国势积弱而失传，日本则更加发扬起来。因而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即系由此产生，日本善兵之能征善战、凶狠残酷，也是由此而来。他对于近代的历史人物，特别推崇清代大汉奸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他甚至认为曾、左之未能取清廷而代之，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由汤恩伯的这样一些论调，即可测

知其为人；在羽毛未丰之前，依付于人以待时机，一旦羽毛丰满，则取而代之。这是历史上无数封建人物称王称霸的规律。湯之阴谋其所以未能得逞，只是由于中原对日作战之一败涂地，以及受到陈誠当权派的宰割而使其小集团瓦解，特别是全国解放之速，根本粉碎了他那充当枭雄的迷梦。

## 二、目空一切，飞揚跋扈：

湯恩伯在未被擢升为十三軍軍长以前，既不敢濫发議論，也不敢擅权独断，但在担任軍长之后，一帆风顺，接着当上了軍团长、三十一集团軍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认为时来运来，他大干特干的时机到了。正在这时，蔣介石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命令湯恩伯在中原扩充实力，将矛头对准东南地区的新四軍。

湯恩伯自1938年夏季在台儿庄与日寇交战后，即撤退到大别山北麓及平汉铁路以西地区集结整补，他以河南叶县作巢穴，以安徽临泉、界首及郑州等战略要地为其前进基地。在蔣介石委其为“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之后，湯恩伯“中原王”的陣势就摆出来了。他在如此时来运转的情况下，目空一切，称王称霸的嘴臉开始显露出来。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及民政厅长方策等，成为替他专办兵差的头子，稍不如意，即遭训斥。即连蔣介石向以亲信目之的蔣鼎文，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应该是湯恩伯的上司，而湯咄咄逼人，使蔣鼎文几乎无权过問，令不出戶。这之后，湯恩伯之囂張跋扈，生杀予夺，拥有“湯屠夫”之称，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記述。

## 三、自負不凡，徒貽笑柄：

湯恩伯在日本士官学炮兵之时，在一次准备野外演习的室内作业中，竟将炮兵摆在一座高山上，而且又无掩护部队。日本教官

湯恩伯將重炮運上山去，他瞪目不能置答。日本教官又問炮兵沒有有力的掩護部隊，一旦為敵人接近將何以處置，湯又不能答。這雖然是他早年在日本學習時的笑話，但他在蔣軍實際作戰中亦復如此粗心大意，顧頭不顧尾。

湯恩伯從充任海陸空軍總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時起，即經常向蔣介石呈遞“手本”，獻策取媚。由於在蔣馮圍混戰中，他的幾次手本受到採納，提高了他寫手本的興趣，初則只寫軍事方面，以後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有關黨政設施等無所不寫。只要他每逢睡不覺的時候，十有九就在寫彙陳手本了。特務頭子戴笠曾經嫉妬而又稱贊地說：“老頭子（指蔣介石）面前以湯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揮而就。鋼筆草字，寫了即交，我寫的就非墨筆工楷不可。”由此看來，湯恩伯之青云直上，與其寫手本有關。其實，湯的手本每每是閉門造車，常常笑話百出。蔣介石身邊的陳布雷一見湯的手本就頭痛，這是由於蔣介石照例將湯的手本批給陳布雷，要他根據湯的手本擬出辦法，弄得陳布雷神經更加衰弱而睡不覺。後來陳布雷只好要唐縱轉請戴笠，設法使湯恩伯少寫一些手本，好讓他多活幾年。戴笠倒也不負人所托，向湯代達過這番請求，因此湯也曾停過一些時候沒有寫手本。但是問題已不在湯恩伯而是在蔣介石，如果有些時候不見有湯的手本來，就要查問。恰在這時（1944年前後），以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這本書是反奸陶希聖為蔣代筆而寫的），即將付印出版，樣本傳到湯恩伯的手里，又引起他寫手本的興致。他在手本里批評這書“眉目不清，文字冗長，不適合青年們的口味。”這書是蔣介石親自刪改過的，自鳴得意，但是湯恩伯除了批評之外，在手本里沒有寫上半句捧台的話，因而引起蔣介石勃然大怒，將那通手本撕得粉碎，怒氣沖天地命令湯恩伯立即

飞淦听训。这时适值日寇正拟进兵中原，前线吃紧，经林蔚、俞飞鹏等从中转圜劝脱，蒋介石才准汤恩伯免于飞淦听训，而改为“严令申斥”了事。后来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传说，在汤恩伯所上的条陈手本中，这是仅有的一次碰壁。

#### 四、结党营私，贿通权贵：

汤恩伯以十三军为骨干而发展到三十一集团军，结党营私，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中原王”集团。这一小集团中，又分为江西派与实力派。江西派以张雪中、陈大庆、万建霖、胡静如为骨干；实力派以汤的干儿子石觉为骨干；另一实力派又以王仲廉、马励武为骨干。汤恩伯则高高在上，紧紧地控制着。他常说：“好马好狗要多养几匹，使其互相牵制，才能杀其口气。”他又说：“谋国者（指蒋介石）如此，我不能不如此。”

汤恩伯贿通权贵的事实，也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身边的权贵，大大小小几乎都受过汤恩伯不同程度的重贿。汤对林蔚、俞飞鹏、钱大钧等人，每逢过年过节或婚丧寿诞必送重礼。他对俞飞鹏更是崇为恩师前辈，除赠重礼之外，而且利用各种机会拍马溜媚。1943年三十一集团军成立的一个周年纪念，汤恩伯借题大肆铺张，举行庆祝典礼和盛大的阅兵式。在典礼仪式上他特别邀请俞飞鹏（俞当时任军委会后勤部长）讲话，紧接着他自己肉麻地向官兵们说：“俞部长是三十一集团军的‘媒姆’。三十一集团军如果没有俞部长这个‘媒姆’，我们就会受到饥寒之苦，更谈不到壮大和发展了。我们有了俞部长，就能够‘效忠党国’，就能够完满地完成委员长（指蒋介石）所赋予我们的任务。”

汤恩伯对于与他地位相当的人如钱卓伦（当时军委会的经费厅长）、刘詠尧等人，则是公开送钱送礼，而美其名曰“外官内叙”

(在抗日戰爭期間，蔣幫統治區經濟崩潰，大小官員如無額外收入，只靠薪給是難以養活一家五口的)。湯恩伯還經常要他的軍需處長胡靜如和洛陽辦事處長韋魯齋，將由日占區搞來的貴重物資滿車滿載地押運到重慶去送禮。當時水陸交通統一檢查權都掌握在特務頭子戴笠之手，湯與戴有勾結，所以凡遇貼有三十一集團軍封條的裝箱物資，一律通行無阻。

#### 五、嗜殺成性，屠夫手段：

在湯恩伯看來，自古掌握大权的英雄豪杰，必須殘殺立威。他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亲笔写出清代大汉奸胡林翼的两句话：“要有菩薩心腸，要有屠夫手段。”他即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銘，但是他所实行的只是后面的那一句話。他在“剿共”中以机枪杀害革命青年和群众两三千人一事，他常常津津乐道，如数家珍。鮑剛是他的副手，后来不如他意，他便杀之而后称心。他指使陈大庆設宴招待鮑剛，直到把鮑灌醉，然后于送其还家途中預伏机枪手将其杀死。1944年春，他自叶县去洛陽途經臨汝县，該县县长左宗廉將臨汝鎮居民閻老五一案報請批示，他不加考虑，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当时同行的还有李宗仁、于学忠，对湯的处置大有惊异之状，他感到有些說不过去，于是在左县长手里搶过原批呈文慌慌忙忙地又在“就地枪决”四字之上加上“奉諭”二字。究竟他是奉到何人的諭呢？显然，这只是他借以掩盖而已。閻老五竟因此而被置之死地，閻老五的家也因此而被搶劫一空。

湯恩伯平日嗜殺成性，事例不胜枚舉。他不仅視人民生命如草芥，对共部下亦凭其喜怒而隨意处死。鮑剛之死，即其一例。因此三十一集團軍官兵人人自危，給湯起了一个渾名——湯屠夫。

## 发展成为“中原王”的过程

湯恩伯在蔣介石极力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之时，确实也有他一套适应蔣介石需要的办法。他之所以能得到蔣介石的特别寵遇而爬上高位，是由于一开始就从反人民的内战中，在屠杀人民的血泊中成長起来。在短短的六年間，他由北洋軍閥中投奔过来的一个中級軍官，即速升五級而当上了嫡系基本部队的十三軍軍长。当时連蔣介石身边的顧祝同、刘峙、朱紹良等，都曾叹为一步登天。黃埔嫡系中的胡宗南、賀衷寒等亦为之側目，深为嫉視。由于这时的湯恩伯十分含蓄，对蔣介石、何应欽恭之敬之，对黃埔嫡系則甘居后進，因此不但不曾被排挤，反而扶搖直上，不断擡升。他在第二師師长任內，因作战不力受过撤职处分，但賦閑不到半年即調任八十九師師长，旋又改調为第四師師长，同时兼任第十縱队指揮官，不但未因作战不力遭到处分，反而又上爬一步。湯后来发展到拥有五个集团軍的統馭大权，却并不忘十三軍这个一步登天的起点。所以他自己高升了，仍是要將十三軍掌握在自己手裏。十三軍軍长一职，論年資、“功績”和各种条件都应由馬勵武繼任，然而他感到給馬勵武不如給石覺更为可靠（石覺是湯的干儿子，在湯的左右及家裏中說得起話）。

湯恩伯之所以念念不忘十三軍，也是有其原因的。1935年夏湯率十三軍（此时只有第四及八十九兩師）由湘鄂邊境北渡到潼关，后又开往陝西省的綏德县，即在該县附近修筑公路，整休待命。1936年冬，湯奉命調發近省，集結于集宁。这次湯部北上，时而灑关，时而晉西，时而陝北，迨至最后才集結于集宁的原因，蔣介石高級司令部虽不曾將企图暴露，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打内战，对付陝北

紅軍。只是到了“双十二”事件之后，蔣介石被迫抗日，在反动政策暂时有所改变的情形下，才有湯恩伯十三軍参加南口战役的一幕。

当时湯部的十三軍归傅作义指揮，在南口的东西大岭一带布防。日寇約有两个师团（内有酒井旅团較为精銳），从北京西山向我进攻。战斗开始时，馬勵武所率領的第十旅第二十团之楊超营在东大岭山谷里尚未展开，即遭到日寇机枪火力的封鎖，以致伤亡殆尽。这一战役由于湯恩伯指揮錯誤，予日寇以可乘之机。后来湯部依山而守，鏖战一周，日寇优势兵力被阻于險峻的地形，相距最近火線不到五、六百公尺，由于士气旺盛，給日寇以較大的杀伤。但不久湯軍陣地多次被毀于敵軍炮火，幸有二十一师李仙洲部的支援，始轉危为安，日寇始終未敢擅进。其間湯恩伯指揮部遭受敌机轰炸，他乘汽車逃走，指揮无定所，与陣地早失联系。这一战役，敌强我弱，算是拼了半月之久，才奉命轉移陣地。

南口的浴血抗战，是十三軍全体士兵英勇牺牲換得的光荣。正当南口守軍浴血抗战之时，以范长江为首的慰劳团前来慰問。通过他們的宣傳，激起全民抗战高潮。但是湯恩伯却以“民族英雄”自居，便从此驕橫起来。特別恶劣的是他竟捏造八十九师罗芳珪全团殉国的战报，以期为他自己博得虛名。据馬勵武了解，罗团损失很大是肯定的，但团长罗芳珪只是受了伤，并未死去，也不是什么“全团殉国”。1938年4月，湯率所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潰退下来之后，不久即被擢升为三十一集团軍总司令。此后又在江西、湖北等地对日作过几次小規模的战斗。在湖北隨县、枣阳一带的“隨枣战役”中，湯部为主力部队之一。日寇約两个师团孤軍深入，由隨县向枣阳方向入侵。蔣軍偵悉日寇企图后，便集結大軍于公路两侧布防，构成袋形陣地，誘敌深入，以期一鼓而歼之。敌寇窺破計划，乘

大雪时机匆忙撤退。由此也可看出湯恩伯的指揮无能，部队机动力量差，致失良好战机。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指揮无能而引为教訓，反而在蔣介石面前，凭着一块“中央”嫡系的牌子，指桑罵槐，說甲部队不行，乙部队不力。湯恩伯便是这样蒙上欺下，打击友軍，抬高自己，而向上爬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蔣介石迁都重庆。到了1939年，蔣介石虽然仍旧挂着“抗日”的招牌，实际上是在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坐山观虎斗”就成为蔣介石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不变的方針。湯恩伯在中原地区的坐大，不断发展，以至自封“中原王”，追源求本，便是在蔣介石这种反动政策之下出現的。茲分成以下几点来說明其内幕：

(1) 在蔣介石卵翼下成长：

如果說湯恩伯是摹仿胡宗南自封“西北王”而自封为“中原王”的話，不如說是在蔣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造成的。胡宗南由第一师师长，在八年之內，即爬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而独当一面。湯恩伯在前后不到九年的時間里，由一个少将高級參謀而爬到边区总司令、副长官而独当一面。两者情况，如出一轍，說明完全是在蔣介石卵翼之下所造成的。所以湯恩伯每每在对其全体嘍囉訓話之时，恆大言不漸地說是“老头子”（指蔣介石）赋予他的权力。他这种驕橫狂妄的举措，也就暴露出他是有恃无恐的。

(2) 想方設法极力扩充实力：

湯恩伯拥有的实力，发展到最高峰时号称“大軍”四十万之众。他从十三軍起家，扩充为三十一集团軍，在任豫魯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时，拥有十九、二十八、四十五、十五等五个集团軍。十三軍、八十五軍、二十九軍是构成三十一集团軍的骨干。在这之外，他



还扩大掌握了十二军(贺粹之为军长)、暂十五军(刘昌义为军长)、暂九军(顾锡九为军长)、九十二军(李仙洲为军长)、九十七军(王敏文为军长)及骑二军(系何柱国十五集团军所部)。除了以上这些正规军之外,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统辖汜东汜北的挺进部队约有八十多个纵队(每个纵队多者三千人,少者三、四百人)。其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分屯于河南中部及豫皖边境,均为汤直接掌握。

特别要指出的,是汤恩伯所掌握的五个集团军,其经理、人事、指挥大权,并不如一般临时划归为其指挥归入其建制的那样,而是所部高级军官都由他自己一手保举、拉拢而来。他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分,竟向蒋介石保升总司令(他曾保荐原东北军系出身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升充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至于军长以下的人事权,蒋介石给予“先斩后奏”之权。他就是这样随心所欲来发展其野心的。

### (3) 扩充部队的阴谋:

汤恩伯不断扩充部队有其一套手法,戏法玩久了,大家也就心里明白,局外人更是看得一清二楚。他不断扩充部队,表面上说是蓄集兵力,准备对日大反攻。他也只有在抗日的幌子下,才能伸手向河南及四省边区人民抓兵、征粮、要饷。但是他骨子里的一套,却是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假想敌的。

汤恩伯除了扩充正规部队之外,还在汜东汜北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收买了四省边区的游杂部队编成纵队达八十左右之多。当时在日占区和蒋管区的流氓、地痞、地主武装,以及形形色色的、不伦不类的队伍,无不应有尽有地收罗在内。汤手下的沈克、张轸等人,说汤的这些措施是“狗吃牛屎——好多”,认为徒然危害

地方，对于抗战毫无裨益。听说沈、张两人还曾天真地劝说过汤恩伯。事后，汤向他的亲信张雪中说：“沈公侠、张翼三实在有些不像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们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见其小而不見其大。試問照他們的意見來办，我需要的兵源从何处来。有朝一日要向新四軍大举进攻之时，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伸入到腹地。”湯的这番話，不但直接了当地說出了他扩軍的野心所在，同时也將他的主子不可告人的阴谋詭計一針見血地暴露出来。

### 湯恩伯自封“中原王”后的驕橫与野心

上文业已說明，湯恩伯自恃有蔣介石的電信，又有为他所賄賂过的权貴如林蔚、俞飞鵬、錢卓倫等人之撑腰，他便感到放手而行已經没有什么可以顧虑的了。据他的亲信万建藩（曾任湯的副參謀长及南京卫戍总部副总司令等职）傳出，湯平生最好《三国演义》，既喜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愛看演唱有关曹操的京劇。在湯的心目中，认为曹操是适合于他的个性而极为推崇的英雄人物。他之所以极力推崇曾國藩、胡林翼，这只是由于曾胡对人民的血腥鎮压，符合他的嗜杀本性；同时也是由于他看到其主子蔣介石三句話不离曾文正公如何如何的一套，也就不得不將曾胡之流捧在头上。但就湯的本性和野心來說，他曾感叹地认为曾國藩未能取清廷而代之为可惜。由此可見他之選擇曹操作为他崇拜的典型人物，就不是偶然的了。他决定以河南叶县为其巢穴，是由于认为叶县是汉光武发祥之地；同时，曹操之兴起即在中原。这就是他自封为“中原王”的緣由了。这說明湯恩伯既要效法刘秀重溫在叶县一战击败其政敌王莽而奠定帝业的好梦，又要效法曹操迁都許昌挟天子以令

諸侯的故技。万建藩每逢談到湯恩伯的这些想法，便眉飞色舞，以幕中人自居而得意非常。

1944年春，特务头子戴笠曾到湯的前进根据地的界首，和后方巢穴的叶县，盘桓了半个月。戴在返回洛阳时說，他在界首时曾由湯陪同去到曹操的出生地谿州，实地訪問了当地一些姓曹的或姓夏侯的居民，结果一无所得。他又說，湯恩伯打算为曹操在谿州或許昌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紀念塔，以表达其崇拜之心。最后戴笠还說：“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沒有料到湯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滿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應該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終之理。”戴的这段話說得听者毛骨悚然。当时文强、黄天迈、叶翔之等人在座，大家事后議論紛紛，深以湯之驕橫狂妄为不当。

湯恩伯既自封为“中原王”之后，首先因利害关系与蔣鼎文发生摩擦，終于演变而为唱对台戏，个中情形，下文詳述。这里只谈他对河南省主席及魯苏皖各省流亡政府的颐使气指。

当时河南人中相傳过这样一句话：“处于三强二大之間，比童养媳还要难以討好公婆。”所谓“三强”，是指蔣鼎文（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老河口为中心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将豫南划入共势力范围）和湯恩伯。所谓两大，是指河南省政府的民政厅长方策和教育厅长魯蕩平。这两人都是来头火的蔣記国民党的中央委員，省主席也是不敢对之如何。而在“三强两大”之間真正难得伺候的，还是湯恩伯。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常說，只要是湯恩伯电话打来，他就发抖。至于寄食于一战区的流亡省政府主席、委員、厅长之流，那就更是不在湯的眼中。当时出自于学忠系統的牟中珩做了山东省主席，驻在界首，就是时常受气的一个。

就是自认为来头大的江苏军阀王懋功、韩德勤（王、韩两人曾先后充任江苏省主席）、李明扬等人，也得看汤恩伯的脸色行事。抗日战争期间，王懋功、韩德勤曾经先后去拜访过汤恩伯，汤不但不待之以前辈之礼，反而傲慢视为其部属，自称要到洛阳开会，而派其副总司令沈克去敷衍一番。王、韩两人怒气冲天地回到顾祝同那里，大罵湯恩伯“忘了本”。（王、韓均屬顧祝同派。顧祝同屬何應欽派。湯恩伯曾受何、顧的支持而爬上了高位，因而王、韓罵湯“忘了本”。）

### 湯恩伯与蔣鼎文的对台戏

蔣鼎文是蔣介石的打手之一，在血腥鎮壓人民的年月里有过“汗馬功劳”，同时又是何应欽手下“四大金剛”之一（据说四大金剛是顧祝同、刘峙、錢大鈞、蔣鼎文）。1941年冬，蔣鼎文继卫立煌之后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湯恩伯的頂头上司。蔣下車伊始，便以老資格的派头对湯以命令行事，碰了许多釘子。继則他以蔣介石、何应欽的大帽子向湯头上压，湯阳奉阴違，不但不就范，反而弄成僵局，令不出戶，大討沒趣。蔣鼎文于是与其亲信智囊团李筱侯、刘韶仿、郝思毅、周心万（李是共秘书长、刘是冀察战区參謀长、郝是副參謀长、周是机要高秘）等几度密商之后，乃决定采取孤立湯恩伯的手段。他在洛阳首先抓住一批北方和四川杂牌軍的首脑如龐炳勛、刘茂恩、孙桐萱、高树勛、李家鈺等，然后又大量委派冀察地区的游击纵队及民軍等游杂部队，番号最多时达六十多个，同湯恩伯的八十来个相差不多。还曾拉攏著名反共头子張蔭梧做了冀察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蔣鼎文自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并在洛阳西工由張蔭梧主持办了一个拥有千余人的党政訓練团（訓練論陷区国民党县党部及县政府科长以上的人员）。蔣

鼎文又大批訓練軍事人員，保舉副補三、劉鄴仿、胡伯翰等為軍長，當時確實也曾活躍一時。蔣鼎文之所作所為，若不是來頭大而硬，是不敢如此對待湯恩伯的。

事情也就很快地在明爭暗鬥中見了高低。湯恩伯看明了蔣鼎文對他的孤立手段，便在葉縣成立一個與洛陽對立的局面，與洛陽唱起對台戲來。湯在葉縣大辦招待所，“招賢納士”，華北以及四省邊區的軍閥、政客、黨棍、學閥、田閥等等，絡繹于途有如山陰道上。由於湯恩伯的招待好，大吃大喝，還有戲看，又有禮物相贈，最起碼的禮物，也有中山牌香煙一打，於是外間傳說湯恩伯的“副長官部”為“富長官部”。湯並不以為是，又在洛陽設立辦事處，派最善於交際的韋魯齋做辦事處長，又加派其副參謀長萬建藩以與長官部聯絡為名，實際上是終日在高級嘍囉中鬼混，請客送禮，几無虛日。尤其是自1943年夏保舉其嫡系大頭目張雪中做了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之後，湯恩伯的聲勢更為之一壯，將蔣鼎文門下的軍閥、官僚、政客等漸漸地拉到了葉縣方面來。

蔣湯的對台戲，一直唱到1944年4月的中原之戰，日寇一舉而侵占了葉縣、洛陽時為止。在蔣湯對台戲正在唱得熱鬧之時，為蔣鼎文捧台的人始終少，配屬蔣鼎文工作的軍統特務頭目張嚴佛原意有所為力，但是他在了解到內中原因之後便泄了氣了。原來是蔣鼎文曾經敕大保舉副補三、劉鄴仿做軍長，都不曾被蔣介石批准。而湯恩伯則有保必准，連總司令如何柱國也都保出來了。還有，在補給方面，也是這樣。蔣鼎文於1942年撤換八面玲瓏的兵站總督吳海瀾，改派他的親信蕭湘接充（蕭湘原是隨蔣鼎文作司書出身的），以為可以借以控制湯恩伯，使之非央求于他不可。不料湯恩伯直接勾通俞飛鵬，將湯部的補給直接運送，根本不經洛陽轉發。大致到

了1944年初，蔣湯對台戲完全由湯占了上風之後，叶縣、洛陽也就搖搖欲墜，不久即為日寇所佔。

在這種狗咬狗的情況下，就造成了日寇進窺的良好機會。日本華北駐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對蔣湯的對台戲，在北平即曾大為叫好。1944年4月，日寇即以不到十天的時間，將蔣、湯所掌握的四十、五十萬大軍打得落花流水，連蔣鼎文最後立足的盧氏縣，也連根拔掉。蔣、湯兩人狼狽而逃，丑態百出。日寇進占盧氏之日，日本飛機撒下大批的漫畫傳單。一張漫畫畫着蔣鼎文一手牽着小老婆，一手抱着鈔票飛命。另一張畫着湯恩伯橫眉怒目，摩拳擦掌，指着蔣鼎文大罵：“銘三（指蔣鼎文）要負失敗之責任，老湯要去告狀！”日寇將蔣湯唱對台戲的情況攔得一清二楚，是由於派了一名間諜名叫佐藤（少將）的潛入洛陽，以賣豆腐作掩護達五年之久，佐藤早已將蔣湯經濟情況傳報回去，所以漫畫里所描繪的內容十分逼真。

### 大興土木，濫發搜刮

1943年，河南大旱，連月不雨，又加蝗蟲為害，以致大河南北，赤地千里，餓死的達四百萬人之多。當時情況之慘，固由於天災所引起，而實際上人為的禍害更為重大。河南人民有“水”、“旱”、“蝗”、“湯”四災并重的說法，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河南人民是如何的痛恨湯恩伯了。

湯部擁有四十萬人，是見諸編制的，全部軍糧自然是出之于地方，這種苛索加于人民頭上，尚有數字可稽。但是湯在叶縣與洛陽唱對台戲之時，招待所大吃大喝的開支，以及送禮賄賂勾結權貴的鉅額開支，却是無法統計的。至于湯恩伯本人及其部下的貪污糜餉，雖然沒有比較全面而具體的資料，但從馬勵武、王秉鈺所了解

的一些事实中，即可看出当时这班匪徒对河南及边区人民的压榨，是上行下效、横征暴敛层出不穷的。现将汤恩伯及其所部贪污情况荣誉大者记述于后：

(一)汤恩伯平日伪装廉洁，对部队的经理权约束很严，曾下令规定，连长如有吃空者必行枪毙。但他将各部队的经理大权控制于他的总部，公然规定所属各军按编制造领粮餉，至少有一千五百至二千名的空额粮餉“繳”归总部充作全军的“公积金”。名之曰“繳”，实际上是由总部军需处按月从发放各军粮餉中照扣。美其名曰“公积金”，实际上不过是变相的公开贪污。此项“公积金”，誰也不敢过問，也从未公布过收支情况。

(二)自蒋政府通令于1939年实行田赋征实的搜刮政策之后，更造成了汤恩伯及其所部贪污的机会。他们借征实之名，派部队到四乡搜刮，扰的农村鸡犬不宁。1941年至1943年河南大旱，农民已经无法生存，相率逃荒。逃荒农民最多的汛东区，有的乡区青壮如小全部逃荒去了，未能逃走的残病老弱留下的一点点粮食，也被汤部匪兵不顾其死活尽行抢走。1941年，由漯河到周家口的大道两侧的麦田中，每隔八步十步，即有饿殍尸体数具，无人收斂，被野狗争食，以至腸肚流于地上，惨不忍睹。

(三)汤恩伯个人的贪污情况，花样既多，好听的名詞也多，开口閉口說什么“对日經濟作战”、“为国为民”，但骨子里完全是为自己大发横财。1941年前后，汤恩伯还只是要他的亲信韦鲁斋、胡静如等，在界首、漯河、洛阳几个中心点做些套购黄金的买卖。不久，汤恩伯便在界首公开成立“物资管理处”，派韦鲁斋充处长，美其名曰管制物资，以免资敌，实际上是在物资管理的招牌掩飾下，大做其投机生意。物资管理处经常分派喽囉跑上海、徐州、开

封、濟南、天津等地，大做生意。後來，湯便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勾結，兩人合夥在界首成立了“財政部貨運分處”。戴以軍統特務王兆槐、張樹勛、白蓮丞等主持其事，湯則派胡靜如、聶魯齋、駱東藩等人參加。由於有了“財政部貨運分處”這塊招牌，對敵“經濟作戰”、“對敵搶運物資”等等一些騙人的話，便經常挂在湯的口頭上，用來掩蓋其不可告人的貪污罪行。

戴笠、湯恩伯為了使合夥的貪污買賣做得更加順利，由戴派人到美國印制了鉅額華北日占區的“聯鈔”和汪精衛漢奸政權的各種偽鈔，成批地運到界首，分發給經濟特務攜帶到日占區去搶購套購物資，不論布疋、油鹽、五金、百貨，一律高價收購。湯戴還勾結漢奸張嵐峰（漢奸軍長），實行在日占區武裝走私。張嵐峰大量接受由美國印制的“偽偽鈔票”，去騙取當地商人的、居民的和日本、朝鮮人經營出售的物資，然後轉售給湯、戴，作為爾後“效忠黨國”的考驗。據文強了解，當時界首貨運分處，經常有一百五十輛以上的載重卡車，無分晝夜，川流不息地來往于川陝豫道上。

湯恩伯在這些“買賣”當中究竟撈了多少，自然未為外人所知。據馬勵武提供的材料：湯恩伯的同鄉葛天（曾充湯的辦事處長）承認，僅在抗日戰爭期間，他經手為湯恩伯搞的金條，折成現洋就有五百萬元之多。馬勵武感嘆地說：“這不過是指這一時期這一件事而言，恐怕還是最少的說法。這樣的貪污，還是明顯可見的，其他不顯明的見不得人的還多着呢！”

（四）至於湯恩伯部下大小官吏之公行貪污，例證不勝枚舉，幾如人盡皆知。十九集團軍之暫九軍軍長霍守義，部隊駐在阜陽附近，他竟令他的軍需高鳳鳴在阜陽勾結縣田賦管理處向該縣人民強索已過年度的軍糧（在1943年度還要1942年度的軍糧）約二十餘



万斤。尔后复征用民間小紅車，由皖北双沟运至敌方盜卖，再叫他的軍需到漯河买金条。三十一集团軍二十九軍軍长陈大庆，1942年交卸时，在叶县兵站倉庫存有公粮七十余万斤，陈大庆并不曾移交下手，也不繳“公”，竟将公粮盜卖肥己。又如十九集团軍暫一軍軍长王毓文，駐皖北董家集时，也曾指使其軍需处长与十九集团軍兵站分監駱东藩勾結，向地方征集軍粮，然后串通汉奸軍长張嵐峰將軍粮运日占区出售，再买盐回来卖出，从中謀取暴利。以上所記，只是湯軍大头目的貪污舉例，至于一般噉嘴的鼠窃狗盜，就記不註記了。

下面再談談湯恩伯在河南大兴土木扰民害民的几件事。

第一件，大修深沟。湯恩伯借口对日作战，阻擋日軍战車前进，决定挖掘深沟。深沟的工程北自郑州附近起，东至开封，再向南到周家口附近为止，两道复綫长达千余里。这项工程，湯恩伯原标榜以兵工为主，民工为輔，但开工之后，湯軍部队则变成了奴役人民的監工队伍。深沟附近百里內的民工，都在其奴役之下，自帶粮食工具，强迫日以繼夜地开掘。郑州附近的一段工程首先完成，湯曾亲自前往視察。

深沟工程原是湯恩伯一时心血来潮，企图以叶县为中心而开掘的，但是他却假說是执行蔣介石的命令，因此不仅扰民害民，而且引起蔣帮的詬难。蔣鼎文一次在紀念周中攻訐湯恩伯說：“有人想学隋場帝，要在河南开掘千里祁沟，而名之曰‘国防工事’，在我看来完全无此必要，在现代战争中尤无此必要。現值灾馮之年，應該立即停止。”蔣鼎文的这番話，自然不是什么为人民打算，不过是借題發揮而已。后来这話傳到了湯恩伯的耳里，他勃然大怒，更加严令共部下日夜赶工。由于每段深沟必須与公路系统及临时的軍

工筑路相联系，势非纵横交错地兴修许多支线不可，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当地人民除了出劳力供驱使之外，还要供应木材、石灰一类的材料。材料一时供应不上，汤军见了祠堂、庙宇就拆，连附近的民房也毁了许多。施工区内有许多坟地，当地人民多不愿将祖坟迁动或将林木毁坏，汤军头目利用这种心理，进行敲詐，迫使许多人出钱纳贿，地方上的保甲长也乘机勒索。汤军驻扎郑州、中牟附近的两个独立旅长彭賈良、黄国书所部，在开掘深沟的期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即是无法计算的。由于1944年4月日寇进攻中原，汤恩伯强迫开掘的沟渠及联系的路线，并没有完成就停工了。这是河南人民不幸中的幸事。至于已掘成的深沟，在作战中并未生效。日寇在进军之前，早已将地形侦察明白，战车绕过深沟挺进；不能绕过的，也早已做好了越沟设备，只要用一部坦克填在沟里，然后从坦克顶上架设钢板，后续的战车即可通行无阻。郑州、洛阳、叶县是日寇进攻的三个目标，即很迅速地归于沦陷，汤恩伯构筑的“千里祁沟”，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第二件，兴修校舍。1943年，汤恩伯在叶县的大树头村附近，假招收沦陷区流亡青年之名，竟大兴土木修建什么“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学院的修建材料，全部都在叶县附近的十余县征用。最初征用的材料多不合规格，又一再地重征，不但附近的祠堂、庙宇、古蹟名胜等建筑物多因此而被毁，连许多民房住宅，也都被拆毁。当时河南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汤屠夫要盖房子，连龙王宫都要拔掉。”这话一传，“汤屠夫”之名，连小孩夜哭也可止住。由此可见河南人民对汤恩伯怨恨之深了。

汤恩伯大兴土木设立“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外面只知道用以招收沦陷区流亡的青年学生，悉其内容的人就知道汤恩伯是

有野心的：第一是欺騙青年，儲備政治資本。湯恩伯為了與蔣鼎文唱對台戲，認為爭取青年以之作為政治資本是不可缺少的事，這就使他大辦“學院”，用盡了各種欺騙手段，找來了千多名學生還不以為足。第二是模仿“西北王”，培植爭雄稱霸力量。湯恩伯看到“西北王”胡宗南無意次派人到界首（湯的前進根據地）招收青年學生，使他眼紅起來。他曾向其親信張雪中說：“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學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學生，實在是欺人太甚，連我控制的四省邊區都成了他的招生所，這還成話。”詭計多端的張雪中很明白了他主子的用心，便建議其自搞一套。張雪中還建議，如將戰區政治部這個機構掌握到手，那就不只是四省邊區的青年不至為胡（宗南）、蔣（鼎文）所得，就是整個第一戰區的青年也都可控制到手。果然，在1942年前後，張雪中即令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不干而去做第一戰區的政治部主任，也就可見其用心之深了（這一情況，系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秘書李表九告訴文強的）。

湯恩伯除在葉縣辦了兩個學院之外，在他統治中原地區的八年期間，還在各地設立了大大小小的軍事學校、黨政訓練班、幹部訓練班等等。鎮平縣的菩提寺和臨泉縣的周圍，就是湯恩伯的兩大訓練中心，受訓人員恆在千人以上。由於這種和那種名目繁多的訓練班不斷出現，興建修造，糧草供用，無不加深河南人民的負擔。

### 矛頭針對中國共產黨

。儘管蔣鼎文和湯恩伯兩人之間，狗咬狗，爭吵不休，葉縣與洛陽之間的對台戲越唱越不能下台，但他們兩人反共反人民卻是一致的。在1942年至1944年之間，蔣湯在這一地區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矛頭都是針對共產黨。

1941年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之所以免职而以蒋鼎文接替的原因，表面上是由于卫在中条山对日作战的惨败，但骨子里则是由于胡宗南向蒋介石告密所致。胡宗南在密电里说：“卫立煌与八路军首要有所往来，思想立场不稳。”这就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派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走狗蒋鼎文前往接替。再加上有汤恩伯的庞大武力的配合，在中原地区更可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当时中原地带处于四战之区，豫北、鲁西、鲁南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淮南、苏北及豫南、鄂东地带为新四军的根据地，在蒋鼎文汤恩伯看来，中原地带已处于共产党武力三面包围圈内，共产党占领区正在日益发展之中。据岳焯远提供的材料说，蒋鼎文到河南的前后，关于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及其地下组织的问题，曾与胡宗南、汤恩伯、戴笠有过缜密的计划与布置。因而蒋鼎文到职不到两个月即逮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当时新五军军长为孙殿英），并企图逮捕新五军的副军长共产党员邢肇棠，幸邢事先得报，逃脱了虎口。接着，约在1941年末1942年初，蒋鼎文又查封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并通过汤恩伯勾引该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革命，投降蒋帮。后来根据叛徒袁晓轩的材料，又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八十余人，如共产党员张振寰、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稽文甫，都是那时被捕的。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广舆（又名张仲鲁）就是那时被迫下台的。赵寿山在第四集团军因政工处长龙冠军告密而被免去军长职务。还有其他许多危害人民的事，都在这时发生。

在特务头子戴笠的指示下，蒋鼎文、汤恩伯又与胡宗南勾搭在一起，分工合作行动起来。胡宗南在西北以西安作中心，全力封锁陕北。蒋鼎文与汤恩伯则各就其势力范围扩大特务组织，统一反共

陣營，控制反共工具。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的政治部主任王以常调走后，由胡宗南推荐的陶峙岳接充，后又由湯恩伯推荐張德中接替陶峙岳。此后胡宗南的反共走卒源源而来，都充当了要职。其中有胡的忠实走狗卞德恭即充当了该部的中共科科长。共产党员靖任秋、邢肇棠案件就是卞匪一手所造成的。胡宗南专门反共的“劳动营”随之也派来了，以刘亚哲为首的大批反共家伙，在河南地区到处横行。

湯恩伯则在四省边区地带，设置“四省边区党政分会”，自兼该分会主任，副主任为沈克，秘书长为李鏡。“党政分会”在叶县成立了“青训班”，也是湯自兼主任，在班里负实际责任的陈霖，是胡宗南推荐来的。“青训班”是专门“训练”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动组织，知名的民主人士稽文甫等即关押在该“青训班”里。湯恩伯还在临泉成立了“临泉特别训练班”，班主任也是他自兼，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升、秘书王蔚軒以及队长教官等，几乎全是青一色的军统特务分子。该班第一、二两期的毕业学生，都充当了湯部反共人员；第三期的毕业学生后来改编成为“豫鲁苏皖边区党政工作队”，由周麟祥任总队长，在四省边区专干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大约自1942年前后到1944年为止，湯恩伯以界首作中心，成立了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及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特务机构，由戴笠先后派周兆其、周麟祥等人充该调查室主任，并派周兆其、刘国宪任界首警备副司令兼稽查处处长。（刘国宪也是军统特务分子。）

据王秉铨提供的材料：湯恩伯在加强内部的特务机构并布置了特务网以后，在军事上作了如下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

（一）1941年7月间，湯令李仙洲部九十二军军长侯鏡如部进

犯皖北阜阳插花庙附近解放区，将新四军彭雪枫将军所属部队压迫于津浦路以东地区。据说，此役还有骑八师马步康部也参加了。

(二) 湯恩伯于 1941 年春，也曾派共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率其所兼八十九军由平汉路西移驻皖北太和县及其附近，旨在增强反共反人民的力量。湯所以命李仙洲和王仲廉两部进驻皖北、豫东，其阴谋在于利用李仙洲是山东人、王仲廉系江苏人的地域关系，先在皖北阜阳、太和附近，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伺机向鲁苏腹地进犯，企图破坏人民政权，消灭人民抗战力量。李仙洲当即在阜阳吕大寨设立军校及“驻鲁干部训练班”，用来培养军政干部，并拉拢山东地方豪绅地痞，以壮声势。1942 年，他们认为时机到来，遂率共九十二军等部向山东解放区进犯，但进到鲁西，即遭八路军回击而惨败，退军到阜阳附近。王仲廉也曾在太和县设立江苏中学，收集江苏流亡青年，同样也笼络大批苏北地区的豪绅地痞流氓，煽言“收复失地”。所有这些，都是湯恩伯整个反共反人民计划中的一部分。

(三) 李仙洲进犯山东解放区受挫之后，湯野心不死，乃于 1942 年冬季，又加强王仲廉部的军事力量，阴谋进犯苏北解放区。1943 年初，湯即保升王仲廉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有暂一军、八十五军、暂九军。湯以河北游击队段海洲部改编的暂三十三师、鹿邑地方团队改编的暂二十九师及三十师编成之暂一军（军长王毓文），驻皖北蒙城黄家集附近整训；又以由苏北撤退之顾锡九部改编的八十七军，驻皖北临泉县附近；以旧东北军一一一师、一一二师改编的暂九军（军长霍守义），驻皖北太和县和界首附近。这些部署和扩军的阴谋，都是为了进犯解放区作准备。狂妄的王仲廉当时甚至叫喊：“打回老家去。”只是由于日寇进攻中原急迫，湯、王部

队顧此失彼，而暫時有所放鬆。

(四)湯恩伯收編游雜部隊和地方團隊，改為挺進軍的，前後約有八個縱隊之多。他公開叫囂說：“蔣委員長叫我自力更生，要在這裡成立一百個團。”湯恩伯如此猖狂地擴充軍隊，陰謀何在，前文已有說明，完全是在反共反人民，此處不必多所敘述了。

那時，蔣鼎文在洛陽以反動透頂的張濬樞充當“冀察戰區黨政分會”副主任，開辦了大規模的“黨政幹部訓練班”，編組兩個“戰地服務團”，以荆宪生、明耀武分任第一、第二團團長，企圖伸入解放區開展特務活動。由於1943年4月日寇發動對太行山區的“掃蕩”戰，演成了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又兼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的龐炳勳及其指揮之下的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和二十七師師長陳孝強等投敵做了大漢奸的丑劇，迫使蔣鼎文苦心訓練出來剛剛開到太行山區的兩個特務組織（即“戰地服務團”）一併成了俘虜。

1944年春，特務頭子戴笠到河南臨汝風穴來主持“中美合作所”主辦的“中美特種技術第三班”的畢業儀式，又曾與蔣鼎文、湯恩伯密謀，計劃成立兩個更大規模的黨政工作總隊。三人幾度密商的结果，決定在蔣鼎文直接指揮之下成立“豫晉冀魯邊區黨政工作總隊”，在湯恩伯直接指揮之下改組和加強原有的“豫晉蘇皖四省邊區黨政工作總隊”。

蔣鼎文指揮下的“豫晉冀魯邊區黨政工作總隊”，隊里的頭目由戴笠一手包辦。他保薦乔宗才充當總隊長，並將當時在洛陽附近所有的特務行動隊，如軍統局豫站指揮之下的行動隊、晉東南站指揮之下的行動隊、刘艺舟特務頭子指揮之下的行動隊、平北北段破壞總隊、軍事委員會華北督導團（這一組織是天主教教會人員組

成，由陈仙洲指挥之下的新乡教区美国籍的主教米于佩尔，一般称为教会特务)等等，藏垢纳污地编在一道。

归湯恩伯指挥的“豫鲁苏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为什么说是改组加强呢？由于湯恩伯感到戴笠原先介绍给他的那个党政工作总队队长周麟祥不够老练兇狠，反共反人民的經驗不够，向戴提了意見。戴便想到了远在第六战区充党政工作总队队长的刘培初，既是共产党的叛徒出身，又有多年特务工作的經驗，而且具有一套兇恶手法，因而急电调来接替周麟祥。他們正在这样积极准备之时，适逢日寇发动了1944年4月进攻中原之战，蔣鼎文湯恩伯指挥下的五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計劃连带打得粉碎。于是两个大规模的完全特务化的“党政工作总队”，也就随着他們的崩潰而不能再起作用了。

### 軍閥、特务、汉奸、日寇组成的杂拌“湯”

上文所記，还只是湯恩伯的形形色色，现在且剥去他的皮，談談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在1944年中原战争之前，湯恩伯并不满足于自封的“中原王”的局面，而一心想做刘秀、曹操，称王称霸。他既然能由北洋軍閥方面投到蒋介石的怀抱，也就只要对他有利，能实现他的野心，那末，任何人的怀抱都可投，这就是湯恩伯的政治目的所在。他本身是蒋介石手下拥有雄厚实力的大軍閥，也就具备了与日寇、汉奸相勾結的条件。当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到界首与大汉奸張嵐峰勾結时，張嵐峰化了装来到界首，戴笠、湯恩伯、張嵐峰三人聚首一堂。戴笠赠送張嵐峰两枝美造名牌左輪手槍和金表等物。这在戴笠來說，是想通过張嵐峰由敌占区捞到大批物資，利市百倍地运到大后方去出售。



这样既可在蒋介石、孔祥熙等人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善于为四大家族开辟财源，同时又可补充巨大的特务经费及其个人挥金如土的挥霍。而在汤恩伯方面，除了分肥的目的之外，他的打算就不同了。他认为：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他是日本留学生，就可倒到日本方面，不怕没有出路；如果日本失败了，他那“中原王”的美梦就要做的更好一些。他与汉奸多所勾结，一旦日本战败，即可收容形形色色的汉奸部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汤恩伯这种不可告人的打算，他是唯恐外人知道的。根据王秉钺、文强等所了解的情形，有以下的一些具体事实：

(一)1944年3月前后，戴笠与汤恩伯到界首盘桓了将近半个月，通过张嵐峰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王向荣的从中奔走，张嵐峰化装到界首与汤、戴两人见面。戴笠向张借证准在蒋介石面前备案，如果日本失败了，张可作为“曲线救国的将领”对待，要他安心以处。但张嵐峰对于特务头子说的话恐不能为凭，于是暗中又去见汤恩伯，认为汤是实力派，说的话也许可以作数。汤恩伯很明了对方的心理，不但满口的“保证”，并且还亲笔写了一通“手谕”，派张嵐峰为“先遣军总指挥”。这个秘密直到日寇投降之后才揭露出来。原来当日本投降之前，蒋介石派熊斌为华北宣抚使去策动张嵐峰反正时，张唯恐不能摇身一变做到蒋记军人的大官，便把汤恩伯的“手谕”取出来张扬。其实熊斌自重庆出发时，早已将起用汉奸的委任状盖好了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关防印信，并已内定张嵐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之一，事情也就顺利办成。后来熊斌问到汤恩伯有无写过“手谕”给张嵐峰这回事，汤恩伯只好含糊地说是“权宜从事”，于是这个秘密也就揭穿了。

在与张嵐峰勾结的同一时期，在界首出现有汉奸孙殿英的代

表譚松艇、汉奸龐炳勛的儿子龐先正和汉奸孙良誠駐開封的辦事處長李子鐸等等，都成為湯恩伯座上佳賓。除此之外，還有大漢奸畢澤宇（又名畢逢春），為湯恩伯所密派，經常來往於南京、上海之間。個中內情雖然不知，但後來湯恩伯又要畢澤宇到重慶去見蔣介石，蔣介石于見面後將畢委為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交給戴笠任用，派為華北策反專員。從這一系列的舉動來看，湯恩伯與漢奸的勾結，已經是一種“通天”的做法了。

（二）據王秉鈞提供的材料說，有一個揚言為日本軍方與湯軍方面交換物資的寇軍代表黃某，系熱河人，他常常往來於日軍中支派遣軍方面和湯恩伯軍部之間。并開列過這種關係，日寇曾派遣一名中將（其名字中有一個清字）來臨泉總部與湯恩伯勾結。這個日寇軍官，系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昔日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的同學，據聞日寇陰謀通過這種關係對蔣介石進行誘降。

（三）還有一件與湯恩伯勾結日寇有關聯的事，雖然發生於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却可以通過這件事看出他的用心。據文強了解：1945年8月以後，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由北平移駐南京，以便與國民黨政府軍事頭目何應欽辦理投降事宜。這時湯恩伯已發表為京滬警備總司令，駐在南京時多。湯曾多次見過岡村寧次和其他日本重要戰犯。關於留用日軍打內戰以及如何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等等問題，湯曾向蔣介石寫過許多“手本”，而且幾乎都為蔣所採用。那時湯恩伯在南京曾經發表許多親日言論，他說：“中日的世仇萬不可結。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敗一勝，古之常理。對日本萬不可過火，應留一些餘地，以防他日的報復。”他簡直把日本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国人民頭上的戰禍，看成是天理循環不可避免的事。湯恩伯在那時還為日本軍國主義吹噓，說：“日本

和德国一样，是一只打不死的狼，刚刚打败了，甚至落了一身毛，只要等到毛长齐了，仍然是一只狼。”可见汤心目中，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和恐惧日本军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又有何分别。

1946年春，汤恩伯曾邀同贺耀组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东亚协会”，当遣送日本侨民回国时，竟使用“亲善”、“共存共荣”、“兄弟之邦”、“同文同种”等等一类认贼作父的名词，曾风靡一时。远在东北的军统特务头目文强、陈旭东以及另一批亲日分子齐云阶、贺莹等等，也曾出而效尤，在沈阳的日本侨民中组织“东方文化学会”，也曾同样用过汤恩伯叫喊过的“亲善”一类认贼作父的口号。后来文强到南京见到汤恩伯，谈及东北地区仿效上海对日本侨民有所组织的话，汤恩伯听了非常高兴，得意忘形地说：“这是百年大计的事，要眼光看得远，才能化敌为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料到下一着。”

### 中原战役一败涂地

1944年4月，日寇进犯中原地区，汤恩伯和蒋鼎文共拥有五十万之众，不战而北，溃不成军。关于中原战役汤恩伯集团一败涂地的情况，现据当时属于他直接掌握之下的嫡系部队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提供的材料，概述于下：

第一、在大敌当前，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仍在争夺指挥权。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从北到南洋的大陆动脉线，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企图以中国大陆作垂死挣扎的根据地，中原战役便是这一大战中的第一阶段。当时日寇盘踞洛阳、郑州以北及黄泛区以东地区，与蒋军隔河对峙。日寇发动进攻，自然首先选探郑州、洛阳为其攻击的两个重点。汤恩伯早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作中心的半圆形

周圍，假洛陽以北（東起靈寶西止洛陽）的正面障地于不顧。這就引起了蔣鼎文的日夜不安，因而向蔣介石請准，抽調湯恩伯駐防禹州附近的二十九軍馬勵武所部開靈寶一帶防守，監視對岸茅津渡的敵軍，而軍洛陽的安全。不料當馬勵武部開赴靈寶防守之後，湯恩伯疑心蔣鼎文會吞吃掉他的這一部隊，千方百計向蔣介石要求調回。加之由于馬勵武是蔣鼎文在黃埔第一期時的區隊長，有師生關係；又因馬勵武未能取得十三軍軍長的表鉢，早已不滿意湯恩伯，因之使蔣湯之間的爭鬥更形錯綜複雜。湯恩伯為了這事，曾到重慶向蔣介石申訴。他借口防線太長，兵力不敷分配，而蔣鼎文擁有五個集團軍的兵力（即劉茂恩、李家鈺、孫桐萱、高樹勛等雜牌部隊），又有胡宗南在關中的支援（事實上蔣、胡之間早鬧不和，潼關以內的部隊胡已拒絕東調），硬將馬勵武部要了回去，開到南陽附近。

第二、日寇發動進攻的兵力約有五、六個師團，附一個裝甲旅團，總兵力不到十二萬人，裝備比較優良。而蔣軍參加會戰的兵力超過五十萬，即三、四倍于日軍，又多經過兩年以上的休整訓練，但是整個中原戰役從頭到尾不到半个月，即以蔣軍的全部崩潰而結束。當時日寇如入無人之境，蔣軍一觸即潰，聞風喪膽，都往嵩山里鑽。蔣軍的腐敗情形，在這一戰役中暴露無遺，連日本軍閥也沒有想到在世界形勢不利的關頭，會這麼容易先打通了大陸動脈綫最北的一段。

第三、當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鄭州、洛陽，繼而攻占了叶縣、臨汝這些要地之後，便形成封鎖嵩山麓的態勢。潰不成軍的湯恩伯部，便在山區里亂竄，見日寇即逃，可是見了山區的人民則凶狠之極，燒殺搶掠，雞犬不寧。當時，豫西土皇帝別庭芳遺留的武裝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聯防”為名，糾合地方人民，襲擊湯軍。由于湯軍

自潰亂之後，紀律蕩然，人民恨之入骨，這樣就被地主豪紳武力頭目所利用。（別庭芳當時已死，由劉杰卿及別庭芳的兒子等仍舊打着他的旗號繼續稱霸一方。）湯軍各部已成驚弓之鳥，潰亂的部隊也鬧不清情況，只要一聞槍聲，即以為日寇追到或擋住了去路，甚至在一聲吆喝之下，就相率繳械逃命。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就是這樣在豫西被亂槍打死的。李死後，湯恩伯謊報為對日作戰陣亡，追贈上將，還在成都大開追悼會。湯恩伯的衛隊也被如此繳了械，指揮全軍的電台同時丟失，湯本人化裝伙夫才逃了出來。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所率的總部直屬部隊，被地方團隊包圍在一個土寨中繳了械，損失很大。王仲廉雖然逃脫了，但他指揮的部隊因此失去聯繫，官兵各自逃命。馬勵武率部從臨汝以南突圍，通過葉洛公路向大營集結時，同時也看到十三軍石覺部也于同夜整隊從臨汝東北突圍，通過葉洛公路向大營方向集結。進占臨汝縣城的日寇發現湯軍突圍偷進的征候，便派出了六、七輛坦克用照明燈搜探，並分途截擊馬、石兩部。其實當時日軍除了六、七輛坦克之外，並不敢在夜間出動部隊。然而馬勵武、石覺這時各有一個軍的兵力，而且都有戰車防禦炮，卻不敢使用，反而互相驚慌，慌亂不堪，行李彈藥失落者很多，連一個山炮營和軍部的聯絡電台也完全損失了，軍部對上對下都失掉了聯繫。在整個中原戰役中，不僅馬勵武所部如此，湯軍其他各部也大都如此。

第四、湯恩伯在中原失敗後，陳誠前來收拾殘局，在檢討會上當面指責湯恩伯，說失敗原因起于湯的“四不和”（即：將帥不和，軍民不和，軍政不和，官兵不和）。蔣介石遠在重慶，原來滿望一手培植起來的爪牙多少有點表現，不料竟會如此不爭氣，苦惱地一星期睡不得覺，逢人便罵，兩眼發赤。他所氣的不但只是培植起來的親

信不爭氣，而且就心日寇繼續西進，若一旦打入潼關，胡宗南不見得會比湯恩伯要強些，萬一西北山區不保，連躲在山上看虎鬥也觀不成了。而使蔣介石更為焦慮的是中國共產黨解放區的日益迅速擴大，他將無立足之地。蔣介石暴跳如雷地罵了幾天之後，只好將蔣鼎文撤職，又將湯恩伯調開，改派其頭號親信陳誠前往河南西峽口接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陳誠一接事，便趁機打擊湯恩伯，在陝西商縣南的清油河鎮，召開了一次中原戰役的檢討會。在這個會上，陳誠給湯恩伯來個下馬威，對湯大加指責，指出失敗的主要原因有所謂“四不和”。陳誠還指使河南“黨政”代表團由方策、魯蕩平、馬乘風等人寫成請願控訴書，在會上控訴湯恩伯的十大罪狀（這項“控訴書”的內容不曾公布，故不悉內容）。原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為陳誠）的“黨政”工作總隊總隊長劉培初（軍統特務，但與陳誠的關係拉得很好），寫了一份報告，指出湯恩伯在河南“四不和”的許多具體事實。劉培初向陳誠提出報告，一方面是獻功，一方面是表示他雖然暫時調離第六戰區到湯恩伯手下做“四省邊區黨政工作總隊長”，但他的心仍然是向着老長官的。陳誠在那次檢討會上，將方策、魯蕩平、馬乘風等人的請願控訴書當眾公布，也將軍統特務劉培初寫的報告交給了湯恩伯。陳誠使出這一套威風，湯恩伯只好老着臉皮當眾認罪。那一班受陳誠指使的嘍囉大為稱快，陳誠自然更是得意忘形，認為排除異己，打擊其爭寵敵人正是良好的機會。湯恩伯于會後大發牢騷說：“陳矮子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會整到他自己頭上。”

湯恩伯後來到了重慶見到戴笠，一開口就說：“雨衣（戴的別名），你派的劉培初，為我帶了倒忙。我有什么過錯，儘可由你來規

劝我，为什么反而给人家借刀杀人呢？”湯恩伯这番話弄的戴笠一时摸不着头脑，直到湯将刘培初所写的报告給戴看了之后，才明白他发牢骚的原因。戴除了当面賠罪道歉之外，后来还把刘培初罵得狗血淋头，从此冷淡不加以理睬了。

第五、湯恩伯路过西安时，又遇到胡宗南摆布的一次檢討会。檢討会的目的是看湯恩伯的笑話，但结果是轉到了反共反人民的问题上，大家唏嘘叹气而散。事实是这样：1944年9月前后，湯由于调重庆，路过西安，胡宗南便在他的公館里为湯饒行。胡在事先安排好，除了宴請湯恩伯及共亲信万建藩等人之外，还要他的參謀长范汉杰、副參謀长李昆剛、“反共专家”托派分子周天儻、張大同以及政治部主任顧希平、第一战区調查統計室主任文强等人作陪（胡宗南当时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陈誠是司令长官）。在席上，胡首先說明聚会的目的，“是为湯先生到重庆饒別，同时借此机会檢討这次中原会战的失敗教訓。請湯先生报告一下，大家都可提供意見”。当胡宗南这番話說完之后，湯恩伯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沉默了許久，然后抱头大哭，接着就嗷嗷唔唔地說：“中原战争失敗之責全由我負，蔣长官（指蔣鼎文）虽然拉了我的腿，我不怪他，怪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报告，我不知从何說起。”湯就是这样結束了他的所謂报告。

又沉默了許久之后，胡宗南的眼光扫到周天儻、張大同的身上。周天儻才强打精神說了一些什么“当前的国际局势，由于苏联反攻的大捷，由于美国盟軍在太平洋的越島进攻，由于第二战場的开辟，世界法西斯軸心的垮台似乎已經到了決定性的关键。但就国内情形來說，中原之敗，而且敗得这么慘，是出乎意料的……”胡宗南听了默默点头。張大同接着說：“要抗日战争胜利迅速地到来，关

鍵在于太平洋开辟第三戰場。”他又說，由于苏联的节节胜利，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国际間将会起根本的变化。由此不能不考虑到我国国内的問題，在他看来，国内問題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張大同这么一說，会場上立刻出现了緊張的气氛，胡宗南连连称道，說：“有見解，有道理。”接着湯恩伯說：“我說 战敗的責任一切都归我負，我只說到一方面。我看中原之敗，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問題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敗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經營，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計劃。这次到重庆怎能去見委員長呢？”湯恩伯說完又是一陣眼泪。那天的所謂綏別檢討会就在湯恩伯第二次的一哭之后，而宣告不欢而散。

湯恩伯自中原战役一败涂地之后，在各方輿論的抨击之下，尤其是在陈誠的宰割之下，其小集团完全瓦解。表面上看来，湯仍得寵于蔣介石，但自中原战役之后仅被摆在一個空頭高位上，成了一个傳達命令的工具，并不能象过去那样，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了。这里不能不指出，陈誠之敢于下毒手拆散湯恩伯的基本部队（十三軍、二十九軍、八十五軍），如果不是受到蔣介石的指示，是有所顧忌的。湯恩伯梦想做曹操称王称霸的野心，难免不傳到蔣介石的耳里，他的命运也就此决定了。



#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沈 蔚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它的英文名称为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OFFICE(缩写为 S. A. C. O.)。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蒋特务公开合作的一个产物,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与美帝海軍部情报署合作组织起来的。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由于经常和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往来,对于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特务以及它的组织、人事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现就个人所知所見写出,不够的地方,尚待过去了解该所情况的先生们能有以指教和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彰的罪恶集团种种情况能全部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美蒋特务的真正面目。

## 一 成立经过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逃到重庆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帝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当时只有特务这一部门,还没有得到主子的垂青,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于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单位得不到主子们的重视,也认为很不光采。当他向蒋介石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蒋介石也表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1940年前后开始,戴笠便一再示意当时军统局美国站站长(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

駐美大使館助理武官)肖勃，希望他在美國方面進行聯繫，找有關的特務部門去接洽，雖經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努力，也沒有引起過美帝方面的重視。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前幾個月，由於軍統局電訊處擔任日本密碼的技術研究室從日軍空軍的調動和種種部署中，偵譯了解到日本空軍有準備在太平洋地區進行活動的企圖。戴笠認為這是討好美帝的最好機會，經過蔣介石的批准之後，便把這一情況通知肖勃。由肖勃轉告駐美武官郭德權，並分別告知美帝國防部有關人員，叫他們注意日空軍的活動。據說當時美帝國防部一些負責的將軍們聽到這一消息，不但捧腹大笑，不相信有這回事，還認為是國民黨政府有意在挑撥美日關係。以後軍統不斷地得到了這方面的情報，連續告知肖勃轉告郭德權以後，他們都不好意思再去正式通知美帝國防部，而只和與他們有些私人關係的個別美軍軍官談談，同樣也只是引起他們笑笑。等到12月8日日空軍偷襲珍珠港成功，美帝在太平洋的艦隊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之後，美國的許多將領才想到幾個月前郭德權告訴他們的情況，不是凭空捏造出來的東西，這才去找他，問這一消息的來源，才知道是軍統局偵譯到的。他們一方面與肖勃開始進行聯繫，同時也叫駐重慶大使館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軍統直接去接洽，以便在對日作戰中能夠通過軍統這一組織從事他們所需要蒐集的情報活動。

迪帕斯和戴笠第一次見面時，對戴所領導的工作大為稱贊了一番。戴感到莫大的榮幸，除了電告肖勃應抓住時機加緊在美國活動外，並在曾家岩住宅中設盛宴招待迪帕斯，邀請軍令部二廳廳長楊宣誠、副廳長鄭介民，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以及他的好友何世孔、伍仁楨等作陪，盡力向迪帕斯夸耀他在抗日戰爭中的“功

續”，和对美帝的崇敬心情。

肖勃在美国活动的結果，得到了美帝主持海外情报工作的海軍參謀部情报署的同意，派遣曾任远东舰队舰长的梅乐斯(MILES)中校，于1942年春間由肖勃陪同到了重庆，当面和戴笠进行了談判，参观了軍統局一些单位。梅乐斯回国向海軍情报署报告了与戴笠談判情况后，极力主張和軍統先进行电訊偵譯方面的技术合作，企图在合作过程中把軍統局电訊处技术研究所所掌握到的有关对日空軍密碼偵譯經驗剽窃过去，自己能够普遍掌握到这方面的技术。美海軍部批准了这一計劃后，于1942年夏秋間，梅乐斯便率领了十多名美国方面专搞电訊工作的特务来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軍統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訊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碼翻譯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分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偵譯日空軍一点經驗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在最初合作的阶段中，由于双方各有一套自私的打算，始終是貌合神离，沒有法子合作得起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虽然双方所派遣的人員不断增加，但距双方真正的目的却愈来愈远，中間还几乎一度停頓下来，合作不下去。不过在这时，美帝特务部門却漸漸了解到当时戴笠所领导下的軍統組織已遍布蔣管区每一角落，如果通过这一单位在中国进行种种特务活动是一个很不易找到的最理想的对象。而戴笠则看到美国人比正在和他进行合作的英国人要慷慨得多，为了满足軍統今后物資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好的靠山。由于双方都看出了对方的可利用之处，所以在进行电訊技术合作方面虽然彼此并不滿意，可是都不愿輕易放弃这一机会，而企图

改变一下合作的方向，扩大合作的范围。

1942年冬，戴笠和梅乐斯在磁器口縲絲厂楊家山戴笠別墅中的一次談話里，提到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問題。当时美帝最缺少的，是日軍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这些地区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資料。軍統方面除了最需要的电訊器材外，更希望能够得到美帝的武器与交通运输工具。經過那次交換意見后，合作便立刻轉入一个新的試驗阶段，而把原来所准备进行的合作項目擱置起来。經双方的主管部門批准之后，美帝的气象工作人員和设备便陸續来到重庆，戴笠所需要的輕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一些。这些武器虽为数不多，我記得第一批运来只不过几百支左輪、曲尺手枪和卡宾枪以及湯姆生机枪，但是来得很快，而且所配的弹药数目也相当多。不象英国人那么拖拖拉拉，不仅数量上一再爭执，而且配属的东西也非常少。因此戴笠对美国人这种“大方”感到极大滿意，在改变合作方向、扩大合作范围的試行期間，戴笠又不断提出請求美方帮助訓練和装备軍統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問題和請求美方供应交通工具、医药設備等問題，也都得到了滿意的答复。原来很简单地組織起来的中美所，由于业务范围一天天扩大，双方人員不断增加，內部机构也逐漸形成。原来梅乐斯和一批美特还只在磁器口縲絲厂楊家山背后钟家山一带办公和住宿，到1943年間便慢慢向东、西、南三面发展开来。

从1943年春間开始，新的合作工作不断地增添，戴笠每有所要求，很快便得了美方滿意的答复，大批美国特务和器材也源源不断地向重庆涌来。从3月初开始，双方便决定把已經試行的各項工作和双方所提出的要求，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而决定正式簽訂一項条约。为了这种条约定一个名称的問題，戴笠曾經一再考虑。他怕

別人將來指責他和帝國主義簽過不平等的美國條約，便力求從名稱上用得妥當些。最後才決定用簽訂“合同”的方式，以表示完全是從平等合作的基礎上來簽訂的。在起草這項合同時，戴經常召集軍統局處長以上和中美所組長以上的大特務開會研究，往往直到深夜才散。第一次合同經過一個多月的醞釀，作過七八次的修改增刪，除了內容方面經常由戴笠口頭上向梅樂斯去試探，先征求他的同意外，還力求在文字技術上要周到仔細。1943年4月間，第一次準備和美方簽訂的合同草稿才擬出來。戴馬上去找宋子文研究。宋認為沒有什麼問題後，戴才去向蔣介石報告。蔣看了也很滿意。這樣才正式通知美方約期正式簽訂合同。從第一次合同签订之後，中美所的籌備工作才結束，而把試行的各項合作工作正式開展起來。

## 二 前後三次簽訂的“合同”概要

第一次簽訂合同的時間約為1943年5月中旬，地點是在重慶磁器口縹絲廠楊家山軍統鄉下辦事處的大禮堂（也是軍統局重慶訓練班的禮堂）。

主持這次合同签订的人：美帝方面為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國生活雜誌老板魯斯，和美國海軍部情報署代表梅樂斯中校；中國方面的主持人，蔣介石原來指派外交部部長宋子文，臨時宋有事沒有來，改由外交部常務次長胡世澤代表，與軍統局副局長戴笠共同主持。

參加這次簽訂合同儀式的人計有：中美所美方參謀長貝樂利、主任秘書史密司和中美所幾個組的美方副組長；中國方面有中美所軍統方面參謀長李崇詩、主任秘書潘共武與軍統所派的幾個組長。另外，戴笠還指定要軍統的“三巨頭”鄭介民、唐縱、毛人鳳，和

第一处处长施志鴻、第二处处长何芝園、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銘、第五处处长沈維翰、第六处处长甄仙舫、第七处处长徐人驥、第八处处长沈醇等均参加。这是因为双方在业务和特务工作上需要紧密配合，他希望中美所与军统能打成一片，所以在中美所与军统的一些重要集会上，两个单位的组长和处长级的人员都要参加。

当天下午，礼堂布置一新，中悬双方国旗。仪式是在宴会前举行的，参加的人员都先坐在摆成马蹄形的餐桌前等候。5点正，戴笠领着鲁斯和胡世泽等在热烈掌声中进入会场，在上首就座后，先由戴笠简单地表达了对鲁斯远道而来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谢意，并介绍在场参加的人和鲁斯见面。他是用点名的方式，把每个参加的人名字叫了一声，站起来后，便补充一句是什么职务，鲁斯微笑点点头便又坐下来。只有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三人和鲁斯握了握手。介绍完毕即由潘其武将合同的中文本宣读一遍，然后由史密司宣读英文本，便由双方主持人在中英文本各两份上签字。接着由鲁斯讲话。他首先谈到，为了早日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和目的。他说美国总统对这项工作寄以很殷切的期望，相信双方在今后一定能忠实地执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一切，能做出出色的惊人成绩。他表示对合同中所列各点感到满意，并主动提出今后双方在合作期间，如果发现没有订入合同的问题而又为工作需要时，美国方面愿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最后他对戴笠和戴所领导的军统局特别赞扬了一番，使参加的这群特务头子个个都很为高兴。

鲁斯讲话后便由胡世泽讲话。他代表蒋介石政府向美方表示最大的谢意和敬意，对美国总统派鲁斯远道而来主持这一合同的

簽訂極感滿意，并盛贊魯斯為美國杰出的人物。胡世澤表示中國方面一定能忠實地履行合約，今後希望在美國不斷幫助下打垮日本帝國主義。戴笠和梅樂斯也在最後表示了一定能很好地履行合約所規定的事項，保證雙方能做到忠誠合作，親密無間，不負兩國元首的期望等等。儀式完畢即舉行宴會。雙方為美蔣特務順利進行合作與互祝兩國領導人健康等不斷干杯。宴會進行到晚上九點左右才停止。魯斯在中美所內住了五天才回國。

第一次合約的內容很多也很繁瑣，我雖然在起草前多次參加過這一合約的研究工作，以後在執行期間又親自履行過合約中一些規定的有關事項，解放後又曾經與當時一些有關的人多次抖擻回憶，但仍只能記到一部分，更由於以後還補充簽訂了兩次，因此對前後秩序也可能有顛倒，現就所知分述如下：

合同一開始就提出這是中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美國海軍參謀部情報署為了早日戰勝雙方共同敵人，願意進行有關對日作戰的情報交換與心戰宣傳以及在敵占領地區進行游擊破壞等工作方面的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術合作所於中國戰時首都重慶。接着便說明中美所系因對日作戰而成立，如對日戰爭取得勝利應即宣告結束，本合約中所商定的事項不論已否執行或正在執行，均應立即中止；但在對日戰爭尚在進行期間，如任何一方不願繼續執行本合約而要求中止此項合作時，除應當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對方外，並應負責保守有關本所一切秘密，另一方有要求賠償因合同中止而所受到的一切損失的權利。

中美所工作人員應按需要由雙方派員共同組成，各個部門正副主管人員由雙方選派，原則上是由軍統派正主管人，美方派副主管人，必要時可另行協商辦理。在選派各部門負責人員時，雙方均

應亦先互相征求對方同意，始行派遣。如在工作期間，一方對另一方工作人員有意見時，得請求更換，雙方均不得借故拖延或拒絕。今後在工作需要時，對組織機構之增減等問題，應由雙方負責人事先進行協商同意，不得由任何一方採取單獨行動。

中美所對外一切行文，由主任副主任出面共同簽署方為有效；對內雙方最高負責人，中國方面為中美所主任，美國方面為美方所派之副主任。主任或副主任因工作關係需要指揮另一方工作人員時，應以主任或副主任共同簽署之命令方能生效。主任或副主任因事離職時，可自行指定專人負責代理，事前並應相互通知，征求對方同意。

雙方工作人員之薪給待遇，均自行負責支付。所有來華工作之美方人員，有關食宿交通運輸等生活方面問題，應由軍統負責協助妥為解決。各項費用凡由軍統先行墊付者，由美方按期歸還。有關中美所辦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軍統派員主辦，所需經費則由雙方共同負擔。

合作的主要業務，是交換關於日本海陸空軍在中國沿海及大陸上的活動部署情況及有關這些方面的材料，雙方均應將所蒐集到的情報全部無保留地提出交換研究，俾有利於對日作戰（實際上却是叫軍統提供這方面情報，名義上雖說交換，而美方卻從來不向軍統提供什麼情報）。

當時美帝特務機關，雖然很重視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與各地人民武裝游擊隊的情況，以及各民主黨派的活動和蘇聯方面的情況，但在合同中卻沒有正式提到，只含糊其詞地說了一句，說在情報交換方面，除上面所談到的對日本的材料外，“其他有關情報”也在交換研究範圍之內。所以從合同全文中找不



出有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字样，而在实际执行时，军统是不断地要向美方提供这些材料来满足它的要求的。当时军统局的新疆省站，便是专门在中苏边境从事蒐集有关苏联的情况向美方提出。对中共和其它所领导的武装部队材料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材料，军统局主管部门更是整套整套地提供。

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总共有五六万人，戴笠请求美帝帮助训练和配发美式武器装备，也得到美方的同意。在第一次合同中便提出先训练和装备五万人，并规定凡经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部队，都得接受中美所的指挥，这些部队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向中美所汇报。合同中关于美方为军统进行训练的情况提得很多，已记不起来，只知道以后除了在各地成立了许多“中美特科技术训练班”外，还在重庆成立了助教人员训练班和气象人员训练班，和在湖南东安成立过医务人员（军医）训练班，以及爆破班等。

合同中还提到为了便于双方海空军对日作战关系，中美所应在中国沿海及后方各重要城市以及所领导的特务武装部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站和无綫电台。关于中美所因工作关系所需要之电讯及气象器材和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物资，均由美方按实际需要数量全部无代价供应，并负责运输。

另外还在合同中谈到，中美所中凡有美国籍工作人员来华后均享有外交人员之待遇。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工作人员，如有失踪、伤亡等情况发生，军统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寻找与负责保护美方人员之安全。

合同最后提到，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凡在本合同签订前有关中美所筹备期间一切措施与本合同商定条文不相抵触者应继续进行，否则应即中止，另行协商解决。合同中还规定，在执行期

同，如双方均感到有必要修改与增补条款，即事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可另行补充签订合同。合同用中英文各缮写两份，中英文本有同等效力。

第二次签订的补充合同，时间为1944年秋，地点为中美所内陈宗院子。美帝方面主持人为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露万，蒋介石集团方面为戴笠。参加的人除中美所组长以上人员外，还有军统局各处处长和各室主任，共有三十余人。

第二次的合同，主要内容是由美帝特务为蒋介石集团培训美式特务人员和向军统提供美国刑具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之镇压。

合同中规定，中美所决定在重庆成立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所需教官由美方选派，技术训练工作全部由美方负责主持，教学器材和实习所需之器材设备等均由美方供给。受训人员由军统选调，所需房屋及训练经费由军统负担。

这次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同意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二十名，送往美国受训一年。除旅费由军统担负外，受训人员在美国一切费用由美方支付，每人一年约一万美元左右。1945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对中美所视察时，又主动地将送美受训大特务的名额增加一倍为四十人。

在这次合同中，还提到增加美方供应中美所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医药设备等问题。如十轮大卡车由原来议定的五百辆增至二千辆，中小吉普车由五十增至二百，并供应全部车辆的维修设备和可供三年使用的各种备件材料。医药器材增至可供一千张病床使用的全套设备和医药。

第三次合同的签订是1945年冬天，这时戴笠和梅乐斯均已赴

东南福泰，根据他们两人商定的几项原则，在重庆中美所内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和军统方面主任秘书潘其武两人主持签订，内容主要是关于结束方面的事务性问题。

根据第一六合同规定，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告结束。有关中美所一切结束工作，均由军统负责主持。所有美方在华工作人员应即返回美国。中美所内美方人员所保存之武器弹药和其他生活日用品等，凡已运来中国者，不问数额多寡，均不计价交与军统接收处理。军统方面所要求增拨之物资及两次合同中规定应由美方供应之物资，除一千张病床所需之全部医药设备器材仍由美方负责供应齐全，改在上海交付外，其他各项物资凡已启运来华者均按已启运之数量供应，未启运者不再供应。双方合作期间，中美所各项资料文件，美方可按需要带走一份外，其余交由军统处理。中美所美方人员离华后，所有美方在华修建之房屋及各项装备与陈设物品，均不计价赠与军统接收，美方不再保留所有权与使用权。

### 三 組織、人選及活動情況

中美所設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美特务子梅乐斯充任。对内对外一切工作，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负责。

双方各設參謀長一人，軍統方面为李崇詩，美方为贝乐利。

双方各設主任秘書一人，軍統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司。

內勤部門設下列各組：

军事作战組（又叫參謀組或簡称軍事組）：組長尚望，号渭父，系軍統所領導的軍委會別動軍司令部參謀長。副組長易焯，系別動軍參謀處長。兩人均系兼職，實際上由易焯負責。組下設有高參四

人，均軍統大特務。美方派有一个副組長和若干參謀，姓名均不詳。这个組主要工作名义上是指揮軍統所領導的武裝特務部隊包括各地的行動總隊和爆破總隊，實際上這些武裝特務頭子們并不听从中美所的指揮，而仍由軍統所控制。这个組所擬定的一切作戰計劃，均須先與軍統商妥後才能發出去。雖然這樣，而各地武裝特務頭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們自己的一套直接向軍統請示。但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彈藥與美式裝備，則又不得不將每次對日作戰的傷亡、成績和消耗向中美所匯報請求補充。這些數字大多是經過一再擴大甚至捏造出來的東西，往往與他們報給軍統的有出入。而美方却非常重視這些統計數字，并經常對這些單位進行武器彈藥的補充，他們根據這些虛報的“成績”便可向美國政府去要東西。

情報組：組長為陸遂初，美方副組長不詳。

这个組是中美所的重點工作組，主要是將軍統向美方提供的各項情報由它分類編委后送與美方，同時把美方需要深入了解的有關問題轉交給軍統作補充或復查。最初一段期間，軍統向美方提供的情報在數量和質量上均不能滿足美特的要求，梅樂斯一再以書面備忘錄或口頭向戴笠提出要求改進。以後由于軍統與汪奸合流，大批軍統特務安置到上海南京及東南各地，到處設有電台，對日軍在華情況蒐集較多，這些材料都是美國特務機關最感缺少的東西，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相當高，因此很引起美方的重視，并且弄得美國特務機關內部由眼紅而發生內鬩。美國陸軍參謀部戰略情報局便要求派員參加中美所工作，并要梅樂斯向駐華美軍總部及大使館提供情報。據說梅樂斯因不答應还被杜諾万扣留在美大使館一天，弄得梅幾乎發神經病，曾回美國休養了幾個月。以後美國陸軍與聯邦調查局的特務也于1944年間參加了這個組的工作。

这个重点组的工作几年来是不断地在发展和加强的。1943年以前只有美蒋特务二十多人，到了1944年便增加到四十多人。原来完全依靠军统局供给的一些情报，也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1944年后也增加了在东南地区的几个情报站，直接蒐集东南沿海地区的情报。由于业务不断扩大，并且美方特别着重于东南地区的工作，1944年夏，军统方面又增加一个副组长王一心。这人原来在军统局本部内专门担任对上海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多年，对东南一带情况熟悉，所以加派他去担任这个职务。

心理作战组：过去军统一向不大着重搞宣传造謠等工作，自与美帝特务合流后，也仿照美国特务机关在中美所内设立了心理作战组。这个组先后由谢力公、吴利君担任组长。谢为托派叛徒，曾任陈独秀的秘书，以出卖陈而投身军统。中美所于1943年夏同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这个组。戴笠在介绍谢力公与梅乐斯见面时，曾提到谢的历史情况，梅乐斯很高兴，认为这种人担任心战工作是非常适宜的。

这个组的成员有二十多人。美帝特务由征集的兵员中，特别挑选了一批适合中美所工作的人前来工作。当时派到这个组的，有过去在美国很享声誉的漫画家两人（姓名已记不清楚）。我记得我去该组找谢力公时，谢曾特别为我介绍过，说这两人在美国报刊杂志上画一张漫画就是几十块美元。应征入伍后，为了发挥其所长，便派在中美所来担任对敌宣传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专在美国搞广播工作和几个搞新闻工作的人，也都分配在这个组。当时戴笠为了不甘落后，也把当时中国有名的漫画家聘为这个组的专员。还有当时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也被聘参加这个组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芑生，更是不断地向这个组提供有关对日本方面的

宣傳材料。

这个組除了經常不斷地向日寇佔領區進行廣播并用飛機空投宣傳品外，1944年又成立了一個流動宣傳大隊，由賀元充大隊長，經常在東南一帶前綫活動。這個大隊配備有十幾輛宣傳車，車上裝有播音設備，專在接近日軍駐地向日本士兵進行宣傳。這個組的工作最緊張活躍的時期，是1945年美軍向日本逐島進攻與向長崎、廣島投原子彈的時候，他們不斷地宣傳美軍在日本本土上作戰的成績，誇大原子彈的威力，去動搖日軍軍心。勝利後，梅樂斯急於想了解這個組的工作在日本軍隊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許多美蔣特務去詢問過一些日本軍人，得到了很令人滿意的答復。因為一些被封鎖的消息不斷傳到了日軍的耳中，他們互相暗中傳佈，據說對前方士氣的影響相當大。在美蔣特務合流期中，軍統得到了美特們的傳授，也學到心理作戰的這一套，戴笠和蔣介石都給以很高的評價。所以到軍統結束而成立保密局時，在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期間，保密局也成立了心戰科，專門搞這些宣傳造謠的活動。

氣象組：這個組完全是由美方提出要成立的。當時雖說是為了雙方海空軍的活動，需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氣象情況，實際上國民黨的海軍已逃進了湘西的山區，空軍的一些殘破飛機也天天在逃警報，而真正急於需要的倒是美方。據說美國曾多次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要求，供給有關中國大陸的氣象材料。當時中國方面實在沒有辦法答復，因為它本身根本沒有重視過這一工作，飛機起飛都要靠無線電臨時和目的地聯絡。特別逃到西南地區後，前過去僅存的一些設備也殘缺不全，形成瘡痍狀況。美帝也很了解這一情況，所以中美所一開始，首先便注意這一部門的工作，大量氣象器材源源不斷地運來。他們只好通過中美所這一組織，在中國大陸上親自動手來

蒐集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組，軍統方面原来由一个姓王的当組长，后来由程浚繼任，实际负责的人是美方的副組长和他們的一些专家。在第一次合同签订前，便已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建立起了气象站和无綫电台。第一次合同签订后，大批的气象工作人员便被培訓出来，几乎凡是与中美所和軍統有关的部队、訓練班、办事处……等外勤单位駐在地区，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1944年底以前，当时蔣管区内都普遍有了这个組的工作单位。据中美所总务組一个美国副組长告诉我，美国对中美所除了装备軍統特务武装花费的武器物资最多外，第二便要算气象方面了。胜利后，这个单位的軍統人員与各地的气象台站全部设备均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民用航空局接收。

行动組：組长周知声，副組长焦金堂。美方副組长不詳。这个組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工作情况和軍事組差不多。因中美所本身并没有外勤行动組織，完全是依靠軍統所领导的大小约八十个左右的行动总队、行动队、行动組和各种名称的破坏队、組等单位进行工作。戴笠把这些单位的“成績”，一方面由軍統局向蔣介石报功請奖，同时也由中美所向美帝去汇报“成績”，請求增补武器炸药等物资。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和不断得到升級，与这个組的工作“成績”也是分不开的。当时軍統一些在敌后和前线工作的行动单位，除了經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經常在上海等地刺杀过一些象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

交通运输組：組长黄荣华，为一侨居美国多年的华侨，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当时中美所运输方面最紧张的

工作，是到昆明去接运由美国海运到印度后再空运到中国的物资。这些物资中占吨位最多的是武器弹药和装备，其次是美帝特务们的生活日用品。1944年后，中美所有十辆卡车二千辆，实际上经常出动的只有一千辆左右。由昆明运出的东西，一部分存放贵阳，以便转运东南地区；一部分存放泸州兰田坝，以便转运西北各地，而大部份则是运到重庆。这个组在昆明设有接运站，在泸州、贵阳、西安、建瓯……等地都设有转运站。当时运往东南地区的武器最多，回时则装货运局从沦陷区购进的物资，所以货运局与中美所的运输业务几乎是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组也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在沒有成立这个组以前，中美所的物资都是由军统局汽车大队代运。从中美所成立起，一直到结束后的一年多，美帝供应的武器、弹药、炸药、刑具、电讯器材……等都还没有运完，最后就地处理了一批。

**经理组：**这个组在1943年以前原为会计组，扩大组权以后改为经理组，先后由毛宗亮、刘君实任组长，周浩良为副组长，组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军统特务，除主管财务会计工作外，以后还兼管物资账目。美方自己有它单独的经理机构。

**医务组：**这个组是1943年以后，中美所扩大组权时才成立的。组长原为张约翰，系军政部军医署长林可胜介绍给戴笠的。但张发现中美所是一个美蒋特务合组的特务机关，便不辞而去，后来由军统医务所所长戴夏民兼任该组组长。这个组主要工作是主管医务行政，专门接受美方供应的医药器材和设备，并计划向美方要求这方面物资。它领导一个由中美所与军统合办的四一医院，院长也是由戴夏民兼任。这个医院专门为两个单位的特务和家属诊治。美方另外还有它自己的诊所和一个设备很好的牙医室。当时美方的这



些診所是不替軍統特務看病的，甚至連替美特們搬運日用品而中暑倒在這些診所前面的搬運工，美特們都是叫人抬到四一醫院去，只有极少数大特務得到梅樂斯或貝樂利的准許，由他們事先通知后才能去看病和檢查。我曾得到他們的准許去檢查過牙齒，那些美國醫生傲慢的神情，使我也不敢再去領教。

總務組：這個組由一開始有中美所便已成立，也是一開始便忙到結束為止，又始終是美方意見最多、最不滿意的一个組。戴笠把軍統局辦總務最有經驗的郭斌派去當組長。這個在香港開過客來門旅館和在軍統局當過總務科長多年的事務工作專家，在任中美所總務組長兩年不到的時間里，被美方提出口頭和書面的意見達五十多次。戴笠只好把另一個兩度任軍統局總務科長的楊蔭謁調去換了郭斌。1943年，中美所擴大組織後，戴還專為办好中美所的總務工作成立了一個管理人員訓練班，把軍統局及所領導的公開單位中最好的事務人員選調了四十多名去受三個月的專門訓練後才派到這個組去工作，希望在生活招待上能滿足美國主子們的要求。他雖然費盡心力去討好巴結，美特們還是不滿。到1945年，又將楊蔭謁撤換而改調美國留學生羅杰去擔任這個職務。要不是抗戰勝利中美所結束，還不知要更換多少人。

這個組的主要工作是為美特們生活方面服務，從洗衣服、吃飯到修房子，幾乎無一不和美特們直接打交道。由於抗戰期間的物資供應困難，美特們總認為是由他們自己出錢而交給中國人代辦一下辦不好，要想買的東西不能馬上買來，吃的東西不合胃口，都要大發脾氣。當時雖然專為美特們蓋了很好的飯廳，在重慶幾處大餐館搜羅了二十多名懂得一點英語的服務員，每天派出几輛專車四處去採購雞肉魚鴨菜蔬水果之類食品，美特們還是天天有意見。

中美所英特最多时有四五百人，除了吃的問題使他們不滿外，更使他們不高兴的是住的房子太少。临时赶修赶建的房子不合他們的生活习惯。戴笠虽曾下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搜购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几乎到了罗掘俱穷的程度，还是不能滿足需要。在中美所范围内和附近一些較好的房屋，只要美特們看中了便立刻騰出来，連軍統局一所白公館監獄，美帝认为很好，也要去作了宿舍。戴笠只好在法滓洞另外建立一所新的監獄，把白公館改成第三招待所。

这个組除了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外，还負責保管武器彈藥和物資。不过每一粒子彈每一寸電話綫的处理，都不是由組长可以作主，而必須通过美方的副組长或英方的管理人員批准，才能从仓库中发出来。

中美所内部組織除了这些主管业务和事务工作的九大組以外，还設有一个总办公室，由主任秘书潘其武兼主任。这个总办公室下面又有几个組。联络組：这个組在中美所没有扩大以前是直属主任副主任領導的。1943年以后成立总办公室才划归总办公室領導。組长刘鎮芳，是戴笠和梅乐斯的翻譯，也是他們两人中的桥梁。他了解到戴、梅的意图，便先向双方面示意，所以在商談問題时，很少弄成僵局，因此戴、梅都器重他，而成为中美所中最走紅的人物。这个組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口头上的翻譯与双方人員的联络。在有美方人員参加工作的单位中，都派有若干联络员（也叫翻譯官）。这些联络员大都是軍統所举办的外事、外語人員訓練班毕业的學生，与刘鎮芳都是同学，其中得到戴梅两人信任的有潘景翔、周关德、潘孚頌等人。每遇到刘鎮芳有事不在中美所时，只有这几个人才有資格临时充当一下戴梅两人之间的翻譯。

总办公室下面还設有文书、人事、譯电等三个組，其中除人事組有美方人員參加工作专主管美方的人事行政业务和办理卡片登記等外，譯电与文书組沒有美方人員參加。因为这两項工作，他們自己还另有組織，情况便不了解。

总办公室設有秘書两人，一个是李逸云，一个是温万生，均为潘其武的亲信，又是潘的福建同乡。总办公室在职权上不能直接領導九大組的工作，但由于軍統方面是主任秘書潘其武負責，潘兼总办公室主任，所以对其他各单位总共成的工作都无形中归总办公室来主持了。

1944年夏天，由于业务一天天扩大，原来一些文件翻譯的工作是由聯絡組与派在各单位的聯絡官担任，經常忙不过来，积压的东西很多，又成立了一个总翻譯室，由刘鏡芳兼主任，专負責文字方面的翻譯。当时軍統自己培养的翻譯人員已趕不上需要，特别是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訓練班先后在各地成立后，大量需要翻譯人員去担任美方教官講課时的翻譯和聯絡工作，戴笠便向軍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了一百名当时由外事局在中央訓練团主办的譯員訓練班的學員。这些受訓的學員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各大学学生，被征入伍，准备予以短期訓練后派往有美軍顧問的各部队各軍事机关去担任翻譯的。这一百人派到中美所后，戴笠又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訓練班。

这个班当时叫做軍統重庆訓練班譯訓隊，費了一个月時間，向學員們讲述中美所的业务和統一翻譯名称等工作。因他們在中訓團譯訓班只受了一些軍事术语方面的統一翻譯課程，而中美所是美蔣特务合組的机构，对一些特务工作方面的常識和术语弄不清楚。同时也要他們全部先办好参加軍統特务組織的各项手續以

后，才能正式叫他們去工作。这一百人中有几个女学员，她們在总翻譯室工作不久，便为美特們发现。他們对这几个能操英語的女性感到很大兴趣，便在她們上下班时几十人列成队伍在办公室通往宿舍的路上等候，找她們纠缠，后来給梅乐斯和戴笠知道了这一情况，便馬上把她們調走，并規定中美所內的职工不准用女性。怕这些美特們因爭风吃醋发生問題。

这批学员一下子派在中美所后，又感到人太多了点，戴笠便把其中一些学化学工作的派到軍統所办的貴州遵义植物油煉代汽油的工厂去工作。到1944年底，有些人不安心于这个特务机关的工作，戴笠怕出問題，便送了一批回外事局，到1945年底中美所工作刚一結束，便全部把他們遣送回去。

中美所里还有一个工程处，1944年成立，由沈觀康任处长。当时由于房屋缺少，戴笠自作聪明临时趕建的一些房屋因設計和工程质量不断发生問題，梅乐斯一再向戴笠提出书面备忘录，叫他注意美方人員安全，这样才成立这个处，专门負責房屋修建工程。在此以前，所有中美所房屋的修建一向是由戴自己設計，由軍統局經絲厂办事处工程股股长侯慎祥負責雇工兴建。1943年以后因大批美帝人員不断涌来，戴本人工作也很忙，往往只随便指手划脚地說上几句，侯便完全照他所指示的去办，結果不断发生房屋倒塌，石堡坎下陷等情况。到1944年又因要成立重庆中美特种警察人員訓練班，戴想在美国人面前显示他的力量，要盖一所比重庆所有的大礼堂都要漂亮的房子。这样才決定不再由他亲自設計，而只提出要求——能容纳四千人，尽可能做到美观和适用。由于这些原因，便成立了这个处。

工程处成立后，戴还決定以后中美所的房屋兴建工程，不再由

办事处工程股负责，全部要交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包。这个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是戴在云南新结识的朋友，戴特地邀请到重庆来帮同兴建中美所的房屋。通过陆的介绍，当时重庆第一流的华泰工程司派专家来这个处担任设计与监工工作。从1944年春间开始，中美所的范围随着戴笠和梅乐斯的需要，便一天天扩大起来，到处开山挖石，废田填沟，数以千计的泥木石工彻夜工作着。在炎热的夏天，每隔几天便有一两个工人因赶工中暑或过度疲劳而死去，至于因赶工而发生工伤事故折手断脚者则天天都有，但是戴笠和梅乐斯还是嫌工程进度太慢。

中美所将要兴建房屋，附近民房被强迫拆除。他们对一些指定要拆除的民房，一看中了便叫住在里面的人马上搬出去，立刻将旧房屋拆掉，而只给予少量的迁移费。一边付钱便一面叫搬家，从不问这些居民在一天之内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为了强迫迁居也不断发生人命事件。我记得在强迫五灵观近一百户居民迁移时，有的迟迁一步，除被特务们痛打之后将行李丢出来外，稍露不满，立刻被抓走关起来。有一个妇女刚生小孩，没有马上搬走，被特务们将房屋拆去。当夜狂风暴雨，第二天这个产妇和刚生下的婴儿便都死去。戴笠听到后说：“这是一个好榜样，以后看有谁还敢赖在房子里。”以后在拆步云桥一带几十间民房时，也有些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几辈子的老家而被特务推倒地上，当场也发生过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中风死去，结果也只给了一点埋葬费了事。

当时在中美所附近一带的居民无不天天惶恐，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看中自己的房子，弄得马上无安身之处。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戴笠到附近去看看准备兴建军械接收美方炸药的仓库，希望离得远一点，已走出了中美所的范围。回来经过一处农民住的茅棚时，

戴笠看到这家人养了一对小鹅很好玩，便走过去看看。这时这一家人都惊慌异常，因为一看那付前呼后拥的气派，加之天天在担心要房子，所以当戴刚一走近时，全家大小六七人便一齐向他跪了下去，连说我们家里人多，找不到房子，请开开恩准许住下去。当时弄得戴莫名其妙，便笑着向他们解释不是来要房子，是看看这对小鹅，这时他们才敢爬起来。当戴离开时，我因走慢一步，便亲眼看到这家一位老人马上把这对小鹅摔死，或许是因为恨它几乎惹出大祸来。当时附近人民对这些特务的恐惧和仇恨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几年间中美所的范围由于不断扩大，从北起綵絲厂向南延伸，包括了小歌乐山的茶店子直到小歌乐山山顶的黄角树。这里原来有一条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的捷徑，也被封鎖，而叫来往的劳动人民繞道走楊公桥。中美所的西边则延伸到渣滓洞煤窑紧接兵工厂。为了占用这个煤窑，也把这个小煤窑的老板活活逼死才占过来。东面一直到兵工署彈道研究所。圍繞整个范围有近三十多里。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房屋、田地、山林，全被强征，誤入这个范围的人，輕則遭到打罵，重則囚禁杀害。有三个中学生因假日游山而誤入禁地，被指为共产党所指派的偵察人員，竟囚禁在重庆和息烽集中营十多年，到解放前还有两个被杀害在白公館。

工程处成立一年多，主要兴建的工程是矗立在钟家山东面步云桥南边的一座特警班的大礼堂和特警班的房屋与大操場。1945年春间，又替梅乐斯在钟家山南边另一个小山头上新建了一所华丽的小住宅(梅原住在戴笠在钟家山的一座別墅中)。正在动工的时候，戴有天带我去看工程进度，很得意地告诉我：“这座房子背山面水，看来风景很好，其实大門正对着一条大山沟，住在里面的主人

是要破大財的。”当时他非常希望他的主子住进去后破大財，好更多地供給軍統的武器和物資。这座房子，他为了討好梅乐斯，所以取名为“梅园”，并准备于建成后在房子四周种上几百株梅花。1945年秋天，这所房子落成时已接近胜利，刚把屋內家俱陈設等弄好，梅乐斯和戴笠一道去东南，連一天也沒有住过。那座比当时国民政府大礼堂还新式还寬敞的特警班礼堂，于1944年圣诞节前赶建完成，除了举行几次盛大集会和宴会外，也因抗战胜利沒有再用到它。

汽車总队：汽車总队于1943年冬成立，总队长一职久久不能决定，一直由軍統汽車大队大队长張秉午以副总队长名义負責。到1945年春，才調了当时自(貢)內(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許建业来担任总队长。总队部設有业务課，由軍統汽車大队副大队长王济發課长。还有一个保养課和一个总务課，保养課由軍統汽車修理所所长曾揚明兼課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修理所。重庆有两个大队，一千多辆十輪卡車。貴阳有一个大队，分駐昆明、衡山。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都駐有一个中队。这个总队成立时，最初有一部分美国司机，以后全部是西南運輸处处长宋子良撥給的华侨司机。这些人多数是从南洋一带回祖國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共有一千多人，胜利后便陸續回去。直到中美所結束一年多这个总队才結束。

中美所的外勤单位原来只有一个东南办事处，1943年成立子福建建阳。当时中美所的重点工作是在东南方面，所以由軍統方面的參謀长李崇詩兼主任，长駐东南指揮。这个办事处組織很龐大，設有軍事、情報、訓練人事、总务四个科，和秘书、會計、督察三个室。当时中美所与軍統在东南的工作，几乎都由这个办事处在領導。1944年中美所在东南設立的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揮所，也

都由这个处直接指挥。这四个情报站的工作，以上海站最受美帝重视。站长庄心田，经常通过一些汉奸到日本去的关系，而能搜集到日本本国的情况。特别是有些汉奸亲自看到日寇海军舰只，在与美帝海军发生战斗后受伤拖回来修理的种种表面现象，更为美帝海军方面所急于要了解的 material，因此这个站的工作经常受到奖励。另外还有閩侯站(站长王调勋)、定海站(站长张元)、漳州站(站长王德元)，也都是负责搜集日寇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主要是海军)和对沿海的军事部署情况。据梅乐斯说，这是美国海军准备帮助中国打日本，准备从海上向日寇进攻后，再派遣部队登陆，前后夹击日军。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总希望他们早点开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战场，特别是在1944年冬，日寇先头部队已越过广西而进入贵州境内马厂坪时，重庆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何应钦等都急于希望美帝海军能在中国沿海发动攻势以挽救重庆的危机。结果却是一直等到胜利之后，为了帮助国民党布置打共产党的内战，这些美国海军才从容地登上了中国大陆。

由东南办事处领导的前进指挥所，是由毛森任指挥官，设在浙江分水县印渚埠。这个单位虽然是列入中美所编制内，而实际上却是军统局的一个前哨据点。它主要是指挥属于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特务武装，到伪军驻防的地区去活动一下，便分别向军统和中美所报战功。这个指挥所因此比较接近日寇占领地区，美帝特务们从来也没有敢去过一次。毛森利用这些经过美帝武装起来的特务部队，在附近设立关卡，强征捐税，而成为当地的太上皇。

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的东南运输站，和中美所有联系，也由东南办事处就近领导。运输站站长姜守全，遇



事得向李崇詩請示。由于李是以中美所中方參謀長而兼東南辦事處主任關係，連中美所設在東南的雄村、玉壺、漳州、建甌、港口等地的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也要受李的監督指揮。這個辦事處幾乎把中美所的工作分去了一半。

東南辦事處還在建甌龍寺設有一個龐大的美軍招待所，除了招待來往東南的美特外，每年還要在這里舉行幾次盛大的集會，慰勞在東南地區工作的美特。據說有一次在舉行聖誕節晚會上，幾個喝得酩酊大醉的美特抱着李崇詩的老婆亂來，氣得李崇詩拔出手槍來準備和這幾個美特干一下，後來經旁人勸才弄得不歡而散。

#### 四 中美所的訓練班情況

中美所從成立起到結束止，前後辦過二十多個各式各樣的訓練班。美帝特務在幫助軍統訓練特務和武裝特務部隊方面，花費的人力、物力最大最多，其中以重慶特種警察訓練班規模最完善，設備最多，訓練時間最久也最能說明問題。

重慶特警班的成立時間比其他訓練班要遲一些，一方面是由于在第二次合同中才正式提出，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和器材以及學生的挑選都費了不少時間，所以到1944年秋天才開始訓練。特警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樂斯兼副主任，實際負責行政工作的，第一期為副主任、軍統特務樂干，第二期為劉人奎。主持訓練工作的則為美特總教官懷特(White)，一切大權都是操在總教官室。班里共有美特教官五十多人，所有技術方面的課程全部由美國教官擔任，完全是按照美國訓練特務的方式進行訓練，對軍統過去那一套特務技術課程一概不採用。當時雖然連戴笠也感到不摻入一點合乎

中国情况的特务課目，将来工作起来不方便，因为不是訓練好了去美国工作。但是美方还是不同意，认为軍統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戴笠也不好在这点上再爭执，便完全听他們去安排。

这个班的組織也和軍統其他訓練班一样，設有教務、政訓、总務等三个組。第一期的教務組組長便是后来在解放前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第二期是曾定凱。班里設有大队部，第一期大队长为李汉庭，二期为楊元森，大队下設有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生八百名，二期一千二百名。这些学生的来源都是从軍統局的几个基本特务訓練班，如兰州、息烽、重庆等班中挑选出来的。

这个班的訓練內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課程最为复杂，除了偵察、审訊、指紋、痕迹、罪犯心理、化妆、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車駕駛、爆破等。当时美特最感自豪的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其中有一部最新的“测謊偵察器”，这是专门用来偵察被审訊的人說話是否真实。

我曾經多次去參觀过他們如何使用这部“测謊偵察器”。这部机器很复杂，占了半間房子，全部是电气操纵。受审訊的人坐在那个特制的椅子上，胸部与脉膊上都系上电线。电門打开后，这个人每說一句話的心理状况是否正常，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机器上的仪表便能指示出来。审訊員只要看这些仪表，便能断定受审者所說的話是撒謊，或者是老老实实在招供。美特們把这种机器看成是宝贝。我多次參觀后，当时便感到太不可靠了！这对一个有經驗而沉得住气的人，倒是成了教星，只要在撒謊时情緒不緊張，心脏跳动得很正常，仪表上便出現了不需要怀疑的种种記錄。如果遇上一个初出茅庐或有心臟病的人，那就会变得再說老实话也一輩子弄不

清冤枉。有些人一坐上那个椅子，心情已經緊張万分，不知道是一回什么事，仪表上的指針与自动記錄設備所显示出来的便是忽高忽低零乱异常，这便是表示出他說的不是“老实话”了！

我記得这部机器刚一运来，他們要在戴笠面前显示一下美国的科学进步，便在装置好以后邀請戴笠去參觀，我也跟了去。那几天正巧軍統总务处在中美所范围内的洪炉厂仓库发生了失窃案，看守仓库的人认为临时僱来的几个搬运工人有嫌疑，把他們都扣留起来，但不能解决，誰也不承认偷了东西。我便向戴建議，把这几个人交給他們实验一下，好当场表演給大家看看。戴馬上同意，要我派汽車立刻将这几个人从警卫大队部接出来送到刑事实验室。第一个被拉到椅子上的，以为是要受电刑，馬上喊娘叫爷地大哭起来，問了半个多钟头，操縱这台机器的几个美特忙得滿头大汗，結果只說了一句“这人所供的是不老实”。戴笠看得有点不耐煩便借故走了。我送他到汽車旁边时，他才笑着对我說：“这样麻烦，还不如我們那些不科学的方法有效得多！”我因急于要想弄清这次窃案，便又回到实验室耐心地等他們一个个去实验一下。結果个个都是“不老实、嫌疑重大”，最后都只好繼續扣留下来进行偵察。半个月后，这个仓库失窃案案情完全弄清楚，原来是管理仓库的特务們自己监守自盜，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內鬩，相互檢舉出来，这样才把这几个說老实话而被这部机器断定为不老实、有重大嫌疑的无辜者釋放。从第一次試驗了这部“測謊器”是在撒謊以后，戴笠对它便毫不感到兴趣，不过对美帝的其他几种刑具倒很为称贊。

当时从美国运来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这是用几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組成的。被审讯的人經過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語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說出

的許多話中找出矛盾再去追問。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設備，这比軍統一貫用的手搖電話机改成的电刑具不但方便而且很美观，象小巧的收音机一样，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連精液都要流出来，但还能說話，这便最有利于审讯。这些美制刑具，更大的特点是虽然經過多次用刑，受刑人的神經系統与心脏机能受了重伤而表面却看不出半点伤痕来。由于这些原因，以后特警班的学生除了几个人专门学习过对“測謊偵察器”的使用、操纵和檢修等技术外，大多是学习另外一些美式审讯方法。美特还送給特警班学生实习用的許多美制手鐐脚鐐。戴笠看到以后很高兴，认为比軍統原来使用的輕便牢靠，携带方便。美特們听到后，便立即贈送五千副給軍統。以后这种美式手脚鐐，除了軍統自己留了一批外，大都分配給各地的公开特务机关。解放前中美所大屠杀中，許多被乱枪打死的烈士們手上和脚上都还带着这些东西。

当时特警班实习用的警犬有一百多条，也全部是由美国經海空陸等运输而到重庆的。戴笠原来认为这些活教材可以由軍統警犬室来繁殖，免得占去运输吨位，好多运其他物资，但美国教官不同意。他們去看过軍統的警犬后，連戴笠所最称赞的那条叫小琳的第一号警犬，都认为品种不純，不够条件，便决定全部由美国运来。只有保警系用来訓練騎警的一些馬匹，从美国运来太不方便，才派人从新疆去采购了一批，但是美特也感到不合条件而是勉强使用。他們认为用最好的馬队組成的騎警，对驅散示威的羣众比之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救火車的水龙向羣众喷射的效果要高明得多。戴笠也很重視这一項新办法，保警系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便是經常练

习騎在高头大馬上冲入人羣中揮动皮鞭警棍去痛毆羣众头部的种种技术。

特警班第一期的学生受訓一年剛剛滿期，便赶上抗战胜利，戴笠立刻把他們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并对那些专心致意負責主持訓練的美国教官，叫每人給准备了一份厚礼，以答謝他們的辛勞。第二期因中美所結束，美国教官都回去了，但訓練方法却仍保留了原来的方式，把第一期学生中向美特学习得最好的留下当助教。不过由于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受到美国教官的亲自傳授，在毕业后分派工作时便不象第一期那样到处受欢迎了。

中美所成立得最早的訓練班，是气象工作人員訓練班。这是由于美帝海空军急于要掌握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在第一次合同未簽訂前便于1942年冬間成立。关于这个班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先后办过七、八期，是專門訓練有关气象測量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每期有学生三十到五十人不等。学生大都是在軍統無線电訓練班中挑选的，毕业后都是分发在各地的气象部門工作。

另一个較早的訓練班則成立于1943年春間，叫“助教工作人員訓練班”。这个訓練班是准备为各地的中美特种技术班培养出一批担任美特教官的助手，全部是由美特們自己負責。这个班由梅乐斯兼班主任，所以学生們自己便把它叫作“梅乐斯訓練班”，借以显示出他們是完全由美国特务培訓出来而有别于軍統局的其他訓練班。这个班只办了一期，学生五十余人，是由軍統其他特訓班毕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毕业时由梅乐斯贈送了鑲有“梅乐斯贈”的短劍一柄。学生大都是分在一些中美班去当助教。

中美所办得最多的是“中美特种技术訓練班”。这些班都是由

戴笠兼主任，軍統派副主任，美帝方面只派總教官和教官。每個班的組織都相同，主任、副主任下設美國總教官室、教育長，以及教務、政訓、總務三個組。學生係由軍統所領導的武裝特務部隊里調來，受訓完畢由美方負責按實際受訓人數全部配發美國武器和裝備。所發武器都是卡賓槍、湯姆生手槍或U. D 手槍，以及少數火箭炮與曲尺及左輪手槍。訓練的內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並傳授爆破術、偵察術、游擊戰術以及配合美軍登陸等戰術。這些都是由美國教官負責，只有政治訓練才由軍統特務負責。受訓期間大都是三個月左右一期。在人多的地方是採用一期未完二期便又同時舉行的辦法，一般是一期接一期地訓練下去。從1943年到1945年，這些班共訓練和裝備了武裝特務五萬多人，在解放戰爭期間都改編成為交通警察總隊。

這些班是按成立先後次序排列，但通常卻是以班的所在地來取名的。最先成立的訓練班，是在安徽軍統所領導的忠義救國軍所在地附近歙縣的雄村，所以第一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一般人又稱為雄村訓練班。這個班的副主任為郭履洲，教育長余萬選，教務組長吳未生，總務組長張東生，政訓組長不詳。班里有美特教官三十多名。參加受訓的部隊都是忠義救國軍的各個縱隊的成員。這個班訓練的時間最長，一直到抗戰勝利才結束，訓練出來的人也最多，共有八千名左右。1945年秋，戴笠曾陪同梅樂斯前往觀察，對這個班極表滿意。這個班在第一期舉行開學典禮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也親自前往講話。抗戰勝利後搶先進入上海的特務部隊，便是由這個訓練班所訓練出來的，當時軍統稱之為裝備最精良、戰鬥力最強的基礎部隊。

第二中美特種技術訓練班於1943年秋成立於湖南南岳，1944

年因湘北日軍進攻，國民黨軍節節敗退，這個班便一下遷移到湘西洪江，但一般人仍稱之為南岳訓練班而不稱洪江班。副主任為陶一珊，教育長郭宗堯，政訓組長蘇鼎光，總務組長葉淪淵，教務組長不詳。這個班當時訓練的部隊主要是軍委會別動軍第六縱隊何際元部以及軍統在湖南招收的土匪陳士虎的部隊。陶一珊在訓練陳士虎部隊以後，看到這部份土匪為數不少，自己便想吃下去，曾和戴笠鬧得不可開交。兩人表面上雖仍稱兄道弟，暗地裏各顯神通，先是相互向戴笠去控告，戴雙方敷衍。最後演變到陳士虎準備派人暗殺陶一珊，陶聞訊立即趕赴重慶檢舉陳在湖南的種種不法行為，說陳野心太大，將來得到美式裝備後又準備去作山大王。陳士虎在其部隊受訓時，曾向美特教官們行賄，裝備的武器不但比何際元部要好，而且得到的彈藥也多。戴笠聽信了陶的話，怕陳士虎一旦變卦，給他丟面子，便同意陶的建議將陳士虎秘密殺害，將其部隊改編。

第三中美班於1943年成立於河南臨汝縣風穴寺，1944年因戰事關係遷往西安附近牛東，一般稱為牛東訓練班。副主任先後由文強、楊蔚兩人擔任過，教育長由金樹云、張樹勛先後擔任過，教務組長為常惠卿，政訓組長劉克敏，總務組長黃翠柏。訓練和裝備的部隊為軍委會別動軍廖宗澤、岳燭遠、楊蔚等幾個縱隊。1944年，戴笠和梅樂斯一道去視察過這個班。當時這個班有美特教官四十名左右。戴笠和梅樂斯都很重視這個班，因為它是設在國民黨反共的重要戰略地區，所以決定要把它成為西北方面訓練反共的特務武裝部隊基地。

第四中美班設在綏遠陝壩，一般稱為陝壩訓練班。副主任高榮，教育長黃康永，其他各組負責人未詳。這個班成立不久，高榮便與美特總教官鬧意見，戴笠一再責備高榮要他聽從美方意見，高榮

面上接受而暗中仍自己搞一套，最后裁将高撤职。这个班没有训练几期便结束。

第五中美班设在贵州息烽军统息烽特训所旧址，副主任先后由邓匡元、何峨芳担任，系训练别动军徐光英纵队。戴笠和梅乐斯也去这个班视察过。

第六中美班设在江西修水县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副主任唐新，专训训练别动军杨遇春、盛瑜等纵队，和一些军统局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每期开学，王陵基均前往讲话。这个班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结束。日寇投降时，王陵基率部进驻武汉市区时，唐新也跟着带了他的行动总队和三十多名美特教官一同飞往武汉。当时驻在武汉的日军发现唐部有美国军官，拒绝他们进入市区，这些美特教官才悻悻返回重庆。

第七中美班设在福建漳州，副主任先后有雷镇中、陈达元。其他情况不詳。

第八中美班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副主任赵世瑞，系训练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和军统的行动总队等。其他情况不詳。

第九中美班设在福建建甌，只知道副主任为林超。其他不了解。

第十中美班设在安徽临泉。只有这个班的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生，政训组长钱孟起等，则仍为军统人员。主要是训练汤恩伯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所领导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的军统行动总队。这个班是由于汤向戴笠提议而成立的，汤和戴感情一向很好，戴为了尊重汤，所以自己不兼主任；但成立不久便因抗战胜利而特束，没有办几期。

除以上十个专门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外，还在浙江淳安港口成立过中美爆破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毛森。这个班也是由美帝派遣专门教官和供应训练器材，带同训练。

另外还在湖南东安办过两期中美医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傅秉。这个班是美特专为这些武装特务部队训练军医人员的。

抗战胜利后，按照第一次合同的规定，中美所应即结束。但是戴笠为了要设法保留一批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分子，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所名义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愿意留下一批美国教官负责主持训练外，并答应供应两个班所需要的各种器材，俾使这批南北两地的汉奸特务镀一镀金变成美蒋特务。戴笠在接收了上海江湾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批房屋后，还感到规模不够大，又加工扩建。当时因上海方面修建房屋工程太大，没有等到完工，戴笠便已死去，只决定了由赵志焘为副主任，正在筹备中即行停止。北平特警班先后由楼兆元、乔家才担任副主任，已招收学生三百余人，刚准备训练，也因戴死去而匆匆结束。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怕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顾虑很多，这两个训练汉奸特务的中美特警班才没有继续举办下去。

## 五 美帝特务的活动情况

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帝特务，除了担任中美所的公开职务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种任务，最明显的是他们利用中美所这个基地来发展在亚洲的情报活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特务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们直接去进行，有的则利用军统的关系去活动。

我记得最先与中美所美特发生关系的，是英国在缅甸、印度活

动的英国特务組織。这一关系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偶然听到該所担任事务工作的特务們告訴我，說有三个远道来的英国客人在該所住了几天便走了。我便去問戴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我我說英国人走了以后他才知道，因为美方事前沒有告诉他。为了这件事，戴笠有点不痛快，认为美方不应该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活动的的一个法国特务要來中美所与美方联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听了很高兴。这个法国特务的姓名我已記不得，只知道他的妻子叫梅丽亚，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儿，戴笠为了招待这位越南公主和駙馬，特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样高的公主。可是戴笠和这位法国特务只在宴会上见过面，攀談了一番，到美法两方特务正式商討問題时，却又沒有被邀請去参加。他虽很难过，但表面上又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他当天借故发脾气罵人的情况，便可看出他的心情。以后泰国代表团团长乃沙愿來到重庆，先是与軍統局联系，由戴笠在黄家垭口找了一栋小洋房給他們六七个人居住。戴笠多次带我去这里布置，对这几个人招待得很周到。后来美方知道这一情况，又很快地把这些人拉了过去，表面上是叫他們与中美所联系，实际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这些人。泰国代表团与美国特务組織勾上后，便感到比和軍統往来更为有利，便投入美帝怀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满，可是自己还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受下去。

美国特务們利用中美特务合作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最初还是秘密地进行，后来便逐渐变成公开的了。例如美国司机去东南和西北地区运送武器、物资时，据一些同去的軍統局司机告訴我，这些美国佬不但非常注意公路交通情况，而且每次休

息下来，便留心打听各地的民情风俗、山川河流以及出产物品等等。派在各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美国教官，更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每天由他们自己带去的电台直接向重庆美方发报。有一件最具体的活动，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便是1945年春间，浙江大学教授费汎的失踪事件，美特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寻找，这一情况我最清楚。从这一件事，便可说明美帝特务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汎，于1944年春应复旦大学邀请来到重庆讲学。有天早上，费汎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两人因为都没有进早餐，这个学生便请费汎留在码头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买早点。等这个学生把早点买回后，便再也找不到费汎，到开船时还不見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去报告。等了一天，还不見费汎到学校，复旦大学便把这一情况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要求设法寻找。卫戍总部的处置办法，便是传讯这个和费汎一同候过船的学生，问去问来也得不出结果。

这时，费汎教授的失踪引起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定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特务秘密抓去了，便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得不到一点消息。事情越闹越大，许多教授们认为个人安全这么没有保障，都人人自危。后来给蒋介石知道了便向戴笠查问这件事。戴回答他军统没有抓这个人。当晚，戴又约集中统局长叶秀峰、宪兵司令张翼到军统局激店办公室开会。这两个单位的特务头子也矢口否认秘密逮捕过费汎。蒋介石便准备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一个大学教授突然无端不见了，除了费汎的家属和亲友别

異常關懷以外，社會上一些進步的輿論也為此而提出了指責，而反動派仍舊不理會。這時便有與費汎先後在美國同過學的大學教授四十人聯名上書美帝駐華的遠東戰區參謀長魏德邁，請求他出面來營救這位留學過美國的教授。這一下果然引起了魏德邁的注意，他曾親自去問過蔣介石。蔣介石雖一面答復沒有抓這個人，但還不放心的再叫戴笠詳查，也無結果，而只把那個同行的學生再嚴刑逼供一次。

當蔣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復而轉告魏德邁之後，魏德邁為了要想樹立美帝在華的威信，便決定把這件事交給梅樂斯來辦。希望通過美帝特務們把費汎找出來。梅樂斯當時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幫助下完成這一任務。戴同意之後，梅樂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個紐約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來去負責這一工作。戴笠便叫我參加協助，并向梅樂斯吹噓說我過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戰前在上海搞特務活動時是以偵探來作掩護的。戴笠在派我時，曾再三叮囑，如果發現了可靠線索一定要先行設法把費汎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蔣介石面前丟臉。戴並叫我不要多出什麼主意，一切看這個美國名探的辦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見面商談時，便問他準備怎樣進行？他主張先去復旦和浙大調查一下再作計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費汎過去的情況再說。

第二天我和他帶了中美所一個翻譯潘景翔由重慶動身去貴州遵義，先去見浙大校長竺可楨先生。我記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煩地在校長辦公室接待了我們，我向他說明了來意之後，他便用英語直接和克拉克交談，答復了這個美國名探提出的有關費汎的問題。我記得竺先生對我們十分肯定地指出，遵義是絕對找不出費汎教授的，說要找這個人，最好是回到重慶向那些專門逮捕和囚禁政治犯

的政府机关去查詢查詢，可能得到圓滿的答复。但是我們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并不滿意，又請他介紹一下費先生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們好去多方了解。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后又問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便要我們去附近的湄潭县費教授一个亲戚处去了解一下。我們并向他要了一张費汎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們便驅車赶往湄潭，見了費汎的一个亲戚和几个与費相識的人，他們也和竺先生所說差不多，說費教授平日思想很进步，对政府常有不滿言論，浙大的学生都很尊敬他等。

从湄潭回来后，我便找了軍統在遵义負責的貴州站遵义組組長陳某查問情况。他告訴我，費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現很激烈，除了軍統对他注意外，中統也很注意他，中統并派有特務監視他这次去重慶可能還有中統特務跟他一路去。他认为軍統如果沒有逮捕他，很有可能是被中統秘密逮捕了。

我們在遵义軍統設在茅草鋪的植物油煉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慶。克拉克认为竺校長告訴他向政府机关查詢的意見很值得重視。當我們向戴笠和梅樂斯一問報告去遵义調查經過情况以及竺校長的意見后，梅樂斯也认为如果能向重慶治安机关去查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沒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給他上書营救費教授的四十名留美教授們。戴笠當時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慶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閱自費汎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檔案，必要时可拿着費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內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問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設在中美所內的軍統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听了立刻把臉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說：“他們想討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們的，要是

提到看我們的看守所時，你就干脆回答他這都是些很久以前關起來的人，沒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會，他又補充一句：“我們沒有抓費汎，你不是不清楚，怎麼會提到這個問題？”

當我們翻遍了稽查處和刑警處等單位的檔案而找不出一點線索時，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又向我們建議可能是由於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處找不到。克拉克一聽也很以為然，便和我到碼頭上調查，後來又到長江下游唐家沱一處專門打撈屍體的地方去查詢，甚至把最近所撈到的無人認領的屍體十多具一起挖出來對証一下。當時天氣很熱，我們在唐家沱附近的墳地里，撬了兩天，仔細查對了那十多具腐爛得已經發臭的屍體，沒有一具可以勉強聯系得上是費汎，才失望而歸。

魏德邊聽說沒有一點結果，很不高興，還要梅樂斯繼續設法偵查。他認為不管是哪一個單位抓去了，只要弄確實以後，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來。正在這個時候，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突然接到一個署名浙江大學學生××的一封信，說他親自見到失蹤的費汎教授在巫山縣過渡，費汎身穿和尚裝束，經他認出後費汎囑他不可對人聲張，因他看破了紅塵，決心出家，要這個學生一定要守秘密。衛戍總部正急著沒有辦法好交代，因為一個大學教授居然丟了找不出來，又驚動了美國主子來出面查詢，實在沒法可辭其咎，得到這封信後，便應夜由稽查處派人去巫山尋找。衛戍總部去的人還沒有回來，梅樂斯也得到這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我陪着克拉克趕赴巫山縣。巫山縣政府一聽洋大人要找什麼和尚，便準備下令各鄉鎮將巫山縣各寺廟的和尚全部押到縣里來由我們當面查對。我和克拉克都不贊成這個打草驚蛇的辦法，決定親自到各寺廟去查訪。結果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我們遍歷巫山十二峰，尋訪了幾十

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象费巩的和尚。我们在平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没宗过，才扫兴而回。

最后，总算由于抗日战争得到胜利，消息传来，美国人纷纷作回国的打算，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我也没有听到费巩的下落，这一件大学教授失踪案，始终成了一个谜。

在这里，最后还要谈一点中美所美特们的胡作非为。当时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为经常到处乱索，时常被人民包围起来喊打，往往弄得狼狈逃回。他们进到中美所范围才敢大搖大摆地走，因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无辜受害。这些美特们后来发现美国的许多空军背上都有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一张护身符，上面有十二个很大的中国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他们从这些背上有字的美军口中，知道这张护身符的好处，也希望弄到一张。戴笠听到翻译的报告后，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后来认为中美所是一个特种机关，没有用这一办法，而改用了一种有中美两国标志的臂章，另外还定制了一批浅蓝色的証章，上面有SACO白色字母，给他们佩带。重庆当时的警察和公开特务机关工作的军统份子，看到佩带这种証章和臂章的美军，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们有不法行为都得让他们几分而好好地保护一下。因此他们便越来越有所恃而无恐了。

在抗战快要结束前，美特们便是忙着做生意。有些在美国经营木材、纸张、杂货等生意的特务，纷纷找人签合同，希望在中国找人推销货物。一些原来在中国当牧师、神甫的中国通，不少也在抗战时调到中美所工作，胜利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了。其中有一个在川西一带活动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后因从事间谍活动被

捕，直到1956年才释放回国，他当时也曾在中美所担任过工作。

## 六 梅乐斯的罪恶活动

以协助中国抗日为名而来到中国的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对他的仇恨的。他在中国的几年当中，不但尽心竭力地帮助军统培养大批美式特务和选送军统大特务赴美国学习，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镇压，并供应大量各种杀人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数以万计的武装特务部队，企图加强反动派阻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以后所破获的许多潜伏特务组织，都与梅乐斯过去在华的罪恶活动有密切关系。他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时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倍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笠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那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作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据我所了解，戴笠曾经希望在广西柳州或桂林成立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梅乐斯认为没有必要，戴笠只好依他的而把广西的特务部



队送到贵州息烽去训练。还有，当时戴笠希冀中美所的武器多集中到重庆，梅乐斯却要多配给到东南沿海地区，以便接应美军在东南登陆。梅一定要在贵阳成立大武器仓库，这样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分置到贵州后可以更快地运往西南。又如，戴笠一直不爱照相，梅乐斯也叫他改变过来，任意由美特们给他拍照。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想永久借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异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恿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便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这么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贴耳了。

梅乐斯不但对戴笠肯下功夫，即对派在中美所工作的大特务和军统的处长级的特务也是尽力表现出一付主人的姿态。不少的大特务都得过他赏赐的手表、衣服之类的东西，一般都能得到些香烟、巧克力糖之类。个别的人还得到他赠送的手枪、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我因在事务工作上和他常常有所接触，他还送过我一部吉普车引擎，自己可以装配成一辆汽车。他在赠送这些东西时，总是叫人用打字机打好一张证明文件，由他签名，以免误会。

自从中美所正式成立那天起，梅乐斯便在他所住的钟家山办公室前面空地上升起了他那面七星旗，一直到中美所结束。他除了回国养病和出去视察工作的这段期间外，每天一早他总是先叫人去升旗，到傍晚才收下来。我对这面长不到两尺、宽不过几寸的窄长小尖角旗很为好奇。这面旗是白底镶红边，一顺排着七颗红星，

既不象美国国旗，也不象中国过去那种帅字旗。后来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这面旗子的来历。原来是梅乐斯过去当海军舰长时，有次去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反抗美帝的船队时，他的军舰大炮把逃在海上的反美武装船只击沉以后，船上的菲律宾人民便挤在许多小舢板上逃命，很快这些舢板又都一一被击沉了。在他凯旋归来时又遇到一只装人最多的舢板在海上挣扎逃命，他便命令军舰不要开炮，而紧紧尾追，到了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的距离时，他才自己亲手用机枪去扫射。在一船人都被杀死后，他还在舢板底部扫射了一下，这时白色的小舢板内的鲜血便从七个弹孔里涌了出来。他看到这一幅惨景非常得意，第二天便在他军舰上加上了这一面七星小旗用以纪念这一次的胜利。从此以后，这面小旗也成了他的个人的标志了。

在对待部下方面，梅乐斯经常劝戴笠要学他的那一套假民主方法。因为戴一向讲个人威信，希望部下怕他，所以动辄以打骂和监禁甚至枪决来表现他的权力，使别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梅乐斯却与他这一套不同，他就在装备部下时也往往不采用最粗暴的方式。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次是发生在歌乐山地区，当时有一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因在重庆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活，便仗着自己能讲几句英语，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在中美所背后歌乐山开一家小酒店，想赚这些外国人的钱，成天和美特们打交道。有一天晚上，几个美国特务趁着酒店男主人去办货，便把这个女老板强奸了，男的回来不依，告到中美所。梅乐斯知道后，只把几个强奸犯找去说了他们一顿，罚他们一个月不准休假外出；另叫翻译通知我通知当地警察局出面，赔一点钱叫他们不要再在附近做生意，如果不听，以后出了事便不再管。当时附近的警察分局和派出所都是

军械特务所掌握，只要一句话说便把这样一件美特偷灯案轻易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是中美所刚成立不久，正在准备强行征用附近民房民地时，有天戴笠陪同梅乐斯带着我和两个翻译一同在后面山坡上察看形势，忽听到一个小山坡背后传出一阵女人惊叫声和男人的狂笑声。戴笠当时很担心军械特务们在胡来，给他在美国主子面前丢脸，赶快给我使个眼色叫我去去看看。梅乐斯一听到这些声音，也急着想了解一下情况，便跟着向这个地方走去。刚一进小山坳，就看到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中年妇女狂奔而来，两个穿着美军军便服的美特紧紧在追赶。这个妇女看到我们这帮人才停下脚步来，一面理着被抓乱了的头髮，一边用手掩住被扯破了衣服的胸襟。戴笠当时很有点生气，因为他一向是只准自己胡作乱为，而要求部下守纪律，可是对美国人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只有看看梅乐斯如何来发落这两个侮辱妇女的美特。当翻译把这个受欺负的贫苦妇女的话告诉了梅乐斯之后，他却发出一阵狂笑，并用很亲切的声音问这两个美特：“你们调戏这样的女人，不会嫌脏吗？”接着也只轻飘飘说了几句，最后还在他们背上拍了一下便打发走了。戴笠看到这样处置，很不以为然。梅乐斯一跟便看出了他的心事。当我拿了点钱把那个妇女赎走之后，他们便坐在一些乱石上谈开了。梅乐斯趁这个机会劝戴笠，告诉他应当学学美国的一套方式来对待部下，不可动辄打骂，不但要设法使部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戴当时听了也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但以后我却很少看到他能真正这样做。不过每次当着梅乐斯面前，戴对部下那种狂叫怒骂的态度比较有点收敛，而往往改用一些最严厉的字眼，只是说话时态度上稍微温和一点，使人不易看出他在大发雷霆，不过这些话

往往使对方听了更为害怕。如有一次他为了招待那个随法国特务来中美所的越南公主，叫中美所一个事务股长布置一个大客厅，要用六十张藤沙发（因为天气热，他听说越南人爱坐藤椅），结果这个人给他准备的是普通软沙发。当他带着我走进这个临时大客厅一看，马上大怒起来，正准备用脚踢那个事务股长时，我看到梅乐斯已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便赶快告诉他。他立刻改变态度而狠狠的说了两句：“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当他和梅乐斯打过招呼后，又怕还没有说够，再补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这个股长吓得浑身打抖，在戴笠和梅乐斯走开以后，便哭着要求我想办法，因为一下要那么多东西，的确凑不出来。最后由我请稽查处和侦缉大队的特务们帮忙，才从几家藤具店强行借来用了一次。当梅乐斯陪着客人走进来一看只两个多钟头又换上了一番新的布置时，曾对戴笠特别夸奖了一番。

梅乐斯最能使戴笠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在供给中美所和军统所需要的东西方面。戴笠提出的数目往往怕太多而不好意思开口，梅乐斯总是主动地替他增加一些，有时还额外赠送一些，特别在武器弹药炸药等类物品，总是出乎意外地使戴笠感到满足。而美帝特务机关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这种阴谋，也通过梅乐斯来进一步实现了！几年间梅乐斯由中校连升了三级便可说明美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威仪是如何满意了。

## 七 为求美特务心举行的几次盛大宴会

中美所历次举行的盛大集会中，要算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最为热闹了！为了举行这次圣诞节晚会，一座可容四千人大的礼堂便日以继夜地赶建完工。这座礼堂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固定

的座位，因平日集会一般人都是站着听讲话，只有晚会时才临时布置桌椅。在兴建这座礼堂时，所有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部是从美国运来。梅乐斯还特地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华丽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的是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线子。这些万国旗当中，没有德、意、日等国国旗，也没有苏联国旗。为了举行这次集会，军统由印度空运来六十多件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官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礼堂的节日布置从12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戴笠准备赠送美国主子们的礼物也在11月底前都已办妥。梅乐斯在12月初就已由美国运来大批妇女们穿的衣料、台布、糖果与小孩玩具以及圣诞节化装用的纸帽等等。这些东西都分成一份份的装在一个小竹篮筐内。一颗圣诞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用专车装来。一切布置都是按照美国的习惯，由一些到过美国去的女太太们指挥，完全按美国生活方式，处处要使美特们象置身于自己家乡一样。

从12月20日以后，戴笠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去看看，有时还邀请梅乐斯去，看合不合主子的意。为了圣诞晚餐要吃火鸡，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几只供观赏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其余的则用鹅肉来替代。戴笠原来想在宴会后来一次盛大舞会，因为凑不出两百个女客，只好改在宴会后看文娱表演。

这天晚上6点钟左右举行宴会，所有在重庆的美特三百多人全部参加，中美所副组长以上、军统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要带自己的太太和十八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去参加，另外选定了四十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去作陪客。为了怕一些女太太们不敢去，戴

笠先要我通知一下，说明只要参加晚会，不跳舞，去的女客都可得到一小箩筐的美国礼品，被邀请了的女客如不去要查究。等到一进入礼堂，戴笠早叫人把女客们全部分别安排在美特们的中间。有些从来不曾和美国人往来过的女眷，被夹杂在这些美国流氓身边，弄得如坐针毡。宴会散后，有些女眷气得把那一小箩礼物摔在地下和我吵起来，说不该劝她们去活受罪，连祖宗三代的脸都丢尽了。其中也有少数的人认为很难得这种机会参加这样盛大的宴会。

这次被邀参加的有八百多人，在大礼堂当中排着五长条桌子，上首加一横排。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三十多人被请去参加。乐队奏着美国流行的许多小调，引起了美特们的怪声叫好。宴会完毕，即互相赠送礼品。梅乐斯别出心裁地叫每个女客走上礼堂的舞台到他面前去领礼品。戴笠站在旁边，一直鼓励她们要对主人多多表现亲热尊敬。所有女客都只和梅乐斯握一握手便拿着礼品走下台来，其中只有一个一向在香港当舞女的女特务刘美美，在戴笠的鼓动下当众抱着梅乐斯吻了一下，立刻引起了在场美特们一阵狂笑和掌声。戴笠便叫她再来一次，梅乐斯又加一份礼物给她。戴笠还希望其他的女客都学刘美美，结果再没有第二个人肯那样干，弄得他非常扫兴，认为这些人太不合时代潮流。礼物赠送完毕，便开始文娱晚会，京戏刚演一半，一些喝得醉薰薰的美特便跑上台去把演员的大刀、花枪拿过来大耍大闹。戴笠也跟着上去到后台挂一串白长须，跟他们一起乱叫乱打，一直闹到深夜才散。最后我督促办事务的收拾会场时，管餐具的特务哭丧着脸向我报告又有几十双牙筷和银质汤匙被这些美特偷去当纪念品了！

1945年圣诞节是在上海社英路杜月笙家中举行的，参加的人虽然没有重庆那么多，但更为豪华奢侈。因胜利后上海物资供应比

重庆方便得多，特别使戴笠感到满意的是，请的女客都是些所谓名媛闺秀和交际花、电影明星、红舞女与京剧、沪剧、越剧等名演员。她们对与美国流氓往来都有一番，使得在座的美特们皆大欢喜。

在中美特警班大礼堂未建成以前，1943年和1942年的圣诞晚会，都是在中美所美方人员的大饭厅举行的。由于当时马路没有修通，还得坐一段路的轿子(四川人称为滑杆)，因此每次举行类似的晚会，除了全部动员军统和中美所所有的滑杆来接送客人外，还得临时派出大批特务武装和警察把歌乐山、磁器口等地的滑杆抓几十乘来当差。上百名抬滑杆的苦力，被抓来后一直要抬到散会才准回去。有的因连续不断地抬来抬去，弄得筋疲力竭，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把穿着漂亮的女客或贵宾摔了一下或弄脏了衣服，她们总是要向戴笠去撒气，戴一怒之下，抬滑杆的便往往被打得死去活来。

戴笠为了讨好这些美国主子，除了圣诞节外，遇到过春节与军统成立纪念日开四一大会时也要举行一次宴会晚会来招待一番。美帝总统代表赫尔利和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等，到中美所视察时，更少不了也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此外对从美国来的什么慰劳团之类的组织，到中美所来慰问或进行慰劳时，也得大事招待。特别是每次听到梅乐斯升了级，更要为他庆祝一下。每举行一次这种盛大豪华的宴会，所花费的钱，为数都是很惊人的。我因办理总务，对此最了解，像这样一年要举行几次的大宴会，以黄金计算多则要几百两一次，少也得几十两，一席所费就不止穷人百半粮了！

## 八 蒋介石是欣赏美国刑具

1945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带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蒋纬

副、秘书曹圣芬、参軍皮宗闊等十来个隨員，在中美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門看了一下。蔣介石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實驗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和大批从美国运来的良种警犬。这些东西对鎮压人民、巩固他的統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問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贊不絕口。

戴笠和貝乐利(梅乐斯当时回国养病，由美方參謀长貝乐利代理副主任)为蔣介石安排的主要节目，是給蔣介石看看特警班第一期八百名学生的各种精彩表演。在新建成的大操場上，剛把一座檢閱台赶建完工，蔣介石登上去以后，左边是中美所和軍統的中級以上的特务一字排开，右边是中美所近三百名服装整齐的美国特务。这些美特这天都穿上美国海軍制服，我和他們往来几年，还从沒有看到过他們这么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集合过。操場中央站着八百名学生和四十多名美国教官。蔣介石剛一出現，高檢閱台还有一百多公尺远，戴笠便示意我指揮八名号兵吹响“立正”的号音，一直等到蔣介石緩步登上檢閱台答了礼之后才叫稍息。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蔣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課目表演时，蔣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揮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騎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羣毆打羣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連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在交头接耳，后悔沒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蔣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表演近一小时才結束，蔣介石不待戴笠去請他，便走到扩音器前訓起話来，由皮宗闊替他譯成英語。他滿面笑容地先向远道而来为他尽心尽力培养爪牙的美国特务們一再表示感謝，并尽力称頌他們几年来的功績。对这些受了美国式訓練的特务，蔣是



勉勵有加，連說你們不但是戴局長最好的學生，也是我最喜愛的學生，今後你們的責任非常重大，應當有很大決心去完成我所交給你們的任務。他一氣講了近半小時，才在一陣歡呼萬歲聲中離去。

### 九 任務未完，先行結束

根據第一次合同的規定，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中美所便應結束。可是戴笠和梅爾斯卻認為這次親密的合作，任務還沒有完。因為除了在幫助軍統搶先進入淪陷區去接收和阻止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部隊進入各大城市這一合同以外的工作做了一些外，對訓練反共有經驗的漢奸特務和繼續幫助軍統全力與共產黨作鬥爭的任務並未完成，雙方且均依依不捨，但一時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再繼續下去。

戴笠在得到蔣介石准許之後，才於1945年冬天第一次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幾年的所謂成績，公開在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公布出來。梅爾斯在離開中國之前，曾一再向戴笠保證過，為了將來幫助國民黨戰勝和消滅另一個比日本更兇的敵人——中國共產黨，他們隨時會再度回來與軍統進行更親密的合作。而在幫助國民黨建立起一支用以鎮壓中國人民的海軍由戴笠來統率，他們是會盡到最大的努力的。戴笠死後，梅爾斯從美國趕來吊唁時，還一再向毛人鳳、鄭介民表示過這種“慷慨的”願望。但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勝利得太快了，使得他們永遠失去了卷土重來的機會。

至於中美所的結束工作，完全是由軍統局代為辦理，我在另几篇材料中已經記述過，這裡就不再重提。

. 615554



